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华西列夫斯基



作者前言

在任何版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著名将帅名录里，人们都完全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这样一个名字。这是因为，在阵容颇为强大的苏军二战帅林中，这个名字至少是常常被排列在第三位。能排在它前面的另两个名字分别是当时苏军的正副最高统帅斯大林和朱可夫。

根据战争年代流传下来的另一种说法，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两人是斯大林缺一不可的左右手或左膀右臂：一个是运筹帷幄的智囊，一个是驰骋疆场的统帅。不过，这种说法形象是形象些，却并不十分准确。

就像朱可夫元帅并不缺乏运筹谋略之术一样，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也同样智勇双全。

在这方面，作者倒好有一比。就如同中国古代历史上大名鼎鼎、声名远播的军事天才卧龙诸葛先生一样，伏尔加河之水滋养成长的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也是既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深谋远虑，又有统领三军、能征惯战的骁勇神威。他，当然是一位智囊式的军事天才，同时也是一位战功显赫的统帅式人物。”

华西列夫斯基，这既是一个令法西斯德军和日本关东军闻风丧胆的名字，也是苏联人民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反法西斯盟国人民十分爱戴并感到亲切的名字。在中国东北的广大地区，至今还流传着当年以华西列夫斯基为总司令的苏联远东军与日本关东军作战的许多故事。在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史或现代史的著述或教科书里，也都载有 1945 年 8 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的基本史实，连同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不朽英名……

需要预先说明的是，华西列夫斯基的成长道路及其全部军事生涯，并不具有更多的传奇性色彩。本书没有、也没有必要在这方面去做刻意的搜寻与涂抹，它所反映的只是华氏怎样由一个普通的俄罗斯少年成长为著名的苏军统帅和二次世界大战名将的真实过程。

华西列夫基于 1895 年出生于一个普通的俄国乡村神父之家，他的少年时代的生活就是田间劳动和读书。此前，在他的家庭和家族史上，几乎没有过任何一个与军职或军事有关的人。有意思的是，虽然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在神学校里就读，但他却一点儿也不喜欢神职和神的事业，也完全不想保留自己的所谓僧侣阶级身份。相反，他倒很想到一所世俗的农业大学去读书，然后成为一名农学家。后来，斯大林曾当面半真半假地问他为什么不想去当神父，他只是说，根本没想过这件事，他父亲也没强迫他。

1914 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 岁的华西列夫斯基抱着“报效祖国”的纯朴念头参军了。由此，他接受了军旅第一次的战火洗礼，也尝到了军旅生涯的滋味。但是，他没想到战争会越打越长，沙俄军队在战场上也连遭败北。虽然他已由起初军校毕业时的准尉军官被提升为上尉营长，但还是于 1917 年 11 月自行决定退伍回家了。这时，俄国十月革命刚刚爆发，军队内部极乱，他只好决心回家再去续他那未了的读农业大学、当农学家的旧梦。这年，他 22 岁。然而，当时的动荡社会现状根本不可能给他提供这样的机会和可能。

华西列夫斯基先是在家乡所在县的地方苏维埃军事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当了8个多月的乡村教师。到1919年4月，他终于被获准参加了苏俄工农红军。由于得到布尔什维克党的信任，他才终于感到“服军役是唯一适合我的禀赋的职业”。

他在红军的队伍里先后参加了反对反革命白匪军武装叛乱和抗击帝国主义联合干涉军的伟大战斗。国内战争结束后，苏军开始改革和整编。自1922年起，他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团长工作，从而积累了一套相当丰富的中级指挥员的经验。1931年起，华西列夫斯基因表现优异、治军有方而被调到红军军训部任职。1939年夏天，他又被调到苏军总参谋部工作。初始，任战役训练处处长，至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被提升为总参作战部第一副部长。

此间，华西列夫斯基曾两次到苏军军事院校学习深造。1926年他奉命到“维斯特列尔”步兵战术进修学校参加了为期一年的团长班学习。1936年秋进入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学习。在这里，他打下了深厚的军事理论基础，这为他后来运用自如地筹划和指挥反法西斯战争的一系列重大战役创造了条件。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华西列夫斯基先后担任过总参作战部长兼副总参谋长、苏军总参谋长、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副国防人民委员、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司令和远东苏军总司令等一系列要职。这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刻，也是他全部军事生涯最有闪光意义和代表性的阶段。

此间，他直接参与了几几乎所有的苏军东西两大战线全部战役的具体筹划和统帅指挥工作。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给了他高度的赏识和信任，他也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精力贡献给了这场空前宏伟的反法西斯战争和卫国战争事业。在1941年12月的莫斯科保卫战中，华西列夫斯基率总参第一梯队10人小组有力地支持了斯大林。1942年春夏之交，德军在南线猖狂突进，他临危受命出任苏军总参谋长一职。此后，他在大本营和战争前线往返奔波，成功地协助斯大林领导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斯大林格勒会战、库尔斯克会战、解放顿巴斯、收复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等战役。1944年夏，他由苏德战场南翼转到西部，后又转到西北部，筹划和指挥了白俄、罗斯战役和波罗地海沿岸战役。最著名的是进军德国领土东普鲁士的作战和1945年对日出兵的远东作战。在所有的苏军特大战役中，只有柏林战役他未参与，因为那时他正在负责准备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出兵作战事宜。

由于华西列夫斯基在上述一系列战役的筹划和指挥中成就突出并贡献巨大，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曾两次授予他“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他还先后于1943年4月和1945年3月两次获得“胜利勋章”——苏军专门为奖励在统帅和指挥战争中建有大功勋的领导人和高级将帅而设立的最高级别勋章。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曾经两次获此殊荣的只有斯大林、朱可夫和他三人。与此同时，他的军衔也由战争初期的少将晋升为中将、大将，到1943年2月，则荣升为苏联元帅。这时，他还不满47岁。

华西列夫斯基是苏联“少壮派”军事将领中的佼佼者。能够与他比肩齐名的只有朱可夫一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悠悠岁月里，华西列夫斯基以其崇高的威望和显赫战功一直担当苏军的主要领导工作和苏联政府国防部门的领导工

作。他先后担任过苏军总参谋长兼苏联武装力量部第一副部长、苏联军事部部长、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国防部部长及国防部总监察长等一系列要职。他也是苏联 50-60 年代的主要军事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之一，直至 1977 年逝世。

华西列夫斯基是由高级参谋成长为苏军一代名将和统帅人物的。这与斯大林的军事观点和治军原则紧密相连。与传统的军事观念不同，在斯大林看来，优秀的参谋人员绝不至于当不了指挥员。事实上，苏军中很多著名将帅都做过参谋工作，单只由总参谋部岗位上出来到各部队充任高级军事首长的，就有朱可夫、瓦图京、麦列茨科夫等一大批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则是这方面最好的代表人物。

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和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华西列夫斯基身上的担子特别重。

在这方面，除最高统帅斯大林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人能与他相提并论。这也是他工作职责所决定的。作为战争年代在职时间最长的苏军总参谋长，他不仅要统筹全局，参与策划各条战线、各个方向上的一系列战役活动，而且还要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独当一面，做好自己所在方向上的战役领导和协调工作。由于这两项工作都不得偏废，使他不得不经常地在战争前线与莫斯科指挥中枢之间飞来飞去，长期奔波。只是到战争末期，由于白俄罗斯第 3 方面军司令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元帅负伤牺牲，他才主动提出辞去总参谋长一职以接替该方面军的指挥工作。为此，斯大林又专门把他安排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 6 名成员之一，以示对他的须臾不可离。

在苏军众多的统帅人物中，华西列夫斯基向有儒将之称。他性格敦厚，待人热诚，严于律己，谦逊自处。他尊重每一个人，从最高统帅到集团军或军师一级的首长。一次，在完成一次重大战役行动之后，斯大林曾对他开玩笑似地说：“华西列夫斯基同志，您指挥这么一大批军队，而且干得不坏，但您自己也许连苍蝇都从来也没有欺侮过。”他从来不认为粗暴是统帅性格的特征，也不认为它是指挥军队的重要因素。他自己也曾说过，“要心平气和并且不让自己提高嗓门，并不总是那么容易。但是……经常要攥紧拳头直到手指发疼，默不作声，克制自己不去骂人或吼叫。善于在下属面前保持自重，应是苏联军事首长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品质”。

华西列夫斯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他相信部属，尊重并信任下级，维护他们的自尊、自尊心。他非常了解，在像苏德战争初期那样很不利的困难局面下，要保持严密的组织性和工作的严肃性是不容易的。所以他极力提倡集体的团结精神，努力造成一种使大家感不到上面的压力，而是感受到有经验的老同志和首长们的有力支持这样一种工作气氛。他对下级历来热情、关怀、坦诚和信任，所以在总参谋部深受大家的爱戴，也获得了崇高的威望。

他的另一个特点是勇敢沉着、机敏干练。他曾在战争期间不止一次地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在前线作战部队工作，但是每次都能准时圆满地完成最高统帅部赋予的使命和任务。他写给最高统帅部的报告，都非常全面而极其明确。他的这一素质深得斯大林的赏识，所以当需要深入地分析某个问题、制定某种可靠决定或提出某项完善的建议时，斯大林常常把他派到前线去。斯大林十分相信华西列夫斯基的判断和建议的准确性与合理性。

他的一个特殊天赋是能在事件的发展中抓住主要的东西，及时作出正确结论，并能极为清楚地预见到事件发展的趋势。但是，他从不炫耀自己。

相反，他总是非常注意倾听别人的意见。他从不打断别人的话，即使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也能耐心地讨论并做说服工作，最后往往使对方心悦诚服。同时，他也很善于在最高统帅面前坚持自己的观点，在这方面他既灵活又坚定。具有此种勇气和本领的，在苏军高级领导人中只有他和朱可夫、安东诺夫等极少数几个人。

在作战风格上，华西列夫斯基的特点是决心大，计划周密，力图合围敌人，切断其退路；或分割敌军集团，以便随着战役发展而各个歼灭之。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战役、克里米亚战役、白俄罗斯战役、麦麦尔战役，尤其是东普鲁士战役和庞大的远东作战中，这种特点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所有的作战行动中，他都随时准备无条件地效忠祖国。他从不夸耀自己的功绩，反对任何吹嘘。在取得战役胜利后，即使是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从不强调自己的个人作用。

第二版《苏联大百科全书》给统帅下的定义是：“统帅乃是领导全国武装力量或战役战略大军团，具有准备与实施战略性战役的雄才大略，并能运用作战经验创造性地发展军事学术的军事家或军事首脑。统帅作用的大小，取决于他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探索和运用可导致作战胜利的作战方法的才干。”

华西列夫斯基自己也认为，指挥战争是一种独特的创造性艺术活动，“完全应该把那些在战场上最卓越地表现出自己的军事艺术和才能、勇敢和必胜信念的军事首长列入统帅的范畴”。在他看来，不仅方面军司令，而且集团军司令级的高级军事首长也应被列入统帅之列。他曾写道：“衡量战争年代里统帅活动成绩的准绳，当然是完成战略性的方面军和集团军战役的任务以及把敌人打得惨败的艺术。”

华西列夫斯基不愧为一代统帅，他无愧于自己的英名和所得到的褒奖！

在考察华西列夫斯基的成长过程中我们还发现，对他一生起到过特别大影响的人，应该首推早年的苏军总部作战部长兼副参谋长特里安达菲洛夫和苏军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他们像伯乐一样发现了他，随后又培养和提拔了他。前者把他由基层部队的团级指挥员调到了红军军训部，由此他才得以站在更高的位置上全面认识了解苏军，同时也锻炼了自己。后者把他调入了苏军总参谋部，并在随后直接把他推荐给了最高统帅斯大林，从而使之得以进入苏军最高指挥中枢。当然，伏罗希洛夫元帅和斯大林本人对他的推重和赏识也是极为重要的。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他一直对斯大林给予的关怀和器重深为感激，并始终认为斯大林不愧为最可钦佩的军事天才和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骄傲领袖。

话说回来，任何别人的推荐和赏识，都必须以自己的天赋和努力为既定基础，不要说在军事领域内和战争年代中，就是在其他没有较大风险的领域内或和平时期，这也照样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用一句中国话来说，成事在天，谋事则完全在人。所谓事在人为，此之谓也。

关于本书的结构安排，考虑到丛书的创意和整体性，作者着重写了传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军事活动，战前的军事生涯也做了较详细的介绍，用以说明其从士兵到元帅的成长过程，其他则未便涉及。

最后，作者需要说明的是，撰写本书的材料收集工作是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完成的，得到了戴茂林等同志的大力帮助。这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看到过一本中文版的给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作传或较完备的介绍性作

品。无疑，这给本书的写作带来了许多不便，其中有些关系到时间和具体事件的准确性问题，不得不去翻阅大量相关的著述或文字。在这里，请允许我对戴茂林及所有给我帮助的人们表示由衷的感谢之忱！

此外，本书的撰写是在极为仓促的时间里克服种种困难和不尽人意事件中完成的，又兼作者自己能力、水平所限，因此它很可能存在包括各方面的疏漏或失误之处。凡此种种，敬希有识专家和读者诸君给予批评和指正。

作者在不胜惶恐中祈盼您的赐教。

1994 年 8 月 31 日

于青灯下

第一章 神父之家出少年

贫寒布衣自乡间，神父之家出少年；

不乐神业思农稼，戎马一生违父愿。

任你打开一幅俄罗斯地图，就会发现，著名的伏尔加河中部平原，是从伊凡诺沃州和科斯特罗马州交界处开始的。19 世纪末，这里曾经有大片大片的森林，而翁扎河、涅姆达河、卢赫河、科斯特罗马河等伏尔加河支流都从它中间流过。似乎它们就是为了孕育这森林平原，养育在它的上面世代生息的古朴的人们。

如果乘轮船沿伏尔加河自科斯特罗马向下游驶去，途经美丽如画的普列斯城，则可一直驶进以盛产亚麻织品著称的基涅什马城的码头。由该城向西南方向有“铁罐子”（旧俄时期人们对火车的早期称呼）直通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再向南，有一条大路直通当地著名的尼基季诺大村庄，与它毗邻的还有个有名的巴特曼纳商业村。这里是附近贫穷村落的一个小热闹中心。它旁边的一些村子居住的人们，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以到过这里或了解这里的某件事情为荣耀。

在距这个所谓的“热闹中心”约 5 公里的地方，曾有一个名叫诺沃波克罗夫斯克耶的小村子。虽然它小得根本名不见经传，但历史可以作证，它确实是那种标准的古典俄罗斯式乡间自然村落。这里土地贫瘠，居所困顿，人们只能靠近乎原始的农业耕种来维持生计。尽管在村落四周长满了笔直高大的漂亮云杉，但生活艰辛的村民们根本无心领略这大自然赐给他们的美丽景色。现在，这些古老的村落早就消失得没有踪影，即使是当地的俄罗斯人，也没有多少还能记得起它了。

但是，谁能想到，曾经叱咤风云，独领风骚并享有深谋远虑、智勇双全之美名的著名苏联元帅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就出生并生长在这里呢。

像许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建树起盖世英名的苏联元帅和将军们一样，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确实来自于地道的乡间农舍。若套用一句中国古话来说，正可谓“起自布衣”。也许是旧俄时代俄罗斯乡间特别贫穷与落后，或许由于数不尽的少年磨难与坎坷，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有一种格外的顽强，一份特殊的机敏。也许，这就是那另一种类型的带有异国风味的“天生丽质难自弃”吧。

然而，在华西列夫斯基身上，还有许多不同于他人的特殊之处。仅就其出身与少年志向而言，他的父亲是一位乡间神父，而在他出生时，父亲还仅仅是一个为生活所迫的教堂合唱团的诵经士，他自己自幼也一直在神学校里读书。尽管如此，他并不喜欢神的事业和神职，他也没有想成为一名军官或军事家，而是想成为一名农学家，即使当了沙俄的军官后，他仍想在退役后重新实现他当一名农学家的梦想，甚至在读完军事学校后仍想去读一所农业大学。也许，神职离他太近了，近得几乎伸手可及；而军人或军事家又离他太远了，远得难以设想。那么，农学家呢？或许这是他现实和理想的综合物？真让人说不清楚。

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像一个谜，如果你仔细地加以品味的话。

华西列夫斯基于 1895 年出生于基什涅马县诺沃波克罗夫克耶附近的新戈利哈村（现在是伊凡诺沃州维丘加区）。还在孩提时，他便开始为贫困的家庭从事简单的劳动。他经常与邻近的小伙伴们远出故乡的森林，到那里采摘各种蘑菇和野果，有时也同哥哥们到田间开荒种地，同农民们一起去割草或打柴。为此，他自幼便熟悉并喜欢上了家乡的山水和一草一木，他几乎走遍了家乡附近的所有森林地区。一次，为了到较远的地方去采摘更多的鲜蘑和野果，他同两个小伙伴天不亮就从家里出发了。由于采集得太多和一整天的林中奔走，他们既背不回来，又感到过分的疲劳，以致下午休息时在林中睡着了。待到醒来，发觉天色大黑，竟辨不出回家的方向。

直到很晚的时候，他们才被家里派来找的人寻见。当时真急坏了家人，母亲流着泪对他说：“以后再不要去那么远的地方了。”他却说：“我还要去，但下次我要在林间做好记号。因为只有到那边去，才可采到更多的蘑菇嘛。”

华西列夫斯基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长年的贫苦生活条件下度过的。也许，这对他那坚忍、刚毅与勤奋、顽强的优秀品格的养成大有好处。但在当时，这确实是为生活所迫，不能不说是对他幼小心灵的一种过重的负荷。按理说，童年生活应该是天真烂漫、温馨快乐的。但毕竟生逢斯时，命蹇时乖，这也是人们无法预先选择的。

后来，华西列夫斯基经常对自己的战友和朋友们谈论这样的话题：少年磨难对一个人来说可以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包袱，一是财富。关键在于你自己如何去面对它。

华西列夫斯基的父亲就是一个榜样。其父自幼即在乡间随祖父耕作劳动，供养家庭生活。其父 17 岁时，祖父病去，祖母很快便改嫁，这样，未成年的父亲便不得不自谋生计。孤苦无依之时，友善的乡人纷纷劝他利用自己的一副好嗓子到科斯特罗马大教堂的唱诗班去找个差事。几经奔波，四处求人，最后他终于在本村谋得了一个教堂合唱团诵经士的职位。后来，他还成了这个唱诗班的指挥。不久，他与同县的乌格耶茨村的一位诵经士的女儿娜杰日达·伊凡诺夫娜·索科洛娃结了婚。由于他自己的勤奋和努力，终于在 1896 年（即生下华西列夫斯基的第二年）被上级教会组织派到他故乡附近的诺沃波罗夫斯克耶村当上了神父。随后，即举家迁居这里。

华西列夫斯基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大部分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尽管如此，父亲的微薄收入仍不足以满足他创下的这个多子女大家庭的生活之需。因为，到 1912 年，除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之外，父母又为他生下了两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华西列夫斯基自幼聪颖勤奋，甚得父母喜爱。据华西列夫斯基自己说，由于要维持这个多子女大家庭最起码的生计，父亲

于神职之外不得不在冬季里做些木工活来贴补家用。有时是给地方当局定做学生用的课桌、饭桌和门窗，有时则给养蜂场做些蜂箱。此外，他们兄弟姐妹无论从小到大都在菜园和田地里从事农业劳动。聪明的母亲曾安排他们每个人做一种固定的农活儿。分配给他的活儿是每天割草，冬季里有时也随父亲一起做些木工活儿。

家境虽然如此，但严格说来，他们一家的生活还不是最坏的，尤其比起当地的那些纯粹的农民家庭来说要好得多。后者的家庭生活往往更为艰难，于女们也很少能有书读。在他的幼年小伙伴中，有许多刚满 10 岁就不得不到附近的工厂里为财主当童工。他们的工作有时与成年人一样，但工厂主给的工钱却少得可怜。这种情况在童年的华西列夫斯基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最初的不平。他常常想，自己的命运和遭遇至少要比这些可爱的小伙伴们好上许多倍，因为他自幼就有书读，也不缺乏必需的裹腹之食与蔽体之衣。

按照父亲的安排，从 8 岁起，华西列夫斯基就在故乡的教会学校读小学。小学毕业后，父亲又送他到县城的基涅什马神学校去读神学。在欧洲，一般的神学校或神学院都具备较好的教学条件，学生在那里既可以专攻神学专业，以求毕业后谋得一可靠而稳定的神职，此外也可在自然科学方面获得丰富知识，并兼顾某些人文科学常识，即类似于旧低时代的普通中学的内容。

1909 年春，即在华西列夫斯基快要在基涅什马神学校毕业前，他的家遭了一场大火，家中所有的房子和财产几乎全部烧光。于是，华西列夫斯基向父亲提出，他不准备再去省城所在地的科斯特罗马神学校读书了。因为那里每年的食宿费高达 75 卢布，而这对他遭难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种新的沉重负担。此外，他不便言明的另一种理由便是，他不想再去攻读父亲执意要他去学的神学专业。因为，他从内心里并不喜欢父亲所从事的神职事业，更不愿意永久地保留自己的僧侣身份。但是，最后父亲还是东挪西借地为他凑足了这笔读书费用。于是，华西列夫斯基的心软了。

毕竟父情殷殷，父心拳拳，怎好执拗相拂呢？这样，这年秋季，华西列夫斯基便带着学具和行李到科斯特罗马神学校报到了。

正像当年由小小的诺沃波克罗夫斯克耶村来到县城基涅什马眼界大开一样，这次来到科斯特罗马省城，更使华西列夫斯基感受到这外面世界的更新更大与更加奇妙。

那时，科斯特罗马城大约有居民 5 万余人，比起县城基涅什马来，自然要大得多了。市中心耸立着当地的一位人民英雄苏萨宁的巨大塑像，塑像下面的巨大广场也是以这位英雄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广场上还有一座八面体的城区消防了望塔，它旁边是地方警备队的装饰华丽的大楼。在大楼前面，有一排漂亮的柱廊和亭亭玉立的铁铸华灯，周围则是鳞次栉比的商店、食品店、面粉店、鱼店等建筑群。紧挨着这些华丽的商店后面的，是议会广场和一座美丽的公园，修筑在人造土堤上的一条公园林荫路，一直伸到伏尔加河岸边。每逢黄昏时分，市民和在这里就读的外乡学生们，都喜欢到这里散步。

科斯特罗马神学校就坐落在临河街的上游。春秋季节，学生常常三五成群地在河对岸观赏风景宜人的美丽市景。在科斯特罗马河流入伏尔加河的入口处，有一所在当地颇为著名的修道院——伊帕季耶夫修道院。它悠久的历史，以及它那镶嵌着无数神奇壁画的墙院和塔楼、教堂、楼阁，无不散发着古代俄罗斯文化所特有的幽光。每一个到过这里的人，无不为之倾倒。

在当地各种门类的学校中，华西列夫斯基就读的神学校颇负盛名。比

之周围的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女子学校等学校，它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学生的思想相当进步。有些布尔什维克党人就利用与教会的特殊关系，亲自在学校的学生中进行宣传工作。然后再由这些学生将革命思想逐步传播到附近的科斯特罗马工厂的工人中去。

为此，也曾有学生遭到当地旧俄政权逮捕，但是，反动派的镇压非但不能阻止革命思想的传布，反而在更多的学生中引起了同情和复仇的情愫。1909 年全俄神学校罢课事件在科斯特罗马神学校的反响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

当时，华西列夫斯基刚刚入学不久。这次全俄性质的神学校罢课事件，主要是为了抗议国民教育部禁止神学校普通教育四年级毕业生升入世俗大学或专科学校这一决定而举行的。华西列夫斯基原本就对神学专业及毕业后的僧侣身份极不感兴趣。

实际上，这也是革命前很多神学教育系统内的进步学生的普遍观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谋求神职立身的打算，而只是想把读神学校当作进入世俗高等学校的跳板而已。因此，当全俄性的罢课消息传来后，该校的学生立即奋起积极响应，实行全校罢课，华西列夫斯基自然也是这一行动的积极参加者之一。罢课事件发生后，省长亲自来该校，并与校长一起在大礼堂会见罢课学生，劝说他们停止罢课，并要求罢课委员会收回他们递交的请愿书，明令立即复课。但是，学生们当场噓了他们，致使他们不得不在一片反对声中退出会场。嗣后不久，地方当局采取了暴力手段，出动警察在 24 小时内把全部学生赶出科斯特罗马城，学校也被强行关闭。

当局的这种做法，更大地激怒了学生。学生们虽被赶出学校和科斯特罗马城，但他们把抗议的思想撒向遍布全省城乡的各个角落，以至很多基层的教会学校和神学组织也大感压力。最后，当局无奈，乃通过谈判答应了学生们的部分要求。于是，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学生们又回到了学校，当然，这次他们是以胜利者的高昂姿态重返校园的。事实上，当时不惟科斯特罗马神学校的学生们不乐意毕业后奉职神业，就是在全俄的许多地方也全皆如此。据当时的《基涅什马报》载：“……上年伊尔库茨克神学校有 16 人毕业，其中只有两人希望继续保留僧侣身份，其余的都想升入高等学校……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神学校今年有 15 人毕业，其中愿意接受神父头衔的连一个也没有。”

也许是事出偶然的阴差阳错，也许是历史命运的召唤与注定，到底华西列夫斯基也没有像他父亲希冀的那样成为一名神职人员。不仅如此，就连他老父殷殷盼望的科斯特罗马神学校的 4 年学习他也没有如期完成。当然，这并不是由于华西列夫斯基的偷懒不学或学业欠佳。完全相反，这是因为另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年轻的神学校学生的终生命运！

1914 年夏，像往常一样，华西列夫斯基回到生养他的诺沃波克罗夫斯克耶村度最后一个暑假。俄历 7 月 20 日，他正与家人在菜园里从事劳动，突然听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于前一天爆发了。他提前赶回了学校。他怀着纯朴的爱国主义感情，立即与几位同学商议，要求提前参加毕业考试，然后报名参军，以求报效祖国。

他的要求当然得到了满足……

但是，他没有意料到这次战争能打得那么久。他更没有预料到的是，

此次投军竟改变了他终生的命运……

华西列夫斯基在回首这段经历时曾不无感慨地写道：

战争打破了我原先的一切计划，将我一生推向了原来根本没有想象过的另外一条道路。我曾经幻想在神学校毕业后到某个农村学校当上 3 年教师，积攒一点钱，然后再进农业学校，或者进莫斯科测地学院。然而，现在战争打起来了，爱国主义的感情激励着我，保卫祖国的口号使我心潮澎湃。因此，我当了兵，这是出乎我自己和亲人意料的……

（进入莫斯科阿列克谢耶夫军事学校之后），我所以决定当一名军官，并非为了想在军界飞黄腾达。我仍然幻想着成为一名农学家，打完仗之后，在俄罗斯广阔无垠的大地的某个角落里从事劳动。当时我并没想到一切都将来个大变样：不仅俄罗斯变了样，我自己也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在这里，华西列夫斯基所说的“大变样”，当然是指俄国 1917 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事情。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他由一个旧俄军官成了苏联红军的一员，到后来甚至成为苏军的高级领导人和统帅。

梦想中的农学家没有当成，不知华西列夫斯基后来作何感想，也许干脆早就忘了。但是，尽管他不喜欢神学和神职，可他的出身于神职家庭这一不可更改的事实，却在后来给他带来了许多麻烦，以至他在 1926 年以后不得不与自己的生身父母断绝了一切关系——不然，他很难在苏联红军中得到重用，更难于加入他所竭诚拥护的共产党组织。或者，他也很可能被迫要求脱离军界。因为，他的父亲直到 30 年代——那是一个可怕的年代——仍然没有脱离教会组织，仍在从事他大半生一贯从事的神职事业。

华西列夫斯基是个极重感情的人。从小因很得父母的喜欢和宠爱，所以他向来都敬重自己的父母，留恋自己那亲切的童年时光。但当革命和党的事业要求他在这两者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时，他还是选择了后者，就像当年许多出身于所谓非革命家庭的革命者一样。对此，恐怕我们中国读者是最好理解不过的了。可是，尽管如此，这并不能说明在华西列夫斯基的内心世界中没有产生过任何想法。

说来有趣的是，这个问题的解决还是在斯大林的亲自过问和关怀下实现的。

大概是在 1940 年春天吧。那时，华西列夫斯基已经是总参谋部作战部第一副部长了。为了讨论当时还在秘密状态下的对德“反击侵略计划”，他经常与当时的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到斯大林那里去汇报工作或研究问题。由此开始，他便与最高统帅熟悉起来了，斯大林也赏识他的机敏和干练。由于工作关系，斯大林有时也请他们与自己一道吃饭，席间话题非常广泛。有时斯大林还与他们一起开玩笑或随便聊天。一般地说，在称呼华西列夫斯基的时候，斯大林喜欢直呼其名，有时也加“同志”二字，而有时干脆则称他为“沙波什尼科夫的人”。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是总参谋部的人，而沙波什尼科夫元帅是当时的总参谋长。另一方面，斯大林知道沙波什尼科夫特别欣赏这位中年人，后者经常在他面前对其夸奖不断。此外，他还知道华西列夫斯基的调入总参及升职，都是由沙波什尼科夫举荐的。

一次，在开得相当冗长的政治局讨论会议过后，斯大林邀请所有与会人员到克里姆林宫进餐，其中包括向政治局委员们报告“反击侵略计划”起

草经过的沙波什尼科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由于会上就总参谋长的工作报告通过了一系列有关作战部署的相当紧迫的决定，沙波什尼科夫便指示华西列夫斯基立刻返回总参，以便从那里立即发出与此有关的新命令给各作战部队首长。待华西列夫斯基回到总参 45 分钟之后，斯大林便叫秘书打电话给他，说是现在克里姆林宫内所有的人都在等他吃饭。

华西列夫斯基很快便办完了交代的事情，几分钟后便谦恭地回到了克里姆林宫。

在祝酒中间，斯大林忽然举着酒杯来到华西列夫斯基身边，说：“我提议，为我们可敬的沙波什尼科夫将军的人的健康来干一杯！”华西列夫斯基连忙站起身来，说了声：“谢谢！”照常理，这只是礼节性的场面，放下酒杯也就过去了。哪知道，这次斯大林并未离开他，相反，倒是向他提出了一个根本意想不到的问题。“米哈伊洛维奇，我很想问您一个问题。请问您在神学校毕业后为什么不去当神父呢？”斯大林半严肃半带笑意地问道。

华西列夫斯基先是一怔，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最高统帅会在今天这种场合问他这样的问题。窘了一阵儿之后，他结结巴巴地说：“无论我还是我父亲都没有过这种愿望，至少是我没有过这种想法。况且，我父亲的 4 个儿子中没有一个是当神父的。”

听了华西列夫斯基的回答，斯大林微微一笑，说道：“是啊，是啊。您没有这样的愿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年我和米高扬都曾想去当神父，却不知人家为什么不收留我们。这其中的原因，我们至今都不清楚呢！”

大家听后纷纷笑了起来。

然而，谈话至此并未结束。

“请您说说，”斯大林忽然变得有些严肃了，“您和您的兄弟们为什么在经济上一点都不帮助父亲一下呢？恰好，我多少知道一点你们家的情况。您的一个兄弟是医生，另一个是农学家，第三个是指挥官、飞行员，而且收入相当丰厚。如果老人不是现在、而是很早以前就离开教会的话，我想你们都会帮助双亲的。他所以需要教会，也不过是为了维持生活嘛！”说到最后，可能觉得对方会认为言辞过重了一些，于是，斯大林把口气缓和下来。

听了这番很富人情味的话，华西列夫斯基心里很感激这位领袖兼长者，但他也确实有自己的难言之隐。说不说呢？他抬头望了望最高统帅，决定还是把话说出来为好。

“是的，自 1926 年起，我就同自己的双亲断绝了一切联系。”华西列夫斯基毕竟心情沉重，语气也是缓缓的。”当时如果我不这样，那么显然，我不但不能加入到我们党的队伍里来，而且未必”能够参加我们的军队，甚至更谈不到现在到总参谋部服务了。”说完后，他没敢去看斯大林，只是低头用余光扫了一眼周围的几个人。

在座的听了，不禁为之哑然。确实，苏联党内长时期的“肃反”及一系列政治斗争，曾使多少人无辜地因为并不十分重要的家庭问题或历史问题而被清除掉了啊！

但是谁敢当着斯大林的面诉说这些呢？

斯大林一语未发，似思似听的样子。

见得此状，华西列夫斯基略略地挺了挺身子，继续补充说：“几周前，我突然收到老父亲的一封来信。”他顿了顿，像是吞入口中一种什么东西似的，“这是我十多年来第一次收到他给我写来的信。但是，由于在我至今填

写的履历表中一直说同双亲没有任何联系，所以，我立即将这封信的事报告了我的党组织书记。他告诉我说，你今后在同双亲的过往关系方面，还应保持过去的一贯做法。”

“什么？”斯大林突然叫了起来，眼睛也瞪大了许多。

在座的好多政治局委员也不胜惊讶。

“你应该立即与你的双亲恢复联系，并一定要在经济上给他们一些帮助。”斯大林有些激动了，继续道，“因为，他们是你的生身父母！这是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不能改变的。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当然需要坚定的立场和革命的品格，但这并不是说要做冷血动物！更不提倡六亲不认！更何况自己的双亲呢？！”他稍停了一下，又说，“对了，请你将这样做已被允许的情况，直接转告给你们总参的党组织。就说是我的意见，当然，也是在座的各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说完，他看了一眼在场的政治局委员，大家纷纷表示支持和首肯。

事后，华西列夫斯基曾对友人说：“我确实由衷地感激最高统帅对我的关怀，更感激他对我父母双亲的真挚感情。通过这件事，我最近距离地、最深切地看到我们的领袖的另一面：亲切，尊重别人的感情，富有人情味儿。”

据华西列夫斯基回忆说，此事过了若干年后，斯大林不知为什么又在另外一个场合向他询问起了他双亲的情况。

他问道：“您的双亲现在住在哪里？日子过得如何啊？”

华西列夫斯基说：“母亲已经去世，父亲已经 80 岁了，现在住在基涅什马的大女儿那里。她以前是个乡村女教师，丈夫和儿子都在卫国战争中牺牲了。”

“那您为什么不把您父亲，或者连同您姐姐接到您这儿来呢？如果他们住在您这里的话，总不会更坏吧、”斯大林劝说道。

华西列夫斯基告诉自己的最高统帅说：“现在他们生活得很好，他们不愿远离自己的故乡和土地。这次确实不再是我的错了。请您一定相信这一点，好吗？”

斯大林笑了。显然，他很喜欢华西列夫斯基这种有头脑又机敏的部下。

第二章 沙俄军中一上尉

欧洲大战起烽火，投笔从戎为报国；

沙俄军中一上尉，转战千里费思索。

在现代苏联军事史或战争史上，确实涌现出过为数颇众的勇冠三军、功名盖世的帅林英才。但是，在他们中间，像华西列夫斯基这样既亲身经历并直接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程，又亲身经历并直接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全程的人，确实不多。

如果说，是命运注定要使华西列夫斯基成为一名军人，那么，这应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如果说，作为一名军人必须要经受过战场的战火洗礼与考验，那么，这在他也是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不消说，1914—1918 年这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规模的战争远不是所谓的人类正义之战。但就其中某些参战的个别军人来说，他们的动机则不一定不是纯正而健康的。本书传主当年的投笔从戎，积极加入战争率伍行列，就是相当典型的一例。

华西列夫斯基那时还是一个不足 20 岁的热血青年，他之投身旧俄沙皇军队，积极参加战争，正是抱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怀就一颗报效祖国的热心而去的。他根本不了解这竟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发生的强盗式的战争。

却说华西列夫斯基请求提前毕业、报名参军的愿望得到满足之后，旋即作为现役军人被置于科斯特罗马省军事首长的管辖之下。1915 年 2 月，华西列夫斯基被派往莫斯科，准备在那里进入阿列克谢耶夫军事学校学习。

俄国当时共有十多所专门性的军事学校。就级别与名气而论，巴甫洛夫军校属第一，亚历山德罗夫军校属第二，阿列克谢耶夫军校则排名第三。该校创立于 1864 年，原名叫莫斯科步兵士官生学校，后奉俄皇尼古拉二世之命，为纪念新诞生的王位继承人，乃于 1906 年改名为阿列克谢耶夫军校。它与前两所军事学校的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前两所军校专招贵族出身的人，或者至少是富裕家庭的子弟入学，而它则优先招收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子弟。自然，这所学校的学员在毕业后的境遇和待遇方面，也远远不能与前两所贵族学校相比。他们通常是被发配到外省偏僻的地区去服役，很有点中国古代被派遣戍边的味道。然而，这并不妨碍该校学员以自己的军校为荣耀与自豪的心理，因为，它的毕业生都能从它那里获得一枚相当考究别致的特制徽章。

阿列克谢耶夫军校当时的校长是哈明将军，他只拥有团长一级的权限。他的队列副校长是波波夫上校，一个十分严厉的长官。他坚持的信条是，只有严厉的处分才能有严格的秩序。这也是旧俄时代沙皇军事教育体制和军队生活中反映出的一种较普遍的倾向。每当波波夫上校接见纹丝不动地立正站在他面前的学员时，总是问他们是否处于战斗戒备状态，如果回答说“不是”，他就会立即要他们带着全副武装进入战斗状态罚站。他还说。“你们是皇帝陛下未来的军官，你们自己不先尝尝这罚站的滋味，将来怎么会处罚别人呢？！”

华西列夫斯基在这所军校里只呆了 4 个月便毕业了。原因是当时正值战争期间，前线急需补充军官，所以这批学员的教育基本上是战时速成培训性质。毕业时，每人授准尉军衔，服役 8 个月后晋升少尉，如果有战功则可随时晋升。离校时，和其他学员一样，华西列夫斯基领到了 300 卢布的军眼费，军眼则由学校统一监制。另外又发了 100 卢布，作为战时离校薪俸。此外，还给每人发了左轮枪、军刀、野战用望远镜、指南针和现行军队条令。这样，华西列夫斯基在年方 20 岁之际，便成了准尉了。

他的心里满是狐疑：我这就成为一名军官了，我真的会训练、培养和带兵吗？他们中许多人还打过仗，而且年龄也比我大得多？

说来也是，当时他们在校训练和学习几乎根本不考虑正在进行的战争的要求，仍然按着早已过时的训练大纲进行十例如。教官们甚至连在野外障碍下的军事行动、新型重炮、各种类型手榴弹（除了俄制的“白铁瓶”）和在战争中使用汽车和飞机的最起码的原理都不介绍，各兵种间协同动作的原则也不予讲解。不仅在课堂，就是野外演练也是理论多于实践，因此，把很大一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形式主义的队列操练上。至于敌军的情况，则更是

一无所知。对此种种，华西列夫斯基十分不满。

一次，他对一位同乡同学说：“难怪外国人都说，俄国人善于送死，而且往往是糊里糊涂地送死。我们现在学习的这些东西，究竟有多少能用到将来的实际战争中呢？！”

与此相反，学校对学员们操行规定倒是极为严格与严厉的。例如，作息时间规定为：5 点 45 分吹预备号，起床，早检查，祈祷，唱赞美歌，茶点，上课。中午 12 点 30 分吃饭，然后继续上课。17 点 45 分吃饭，饭后休息，然后喝晚茶。21 点全连列队听晚降旗号，然后点名和检查，23 点熄灯。这时，除了昼夜值勤者外，所有学员都必须上床就寝。此外，还为休假学员制定了一整套的规章制度，如，禁止学员到花钱的场所去游玩，禁止去俱乐部、饭店、大众食堂、台球房、赛马场、红场上的商店等地方。在剧院和音乐会上，不许学员坐靠近池座前 7 排的位子。在马戏院，不能坐在靠近前 4 排的位子。这些，对于培养一名有操行的军官也许是必须的。但华西列夫斯基相信，要造就和培养自己成为合格的军官，光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还有比它们更为重要的东西。

那时，华西列夫斯基还不大懂得军队及其指挥官所需担负的社会使命，只知道一名优秀的指挥官必不可少的素质是：熟悉相当的军事理论，知己知彼，善于带领部下，培养和训练他们，保证部队有高度的纪律性和坚决服从的精神。为此，一方面，他下了很大功夫阅读俄国著名军事家和军事指挥者的著作，熟悉他们的生平与事业追求。他最喜欢的是苏沃洛夫、库图佐夫、米柳钦、斯科别列夫等人的著作，并做了大量的笔记和卡片，以至以后奔赴战场时还带着它们。另一方面，他十分注意向他当时的连长特卡丘大尉学习实践训练的本领。后者是当时教官中极少数亲自参加过战争、负过伤、得过奖章的军人之一。由于两人军事观点接近，为人处事作风相似，最后竟成为了难舍难分的好朋友。

在这 4 个月的军校学习和训练中，华西列夫斯基积累并记下了许多军事理论信条，在以后的终生军事生涯中，他总是把这些信条当成自己的座右铭。其中有些是 1877—1878 年俄土战争时期的俄国英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德拉戈米罗夫教授的名言；有些则是军校提倡或他自己总结出来的。如：

我们的宗旨是消灭敌人，只消灭敌人而自己不受伤亡的
作战是不可能的。只使自己伤亡而未能消灭敌人的作战是愚蠢的。

对部下和士兵，与其命令不如委托。

为祖国服务，向军旗致敬，维护军服的荣誉。

大公大勇，先公后私。

接近部下，始有信任。

敢于标新立异。

行动要有目的性。

1915 年 6 月，华西列夫斯基作为一名青年准尉，被派往驻在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省的一个县城的预备营中。这个有着大量俄罗斯文物古迹的小城，曾在这位年轻的准尉心里留下许多难以忘怀的故事。

大约十来天后，这个营忽然接到立即开赴前线的命令。为了给它的一个补充连任命一名新连长，营长便把包括华西列夫斯基在内的军官集合在一

起，请愿意赴前线的军官自动报名。华西列夫斯基想，一定会有许多人在他之前主动地举手的，尤其那些在预备营呆了很久的军官们会这样做。哪知道，尽管营长多次向“军官先生们”发出动员号召，却根本无人响应，连一个举手的也没有。大厅里仍然是一片寂静，甚至有些穿着笔挺的军官们竟完全是一副不管不顾的样子。

营长是一名老上校，显然年龄已经超过 50 岁。他很生气，大声地责备说：“你们是俄国皇帝陛下的军官！不应该只知白拿朝廷的俸禄，而不为国家的祸福担忧。

现在国家有难，你们谁也不想去保卫祖国吗？”

结果还是沉默，大厅里更加寂静。

最后，老上校无奈地摇了摇头，又挥手叫来了副官。他指示副官用抽签的办法，立即从速选出一名连长来。

此时，华西列夫斯基也默默地站在这些军官的行列里，他为大厅里的全体军官感到耻辱。心想，我倒是很想立即到前线去，但此时怎好冒昧地毛遂自荐呢——毕竟自己仅仅是一名初出茅庐的年轻准尉，这距连长的军阶还差得很远，怎好自不量力地高攀此职呢？！他认为，大概其他的年轻准尉们也准是这样想的。然而，年纪大一些的军官们仍是无动于衷地站在那里，显然他们中仍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率队开赴前线。而副官正在忙于给每人制作预备抽取的纸签。

华西列夫斯基再也忍不住了，只见他跨前一步，礼毕，大声说道：

“报告营长，我是刚从阿列克谢耶夫军校毕业来此的准尉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虽然我的资历不够，但我愿意同另外的某个军官先生一道率领这支连队，立即奔赴指定的前线。报效祖国是我的义务和志愿，服从命令则是我的天职。”

营长的脸上立即露出了笑容。他急步走过来，先拉住了青年准尉的双手，又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好样的！真是好小伙子！我感谢你的勇敢和忠诚。”

随后，又有一名年轻的准尉也主动地跨出队伍，表示愿与华西列夫斯基共同率领这个连队去前线。

这样，华西列夫斯基便成了这支补充连的代理连长。但是，随后命令又改变了：没有要求他们这支队伍直接开赴前线，而是由本地转到另一省区，并被编入了新的预备役部队。直到这年 9 月份，华西列夫斯基所率的这个连队才被派往前线，直接隶属于西南方面军第 9 集团军。嗣后，华西列夫斯基及他的连队被集团军司令部编入步兵第 103 师，在这里，他暂时出任连长。后来，他所在的这个连被派赴诺沃霍罗夫斯克第 409 团第 1 营，被编为该营第 2 连。

自此，华西列夫斯基便来到了战争的最前沿。在这里，他第一次受到战斗的洗礼。及至第一次炮火过后，他才真正弄清楚了什么是榴霰弹，什么是榴弹，以及什么是迫击炮的炮火。这时，他才真正而切实地感到，和平的生活已经远远地被留在后面。

此后，华西列夫斯基的职业军人生涯便真正开始了。

华西列夫斯基率领自己所在的连队参加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是在 1915 年 12 月中旬展开的。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战役。当时，整个第 9 集团军所占领的防线都是极为不利的，它在霍亨城以西地区与奥匈帝国的第 7 集

团军展开了阵地战。华西列夫斯基所在第1营及他指挥的第2连，被部署在团部所在地尔扎维涅茨村以西的阵地上。

战壕给人的印象十分蹩脚，只有一些极普通的沟渠，没有胸墙，只是在两边乱七八糟地堆了些土，既无枪眼，也无遮弹檐，甚至连起码的伪装都没有。武器装备和弹药供应也都极差。士兵的枪多是用缴获的奥地利军队的步枪，子弹严重不足。俄制火炮虽然性能不错，但各种型号的炮弹都极为缺乏。

战斗打响后，华西列夫斯基所在的团曾在一周内反复不断地向霍亭以西的敌军正面阵地发起冲击，以求获得局部突破。但结果均未能达到战役目的，相反却带来了严重的指战员损失。到年底，俄军虽把阵地向前推移了大约15俄里，但终究损兵折将，得不偿失。最后，该团不得不退出战斗，作为师的预备队在整个冬季里进行长时期的修整。

通过此役及随后的冬季修整，华西列夫斯基发现了旧俄军队的许多弊病。且不说最高统治者与高级指挥官同广大前线士兵之间存在的那种尖锐利益对立，即使在中下级指挥员和士兵之间，也存在严重的不协调现状。一方面是前线士兵纪律极差，斗志懈怠，有些则干脆遇机会便开小差；另一方面则是中下级军官以严酷和粗暴的方式对待士兵。如，第103师师长萨拉福夫将军就明确告诉下属，必须使士兵害怕班长的棍子胜过害怕敌人的子弹。显然，这完全是普鲁士式的军规教育。

华西列夫斯基对这种官兵关系不敢苟同，尤其在战争环境中，这样的官兵关系是不可思议的。他认为，慑于惩罚的服从是毫无用处的。一旦军队处于困难的作战条件下，这种服从就会消失得毫无踪影。他觉得，要想克敌制胜，光有服从是远远不够的。真正需要而又极其重要的应该是下属对指挥官的信任。自从进入阿列克谢耶夫军校以后，尤其是通过这段时间在实际战场上的耳闻目睹，华西列夫斯基越来越服膺了这样的观点：明智而有作为的军官，都应把自己同下属包括士兵的关系建立在尊重他们人格的基础之上。在他看来，俄国历史上从苏沃洛夫大元帅、库图佐夫元帅到十二月党人军官，以及俄国军官阶层中那些先进的陆军尉官，莫不如此然。

由于有了此种明确的认识，他便开始在自己所属的连队里试行新的教育和训练方法。开始，有的军官认为，他这样做是一种姑息纵容的先导手段。但随着一段时间的工作，辛勤的耕耘便逐步结出了果实。周围的非议也随之逐渐消失了。到1916年春，经过整整一冬的休整与训练，华西列夫斯基因治军有方被提升为第1连连长。

紧接着，在全团性的大检查中，团长列昂节夫上校认为，华西列夫斯基领导下的第1连不论在训练、纪律，还是战斗力方面，都是团内的最优秀单位之一。列昂节夫上校在全团总评会上谈到华西列夫斯基时说：“我到过许多连队和团队，甚至我自己也有过率领一支基本连队的经历，但是像华西列夫斯基少尉这样，几乎从未与下属发生过纠纷的青年军官，确实是极为罕见的。”

关于这一点，华西列夫斯基本人也很引以骄傲和自豪，而且终生都未改变。因为，有些他当年领导下的下级军官直到四五十年后都还一直与他保持着密切联系，双方都对第一次大战中彼此和睦、融洽的上下级关系记忆犹新。有些人则到七八十岁仍对他这位当年的年轻上司保持着敬意。例如，1946年1月，当年诺沃霍漂尔斯克第409团I连的列兵基斯利钦科在写给他的信

中说：“过了28年，你还没有忘记前线同一战壕里生死与共的战友……”1956年，住在芬兰的土尔库市的埃赫瓦尔特，特别写信给他追忆昔日战斗友情。信中写道：“今年秋天是基尔利巴巴高地战斗的40周年，你还记得曾经参加这次战斗的光荣的诺沃霍漂尔斯克第409团1连您指挥下的一名芬兰籍下级军官吗？”

1916年春季，经过长时间休整的第9集团军随着整个西南方面军参加了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著名战役的“勃鲁西洛夫突破”之战。该集团军正面的敌人仍是它先前的对手，即奥地利第7集团军。华西列夫斯基所在的步兵第103师，根据集团军的命令，与步兵第82师再次组合，于是新的混成军成立了。5月22日，战役打响后，混成军的任务是迅速突破敌人的正面阵地，同时随整个第9集团军向科洛梅亚地区挺进。

华西列夫斯基所在的第409团的具体任务是：突入东喀尔巴阡峡谷，穿越布科维纳地区，最后攻取基尔利巴巴等一系列高地，从而彻底把奥军赶回罗马尼亚。在这次大规模越野进攻战斗中，华西列夫斯基学到了不少在遭遇战和行军中领导分队的经验。

同时，由于他指挥有方，连队突进有力，还在战斗进行过程中就被提升为该团第1营管长，军衔也升为上尉。

虽然西南方面军和沙皇大本营指挥部对这次大规模进攻的胜利结果没有很好地加以利用，但就“勃鲁西洛夫突破”本身来说，仍然不失其世界性声誉，因为它曾直接影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和结局。对华西列夫斯基本人，也有着不小的意义。“它对我的作战观点的形成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我在进攻期间得到的锻炼，对我后来很有帮助，在各种分队范围内组织战斗行动的经验，在卫国战争时期都派上了用场。”华西列夫斯基如是说。

此次战役结束后，华西列夫斯基曾结识了骑兵第3军军长克列尔伯爵。他认为，伯爵不愧为一个勇敢的军人，但却属于那种平庸的军事长官。华西列夫斯基之所以对他颇有些兴味，主要是因为伯爵曾经是他热烈崇拜的斯科别列夫将军的亲密助手。

而他恰好对斯科别列夫的治军思想与战术原则极感兴趣。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第409团正作为预备队休整，正好归属克列尔伯爵的骑兵第3军统辖。一次，伯爵提出要一个步兵营去担任他设在基姆波隆格的司令部的警卫工作。结果，挑来挑去，华西列夫斯基的第一营被选中。当他到骑兵第3军驻地向参谋长报到时，那位参谋长感到十分惊讶。

“小家伙，你今年多大了？”参谋长问。

“报告长官，我今年22岁。”华西列夫斯基双脚一并，立正答道。

“噢，这么年轻就当营长了，不简单啊！”说完，参谋长就要离开。

这时，身材高大的克列尔伯爵正好出来，问道：“你在和谁讲话？”

参谋长用手一指，毕恭毕敬地说道：“将军，这位就是给您派来的警卫营营长。”

我刚才正在同这位年轻的上尉聊天。”

“啊，我知道了。你就是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一年前才从莫斯科阿列克谢耶夫军校分配来的，对吧？”伯爵笑脸对着华西列夫斯基。不等对方回答，他便用两只大手捧住了华西列夫斯基的脑袋，又继续说道：“好啊，再打两年仗，我们这些昨天的准尉就要当上将军了！”

当时，华西列夫斯基觉得这位伯爵将军很是可亲，待到接触多了之后，

他才感到了伯爵的虚伪。一实际上，克列尔伯爵是个地道的保皇党人和暴君胚子，但他却常常在下属面前扮演出一个民主派的模样。事实表明，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克列尔将军便完全暴露出他极端残忍的本性。

1916年8月，罗马尼亚当局终于克服了两年的动摇，直接向奥匈帝国宣战。但后来的战争发展表明，俄国的这位新盟友根本没有接受战争考验的任何准备。到11月，罗马尼亚军队便彻底败北。首都布加勒斯特也沦入敌手，大约1/3的罗马尼亚军队转瞬间便成了敌方的俘虏。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旧俄统帅部不得不将整个战线南移，以掩护比萨拉比亚。为此，新组成了一个罗马尼亚方面军，华西列夫斯基所属的第9集团军全部划归该方面军指挥。随后，他也不得不随部队跨出国境，来到罗马尼亚境内奉命防御。

1917年3月，当华西列夫斯基和他所在的部队还在境外的疆场上努力奔波的时候，突然传来了二月革命的消息。沙皇被推翻下台，但代之而起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仍然继续坚持战争政策。这样，在各方面军和各集团军内部，纷纷要求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向新政权宣誓效忠，当然也有保皇党军人叛乱的事情。随之而来的就是在军队中出现了布尔什维克党人宣传鼓动的士兵苏维埃活动。所有这一切，一时搅得军队混乱不堪。中下级军官中也出现不同派别：有的站在保皇党一边，有的表示拥护临时政府，有的则与士兵一起，开始反对继续进行战争的政策。这时的华西列夫斯基，在政治态度上还并不十分明朗。

这是因为，当时布尔什维克影响的增长也是逐步的、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部队距首都远近的影响。一般地说，北方方面军的革命化程度要比西方方面军快些，而西方方面军又比西南方面军快些，同样，西南方面军又比罗马尼亚方面军快些。

尤其在罗马尼亚方面军中，反动势力拥有相当大的市场，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挠布尔什维克党人在该军的鼓动和宣传工作。据华西列夫斯基回忆，当时他所在的诺沃霍漂尔斯克第409团中，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个布尔什维克鼓动员在秘密状态下展开活动。

至于出现支部活动，那是后来才发生的事情。

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严重动荡，旧俄军队原来就不很妙的前线形势也日趋恶化。

先是6月间西南方面军在利沃夫附近的进攻遭到失败，紧接着7月间罗马尼亚方面军的进攻也严重受挫。于是，前线士兵开始人心浮动，开小差回家的人数日益增多。

这种形势首先影响到中下级军官，他们感到无所适从，进退失据。真正的，也是最后的选择正在迫近他们。

8月间，罗马尼亚方面军新易的最高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将军组织保皇派军官发动了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叛乱，相当多的军官都归到了他的麾下。华西列夫斯基等在战争初期入伍的军官，没有选择他们的道路。相反，这些人开始逐步向士兵阶层靠拢。这样，整个军队分裂了：一边是士兵和进步军官，一边是继续号召“保卫祖国”的人们。

华西列夫斯基曾经千百遍在内心里反问自己，同时也在思谋今后的打算和出路。

他曾就此写道：“难道能有不跟自己的人民站在一起的爱国者吗？不能！我暗自回答。这说明，真理并不在我以前寻找的地方。科尔尼洛夫的叛

乱是对我的幻想的彻底打击。我开始谴责战争，对临时政府产生了怀疑。”

此后一段时间，华西列夫斯基所在的第 409 团又在多尔纳—瓦特拉以东地区进行了多次的艰苦作战。之后，他们才被编为第 4 集团军的预备队，在阿朱德—瑙市郊进行新的一番休整。此间，他们到处探听来自祖国的一切政治消息，哪怕是只言片语也不放过。他们听到了许多关于雅西、基什尼奥夫、敖德萨等大城市里老百姓和驻军游行示威的传闻，但确切的消息一直没有。大家都在期待事态发生决定性的转折。

他们心里都清楚，现在的形势不明朗只不过是暂时现象。

一天，就在阿朱德—瑙市郊区，华西列夫斯基确切地听到了十月革命爆发的消息。待他像往常那样走向各个连队巡视时，竟发现绝大多数士兵都已在毫不避讳地讨论着《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由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毅然宣布放弃目前的战争政策，当天前线的士兵们便与奥地利士兵搞起了大规模联欢活动。看到他们纷纷扔掉那些前几天还枪口相向的枪支、互相拥抱、载歌载舞的场面，华西列夫斯基的心灵深处仿佛受到了猛烈的震撼：这是什么？它不正是人民意志的表露和体现吗？！

军官阶层再一次分裂，不久前大家还都坐在同一条板凳上讨论问题，甚至还在同一战壕里向敌人喊着冲杀的命令。现在则变得怒目相视，甚至干脆反目成仇了。

在第 409 团团部召集的全团营连级军官会议上，华西列夫斯基因为“结交布尔什维克”和出席过士兵代表苏维埃会议而遭受同僚们的白眼。

既然如此，我何不干脆宣布自己承认苏维埃政权呢？华西列夫斯基曾这样想，但一转念：还是先辞官回家吧，到那时还愁回国后没有定夺？

1917 年 11 月底，华西列夫斯基退伍了。

有的战友激动地同他拥抱道别。另一些人则避之不及，根本不愿同他握手。还有一些人，则是他根本不屑去看的一群。

12 月初，华西列夫斯基从罗马尼亚踏上了回国回乡的路程。他艰难地走过了形势复杂的乌克兰，好不容易回到了俄罗斯本土。每到一地，他都格外地感受到那种高涨的政治热情与革命精神，他贪婪地吸取各地出现的各种新气象。月底，他终于回到了故乡。

如此急转直下地退伍回乡，华西列夫斯基到底是怎么想的呢？请看他的自陈自话：

我决心辞去军职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那时已经知道，工农政府正在进行签订和约的谈判。有人已经开始自发地退伍，我为什么还要盲目地呆在罗马尼亚呢？过去，我带领士兵打仗，自以为是在履行一个俄国爱国者的义务。现在才明白，人民过去受骗了，他们需要的是和平。旧军队同苏维埃国家是不相容的。这就是说，我的军事生涯该结束了。我准备怀着一颗纯洁的心，献身于自己喜爱的事业——在田野里劳动。

第三章 投身红军是我家

辗转寻求千百度，投身红军是我家；

新生祖国危难日，征战南北卫国家。

1917年12月底，从罗马尼亚前线辞官回家后，华西列夫斯基并没有能够按他当初所设想的那样去读一所农业大学。这是因为，当时整个俄国社会自上到下都处在急剧地除旧布新之际，日益纷繁复杂的国内政治形势及日趋尖锐的新旧势力的斗争，都不可能单独为他提供一块世外乐土。

至于他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回到故乡参加他素所喜爱的田野劳动，同样也是既不可能，更不现实的。平心而论，华西列夫斯基上尉也好，华西列夫斯基营长也好，现今都已不再想真正地回乡务农了，尽管他仍是一如既往地喜爱自己的故乡。

那么，至少总得做点什么事儿吧？哪怕这仅仅是出于谋生之道的基本考虑呢！

更何况，他年方23岁，正值风华正茂之时，今后究竟应向什么去处和方向求发展呢？

这才是现实，才是他躲不掉、回避不了的现实。

恰在这时，他家乡所在县的地方苏维埃军事部给他转来一封来自罗马尼亚前线的电报。电称：他原来所供职的步兵第409团举行大会，根据当时军队中通行的选举原则，将已经退伍辞官的他再度推选为该团团长。故此，士兵委员会建议他立即返回部队，担任该团的指挥职务。但是，鉴于当时乌克兰地区日益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县军事部劝他最好不要回去受职，最起码还可在家乡找个合适的差事做一做嘛！

乌克兰地区当时的局势到底是怎么复杂呢？原来，1917年10月31日，基辅的政权已经胜利地转到了布尔什维克党人手中，当地苏维埃组织也建立起来。但临时政府时期成立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中央拉达，不久又颠覆了苏维埃组织，并宣布不服从彼得格勒。此后，它同叛乱的顿河哥萨克将领卡列金结成反动联盟，并与罗马尼亚方面军司令谢尔巴切夫商定，要把罗马尼亚方面军与西南方面军合并成由他统一指挥的乌克兰方面军，统归拉达节制。此间，虽然哈尔科夫苏维埃政权保存下来，全乌克兰苏维埃第一届代表大会也在这里宣布成立了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但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实际上仍处于拉达的控制之下。而华西列夫斯基原来所在的第409团此时也暂时与受谢尔巴切夫统辖的军队在一起，显然，倘华西列夫斯基此时重返部队出任该团团团长，则很有可能被谢尔巴切夫裹挟并由此卷入反苏维埃政权的军事冒险。在这种情况下，华西列夫斯基自然是不去为好。

不过，正好借此时机，华西列夫斯基向县军事部提出了自己的谋职要求。他表示最好利用自己的专长安排他去从事苏维埃政权的某项军事工作。其实，县军事部也早有此项打算。这样，双方两谋合一，便安排他为基涅什马县乌格列茨克乡役前普遍军训处的教官。

这种地方性役前普遍军训处，原是根据1918年1月关于建立工农红军的法令而设立的从中央到地方的统一组织，它直接隶属于各级政权的军事人民委员会或军事部。

后来为了理顺关系，最高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又决定在全俄总参谋部下设立全俄性质的役前普遍军训中央局，并直接由它来具体负责领导全国各级政权中的这一组织机构。它的主要任务是，对要求参加苏俄工农红军的各类兵源做统一的役前军事专门训练，然后分别各类情况把他们送往所需的部队。

华西列夫斯基在这个任上总共工作了大约 8 个月。但是，他显然并不满足于长期从事这项工作，希望能够直接参加苏俄工农红军，并成为这支伟大军队中的一名军事指挥人员。但在当时，当地的军事部门并没有给他提供这样的机会，而且有迹象表明似乎今后亦无此种打算。据他自己推测，这可能是由于他出身于神职人员家庭，又当过旧俄沙皇军队的军官，且被授过上尉军衔。

鉴此，8 月间，华西列夫斯基便根据报载招聘教师的消息，向基涅什马县军事部提出了改行的申请。当时，他认为，既然苏维埃组织对他在军事方面的工作没有给予足够信任，若利用当年在神学校获得的证书去当一名人民教师还是足够条件的。

而且，在教师岗位上照样也是为祖国和人民服务。国家当时也需要培养更多的有文化的一代青年，以便在未来接替老一代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生活。不久，县军事部批准了他的改行申请，并给他送来了到图拉省新西尔县某乡村小学教书的委任状。

从这年的 9 月到 1919 年 4 月，华西列夫斯基在新西尔县的两所乡村小学当了 8 个月的人民教师。他一方面执鞭任教，哺育新人，另一方面也积极投身于当地反对富农等一系列政治斗争活动。由于他全身心地投入这项新的工作，很快就同学生、教师以及学生家长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他觉得自己好像终于找到了长期所向往的生活归宿一样，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全部时间几乎都花在学校工作上了。学校校长和地方领导也一再表扬他的工作成就，认为他是一名完全合格又十分称职的好教师。可是，久而久之，用他自己的话说，无论是顺利地教课，还是孩子们的依恋，乃至同事与领导们的友谊，都不能使他完全的满足。冥冥之中，他总觉得似乎缺少点什么。

我究竟缺少点什么呢？这一点，直到 1919 年 4 月，我被新西尔县军事委员会召去参加红军，并编入预备第 4 营驻叶弗列莫夫市的时候才明白过来……几乎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开始我就酝酿着的理想，终于实现了。1919 年 5 月，我被编入红军，当上了指挥官。从此，我的生活道路就笔直向前了一咱从我担任红军指挥官、感到党的信任后，我懂得了，服军役是惟一适合我禀赋的职业。

噢！原来如此！看起来，华西列夫斯基确实是天生职业军人的好材料，他已经与军队行伍结下了真正的不解之缘。也许，他的资质、秉赋、才学、能力及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阅历，早已注定他成为一名不凡的军事统帅了。

加入工农红军后，华西列夫斯基开始被任命为预备第 4 营的一个排的教官（副排长）。该营长是前旧俄军队的中校顿钦科，军事委员是前准尉明科。顿钦科中校后来曾在“维斯特列尔步兵战术学校”任教官，华西列夫斯基 1926 年在参加该校举办的团长进修班时又见到过他。这个营是根据苏维埃共和国 1918 年 9 月的一项命令组建起来的，准备作为军区预备使用。

华西列夫斯基明显地感到，尽管这个营才刚刚建立几个月，但较之他生活过的旧俄正规部队仍有天壤之别。其内务制度之井然有序，战士们之整洁卫生，纪律之严明自觉，都大大地出乎他的预料，这在旧军队中是极为罕见的。他还发现，这里的普通士兵与指挥人员（红军中不许称军官）的关系，完全是建立在互相信任基础上的一种新型关系。难道这不正是他过去在；日

军队中所一贯追求的那种理想的官兵关系吗？他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家”，这里才是他真正的用武之地。

特别与旧军队不同的一点是，这里是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在起着全面的领导作用。

在全营的日常生活中，军事训练中，以及在官兵教育方面，党的组织和所有的党员同志全都率先垂范，是真正的模范和先锋。从这时起，华西列夫斯基在内心深处暗暗地产生了一种渴望和想法，这就是，一定要争取加入人民利益和真正保卫者布尔什维克党中去。

从这以后，华西列夫斯基的世界观变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越来越认识到，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真正的人民革命。我的政治意识在它影响下形成了。由此，祖国和爱国主义的观念也更加充实了。祖国，这就是苏维埃俄罗斯，是推翻了横暴不义的；日世界并决心在自己的国土上实现人类优秀思想家的理想——社会主义的、劳动人民的国家。我开始认识到，苏维埃祖国也需要有自己的军队，需要有自己的指挥干部，包括军事专家在内。”

投身苏俄工农红军和政治意识的改变，使华西列夫斯基获得了新生。

入伍不到一个月，华西列夫斯基就参加了一次战斗。6月初，在叶弗列莫夫县的斯图平诺乡，当地富农打死了省里来的负责余粮征集工作的一位干部。根据图拉省革命委员会的命令，立即专门成立了一个负责镇压乡里富农和土匪的专门委员会，并决定在第4预备营里分出一支大约百余人的武装小分队拨归该委员会调遣。根据优选原则，华西列夫斯基被指定担任这支小分队的队长。同时营内党组织又为他指派了马祖罗夫为首的几位党员前来协助他具体工作。这是华西列夫斯基第一次去完成布尔什维克党交给他的战斗任务。

由于当时形势复杂，小分队全副武装出发时，当地居民对他们的态度也是各种各样，有的人亲切友善，有的人则怀着戒心和恶意。又因为小分队的行军路线要经过土匪出没的荒山野林，因此昼夜都得处于完全的戒备状态。有趣的是，华西列夫斯基小分队所经过的地区，恰好是著名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在他的《猎人日记》中曾描写过的美丽的密恰河两岸地区。当年，密恰河两岸那河边茂密碧绿的水草，金黄墨绿的郁郁丛林，以及时而阳光普照，时而月色映辉的莹彻太空，曾使这位文坛巨擘为之陶醉，大为倾折。对此，作家曾用大量篇幅和笔墨加以渲染和铺陈。可是，当华西列夫斯基率小分队途经这些地区时所亲眼看到的景象，简直和屠格涅夫笔下的抒情描写相去十万八千里！因为，在这同样到处散发甜蜜芬芳的黑夜中，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能爆发出土匪活动的火光；作家笔下夜莺的华彩乐曲，则不时地要被富农们短截筒枪的暗哑射击声所打断……

到达指定地区后，华西列夫斯基立即命令小分队呈扇形散开，并分组包围了当地富农的大庭院。突击小组很快就消灭了企图负隅顽抗的富农武装。小分队队员们纷纷冲进大院，正在准备从地下通道逃走的富农分子当即被擒。至破晓时分，战士们已经从周围找出了富农组织隐藏起来的上万普特粮食，数以千计的追随当地富农的农民或以前逃避参加红军的人们，统统被小分队抓获，最后送交叶弗列莫夫县革命委员会处理。这次战斗任务完成得十分圆满，行动迅速，准确无误，收获颇大。

为此，华西列夫斯基及小分队受到了地方政权的赞誉与嘉奖。

1919年夏，由于国内各地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反革命武装叛乱活动，新

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局势是极为严峻的。在图拉省所辖地区，由于它与莫斯科近在咫尺，反对前来大举进犯的邓尼金反革命武装的任务十分艰巨。为此，7月9日，俄共（布）中央向全俄红军和人民发出号召：“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甚至说：“社会主义革命的危急关头，甚至是最危急的关头到了。”8月23日，图拉省革命委员会宣布全省处于军事戒备状态，各县都成立了防卫委员会。10月20日，列宁亲自给图拉省革命委员会发来一封电报，电称：

现在图拉的意义非常重要，——姑不论敌人是否逼近，

就一般来说，图拉对共和国的意义也是巨大的。

因此，必须尽一切努力齐心协力地工作，集中一切力量

搞好军事工作和军需工作……必须在军队、预备兵以及男女

工人中间特别加强工作。

要时刻注意防卫工作……扩军工作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按照党中央和列宁的指示，整个图拉省和各县区都立即行动起来。在图拉周围和图拉通往莫斯科的各条道路上，红军部队和预备队官兵不断地往来调动。当地居民则帮助部队挖战壕，设置铁丝网，构筑机枪掩体。全省人民都被组织起来，而且全部纳入战时军事化生活状态，老百姓几乎人人有武器，天天搞训练。

华西列夫斯基所在的预备第4营也从叶弗列莫夫市被调往图拉，由于不断地扩军工作，这时它已发展成有两个营建制的团了。到图拉之前，华西列夫斯基已升任连长。此后，由于不断有图拉地区的工人和市民要求加入红军队伍，团里又组建了第3营，干练的华西列夫斯基被任命为该营营长。到10月初，由于邓尼金反革命匪帮日益逼近图拉并直接威胁到苏俄首都莫斯科，当地苏维埃组织要求继续不断地扩大红军规模，以抵抗反革命匪帮的进攻。此时，华西列夫斯基被任命为团长，他所统领的这个团就是在原先叶弗列莫夫营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随后未久，该团被改编为图拉步兵第2师第5团。

是时，华西列夫斯基年仅24岁。

10月中旬，当华西列夫斯基和他的第5团奉命移驻筑垒区亚斯诺波利扬斯克地境时，传来了战略重地奥廖尔被邓尼金反革命武装占领的消息。形势越来越严峻。俄共（布）中央在列宁的主持下举行紧急会议，要求加强南线防御，无论如何不准放弃图拉地域，以坚决保卫新生共和国的首都莫斯科。华西列夫斯基所在团的全体官兵，个个摩拳擦掌，决心要在筑垒线上与邓尼金白匪军拼刺刀，以实际行动来捍卫伟大祖国的首都。

10月下旬后，南线战场形势出现明显的好转。南方方面军的第13、第14集团军在奥廖尔和克罗梅地域给了敌人严重打击。邓尼金白匪军在遭到重创后，暂时放弃了进攻图拉并攻打莫斯科的企图，带着残部仓皇向南方退去。随后，他的反革命军队又在一次战斗中彻底败北，几至全军覆灭。这样，首都的危险彻底解除了。

随着防卫白匪军的国内战争的结束，又迎来了抗击帝国主义联合干涉军的艰苦战斗。华西列夫斯基深深地感到，自己的命运已经与苏维埃共和国完全连结在一起。

1919年11月，华西列夫斯基的第5团告别了图拉人民，随同图拉步兵第2师转战到了祖国西部白俄罗斯的湖泊沼泽地带。当时，他们师的全体官

兵进驻到了维捷勃斯克省的谢别日县境内，以接受西方方面军第 15 集团军的统辖节制。他们的任务是，抵制来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波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军队对苏俄的进犯和武装干涉。

调驻此地后，该师改称为步兵第 48 师，华西列夫斯基的团也相应地成为第 143 旅的第 427 团。

在向当地革命委员会报告工作过程中，谦逊的华西列夫斯基几次提出，他自己还很年轻，缺乏在作战条件下指挥一个团的经验，故而请求革命委员会给他们团派来一位更有经验的团长，而他自己则乐于担任副团长或一个营的营长。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同志很赞赏华西列夫斯基这种谦逊、坦率的作风，但仍数次劝他收回自己的请求，认为他完全有资格和能力领导好自己的团。后来由于他的执意相求，革命委员会才终于接受了建议，派索鲍尔诺夫前来担任该团团长，命令他继续作该团的副团长。未久，华西列夫斯基的团随第 143 旅被调至步兵第 11 师，改称为第 32 旅第 96 团，他的职务仍是副团长。

1920 年 5 月，华西列夫斯基所在的这第 11 师奉命参加一次对波兰资产阶级地主干涉军的反突击任务，而第 96 团则担任了全师主要攻击团的艰巨任务。他带领全团沿铁路线周围的湖泊地区，猛烈地向前推进了大约 20 俄里。后来又与波兰精锐部队波兹南师发生遭遇。激战中，华西列夫斯基身先士卒，智勇神威。最后，他机智地率领一个营绕到了克鲁列夫希兹纳车站背后，给敌人以出其不意的猛烈打击。然而，在随后争夺该车站的反复绞杀性战斗中，他的部队也遭到了很大的伤亡，以致曾有几天被编入师的预备队进行休整。可是，在重新投入战斗的另一次与敌军骑兵的遭遇战中，由于大部分士兵没有同骑兵作战的经验，最后全团被冲散了，以致他不得不一边行军一边收集被冲散的部队。事后，他曾说：“这对我来说又是一课。”

7 月间，华西列夫斯基随同部队又一次向波兰敌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势。他所在的第 15 集团军很快便恢复了 5 月进攻时放弃的大片地区。接着继续直逼波军，卢格博科耶、帕拉菲亚诺沃和莫洛杰奇诺军大片地段被甩在身后，最后一直推进到利达一线。

当他们准备继续向前跨过涅曼河时，突然遭到了死守这一防御地带的波兰匪军的顽强阻击。原来，波军在这里所凭借抵抗的筑垒防线，正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所构筑的。至 7 月底，双方在这一地区展开了拉锯战，战斗异常激烈，华西列夫斯基所率领的英雄 96 团，在这个时期的战斗中打得非常顽强、勇敢，很多基层指挥员牺牲了，受伤的那些则一概带伤指挥作战。这种情况使他极为感动，由此他也切实地看到了苏俄红军将士与旧俄军队官兵的根本区别之处。

正当战斗进行得空前激烈的时候，置身前线的华西列夫斯基突然接到一道命令：要他立即动身前往原来所在的步兵第 48 师担任第 427 团团团长之职。应该承认，此时他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本来，在这里他已与第 96 团官兵形成了非常友好的关系。而且，他特别珍重的一点还在于，正是在该团这段时期内，使他取得了同敌人正规军作战的许多指挥方面的知识和艺术，因此，他对该团的感情是很深的。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步兵第 48 师又是他曾经工作过的部队，那里有他从图拉带过的原步兵第 5 团的很多官兵；况且，这也是上级不可动摇的军令。作为一名军人，只能无条件地执行它。

这样，华西列夫斯基热情地辞别第 96 团的战友和士兵们后，背着一身征尘来到了步兵第 48 师师部所在地的维利诺地区报到。当时 48 师的师长是

巴拉诺维奇，1919 年他曾在图拉省的别廖市担任预备营营长，后来是由 48 师一个团的团长提升上来的。

在这里，师长指示他立即去 143 旅报到，因为第 427 团仍归该旅节制。到了旅部，旅长兼政治委员卡尔宁却告诉他说，他原来要调任的职务现在已经有别人接任了，并建议他去师里听候师长的新指示。华西列夫斯基心里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但一转念，算了吧，何必呢！干什么不都是革命工作吗？况且，按他的历来主张，他并非一定要当团长，相反，倒是更喜欢担任副团长或营长这类自己最熟悉的工作。因此，他没再去找师长，而是请求卡尔宁旅长在旅里给他派一个这类的职务。这样，他便被派到第 429 团当了副团长。

到 8 月初，西线的苏俄红军经过胜利的 7 月进攻，已经把波兰敌军赶到华沙地区。

但随着长达 500 公里的英勇跃进与长途行军，部队已经相当疲惫。又由于远离后方，人员和弹药都得不到及时的补充，而这时所面对的又是得到协约国强大技术装备支持的毕苏斯基的优势兵力，因而苏俄红军很快就陷入了痛苦的 8 月挫折。苏军第 3、4、15 集团军及骑兵第 3 军不得不纷纷后撤，这就是当时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所广泛宣传的“维斯瓦奇迹”。

为了阻击敌人优势兵力对后撤的苏俄西线红军部队的猛烈追击，华西列夫斯基所在的第 48 师乃奉命开赴第 15 集团军各部刚刚撤出的沃尔科维斯克地区。这一带原是第 15 集团军的后方，有各种辎重、炮场的炊事房。他们初到这里时，还看到一些零散走失的红军战士不时一群群地来到这里。这些经过英勇激战的士兵，个个面孔黧黑，疲惫不堪，许多人还裹着带血的绷带，一些轻伤员则三五成群地在大路两旁踟蹰而行。看到自己的战友们的这副惨景，华西列夫斯基真是伤心难禁。

8 月下旬，即第 48 师刚挺进到这里不到 4 天的时候，他们便与前来追击的波兰敌军遭遇。华西列夫斯基所在的第 429 团在待命的斯维斯洛奇地区也遭到了敌军的猛攻，经过官兵们顽强勇敢的抵抗，敌人的进攻被暂时打退了。接着，全师在接近比亚维斯卡森林的地段部署了较牢固的防御阵地。在此后的两星期中，总是有敌军不断地发动进攻，双方互有胜负，但该师的大体防线还是基本保持住了。这段时间的艰苦战斗，不论是对华西列夫斯基本人，还是对整个第 48 师官兵，都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和锻炼。

就华西列夫斯基个人来说，恰巧在这时还出现了一次不大不小的特殊波折。

事情是这样的。

9 月中旬左右，波兰匪军在一次猛烈的进攻中，冲破了部署在第 429 团左翼的第 427 团的阵地。为保障侧翼安全并支持受难中的友邻，团长德列伊维奇经与华西列夫斯基商量，决定使用本团的预备队第 2 营对敌实施反突击行动。这次反突击行动是华西列夫斯基亲自率第 2 营实施的。战斗中，华西列夫斯基指挥若定，机智地摸到了敌人后方，然后施以猛烈的突然打击。反突击成功了，敌军被打退了，获得了相当可观的一批战利品。但是，原先企图与第 427 团建立联系的目的没有能够实现。后来经从战斗中跑散并撤到 429 团阵地的个别 427 团战士处获悉，他们团因突然遭受巨大损失已经向另一方向溃不成军地败退了。

当天晚上，德列伊维奇团长把华西列夫斯基叫到了团部，当面递给他

一份卡尔宁旅长的电报命令。命令责成他立即负起步兵第 427 团团长的职，并在清晨之前无论如何要恢复它受创之前的状态。面对此状，华西列夫斯基很感愕然复茫然。但不管如何，军令毕竟是军令，他不能装作视而不见，更不能置之不理。

华西列夫斯基抓起电话：“报告旅长，我是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您的命令我看到了。但是，请原谅我的直率，我很难执行您的这项命令，尽管主观上我一点也不想不执行它……”

“什么？！难道你在战场上胆怯了吗？要知道，你现在已经是苏俄红军的一名军官了，这不是在旧军队！”华西列夫斯基的话还没说完，电话的另一端就传来了卡尔宁旅长这番气势汹汹的训斥声。

华西列夫斯基很感委屈。想不到旅长对他竟这么不客气，这很有点像是对他军人人格的侮辱。于是他也提高了声音：

“我想请问旅长，我如果现在就去执行您的命令，那么，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第 427 团，它的团部及它的前团长呢？”

旅长听了，觉得对方是在和他赌气，便道：

“你要找的这些，实际上都在你刚从那里回来的那个营的所在地区，如你真的要去找的话。”

“报告旅长，在我率 2 营实施反突击的那个地区，现在根本看不到 427 团的任何影子。否则，我也就不会与他们建立不起来联系了。”华西列夫斯基停了一会儿，换了一种建议的口气继续说道：“现在，我个人有个建议，立即把作为旅预备队的 428 团调到被敌军冲破的地段，然后哪怕只给我一夜时间，也好用来收集和整顿可能被冲散的 427 团。当然，必要的时候还要请求旅里给予人力方面的支援……”

“好了，你不要说了！请你立即到我的旅部来一趟。请记住，是立即！！”卡尔宁旅长生气地挂断了电话。

这时，已是 22 时 20 分了。

很快，华西列夫斯基便急匆匆地赶到了旅部。他清楚，这位拉脱维亚工人出身的严厉旅长一定还会当面给他以更严重的训斥。当然，他也深知，这位顶头上司是个令人敬畏的勇敢军人，不愧是 1917 年莫斯科武装起义的英雄机枪手。

果然，一见面，卡尔宁旅长便再次决断地重复了他先前的那个命令，并问他到底执行不执行。华西列夫斯基便解释道：“像我刚才在电话中说的那样，尽管我主观上想执行您的这项命令，但这个命令我实在无法完成，因为……”还未等华西列夫斯基把话全说出来，卡尔宁旅长便控制不住了。“你不要狡辩了，我也不想听。

既然你敢不服从上级的命令，我就有权把你监禁起来！”随后，旅长便命令卫兵把华西列夫斯基捆了起来，亲当即决定将这个不服从上司命令的军官押送到设立在沃尔科维斯科的师部军事法庭。

华西列夫斯基明白，再争辩什么也没用了。于是，他便在旅部宪兵的押送下连夜向沃尔科维斯科方向去了。他们刚刚走出不到 4 俄里，传令兵又送来了新的命令，说是旅长决定把原人带回旅部，另行处理。

重新回到旅部后，卡尔宁旅长则第三次向华西列夫斯基重复了那道要他去重建 427 团的命令。华西列夫斯基这时也来气了，便再次表示，他无法执行那道命令，如果旅长还坚持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话，他甘愿接受任何方

式的处罚。于是，旅长便命令文书当面起草了一份书面命令。根据该命令，华西列夫斯基因“怠工和盲目胆怯”被撤销第429团副团长之职，并任命他回所在团的第2营、6连充当一名排长，而且要求必须连夜去报到，天明前赶到。

此时，刚好深夜1时50分。

待华西列夫斯基带着旅长这项命令回到团里时，团长和军事委员都深感不安，也为所发生的一切大感意外。作为战友和同志，他们都非常同情他，但所能做到的也最多不过是安慰安慰他而已。此外，两位战友还坚持要留他在团部过一夜，这由他们亲自向旅长去说明。但此时的华西列夫斯基心情极其复杂而沉闷，他也不愿意让战友们看着他难受的样子，更不愿把这种不好的情绪传染给明天还要继续指挥作战的他们。因此，在他的执意要求下，当天深夜，他便带着行李去了自己白天刚从那里回来的2营阵地……

几天后，旅长把作为旅预备队的第428团的一部分也派到了这里。实际上，这正是当时华西列夫斯基向他所建议的做法。这样，经过这两部红军将士的顽强战斗，第427团演退留下的缺口终于补好了。敌人对此一地段发动的两次攻势均被击退。

不到一周时间，华西列夫斯基在2营6连他的排里便接到了师长的命令，要求他立即赶到师部听候对他的新指示。

在师部，师长和军事委员热情地接待了华西列夫斯基。两位首长对他宣布说：“经师党委和军事调查机关的详细调查，卡尔宁旅长对你的控告并不能得到证实。

因此，现在师党委决定，撤销卡尔宁旅长对你的不正确命令。希望你能正确对待这件事情。”随后，两位首长还告诉他说：“原步兵第96团和现步兵429团两家的团首长和党组织对你的评语都十分好。步兵第11师首长和政治部还通知我们说，由于你1920年在7月进攻中表现出的有成效而机智的行为，已经提出了授予你‘红旗勋章’的申请。”此外；两位首长还郑重地告诉他：“经集团军司令科尔克将军同意，在目前没有团长职务空缺之时，暂时任命你为我们师新编成的独立营的营长。”并问他对这种安排是否满意。华西列夫斯基表示，他愿意服从师部的新安排，并在新的战斗岗位上尽自己的一切努力来积极工作，这样才能不负党和红军给予他的巨大信任。

此次风波过后，华西列夫斯基显得异常兴奋。他曾专门利用战斗间隙回了一趟原来的第429团团部，当面向德列伊维奇团长和军事委员诉说自己的种种感受。他讲道；像这样的遭遇和经历，在旧军队中是经常发生的，甚至是司空见惯的。而事后则根本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申述，更不会有谁站出来为一个下级军官主持公道。而他今天所能得到的这种善遇，则只能发生在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的队伍里。因此，他很感谢布尔什维克党的英明，也感到红军队伍里的正确的官兵关系和作风。

到今年10月间，由于苏波和约的签订，整个西方前线反对干涉军的斗争便也基本结束。华西列夫斯基所在的步兵第48师则奉命作为集团军的预备队，进驻了从第聂伯河到列津纳河之间的走廊地区。

稍后，华西列夫斯基及其所率的独立营还曾在图罗夫一带参加过围剿土匪部队的数次战斗。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剿匪战斗中，前面提到的那位第143旅旅长卡尔宁英勇地牺牲了。对此，华西列夫斯基深感悲痛，并特别到师部去参加了这位英雄的追悼会。事后，他曾对他的战友说过这样的话；

“其实，他和我同年，他的生活还刚刚开始。但在这短短的一生中，卡尔宁却为苏维埃政权做了许多贡献……”

第四章 治军严整锋芒初露

团长任上整八载，累积经验成良才；
治军严整锋芒初露，将帅之星苦寒来。

我们知道，在整个苏俄国内战争时期，华西列夫斯基曾经有过若干次由营长升至团长的机会，但到最后，不是他自己谦逊地主动推掉了，就是由于其他的偶然因素阴差阳错地给搞没了。

难道他真的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出任正团职吗？

难道他真的命定要与团职绝缘吗？

事实上，华西列夫斯基既不是缺乏做正团职工作的能力，也不可能就命定与团职绝了缘分。至于他主动说明自己尚缺乏在正规作战条件下独立指挥一个团的经验，倒很可能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到了 20 年代初期，他已经不再缺乏对团这样的中级作战指挥机构的领导经验了。相反，从 1922 年到 1931 年这 10 年间，他几乎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团的指挥和领导工作岗位。用他自己的话说，此间，他曾在他所属的师的每一个团中都担任过正团职的工作。甚至师里的某些落后团的改造工作，也要专门请他这位高明的团长亲自来做。而结果也确实表明，经他治理改造后，即使落后团也能转瞬间变成先进团。

因此，华西列夫斯基曾在他所写的回忆录中专门写了一章这方面的实际工作情况，而且堂而皇之地题名为：“团的工作经验”。连他自己也认为，他已经掌握了相当丰富的团的工作经验。

实际情形究竟如何，且让笔者如实道来。

1920 年 11 月，华西列夫斯基所在的步兵第 48 师奉命调到斯摩棱斯克省驻防，同时负责该地区的剿灭残匪的工作。他所担任营长的那个独立营由于一些年纪渐大的军人被动员退伍或发送回籍而宣布解散。此后，他被师部任命为第 142 旅第 424 团副团长。

1922 年，苏俄工农红军开始改制，所有的步兵师都撤销了旅的建制。规定内地各军区的师只能有 3 个步兵团，一所师办初级指挥学校及若干分队。由此，旅改编成团、团改编成营、营改编成连。华西列夫斯基所在步兵第 48 师也循此例，将原来的 3 个旅分别改编成了第 142 团、143 团、144 团。初始，他被任命为第 142 团副团长，后因团长被派出学习，他便代理该团团长之职，未久，则成为该团的正式团长。还须提及的是，在这次改制之前，华西列夫斯基还曾短期担任过所在师第 142 旅的代理参谋长。这是他自服军役以来第一次担任参谋工作，他根本想不到的是，在以后的大半生军事生涯中，他竟更多地都在担任高级参谋的职务。当然，这是后话。

此间，由于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已经结束，苏维埃国家政权在内外均已获得相当的巩固地位，所以，军队的存在便也由战时状态转向了和平时期。军队当前的主要任务也开始转向以提高全体官兵政治与军事素质、加速全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主的轨道上来。为适应这种新形势的变化，华西列

夫斯基接手第 142 团的领导工作后，便狠抓全团的日常战斗训练技术和政治理论学习，有时甚至包括文化课的学习和提高。1922 年 9 月，华西列夫斯基还率所部参加了军区联合组织的一次各兵种协同作战的大规模对抗演习。这在国内战争结束以来还是第一次，当时的苏联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及红军第一副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都亲自参加了。

通过这次大规模军事演习，华西列夫斯基大开眼界。虽然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红军中级指挥员，但他已经认识到，军队今后的首要任务必须是下大力全面提高指战员的军事理论修养和作战技术水平，从根本上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因此，他在自己所在团内率先开展各种军事技术训练，甚至包括旨在提高指战员身体体能素质的军事体育训练活动。一段时间过后，第 142 团的总体水平和实力逐步地显露出来。不论是师里还是军里的各种赛事中，该团总的成績一直保持领先地位。为此，华西列夫斯基本人多次受到师首长，甚至上至军区首长的表彰。

正因为如此，当 1924 年初整个苏联红军倡导提高部队全面战斗力的活动开展后，华西列夫斯基便被师部调出，指定由他担任师初级指挥学校校长之职。在此任上，华西列夫斯基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长。他不仅为步兵第 48 师培养出了第一批现代化条件下中级指挥员的助手，而且还在军事教学实践中独创了一套新的教学与训练方法，特别是结合当时进行的军事改革活动，对该师初中级指挥机构做了相当合理且更切合实际需要的大胆调整。华西列夫斯基的一个很显著特点和优点，就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他总能在自己的任何工作岗位上都取得令人称誉的成就。从根本上说来，这确实是一个人的素质与能力的问题。

正当他忙于师初级指挥学校紧张的日常工作的时候，一天，华西列夫斯基突然接到了要他去苏联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即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参加入学考试的调令。该调令是由红军总干部部直接下达到师里的。这件事不仅使师首长感到很突然，就连他本人也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很纳闷；自己无论与这所苏军最高军事学府，还是总干部部都无任何联系与瓜葛，怎么会突然要他去到那里学习呢？

一向以谦逊自处的华西列夫斯基觉得自己的条件不够，因为该学院是以培养苏军中高级指挥人员为宗旨的，而自己这时还只是一名并无更多建树可言的普通中级指挥人员。因此，他亲自找到师首长和师党组织，如实谈了自己的上述想法，并请求师部向上级提出建议，不要派他去这所学院学习。可是，红军总干部部在答复步兵 48 师师长的上述请示报告时，不仅没有同意师部按华西列夫斯基的要求写出的意见，反而再次重申了前述调令的内容。这样，华西列夫斯基似乎只有立刻前去报到、准备参加入学考试的惟一选择了。即使如此，临出发前，他也还向师首长表示，一旦有可能改变目前的现状，他仍希望回到师里继续工作。

到了苏联红军军事学院之后，华西列夫斯基便按照自己的实际想法，向该院招生委员会主席提出了一份请求允许他放弃学习而回到步兵第 48 师继续工作的报告。

第二天，华西列夫斯基被通知说，招生委员会副主席要与他当面谈话。待他见到这位学院领导时，先是一怔，紧接着俩人便热烈握手并拥抱在一起了。原来，这位副主席竟是他十分了解和熟悉的一位朋友——特卡切夫。当年，特卡切夫在这所军事学院学习期间，曾到步兵第 48 师实习过相当长的

时间。那时，俩人关系处得非常好，经常在一起坐论时局，纵谈军事，直至个人生活中的许多琐事。如今，特卡切夫正在红军总干部部机关工作，这次高级军事学院的招生工作就是由他来具体负责的。

至此，华西列夫斯基顿时明白了，原来那道调令和再次被重申的指示，竟全是这位老朋友的功劳。惟其如此，华西列夫斯基乃更加不安，虽然特卡切夫试图再次说服他留下来参加这难得的考试，他还是委婉地拒绝了。这样，他便又回到了他所热爱的步兵第 48 师。

本书的这段叙述，基本史实全部来自华西列夫斯基本人晚年自撰的回忆录，这表明他并没有在苏军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自己叙述和回忆的可靠性。笔者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在国内现有的某些公开发行的出版物上，竟分明地写着该氏曾毕业于苏联红军军事学院或伏龙芝军事学院等字样。这里权作匡正。

回到师里后，华西列夫斯基继续从事他原来的工作，直到 1924 年 12 月苏军明令撤销师办军校之时。此后，由于该师第 143 团团长调往莫斯科特种部队工作，该团团长之职便由他来接替。而且，在此后的 4 年之中，他曾多次担任过该团团长之职。

第 143 团原本就是步兵第 48 师的尖子团，在国内战争期间，该团（那时是旅，旅长正是那位曾与华西列夫斯基发生过误会、后来在剿匪战斗中牺牲了的勇敢英雄卡尔宁）曾经荣膺过集团红旗勋章。由于早在师部工作期间就与该团各级指挥人员关系极熟，所以这次一来到团长任上，全团的官兵都对他表示热烈欢迎。此间，曾经发生了一件极有意义且有趣的事情。这就是他们所属的莫斯科军区司令员、著名的苏共政治活动家伏罗希洛夫来第 48 师及他们团视察一事。

当时，华西列夫斯基的第 143 团正在进行通常为期 3 个月的新兵集训。伏罗希洛夫到他们团视察的那一天，正好赶上第 2 营的实弹射击项目训练。上午 9 时，在师长的陪同下，军区司令员带着著名的步兵专家谢斯塔科夫直接来到了一个班的射击现场。

司令员一行首先检查了这个班的射击前准备情况，接着又耐心地观看了全班每个新战士的射击过程。待射击完毕，司令员没有让人向他报告各靶标的中弹情况，而是亲自走到靶场的另一端，仔细地逐个检查靶标。然后，他把战士叫过来，让他们自己亲自向他报告自己的射击成绩。总的看来，这次射击成绩良好，但是，其中却有一名战士一弹也未打中靶标。

司令员态度和蔼地向这名战士问道：“喂，小伙子，你的成绩为什么这么坏呢？”

但见这个战士机灵地来了个立正：“报告首长同志！我原来的成绩一直不错，这次是因为这支枪不太好使……”

司令员立即转向负责全团军训的华西列夫斯基：“团长同志，请问，每支发给战士使用的步枪是否都进行过校准试验？”

华西列夫斯基点了点头，说：“是的，全部都经过校准试验。”然后，他请这名战士的连长立即去取这支步枪的试射登记卡片。

一会儿，连长带着卡片回来了。华西列夫斯基接过卡片，略看了一眼，随后转交给了司令员。伏罗希洛夫拿过一看，卡片表明，这支步枪射效良好。他微微地笑一。

这时，司令员向那名战士要过了那支步枪，显然，这位曾是各种步兵

武器特等射手的苏联英雄要亲自检查一下这支枪了。他伸出手来，把那名战士拉到自己的身旁，然后一同走向附近的一座瞄准架。按军事常规，依托瞄准架射击的结果便可临时验出枪支的基本射效情况。

只见司令员略略地弯下腰，把枪平稳地放在瞄准架的架托之上。扳机被拉开了，食指也放到指定位置。“叭叭叭……”一阵枪声过后，报靶员兴高采烈地跑过来，举着双手大声喊道：“优秀！优秀！”

但是，司令员并不为此满足。他命令把靶标向射击线以后挪动 300 米，并伏下高大的身躯，开始以无依托的卧姿向靶标射击，结果，成绩依然优秀。

在场的全体官兵全都为司令员热烈鼓掌，战士群中不时发出“啧啧”的赞叹声。

只有他身边的那名战士红着脸低下了头。

随后，司令员对射击班的战士们及在场的各位陪同首长发表了即兴演说。他情绪饱满地讲道：

“同志们！你们班打得很好！对你们取得的良好的射击成绩和学习成绩，我向你们，向你们的指挥官表示感谢！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成为祖国保卫事业的合格军人。”

接着，他转向刚才那名战士，继续说：

“但是，你们班的这个同志——他点了那个战士的名字——却一弹未中。这倒也不要紧，任何优秀射手都是苦练出来的嘛！然而，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却说枪不好使，那么，请大家看看靶标吧！看来，现在他自己也信服了。这支他认为‘不太好使’的枪，在会使用它的人的手里是多么地好使啊！我想，我们首先应该奉送给他一句聪慧的俄罗斯古谚语，这就是‘脸丑别抱怨镜子’。我希望他今后能更认真地对待学业和训练，争取在集训结束时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射手。但是，由于他侮辱了他没有任何过错的朋友，我不能把这支枪再还给他了。况且，我看这支步枪的射效甚至比我平时用来练习射击的那一支还要好一些。”

说到这里，他把脸转向华西列夫斯基，接下去说道：

“因此，我非常想请团长同志把它赠送给我。我对团长的第二个请求是，今天就发给这个战士另外一支射效同样良好的步枪。当然，我相信，射效不好的步枪，一般说来在你们团是没有的。另外，在夏季训练结束后，请通过谢斯塔科夫同志，把这个‘与众不同’的同志的射击成绩和学习成绩转告给我。当然，我再重复一遍，我希望并且也相信，到那时候，这个同志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步枪射手和合格的红军战士！”

视察结束后，伏罗希洛夫司令员专门找华西列夫斯基谈了话，高度评价他领导下的第 143 团的有成效的工作，并鼓励他继续努力，争取使自己所在团成为全军区的模范团。司令员还特别对他谈到这样的见解：团是军队中最富承上启下性质的枢纽组织，它既是基本的实际作战单位，又是贯穿上级领导意图的部署性指挥机关。因此，团的工作不论对整个部队，还是具体到指挥员个人，都是特别重要而有意义的。

对此，华西列夫斯基深有同感，这么多年来在团的工作岗位上，确实使他学到了许多非常重要的东西。关于司令员的工作作风，华西列夫斯基更是由衷地佩服。

1926 年夏，当华西列夫斯基还在第 143 团团长的任上时，他奉命到“维斯特列尔”步兵战术进修学校团长进修班学习了一年。该校是苏军最老

和最有名望的一所军校，始建于1918年11月，到1924年正式定名为：共产国际“维斯特列尔”工农红军指挥人员步兵战术进修学校。当时的校长是国内战争期间著名军事首长、3枝红旗勋章获得者哈哈尼扬，他曾著有享誉极高的《军人心理学原理》一书，且素以知识渊博、辩才无碍著称。

在校期间，由于参加学习的学员都是从红军中级指挥人员中优中选优而来，所以为他们上课的教官们都是一些严肃认真、思想深刻的专家们。如，地形学专家D·C·舒瓦耶夫，军事工程师N·H·彼得罗夫，枪炮学专家H·K·谢格尔克兰茨，军制学专家H·N·米舒图什金，兵器学总导师H·M·赛拉托夫及射击学总导师C·N·舍斯塔科夫，等等。此外，校长哈哈尼扬本人则亲自为他们负责战术作业的教学。当时为他们开设的课程主要有4大科目：战术、射击、教学法及社会科学。学员们研究了当时来说最新的以各种形式进行的战斗，研究了那时新式武器的基本原理和使用方法，还研究了在各兵种协同作战条件下的指挥技巧。关于社会科学，学校则经常为他们请来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做国际国内形势报告。因此这也是当时最受学员欢迎的课程之一。

华西列夫斯基利用这次脱离部队的系统时间，更集中地阅读了许多俄罗斯及外国的著名军事理论著作，这对他以后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在苏军总参谋部和最高统帅大本营辅佐斯大林运筹帷幄，无疑是大有种益的。这次同他一起在团长班学习的学员中，有许多人在后来的卫国战争中成了苏军名将。不消说，华西列夫斯基对这所培养过他成长的著名军校是颇有感情的。1958年11月21日，当时已经成为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的他，曾专门为该军校建校40周年题词纪念。题词为：

“维斯特列尔”进修学校是苏联军队中培养军官干部最

老的一所军校，它在其存在的整个时期里为苏联武装力量成功地培养了一批具有高度素养的军官。我以感激的心情怀念着我在进修学校的生活和学习，军校给了我这个红军指挥官以各种扎实的知识。

1927年8月，华西列夫斯基为期一年的军校进修结束。此后他仍回到原来的第143团工作。

适此前后，苏军在全军范围内开始普遍推行新的《步兵战斗条令》教育，全苏各武装部队都在忙不迭地为适应这个条令进行各种各样的军事演习。紧接着，军队又试点性地开始装备新式武器，其中主要的是半自动步枪、苏制新式机枪及1927年型的团属加农炮。华西列夫斯基所属的步兵第48师正好在这个试点范围之内。于是，他们师便首先在驻地托尔若克市地区附近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战术与新武器应用演习。演习前，莫斯科军区第一副参谋长麦列茨科夫首先参观了第48师和华西列夫斯基第143团的动员活动。后来，工农红军部长列维契夫领导的特别委员会以及陆海军副人民委员翁什利赫特还特别前来观察了第143团的整个动员过程。检查结果表明，整个步兵第48师的动员活动是好的，其中特别表扬了华西列夫斯基所领导的第143团。

翁什利赫特最后还代表陆海军人民委员对第143团全体官兵宣布了嘉奖令。

此间，恰逢莫斯科军区司令员易人，原来接替伏罗希洛夫的沙波什尼科夫现在又因工作需要调出，前来接替他的则是乌鲍列维奇。这位新司令员

刚一到任就提出要视察步兵第 48 师，结果是，他发现在第 48 师各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现象，如第 142、第 143 两个团都是在军事训练和战斗力、纪律性方面相当不错的单位，而第 144 团则远远不能与之齐肩。鉴此，他向第 48 师领导建议，必须改组第 144 团的领导机构。于是，该师领导就如实地向司令员汇报了华西列夫斯基在上述两团的先后经历与治军成绩。这样，由司令员拍板同意，决定调华西列夫斯基前去治理第 144 团。

晚些时候，当师首长通知华西列夫斯基说准备派他去第 144 团担任团长时，后者大感意外。他表示自己不愿去新的岗位，毕竟第 143 团是全师唯一的红旗勋章团，更何况这 4 年来他对该团的工作也着实花费了不少的心血。最后，师首长不得不直截了当地对他说，这次调动是直接经军区司令员拍板同意的，目的是为了第 144 团尽快地摆脱目前这种经常出问题的状态。华西列夫斯基仍感到委屈，思想不通。最后，师首长便建议他最好已去见一见军区司令员乌鲍列维奇，把想法当面同司令员谈一谈。

师长还保证说，他将用电话先与司令员联系，尽力支持华西列夫斯基要求改变命令的请求。

这样，华西列夫斯基便于 11 月底亲自找到了军区司令员乌鲍列维奇。俩人一见面，司令员对他非常热情，询问他的家庭情况等。当时，他曾以为是司令员在与他搞什么“王顾左右而言他”那一套，便索性一古脑儿地把自己的真实想法都说了出来，其中还特别谈到他希望能第 143 团这样的荣誉单位解决自己的入党问题。到最后，他干脆毫不隐讳地把他目前与第 143 团党组织的良好关系也一并和盘托出了。司令员一直在静静地听着，态度和善，又显得非常有耐心。待他说完，司令员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问道：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同志，我现在想问您一个问题。您是否知道关于您的这项新任命是根据谁的建议以及出于什么原因提出来的吗？”

“我知道，这是经过司令员您同意的。”华西列夫斯基低声地说道，“我也知道让我去那里的原因。”

“好，看来您是个很诚实的人，这让我感到高兴。”司令员重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接着便谈开了：

“您刚才说您想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对吧？我看这是完全正当的，我完全支持您！可您想到过没有，这样做的结果又是什么呢？事实上，我们准备调您去第 144 团，就完全是党的工作的需要。这个问题最初就是第 48 师党组织提出来的。步兵第 48 师党组织和师首长相信您依靠第 144 团的党组织是能够使该团摆脱落后状态的。第 144 团的党组织是坚强的，当然也是合格的，它所需要的就是一个受过良好军事训练的有工作经验的团长。您通晓自己的工作，也热爱自己的工作，又在这一岗位上积累了相当的经验。我相信，经过您的努力，这项工作是一定会完成的。”

华西列夫斯基听着司令员入情入理的分析，心中渐渐地静下来。司令员一边观察他的表情变化，一边又继续说道：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您过去工作一贯认真，而且也不无成就，所以我和您的师首长才这样慎重地对待您，包括您现在提出的要求改变那道命令。如果到现在您还仍然坚持留在原来的第 143 团，我也愿意请求人民委员撤销那道命令。现在就由您自己来决定吧！”

这一席话，尤其是后面这段话，很使华西列夫斯基不安。他觉得，司

令员和师首长对他确实是仁至义尽，至少也可算得上名副其实的苦口婆心。他再也坐不住了，于是站起来说道：

“对不起！司令员同志，是我错了。请您原谅我不客气地占用了您的宝贵时间。

请您允许我立即前往新的工作岗位去报到。我在这里向您保证，我将竭尽全力做好第 144 团的工作，决不辜负党和首长们对我的信任！”

司令员笑了，他忙站起来拉华西列夫斯基重新坐下，又问还有什么困难需要他来出面帮助解决。华西列夫斯基说：“再没有了，除了党的信任之外。”

华西列夫斯基未回到师部向师首长说明这一切之前，乌鲍列维奇司令员就已事先在电话里向第 48 师师长通告了刚才所发生的一切。

此后，华西列夫斯基便欣然领命，来到了第 144 团。

当时，第 144 团的驻地在维什尼沃洛乔克。这是一座小巧而精致的俄罗斯小城，它有古老的水渠、水闸、漂亮的花园以及遍布城区的各式各样的林荫道。初到这里，华西列夫斯基即找到团的党组织，把自己加强该团训练力度、整顿官兵组织纪律性以及如何迅速改变部队现状的种种措施与想法一并做了汇报。团党组织完全支持他的工作，并说将在解决官兵思想认识问题上努力帮助他。

自此，华西列夫斯基不辞辛苦，经常地蹲连队，哪里问题严重，他便亲自去那里住上一段，就地办公，现场解决，限期纠正。在他的模范行动带动下，各营连指挥员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全团上下立即出现了可喜的转机。于是，他又趁热打铁，在全国范围狠抓军事训练和战术演习。有许多训练科目都是他具体负责的，如射击、战术、野练等。

功夫不负苦心人，有耕耘便有收获。1929 年春，在第 48 师全师的战役战术两级联合军事演习中，华西列夫斯基硬带出来的第 144 团取得了全团优秀、一个营第一的好成绩。为此，师首长亲自到该团为官兵颁发荣誉证书。1930 年秋，在全师校阅中，第 144 团夺得了师里的第一名。这一下，全师轰动了。莫斯科军区首长特别给该团以通令表扬。由此，全团雀跃。“荣誉和尊严对军人来说，当是第一位重要的东西。”这是华西列夫斯基新上任时在全团指挥人员大会上喊出来的话。当初，还有些人将信将疑，而现在，再也没有人不服膺它了。

1930 年秋末，在第 48 师校阅之后，整个莫斯科军区在莫斯科郊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全军区的联合军事演习。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一些军区和高等军事院校的代表、还有一些友好国家的军事代表团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这次演习。这次演习相当成功，全军区部队都展示了自己最新的训练水平。整个第 48 师的成绩都不错，其中第 144 团则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工农红军总部和军区首长对步兵第 48 师第 144 团的如此巨大进步和成绩都表示赞誉。

就在这次演习结束之际，工农红军总部作战部部长兼副参谋长特里安达菲洛夫（当时他还兼任步兵第 48 师所属的第 2 军军长之职）亲自找到华西列夫斯基做了晤谈。

临别时，他告诉华西列夫斯基说，为了事业的需要，后者可能于最近被调赴陆海军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任职。

后来，关于调动的消息基本上被确切证实了。华西列夫斯基很留恋他曾经在这里工作过的步兵第 48 师。如果从国内战争后期的几年算起，直到

他 1931 年离去，华西列夫斯基前后总共在这里工作了 12 年之久。12 年啊！即便是草木，怕也该生情了，何况人呢！

考虑到种种实际因素，离开前，华西列夫斯基向所在的第 144 团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团党委欣然接受了他这一请求。

华西列夫斯基甚至晚年时还清楚地记得，那次讨论他入党的会议是在他赴莫斯科任新职前最后的一个星期天举行的。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会议是公开进行的，会场定在全团初级人员指挥学校的

列宁广场，全团几乎所有的人都来参加了。

我简直难以用笔墨来表达我在彼时彼刻的全部感受。

在场的高级和中级指挥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以及普通战

士中的同志们都对我说了极为热情的话，对我的工作给予了

高度的评价。我懂得，他们对我说的那些美好的话都是给我的巨大鞭策。

党的会议一致决定接受我为共产党预备党员。几天以后，

师党委批准了这个决定，并将这个决定报送军区党委。1931

年 8 月，莫斯科党委批准这一决定。于是，我成了联共

（布）党的预备党员。

但是，华西列夫斯基成为正式党员却要晚得多，正如一些传记性资料中所说的，那是在 1938 年。原因是，自 1933 年以后，苏共内部开始了大规模的所谓“清党”运动，至 1936 年前一直停止吸收新党员工作。所幸的是，在一系列的“清党”、“肃反”政治运动中，华西列夫斯基并未受到牵连。1938 年初，总参谋部党委同意接收他为正式党员，3 月，这一决定得到了红军政治部党委的批准。

第五章 供职于总参谋部

伯乐引来千里驹，军训部里得先机；

总参学府获再造，步入中枢始奠基。

1931 年秋，华西列夫斯基奉命由步兵第 48 师调入苏联红军军训部任职。

苏军军训部是一个刚刚成立的新部门，它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全军新形势下军事训练的安排部署、督导检查等工作。其机构组成，除了负责全面领导工作的军训司令部外，还按当时苏军所具有的各兵种组建了相应的监察领导机关。具体有步兵监察部、骑兵监察部、炮兵监察部、工程兵监察部、通讯兵监察部、体育训练监察部及军乐监察部等。坦克兵和航空兵的训练暂时独立，没有纳入军训部的统一领导之内。在这里，现代化战争所必须的各兵种协同动作，已经开始被提上了正式的议事日程。这也体现了 30 年代初期苏军领导部门和指挥机关关于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思路。

由于军训部系新建部门，所以从部长到各兵种首长及机关工作人员，都是按实际需要由四面八方及各部队抽调上来的。按当时的遴选标准，凡作为一般干部抽调来此工作的，通常都是多年担任指挥和参谋工作的中级军

官。规定要求，这些人必须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或国内战争的实战战斗，在原各部队任职期间有优异的表现和丰富的军事经验。具体到华西列夫斯基，就是因为他曾经有过长期担任苏军中级指挥员的丰富经验和优良业绩。

推荐华西列夫斯基到军训部机关来的，是当时苏军总部作战部长兼副参谋长特里安达菲洛夫。特里安达菲洛夫是个标准的军人，很难想象还有比他更热爱自己职业的人。在军事上，简直没有他不感兴趣的东西。他不仅受过全面正规的军事训练，而且在军事理论研究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苏军 30 年代初所大力推广和训练的大纵深战役理论，就是以他为首的一批高级军事专家和高级军事首长们所首先倡议的。

这一理论的提出和随后在整个全军各部队军事训练过程中的施行，对于提高当时苏军的现代战役水平及部队现代化建设，起到过极为重大的积极作用。

华西列夫斯基之所以被他发现，是由于 1928 年特里安达菲洛夫带职锻炼到莫斯科军区第 2 军任军长，而这时正好是华西列夫斯基领命改造该军所属第 48 师第 144 团的开始时期。第 144 团在华西列夫斯基领导下迅速改变面貌、由后进变先进的事实，很使特里安达菲洛夫感到惊奇，他当时很想见一见这位治军有方的年轻团长。在建立起实际接触以后，俩人都发觉彼此非常谈得来。这位军长尤其欣赏华西列夫斯基的地方是，后者除了带兵有方，还特别重视学习和研究现代军事理论及新形势下的战略战术原则，并能有效地把这些及时结合到部队的军事训练中。在他看来，华西列夫斯基身上有一种其他中级指挥员所缺少的主动精神和新锐意识。在特里安达菲洛夫任第 2 军军长的两年中，他经常到第 144 团去视察，有时在野外演习中甚至与华西列夫斯基一起研究如何进行现代战斗、掌握和使用最新式装备和新技术兵器的方法和新形式，以及诸兵种合成战斗中的协同问题，等等。

到军训部司令部机关工作之初，华西列夫斯基对坐办公室的工作极不习惯。长年的基层部队生活使他特别留恋，以至在这里显得很不安心。后来又是特里安达菲洛夫来劝慰他，鼓励他，帮助他如何更快地适应新的工作环境，找到自己新的用武之地。后来华西列夫斯基曾经对友人说，特里安达菲洛夫将军是他由部队基层过渡到苏军领导机关的最早和最值得钦佩的领路人。他很为将军的早去（特里安达菲洛夫 1931 年 7 月因飞机失事遇难）感到惋惜……

在军训部工作的两年时间里，华西列夫斯基先是主持编辑《军训通报》。后来，苏军最有影响的军事学术刊物《军事通报》也转归军训部办，他同时也成了该刊的主要负责人。此间，华西列夫斯基深入地研究了关于大纵深进攻战役的理论，以及诸兵种合成战斗动作协调等一系列最新军事科学理论。这为他后来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成功地筹划和领导大规模战役行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构成了他军事思想的主要框架。

当时，整个苏军和军训部都特别重视对大纵深战役理论的研究及应用训练。这不仅是苏军日益走向现代化的实际需要，也是国际形势日趋严峻的现实要求。在西方，希特勒上台后，法西斯主义的猖獗活动直接威胁到苏联的安全。在东方，日本已经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广大地区，并且大量陈兵于中苏边境地域。在苏联东西两边的国境线上，经常发生反苏武装挑衅事件，至于西方国家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叫嚣，更是不绝于耳。从根本上说，苏军对这一军事理论的重视，就是为了应付可能随时发生的敌人入侵事件，以便

利用军事科学的最新成就及大量出现的新技术兵器来回击敌人，直至以大纵深的迅速反突击方式，在侵略者的国土上有力地打击和消灭敌人。

由于华西列夫斯基在大纵深战役理论研究方面的突出成绩，当谢佳金将军（他也是这一理论的主要阐释者之一）出任第2任军训部部长后，华西列夫斯基曾多次被派遣到各军区的野战部队去检查应用训练演习。在1933年夏季进行的诸兵种合同大纵深战役试验演习中，华西列夫斯基被任命为演习导演司令部的参谋长。担任这次演习总导演的是苏军参谋长叶戈罗夫，副导演是苏军炮兵主任戈洛夫斯基。为了这次震动全军的大型演习的准备和总结工作，华西列夫斯基整整忙了4个月。演习结束后，他参与编写了《大纵深诸兵种合同战斗细则》、《步兵、炮兵、坦克兵和航空兵在现代诸兵种合同战斗中的协同动作细则》。这些，后来曾广泛发至全军各部队使用。

此间，华西列夫斯基还与军训部的其他同事们到各野战部队去参加系统的战斗、技术和作战方法的作业。有时则是去军事科研单位了解最新的技术装备和兵器，有时也直接去炮兵、坦克兵和工程兵的射击场地见习。这些，都大大地改善了他的全面军事素养和现代武器装备与新技术兵器知识。此外，根据国防人民委员会的命令，华西列夫斯基还经常随同谢佳金部长给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的高级军事首长上课。

其中最重要的课程讲座直接由副国防人民委员留哈切夫斯基亲自讲授，华西列夫斯基则负责为他们准备沙盘作业。

1934年，由于伏尔加军区的夏季演习暴露出了战役战术训练和指挥，特别是军师两级指挥方面的一系列缺点，国防人民委员会特别发布命令，对这次演习作出了组织结论。由于命令直接涉及华西列夫斯基在这方面的优点，军训部为加强该军区司令部机关的领导工作，专门派他到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司令部担任军训部长一职。

此间，他结识了许多后来成为苏军名将的军事领导人。如他的终生挚友、著名的朱可夫元帅及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布琼尼元帅、特卡切夫将军等都是他在这时认识的。

1935年9月，苏共中央和人民委员部作出决定，在陆海军中普遍实行指挥人员和领导人员军衔制。华西列夫斯基当时被授予上校军衔。在前此的16年中，他和所有的苏联红军军官一样，只是在上衣领上常年不变地缀一只菱形章。同此间的其他军事改革一样，实行军衔制度，也标志了苏军在现代化发展中的一个侧面。

1935年底，苏军正式成立了总参谋部机关，稍后，则建立了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专门为红军培养各兵种的中高级参谋人才。应该指出，苏军于此际特别设立总参机构和总参学院，首先是基于反侵略战争的直接需要。苏联领导人明智地感到，即将爆发的世界战争必将是超出以往任何年代的规模和性质的新的现代化军事较量。因此，必须花大气力在军事理论和新技术兵器方面加强研究，使总参谋部成为未来战争中指导苏军得以运筹帷幄、决胜疆场的最高神经中枢。当然，它也考虑到了下面的实际因素，即当时苏军各部队也实现了初步的新技术兵器装备。如，那时已经有了T-26、BT、T-28型坦克，稍后又有了更先进的T-35型坦克；以及西蒙诺夫自动步枪、高射机枪和高射炮、新式战斗机，等等。在部队建制方面，也有了装甲坦克旅、航空兵旅，以及快速机械化军等。

1936年秋，受国防人民委员派遣，华西列夫斯基上校前往刚刚成立的

总参谋部学院深造。他和其他许多后来成为苏军名将的指挥人员，极为幸运地成为这所著名学院的第一期学员。据介绍，挑选这批学员的工作是在苏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其选拔条件相当严格：在成份上，他们必须是总参谋部、各军区司令部的工作人员，再就是各大兵团司令和参谋长以及各苏军军校的高级教官；在经历和表现上，被派往学习的人员必须具备战斗经历，有优良的工作鉴定，照例还要受过高等军事教育。

总参军事学院坐落在莫斯科特鲁别茨基大街，当时还只有两座大楼，一座作为教室使用，另一座则是学员的宿舍。学院专门为学员们定做了有别于当时任何军校学员和普通现役军人的校服：上衣和大衣上都有镶着白边的黑色天鹅绒衣领，裤子两侧是带白边的深红色镶条，军帽上也是带白边的深红色帽圈。11月1日的开学典礼极为隆重，苏共中央和苏军的很多高级领导人全部到场祝贺。显然，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对这批严格选拔上来的优秀学员是寄予了深切厚望的。

按当时规定，这第一期的137名学员要在18个月内学完战役学、战术学、军制学、俄国军事史、外军史、方面军战役战略理论、大纵深战役设计、诸兵合成指挥、新技术兵器等主要军事课程。此外还专门开设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当代世界政治与军事、现代外军研究等讲座课程，负责讲授这些课程和讲座的多是苏共中央和苏军的高级首长，也有许多人是在这些问题上有深入研究的著名专家和学者。当时，学院的教员也是按党中央指示从全苏各著名军事院校选来的。

在总参军事学院学习期间，华西列夫斯基刻苦钻研各种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优秀地完成每一学科的理论作业和导演战役实施方案，经常受到指导教官的表扬。

他用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了解和研究最新技术兵器和当前外军的书面材料；对集团军战役、航空兵兵团行动、坦克装甲兵团作战及集团军后方与后勤工作等最新军事热点理论问题，他更表现出了极浓厚的兴趣和热情。此外，他还研究了下列问题：计划和实施方面军战役和集团军战役的形式；战役过程中部队的指挥与保障；诸种兵团协同作战中的相互配合，以及现代化技术兵器的使用与最大效能发挥，等等。可以看出，他感兴趣并勤奋探索的上述领域，恰好成为后来他在总参谋部和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辅助指导苏联卫国战争的必备知识范畴。

1937年夏，学院全体学员经过短暂的暑假休息后，华西列夫斯基和他的同学们被特别安排到海军舰艇上实习了两周。按规定，一半去黑海舰队，一半去波罗的海舰队。他在赴波罗的海舰队实习期间，了解和学习到了许多他以前根本不知道的海军知识。经此一遭，眼界大开。他甚至对朋友说：海军可能是最有魅力和诱惑力的地方，因为海上的无障碍作战，才是对指挥人员最大的智能考验。

海军实习结束后，由于某些客观原因，很多学员可能会学不到毕业就奉命去各部队担任职务。开始，华西列夫斯基也在被抽调的这部分学员中间，但到最后，则把他留在了总参军事学院担任包括集团军战役教研室在内的后勤教研室主任。接到这一任命，华西列夫斯基大感惶惑，因为他对后勤军事学并无很大兴趣。后来才听学院领导说，对他的如此安排是前学院领导人与苏军总参谋长共同研究后决定的。

1937年9月，当华西列夫斯基在总参学院工作刚满一个月时，总参谋

部又来了新的调令，说是请他第2天到总参谋部去领受新的任务。翌日，华西列夫斯基准时到了指定的办事机构。在这里，他被正式告知说，总参谋部已经提请任命他为总参机关主管军队高级指挥人员战役训练处处长一职，国防人民委员的书面命令已经签署完毕。这样，从这年10月起，华西列夫斯基就开始在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工作了。这时他根本预料不到的是。此后这里竟成为他长期永久性的家。

从这时直到1939年6月，华西列夫斯基一直都在担任总参谋部战役训练处处长之职。他的主要时间和工作都用来完成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交给他的形式上纷繁复杂而内容却大体相似的任务。这主要包括：缜密地拟定苏联国防人民委员有关红军领导部门战役战略训练的年度命令和指示，通过这些文件做年度总结，并在年度总结的基础上确定下一年度的军事训练任务。同时也根据各军区的位置、特点、物质条件以及它在武装力量系统中的作用，向各军下达具体的军事训练任务。一般说来，这和他前此在军训部的工作没有更多的区别，只是比那时显得更加复杂和紧张。

有时，华西列夫斯基也直接到各军区或部队参与各种训练和演习活动。1938年春夏，他曾亲自参加基辅特别军区领导机关的一次极为复杂的军事演习。当时，该军区的司令员是铁木辛哥，他的参谋长则是华西列夫斯基在总参军事学院的同学瓦图京。他们所在的这个军区拥有实力相当强大的4个集团军群：骑兵集团军群、敖德萨集团军群、文尼察集团军群和日托米尔集团军群。其中，该骑兵集团军群是那时苏军中最好的一支快速军团，它由两个骑兵军、炮兵军、坦克军及其他部队编成，其任务是在军区的任何地域内对敌实施突击或反突击。其他3个集团军群是由若干个步兵师、坦克师及各种保障部队组成的集团军型军团。正当这次大规模演习尚在进行之中，该军区司令部突然接到了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的命令：要求文尼察集团军立即进入战备状态，并调往苏联边境地区；骑兵第18军、坦克第25军、步兵第17军、坦克兵2个独立旅、航空兵7个团立即在卡梅涅茨一波多尔斯州和文尼察州的土地进入行动；日托米尔集团军立即结束演习，在诺沃格勒-沃伦斯基和谢佩托夫卡地域集结。还要求将军区司令部作战部建立在普罗斯库罗夫。

当时，不论是铁木辛哥、瓦图京还是华西列夫斯基，都不知道国防人民委员的命令意图，只是到后来，他们才获悉，这是苏军鉴于反动的慕尼黑协定及其带来的叛卖行径所采取的临时应变措施。通过此事，身为总参谋部官员的华西列夫斯基充分认识到了战争形势的日益吃紧。此后，苏军则逐步加强了西线的反侵略战争部署。

实际上，这段时间内苏联的东线也远不是风平浪静。日本帝国主义一手挑起的哈桑湖军事冲突（即张鼓峰事件），在苏联方面看来，也是企图进攻苏联的前奏。

当时，总参谋部认为，这可能是日本人想检查一下苏军在滨海地区的实际战备情况。

在战事延续一周后，日本侵略者被苏军彻底击败，最后不得不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了事。在这段日子，遵照总参谋长指示，专门在总参谋部和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的办公室之间装设了一部专线电话，华西列夫斯基就奉命守在电话的一端，所有的事态变化都由他直接报告国防人民委员。

哈桑湖冲突中苏军战斗的经验表明，苏联军事条令和教令是符合形势

和新的战斗技术装备的要求的，当然也暴露出远东（滨海）集团军在战斗训练方面，特别是诸兵种协同动作、军队指挥以及动员准备方面的某些缺点。为此，总参谋部领导指示华西列夫斯基利用这次实战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对军训处原来的战斗训练及战役训练条令作出新的补充和修改。修改后的条令以总参命令形式下发到各军区和各集团军群。由于这项命令经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审定，后者又当面向华西列夫斯基提出了两条修改意见。待最终完成并下发部队后，该命令很受各军区及集团军群的高级指挥人员的欢迎。为此，华西列夫斯基还得到了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表扬和嘉许。

1938 年秋，总参谋部机关特别发布了一道命令，对华西列夫斯基进行嘉奖，表彰他“忠诚地和高质量地完成了一系列重大的任务”。这里的“一系列重大任务”，主要是指下述 3 件：一是他参加拟定了人民委员关于战斗训练的年度命令；二是他撰写的关于工农红军领导人员冬季战役训练的训令；三是他起草完成了人民委员关于哈桑湖地区战斗行动总结的命令。

1939 年初，由于战争日益临近，总参谋部决定将原来的作战处扩充为权限更高的作战部，并对它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做了较大的调整。作战部是总参谋部的核心机构。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其他机构都是在和作战部密切配合下工作的，执行作战部提出的种种要求，又从它那里获得自己工作的基本材料。作战部的主要任务包括：制定所有战役的计划，收集和分析各方面军的情况材料，监督对最高统帅部训令的执行，等等。按苏军当时和后来的工作惯例，只有作战部部长或副部长才有资格与总参谋长一起去最高统帅部汇报工作。这就要求作战部长或副部长必须了解总参从事的一切工作，以及总参掌握的一切东西，其中包括有关敌情、军事运输及各方面军实力和预备队状况。其实，这一切也是拟定和编制成功的作战计划所必不可少的要素。

当作战部开始组建时，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就考虑应该把沉着干练的华西列夫斯基选派到这里来工作。但当时战役训练处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而全军高级指挥人员这一层面的联合军事演习又接二连三，以致一时没能实现。到了 6 月间，经沙波什尼科夫与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商定，最后报请最高统帅斯大林批准，决定调华西列夫斯基出任作战部副部长，同时暂时继续兼任战役训练处处长。

1939 年 9 月 1 日，法西斯德国突然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此前，苏联政府为了争取更多的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时间，而与德国签定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从而实现了联共（布）第 18 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尽量“不让帝国主义把我国拖入战争”的战略构想。

但是，苏联政府和军队的决策者都清楚地知道，一旦世界大战爆发，那么在欧洲战场上将出现的决定性争夺必将是在德国法西斯与社会主义苏联之间展开。也就是说，苏德战争终将不可避免。苏联政府所以要同德国法西斯订立上述互不侵犯条约，除了前面提到的通过哪怕是暂时的缓和来增加战争准备时间之外，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国际政治战略方面的考虑，这就是使当时由英法等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积极出面推行的“绥靖主义”阴谋政策落空。因为，当时英法列强，甚至包括美国在内对德国法西斯的侵略行径都一概纵容，甚至怂恿希特勒向东进军，目的就是要将战争的祸水引向社会主义苏联。以至当苏联政府向它们提出共同防御法西斯侵略的建议时，不论波兰还是英法两国，全都不乐此为。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所出现的“西线无战事”（亦被称为“奇怪的战争”）的历史事实，便已经充分证明了当时苏联政府

的明智和远见。

尽管如此，苏联最高军事委员会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不抱幻想。还在战争爆发初期，斯大林便指示总参谋部着手拟定和编制旨在应付突发事变的苏军战时集中和展开作战计划（后总参谋部将它命名为“反击侵略计划”）。这项工作最早是由苏军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负责领导的，具体参与这项计划编制的即是总参作战部瓦图京部长与华西列夫斯基副部长。

1940年5月间，为适应即将到来的战争形势，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对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的领导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在这次调整中，华西列夫斯基被任命为总参谋部第一副部长，具体负责西方工作。此后，编制“反击侵略计划”的任务便成了华西列夫斯基的主要工作。需要说明的是，该计划的基本思想和主要内容要点，都是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提出的，具体的进一步研究调查工作及最后起草成书面材料，则是由华西列夫斯基、瓦图京和马兰金来完成的。

在这段时间里，华西列夫斯基每天工作都在12个小时以上。即使是休息时，也满脑子都是作战计划。经过3个月的紧张工作，这项计划的雏形算是完成了。

计划认定希特勒德国将是苏联的最可能和最主要的敌人。意大利也可能站到德国一边，但它的军事行动多半会局限在巴尔干地区，因而最多只能对苏联边境地区造成间接威胁。此外，站在德国一边的还可能有芬兰（后来在法国被打败和英国在敦克尔刻瓦解后，它的领导人果然倒向了柏林）、罗马尼亚（从1939年就成了典型的德国“原料附庸”，翌年干脆放弃中立，直接投靠了法西斯联盟）和匈牙利（当时已是“反共产国际条约”的参加国）。在当时，沙波什尼科夫认为，军事冲突可能会局限于苏联西部边境。鉴此，该作战计划规定，苏军主力应集结于苏联西部地区。此外，该计划也未排除日本进攻苏联远东的可能，因此建议在那里集中足以保证苏联地位稳定的力量。至于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沙波什尼科夫认为应在由桑河口向北的地区展开，因为这对德国来说最有利，因而也是最可能的。计划规定，苏军主力应在由波罗的海沿岸至波列西耶一带集结，即当时西北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的驻扎地段。计划中还认为，要保苏联南部的安全，同样也需要有两个方面军的力量，不过其兵员和兵器的数量都应少一些。计划指出，德军在苏联西部从兵力的集结到展开至少需要10—15天。关于战争可能爆发的日期，计划中只字未提。

这便是苏军最早的“反击侵略计划”梗概。

10月5日这一天，华西列夫斯基和新任作战部长阿尼索夫带着这份计划来到了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按原来的规定，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部分政治局委员要审查该计划。汇报是直接由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新任总参谋长麦列茨科夫和第一副总参谋长瓦图京当面向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们提出的。此间，华西列夫斯基和阿尼索夫则等候在斯大林秘书处的房间里。一旦遇有问题需要解释说明，则由斯大林的秘书通知他们进去。

在审查该计划过程中，斯大林认为，潜在敌人进攻的最可能的突击方向，不应该是计划中提出的西部方向，而应是西南方向。按照他的分析，战争一旦爆发，德国不会把主力放到沿苏德边界地区发生的交战的中心部位，而是要把主力放在西南部，以期夺取那里的苏联大片工业区、原料产地和粮食产区。在场的部分政治局委员及刚刚由西南前线视察归来的国防人民委员

铁木辛哥也表示赞同斯大林的这种分析。这样，审查结果认为，总参谋部必须按这种分析重新编制该计划，新计划必须把苏军主力集结于西南方向的广大地域。按斯大林的要求，所有与此有关的工作必须在 12 月 15 日前完成。

这样，华西列夫斯基等人又开始了新的忙碌。到 12 月初，“反击侵略计划”的第二稿完成。到 1941 年 2 月，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进行了 17 个月之久，苏军领导机关和总参谋部又研究了德国在欧洲战场上的所有进攻型战役及其有关最新资料，因此对该计划又做了第三次补充修改。

至此，这项工作乃基本告竣。其主要内容是：苏军的军事行动应从反击进犯之敌的突击开始。从德方看，德军的突击行动将以大规模空战形式展开，以使苏机场陷入瘫痪，削弱苏军队集群，特别是坦克集群，破坏苏军后方设施，摧毁火车站及靠近前线的大城市。

从苏方来看，苏军必须倾空军全力挫败敌人夺取制空权的图谋，而且也要从空中给敌人以坚决的打击。同时，如果敌地面部队与大坦克群向苏边界发动攻击，这时苏步兵部队和边境地区的筑垒地域必须协同边防部队顶住第一次打击。而苏机械化军应依靠反坦克地区发动反突击，同步兵一起消灭并契入苏防线的敌军，并为苏联军队转入进攻创造有利条件。

此外，这份新的作战计划还规定了在敌军开始进攻时从苏联内地往边境区域运送部队的通道。还考虑到不论在任何情况下，苏军都应在军队集群编成内，以做好准备的全部兵力投入战争。计划还要求，所有军队的动员和集中，都应预先进行。

总的看，总参谋部前后经过反复修订的这份“反击侵略计划”是考虑相当周密的。包括华西列夫斯基等主要制定者在内的苏军总参谋部人员，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劳动。无数次的调查、核实、分析及布置、部署工作，反复不断的推敲、论证、判断及演习、训练实践，曾使总参谋部，主要是作战部的全体工作人员筋疲力尽。为此，华西列夫斯基曾生了一场大病，而且一病数月不起……

但是，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军在苏联西部宽大正面实施突然攻击的事实，还是证明当时斯大林的判断是错误的。是沙波什尼科夫认为的西部，而不是斯大林认为的西南部。这也是战争初期苏联军队一度混乱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因为，是敌人攻击开始后苏军统帅部才被迫按实际情形来修正上述错误判断的。而把主力部队从西南边境地区移到斯摩棱斯克—莫斯科的西部方向，是需大量时间的。此外，原来的内地部队及预备队也是事先规定好了输送路线和固定停靠地域的。这下全部打乱了，他们不得不在他们所不熟悉的地方下车和参战。

当然，战争中的许多细节问题都不是可以事先完全预测到的……

在此，还有必要介绍一下前此华西列夫斯基以苏联代表团军事专家身份随同莫洛托夫访德的某些情况。

1940 年 11 月 7 日，是苏联十月革命第 23 周年纪念日。这天，莫斯科红场上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苏联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人都参加了这次在紧张的备战前提下举行的有意义的活动。在阅兵式刚刚结束之后，华西列夫斯基便被叫到了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那里，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铁木辛哥手下负有特别使命的兹洛宾将军。

在铁木辛哥宽大明亮的办公室内，国防人民委员正式通知他们两人说：“根据苏联政府的决定，最近几天你们将以军事专家的身份作为政府代表团

的成员前往柏林，进一步的具体指示将由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直接告诉你们。”华西列夫斯基事前曾听说，最近一个对期，柏林方面一直邀请苏联派代表团访德。他也知道，苏联政府为了进一步迟滞随时可能爆发的苏德战争，已经答应派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一行前往柏林。但是他并不知道，政府代表团成员中还有军事随员，更没有听说要派他跟随前往的消息。

在代表团准备过程中，莫洛托夫专门召见了华西列夫斯基和兹洛宾，并给他们下达了必要的指示。外交人民委员告诉他们，早在10月13日，德国外长冯·里宾特洛甫曾致函斯大林，以德英利益冲突来虚伪地解释他们对欧洲弱小国家的侵略行径。

后来又称要与苏联磋商击败英国后的欧洲及英属亚洲殖民势力范围的分割占领问题，言下之意是诱使苏联加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苏联政府所以接受德方的邀请，是想借机查明德国法西斯的真实想法和战争计划概况，政府当然没有与德国在柏林缔结任何协议的意向。同时，苏联政府代表团这次将不卑不亢地对希特勒觊觎罗马尼亚、芬兰和其他地区的图谋表明自己的反对态度。最后，外交人民委员说道：“你们将作为代表团的军事成员参加这次柏林之行，这一点对方已经同意了。你们的任务是，力图查明希特勒法西斯是否还想继续承担《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义务，法西斯所信誓旦旦表示的彻底消灭大不列颠王国是不是为攻击我国而施放的烟幕。

如果是，那么法西斯的侵略锋芒将指向哪里。”

11月9日，代表团启程，随专车前往的还有当时的德国驻苏大使冯·德·舒伦堡。

翌晚，火车行至苏联边境。在德国边境对应的埃德库宁火车站，地方铁路当局长时间地坚持要代表团转乘他们“特地准备”的列车。对此代表团通过自己的列车长加以断然拒绝，因为专车已在苏联边境站上了西欧式的列车托架，完全不妨碍列车在德国的窄轨铁路上运行。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之后，德国人不得不让步，只是在苏联专车的后面加挂了两节德国车厢。

12日清晨，列车抵达柏林。德国外长冯·里宾特洛甫和凯特尔元帅一行到车站迎接苏联代表团。德国方面把简短的站内欢迎仪式搞得十分隆重、热烈。《国际歌》的雄壮乐曲响彻整个柏林车站，各新闻媒介在晨报就刊出了苏联代表团抵达柏林访问的报道和大幅新闻照片。显然，德国人的这种作法是给欧洲人和全世界看的。

当天上午，苏联代表团前往帝国总理府礼节性见过希特勒之后，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的第一次谈判就开始了。为了急于完成希特勒交给的迷惑苏联人的任务，这个外交部长大谈英国灭亡已成定局，他趾高气扬地说：“地球上的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大不列颠王国寿终正寝的处境。英国已被打得落花流水，要它承认自己的失败，现在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他接着又说：“如果英国不承认失败，那么德国将日夜不停地袭击英国城市，它的潜艇也将会使英国遭受到更为惨重的损失……”

待到第2天与希特勒会谈时，华西列夫斯基再次目睹了这个个子极为矮小的战争狂人的表演。谈判一开始，这个法西斯纳粹头目就向莫洛托夫表白，德国军事机器的攻击方向现在只有一个，这就是西方，是英国。他说：“现在看来，击溃英国只是一个不远的将来的问题了。我认为，苏联应与我们——他列举了意大利、日本，还有法国的维希政府——一起来关心垮台后

的不列颠王国的遗产分配问题。”接着他暗示说，在目前这个反对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大同盟”中，苏联也理应被包括进来。那么，在最终讨论英国财产分割问题时，苏联的发言权将比现在要大得多。

他甚至半公开地许诺，德国将保证苏联向波斯湾和印度洋扩张，并夺取在伊朗南部的英国油田。他还指出，德国能够帮助苏联协调它对土耳其的某些要求，直至修改在瑞士蒙特勒签署的海峡公约，以用其他公约取而代之。

莫洛托夫识破了希特勒所建议的这些挑拨离间的阴谋，他只是从正面阐述了苏联的立场，并要德国就德意日三国条约的政治意图作出适当的说明。他还问道，德国的战争矛头将在何时何地指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其他欧洲国家？而在远东，日本的侵略活动又将如何展开？关于罗马尼亚和芬兰问题，莫洛托夫要求对方明确回答下列问题：派遣德国军事代表团前往罗马尼亚的用意是什么？为什么和出于什么目的把德国军队开往芬兰？他指出，如果德国真正愿意改善对苏关系，那么在芬兰就不应有德军进驻。

当希特勒拐弯抹角又把问题扯到英国即将完蛋之类的问题上时，英国飞机空袭柏林的警报响了起来，会谈不得不推迟到第二天再举行。

当天晚上，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又举行会谈。会谈刚刚开始，英国空军又来打扰。原来，英国情报机关已经了解到前两次会谈的情况，他们的飞机是有目标有目的地来的。当他们不得不下到德国外长讲究的私人避弹室时，这个德国部长边走边叨唠这样一句话：“英国是要完蛋了。”对此，莫洛托夫半真半假地说：“如果真的像您刚才说的英国已被击溃，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换到这间房子里来呢？扔下来的又是谁的炸弹呢？”此言一出，里宾特洛甫竟一时语塞，显得十分茫然又窘迫的样子，于是引来在场人员一阵好笑。事后，华西列夫斯基和兹洛宾逢人便把这件事当笑话讲，总参谋部里的许多工作人员都知道了莫洛托夫的厉害和老辣。

在柏林期间，苏联代表团没有与德国就任何问题达成协议。他们当时从驻德使馆的情报机构等多种渠道得到了大量的情报。这些情报表明，至少从 1940 年夏秋开始，希特勒德国的侵略矛头并不是像他们一再表明的那样指向英国，相反而是对准苏联的。这次会谈中对方所以显得那么积极，纯粹是在制造侵苏烟雾。他们一边向苏联提出瓜分不列颠王国的“诱人”建议，一边在指望创造准备入侵苏联的最佳条件。此外，要是它的阴谋和骗局得逞，希特勒还可以据此及时地防止日后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他的第三帝国命运的东西。

14 日，苏联代表团离开柏林启程回国。送行时，主人的盛情，甚至表面上的客套已经全无踪影了。华西列夫斯基说：“只有冷淡的送行，互相说些索然无味的官场辞令。”

拥有 80 年代以来最多读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内幕》一书的作者，苏联著名历史学家 Q·D·沃尔科夫在评述苏联代表团此次柏林之行的作用时写道：

苏联政府一边参与柏林会谈，一边力图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以便尽可能长久地拖延与法西斯德国的军事冲突，赢得了巩固苏维埃国家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的时间。

作者还分析道，苏联政府从柏林会谈中得出的结论至少有三条；第一，认清了希特勒与里宾特洛甫玩弄的两面派阴谋把戏，即他们口头上主张必须

坚决加强苏德关系和苏德友好，但在实际上却准备对苏联实施疯狂的进攻；第二，希特勒掩饰日后德国侵略方向的作法没有成功，他所有的关于彻底粉碎英国、给英国以重创的虚伪声明，丝毫没能迷惑住苏联政府；第三，希特勒关于瓜分“没落的不列颠王国”遗产的离间性建议，遭到了断然拒绝。问题很清楚，在即将到来的反法西斯德国的斗争中，英国可能成为苏联的一个潜在盟友。此外，苏联在会谈中所采取的对英立场，也摧毁了英国绥靖主义分子的立足点，这些人总是幻想与德国缔结投降主义的和约和建立资本主义列强的反苏统一战线。

华西列夫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认为，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对这次出访的共同感想是：苏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必须准备反击法西斯德国的侵略……

第六章 苏德战争之初期

反击计划初就日，苏德战端骤然开；
前线后方御敌策，作战部长总牵怀。

1941年6月22日凌晨，法西斯德国在苏联边境西部约1000多公里的宽大正面突然发起了侵苏战争。至此，希特勒蓄谋已久的、苏方随时在准备的苏德战争终于爆发了。

1941年6月22日是赌命运的一天。在午夜后2点10分，我进入了兵团前沿指挥所。它的位置在波豪卡莱以南的一个了望塔里面，距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西北方约9英里的地方。当我在3点10分到过该地时，天还是黑的。3点15分，我方炮火开始射击。3点40分，俯冲轰炸机开始了第一次攻击。4点15分，第17、18两个装甲师的前卫单位开始渡过布格河。4点45分，第18师的领头战车开始涉水渡河。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它们已经具有防水装备，这是在海狮作战计划中已经试用过的，可以使它们渡过深度达13英尺的河水。

6点50分，我在柯罗德罗附近，坐着一艘攻击艇渡过了布格河。我的活动指挥部，包括两辆装甲无线电通信车，一些能够越野的车辆和一些摩托车，在8点30分也开始跟到了我的后面一同前进。我开始尾随第18装甲师的战车后面前进，不久就到了里斯拉河的桥上。这个桥的攻占对于第47装甲军的进展是具有极大重要性的。在那里，除了一些俄国的哨兵以外，我没有发现有任何其他的人。当他们看到我的车队之后，俄国兵马上回身就跑。有两个我的传令官，不听我的命令，自告奋勇地去追击他们，结果都冤枉地送掉了性命……

上面这段文字，真实地记录了法西斯德国第2装甲兵团在苏德西部边境中段向苏联发起突然进攻的大致情形。它的作者是有“闪击英雄”之称的德军第2装甲兵团司令古德里安将军。这是他在自己的自传性著作中，对他

率先于“中央”集团军群所负责的地段突入苏联境内发动闪击的自白。

当时，希特勒法西斯用以突然攻击苏联的部队共有 3 个大的武装集群；“南部”集团军群，由龙德施泰特元帅指挥，负责在普里配特沼泽地的南面发起进攻；“中央”集团军群，由波克元帅指挥，任务是在普里配特和苏伐尔基峰之间发起进攻；“北部”集团军群，由李布元帅指挥，以东普鲁士地区作为进攻出发基地。战争狂人希特勒的作战意图是，务使该 3 个集团军群突破边境附近的苏军防线，然后将其包围并分别加以歼灭。各集团军集群的强大装甲兵团主要负责带头突破，并一直向苏联境内纵深地带挺进发展，以阻止苏军后退过程中建立新的稳固性防线。据古德里安叙述，当时希特勒并没有哪一方面是主攻方向，而且 3 个集团军群的实力配置也大体相等。如果说有所不同的话，也只是在装甲兵团的配备上，即“中央”集群有两个装甲兵团，而“南部”和“北部”集群只有一个。

希特勒法西斯发动侵苏战争的阴谋企图，确是蓄谋已久的。

当年，他在奥地利兰德斯堡监狱里所写的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中，就已经把独霸西欧大陆与东进扩张苏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他声称，要使德国成为“地球的主人”，在西方首先就要击败德国的宿敌法国，粉碎徒有其表的不列颠王国；在东方“必须积极扩张，主要是牺牲俄国”。1939 年 11 月，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署 3 个月后，希特勒在一次军事会议上竟厚颜无耻地说：“我们与俄国之间是签有条约，但它只能在有价值时才予以遵守。”1940 年 6 月初，当德国法西斯军队前出到英吉利海峡沿岸一带时，希特勒在一次与龙德施泰特的谈话中表示，他“自己毕生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报复布尔什维主义”。一度，他曾想在 1940 年秋就发动侵苏战争，但后来因为准备尚未就绪（主要缺乏一定数量的机场和新式装甲战车），且加以秋季已经逼近而放弃了。因为他不想重蹈当年拿破仑的覆辙。他一直认为，拿破仑远征俄罗斯的失败主要是由于严寒而招致的。

被战争机器推着四处旅行并已兴奋到狂不可止状态的这个第三帝国的矮小领导人，如果不是极力回避，那么必是早已忘记了德国大政治家格勒纳将军在《施利芬的遗嘱》一书中所做的具有先见之明的预言：

谁想认识东方战场的战略性质，谁就不应该无视历史的

追忆。在容纳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维斯瓦河与乌拉尔之间
广阔平原的大门口耸立着的拿破仑一世这个警告的形象，他的
命运应能使任何攻打俄国的人在对俄国进攻之前感到不寒
而栗。

还在 1940 年莫洛托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柏林之行以前的 8 月间，法西斯德国对苏战争计划的基本方案就已基本制定完毕。它使用的名称代号叫“巴巴罗萨”，意为蓄有红胡子的人。选用这个代号并非偶然，它是德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的绰号，现在用他的绰号替东进侵苏计划命名，用意即在“消灭俄罗斯的有生力量”。12 月 18 日，希特勒亲自签署了关于准备执行该计划的第 21 号训令。“巴巴罗萨”计划宣称：“德国武装力量应做好准备，以便在对英战争尚未结束以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军事战役一举击溃并彻底战胜苏俄。为此目的，陆军必须动用一切可以调动的部队……准备工作必须在 1941 年 5 月 15 日以前完成。”

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计划根植于“总体战”和“闪电战”的理论基础。一般说来，它可以代表法西斯德国军事艺术的“最高成就”，它是在对

外扩张的年代里，在对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法国和英国的战争中积累起来的成功经验的一次综合应用。法西斯希特勒和他的帝国将军们的进攻理论的出发点是：苏维埃制度不稳固，苏军训练无术而不堪一击。这样，苏联及其军队都被认为是无法抵御古德里安的坦克兵团、德国空军的第一流飞机及德国陆军铁拳的集中打击的对象。关于对苏战争胜利的最后期限，则更显示了希特勒法西斯的狂妄与骄横，如，最先 E·马克思认为需要 7—19 周；总参谋部预计说最多不超过 16 周；布劳希奇稍后认为是 6—8 周；到最后，希特勒在与冯·波克元帅的交谈中则夸下海口说，苏联在 3—6 周内即将完蛋。

1941 年 4 月 30 日，希特勒把德军实施“巴巴罗萨”计划的开始时间定在了 6 月 22 日——...

在战争开始的瞬间，包括此后的一段日子里，苏联军队，尤其身处一线而又相对薄弱的边境地区的军队猝不及防，以致出现了一攻即溃的局面。

虽然苏军已经有了较长时间的反击侵略战争的准备，苏联政府和总参谋部也为战争做了相当的部署和动员，苏联人民也无时无刻不在枕戈以待，但毕竟战争是在被动局面下迎来的。它的到来，犹如一次巨大灾难的突然降临，人们只能预防它的到来，但还不能十分准确地得知它将在某时某刻到来。更何况，当时苏军对敌人进攻方向还做了不正确的判断，各部队的战略防御还在匆忙而紧张的部署之中，连最高军事委员会和总参谋部也未估计到敌人进攻会来得这么快……

据《苏联外交政策史。1917—1985》一书披露，当时苏联政府和斯大林虽然十分清楚地知道，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对它爆发的日期推测却犯了错误，斯大林“错误地认为希特勒不会在近期贸然破坏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来，即 1942 年 8 月，当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见丘吉尔时，他自己也承认是把时间估计错了，他说他已经知道战争迫在眉睫，但是还“想争取 6 个月的时间用于对付这一进攻的准备”。

因此，直到这年的 5 月初，总参谋部经斯大林同意才开始发出把大量兵力调往西线的指示。而且，按照当时的决策，调往西部边境的 5 个集团军群，都是在隐蔽条件下秘密运输过去的，这当然也妨碍了部队集结的速度。朱可夫元帅在回忆录中写道：“未经斯大林的许可，依据隐蔽计划的规定，我们是绝对禁止部队向边界前沿做任何调动的。”

到临战前，西部各边防军区已经有 170 个师的兵力，这个数目已经超过了当时苏军武装力量的一半。这些部队集结于一个正面达 4500 公里，纵深达 400 公里的宽大地域。第二梯队各师则位于离边界 50—100 公里的地方，而预备队各兵团则远离边界 150—400 公里。同时，按总参谋部制定的“反击侵略计划”规定，所有的装甲坦克师都被编到了第二梯队和预备队。在整个苏军部署中，第一梯队的边防部队的力量显得过弱，各预备队的战斗方向也不够明确。至于第二梯队，则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展开，也没有全部开进到指定地域。

进入 6 月份，总参谋部接连不断地收到西部边境各军区和集团军作战处送来的一个比一个更令人震惊的报告：

“德军已在与我国交界的边境地区集结完毕。”

“敌人已经在边境的许多地段拆除其早先设置的铁丝网，并在扫雷。迹象表明，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军队冲向我方做准备。”

“德国人的坦克集群已经进入了出发地域，夜晚我们这里可以听到坦克

发动机的轰鸣声。”

“敌人静下来了。我们感到这可能是进攻的前兆。”

“据刚刚抓获的越境敌军俘虏供称，他们最近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要开始，每人分到的食品很多。”

“一位自称是德国共产党员的德军叛逃者报告说，希特勒肯定在不出 6 月里对我们发动突击。我部认为他说的较可靠。”

在这些日子里，总参谋部作战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寸步不离自己的岗位。华西列夫斯基更是忙碌无比，他每隔一两个小时就需要向国防人民委员汇报一次情况，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像上面这些有关敌军最新动态的情报。有些被认为是极重要的情报，他则需要亲自向斯大林本人汇报，并在那里与总参谋长一起对这些情报作出分析。

在听取了斯大林的意见后，根据必要与否向各有关军区和集团军发出相应的具体指示。

6 月 22 日零时整，正在作战部深夜执勤的华西列夫斯基，突然收到了总参谋长朱可夫交来的由他和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签署的一道重要命令。根据指示，他必须即刻将该命令发给列宁格勒军区、西部特别军区、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基辅特别军区的司令员和军事委员。

命令全文如下：

1. 1941 年 6 月 22 日到 23 日德军可能在列宁格勒军区、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西部特别军区、基辅特别军区和敖德萨军区正面实施突然袭击。袭击可能以挑衅形式开始。

2. 我军的任务是：不受任何挑衅行动的影响，以免使问题复杂化。与此同时，列宁格勒、波罗的海沿岸、基辅、敖德萨各军区部队进入一级战斗准备，以防德军或其盟军可能的突然袭击。

3. 兹命令：

(1) 1941 年 6 月 21 日夜间，隐蔽占领国境线筑垒地域各发射点；

(2) 1941 年 6 月 22 日拂晓前，将全部飞机，包括陆军航空兵的飞机分散到各野战机场，并加以周密伪装；

(3) 所有部队进入战斗准备，部队应分散和伪装起来；

(4) 防空部队不待对征用兵员补充进行紧急动员即进入战斗准备，对城市和防御目标应采取灯火管制的一切措施；

(5) 在没有特别命令的情况下，不得采取任何其他措施。

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

红军总参谋长朱可夫

据介绍，6 月 21 日 17 时，斯大林突然召见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向他们当面讲了他所得到的可靠情报。于是，3 人在一起共同商量的结果，便形成了这道命令的大致内容。最后，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又一起起草了该命令。这时距敌人发起进攻还有 7 小时。

待交给华西列夫斯基转发时，则只剩不到 4 小时了。实际上，当时许多苏军部队都未能在德国军队进攻之前接到这项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命令文件，这真是天大的遗憾！

命令发出后，华西列夫斯基要求作战部的全体参谋及一般工作人员各

就各位，务必保持总参谋部与上述各前线军区司令部畅通的电信联系，一旦无论哪个作战方向有军事冲突或受到攻击的消息，立即向他报告。

暮春之夜，显得那么静谧，安然。时间仍在按它自己的方式慢慢地走着，仿佛丝毫也不吝惜自己的流逝。

突然，直接联通西部特别军区司令部的那台“博多式”电报机传来了讯号。接收员立即忙碌起来。随后，联通其他各军区的电报机的讯号声也响了起来。之后，数十部电话都相继铃声大作……

最先到的消息是西部军区司令部的，他们报告说，据边境部队报告，4点20分左右，敌人开始炮击，随后是飞机轰炸，接着就是装甲兵的坦克战车越过了国境线……目前，德国人的装甲部队正在横冲直撞地向我纵深地带挺进，步兵部队根本无法抵抗……

大家终于像醒了一样，彼此的神色异样，眼神、目光和话语里传递的信息都是一个：可恶的法西斯德国强盗终于向我们动手了。有些女话务员都哭出声来，她们无助地看着自己身旁的首长和战友们。此后，整天整夜里，作战部一片嘈杂不断，接线员和话务员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大声点！请再大声点！”“我这儿听不清！”

请再重复一下！”

战争爆发的当天，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府首脑们便齐集最高军事委员会办公地点，斯大林也把总参谋部的各部主要负责人召去开会，共同讨论对付敌人侵略的有效措施。同时把各有关机构按战时生活状态进行了新的调整和改组。

第二天，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正式成立。其成员主要有：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元帅（主席），苏军总参谋部总参谋长朱可夫大将，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元帅、布琼尼元帅和海军人民委员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同时，大本营下又设立了一个常设顾问处，其主要成员有：瓦图京、沃兹涅先斯基、沃罗诺夫、日丹诺夫、米高扬、沙波什尼科夫、日加列夫、库利宁、麦列茨科夫以及党政军其他活动家。后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联合成立了由斯大林任主席的国防委员会。

同一天，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组建情报局的决议，任命戈利科夫中将出任该局局长。为与此协调工作，总参谋部决定把为政府发布前线事态消息做准备工作的任务交给了华西列夫斯基负责。

与此同时，根据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和总参谋部的意见，决定将原各军区按所处位置和作战方向改变了名称。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改为西北方面军；西部特别军区——西方方面军；基辅特别军区——西南方面军；列宁格勒军区——北方方面军；莫斯科军区——南方方面军；敖德萨军区——第9集团军。

7月19日，斯大林被任命为苏联国防人民委员，8月8日，被任命为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从这一天起，苏联的最高战争指挥机关才开始被称做最高统帅部大本营。

在整个战争期间，大本营都可以说是最高统帅领导下的一个常设机构。不过，它的工作方式是很特殊的。不能把大本营看作是一个最高统帅领导之下的、由经过批准的成员参加的、字面意义上的经常开会的机构。要知道，大本营的大多数成员往往同时肩负其他重要职务，他们经常呆在远离莫斯科

的前线，如身为大本营成员的铁木辛哥就被任命为西方方向总司令，伏罗希洛夫则被任命为西北方向总司令，布琼尼是西南方向总司令，沙波什尼科夫在 7 月 29 日未被再度任命为总参谋长之前，则一直在西方方面军执行特殊任务。但是，有一点是固定不变的，即大本营的每个成员都与最高统帅保持直接的联系。斯大林明白，大本营所肩负的主要职责是何等的重要，因此认为不可能，而且也没必要把他们全部召齐开会。为了拟定某一战役计划或讨论有关作战的重要问题，只是把驻在该地区的大本营成员、方面军司令和军事委员召来。有时在政治局部分委员或国防委员在场的情况下，当场就把问题决定下来，即形成为所谓的大本营训令或命令等。

既然如此，总参谋部便成了大本营或最高军事统帅的办事机关了。通常的情况都是，总参谋部提出必要的情报并加以整理，然后据此提出可行性建议提交给大本营，或直接与最高统帅一起商讨，待经后者批准，则直接形成命令发往各前线部队。

战争爆发最初的两个月里，华西列夫斯基的工作岗位一直在总参谋部作战部。

那时，作战部简直像一所蜂房，“蜜蜂”从前线飞回来，带来了紧急情报，立即给分发到当时根据战斗方向成立的 3 个处——西方处、西北处、西南处。各个方面军司令部都把他们的情况汇总到这里，经过处理再转给最高统帅或大本营，然后他们再把新的训令或命令下达给前线各部队。当时人员短缺得厉害，很多首长也不得不去做某种具体工作。

作战部内挂满了各种比例和各种用途的地图，电话机话筒上的连线长达 10 米以上，这为的是一边听电话，一边随手在各处的地图上作好军事标记。10 多部“博多式”电报机和数十部电话终日终夜地工作。有时这还不够，则只能靠通讯飞机或侦察机与前线保持联系。华西列夫斯基经常向同僚们说的一句话就是：“准确而可靠及时的情报，对一个参谋人员来说就像空气一样必不可少。”前线有什么变化？我军和敌军的部队位置现在哪里？战斗在什么地区进行？援军要派往何处？什么地方需要技术兵种？需要哪种技术兵器？……所有这些，都需要有条不紊地、不误时机地传到大本营，传到最高统帅那里。

有一次，华西列夫斯基正在地下的电报房里同西南方面军通话。通话中，他突然需要到上面去取一些必要的文件。恰好在这时，空袭警报响起来，上面的人们纷纷向地下部分涌来。而他则不能因此而不去取那些急需的文件，因为电话那一端的前线同志还在等着他呢。当他快步走到电梯旁时，忽然看到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委员们正从电梯里往外走，显然，他们是为躲空袭而下来的。当斯大林看到他要往上去时，便来到了他跟前。斯大林指着他对莫洛托夫说：“瞧，我们的作战部长在这儿呢，也许这空袭是冲着 he 来的吧。”一句话，说得莫洛托夫和其他国防委员们都笑了起来。

然后，斯大林向华西列夫斯基问好：“您好！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这一段时间您在哪儿躲着来着，我怎么老也见不到您哪？”

“我仍在总参谋部工作。现在真是太忙了”说完，华西列夫斯基急着要走开。

“已经发出空袭警报了，您还到哪儿去啊？”斯大林不解地问。

“我正在同西南方面军通话，急需到上面去取些文件，马上就回来……”还没说完，电梯门便自动关上并向上升去。

斯大林很有感触地叹了口气，说道：“战争爆发以来，总参谋部的同志们工作量是最大的。他们真够辛苦的！”莫洛托夫接过话头，道：“然而也是最默默无闻的，人们只知道指挥战争的有最高统帅，有前线的司令官，甚至包括基层的指挥员。”

忽然，斯大林问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去年冬天您的柏林之行，也曾经有这位谦逊的高级参谋随行吧？您对他有什么印象，或者评价呢？”

“噢，这的确是一位十分谦逊而忠诚的好同志。他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话语不多，很沉着。记得在使馆休息的时候，他还专门自己去找负责情报工作的同志了解情况。那时，他便十分关心希特勒发动进攻的突击方向问题。总之，斯大林同志，我认为这是个有培养前途的好同志。”

斯大林听后，默默地点了点头。

战争的形势发展到7月中下旬，苏军已经初步稳住了自己的阵线。像以前一样，这时的中部战线仍是苏德战场的主要方向。由于激烈的斯摩棱斯克会战中苏军的拼死抵抗，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得以从自己的预备队抽掉了几个方面军在这一方向上建立起了新的战略防御正面。接着，又建立了以朱可夫元帅为司令的大本营预备队方面军，这便可靠地掩护了莫斯科方向的安然无恙。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持续两个月的斯摩棱斯克会战中，虽然最后西方方面军被迫放弃了这座城市，但它却为粉碎法西斯希特勒的闪电战奠定了基础，并迫使敌人不得不修改了其反动的“巴巴罗萨”计划。这就是，敌人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不得不放弃了原来要求古德里安装甲部队直捣莫斯科城的计划。最后，该集群被转移到了西南方向，他们企图通过攻击基辅、渡过第聂伯河来实施迂回进攻苏联首都的罪恶计划。

与此同时，西北方向的法西斯进攻虽然被暂时止住了，但敌人正在组建新的突击集团，下一步的打算便是，突破苏军西北方面军刚刚建立起来的防御正面，最后直取列宁格勒。这说明西北方向的局势仍是严峻甚至危险的。

7月30日，大本营召回了西北方向总司令伏罗希洛夫和军事委员日丹诺夫，以期研究加强保卫列宁格勒的措施，刚刚接替朱可夫元帅再入总参谋部工作的沙波什尼科夫总参谋长也参加了对该问题的讨论。在讨论研究过程中，伏罗希洛夫曾向斯大林提出建议，希望能把现在总参工作的华西列夫斯基派到他那里去担任参谋长。他还顺便讲了20年代末期他在莫斯科军区工作时与华西列夫斯基交往的一些情况。他说，从那时起，他就对华西列夫斯基产生了很好的印象，并确认后者是一个善于思考、沉着而又机敏干练的好苗子。斯大林当时并没有表示明确态度，只说：“等晚上再做决定吧。”

沙波什尼科夫回到总参谋部后，已经是翌日凌晨4点多钟。由于他一直是华西列夫斯基的老上级，两人关系又好得不同寻常，当下，他便把这一情况透露给华西列夫斯基，并想听听他本人对这种安排的意见和想法。

闻听之后，华西列夫斯基感到有些意外，便态度恳切地说道：“是的，当年伏罗希洛夫元帅曾对我抱有不少的好感。但是，今天和过去不同了。您想想看，如果像扎哈罗夫这样有才干而在作战方面又受过全面训练的人担任这一职务都不能使克利门特·叶弗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满意，那么毫无疑问，我就更不合适了。”

听了这番话，沙波什尼科夫觉得也有些道理。因为，华西列夫斯基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在军训部机关和总参机关工作，确实缺少直接作战的经

验。于是，分手前，他只是说：“不管怎样，你先研究一下西北方向的作战情况吧。也许晚上大本营开会时就会对关于你的任命有个决定的。”

沙波什尼科夫走后，华西列夫斯基花了整整一天时间，埋头研究西北方向的战争形势，以及最近一个阶段以来的有关文件。他心里想，不管怎样，如果真的命令下来了，总是要执行的。

深夜，沙波什尼科夫从大本营回来了。“你猜，大本营对你的新任命是什么？”总参谋长站在华西列夫斯基的桌前问道。

华西列夫斯基看了看这位可敬的长者，没有吱声。只是随手拿起一支描地图的红蓝铅笔，自顾自地在手里转动着它。

“听着，是作战部长兼副总参谋长。”

俩人都笑了。华西列夫斯基接着说：“这就是说，我将不会离开您了？我真高兴，我最愿意做的事之一，就是直接在您的手下工作。因为这样我可以学到许多的东西。”

沙波什尼科夫明白，华西列夫斯基说的确实是由衷之言。

晋升为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之后，华西列夫斯基的工作便更加繁忙。因为，自此以后，他必须每天随同沙波什尼科夫到最高统帅那里汇报工作，讨论问题，研究战役计划……有时，一天就要往克里姆林宫去好几趟。好在这时大本营和总参谋部都搬到了基洛夫大街。这是因为，在敌机来轰炸时，从这里能迅速而方便地转移到基洛夫地铁站。这时，该地铁站已经不对乘客开放，车站的大厅与铁路已经隔开，大厅里重新安排了许多办公室，不仅总参谋部的地下办公室在这里，而且还专门在这儿为斯大林准备了一间带有安全装置的办公室。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 1941 年 9 月，也就是战争进行了 3 个月之后的苏德战场上双方的大致态势及未来战局走向。

西方战场虽然在 8 月间还有较激烈的战斗，但随着法西斯德国军队战略计划的改变，特别是把古德里安的精锐第 2 装甲兵团集群转移到西南地区作战以后，宽大的西面的苏德双方则只是一般的军事对峙态势。苏军也因此对敌人猛攻莫斯科方向的担心解除了。由于大本营预备队方面军所建立起来的牢固战略防御正面的出现，基本上保持了西线中央无战事的局面。

与此相反，原来相对平稳的西南方向和南方方向现在突然吃紧。一方面，敌“南部”集团军群加强了攻势；另一方面，撤至这一地区的古德里安集群也发动了相当猛烈的攻势。在这样严重的局面下，苏军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就出现了战场上的对比劣势。为此，苏军最高统帅部曾专门组建了勃良斯克方面军，以抵抗德国在这一地域谋求闪击突破的企图。但由于种种原因，抵抗没有奏效，最后不得不撤出基辅等战略地区，从而使敌军前出到了第聂伯河等纵深地区。

显然，该方向之德军下一步的作战目的是通过顿巴斯地区，最后与敌中央集群共同逼指莫斯科城。

在北方和西北方向，敌“北部”集团军群通过新组织起来的 3 个突击集团，已经在科波尔高原地区、卢加地区和沿卢加—列宁格勒公路 3 个方向开始猛烈突击，企图一举攻占列宁格勒。苏军西北方面军在敌我力量对比上也处于明显的弱势，要求大本营增派预备队支援。为此，最高统帅大本营决定组建列宁格勒方面军，以便在敌人攻击方向前面建立能够阻击其前进的防御正面，从而解救列宁格勒之危。

按斯大林的意见，原大本营预备队方面军总司令朱可夫元帅出任列宁格勒方面军的司令员。与此同时，因西南战线失利而被撤的布琼尼元帅西南方面军司令之职，由大本营成员铁木辛哥元帅担任。相应地，铁木辛哥让出的西方面军总司令一职则由科涅夫将军代替。

第七章 风雪激战莫斯科

首都告危形势迫，风雪激战莫斯科；
受命驻城撑战局，佐理统帅显才卓。

苏德战争进入第一个秋季的时候，苏军所面临的战略形势依然十分紧张。总参谋部根据种种迹象分析认为，此后战场双方将要展开的军事行动，在紧张和激烈程度上将不会亚于战争初期。

因为，当时法西斯希特勒军队并未丧失其优势地位，虽然自入侵苏联以来他们已经损失兵员达 53 万之多，但他们仍在气势汹汹地猛烈向东推进。法西斯军队仍然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制空权，在战场总兵力和兵器方面也仍有相当大的优势。

在西北地区，苏军未能制止住德国军队向列宁格勒的挺进，随后这座城便遭到了敌人的围困；在西南战场，由于基辅陷落，致使哈尔科夫工业区和顿巴斯受到严重威胁。在克里米亚，苏军受到了敌人的分割包围，他们独自承受着法西斯军队的打击。

那时，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和总参谋部所最为关切的仍是西部战场，即中央方向的战局变化。总参谋部认为，虽然秋季以来这里的形势比较稳定，但这并不全是因为法西斯军队曾在这里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和打击。显然，敌军由进攻转入防御只是暂时的，他们正在这个方向上组织新的突击集团，以便在认为适当的时候从这里发动对莫斯科的第二次攻势。因为，法西斯希特勒一直坚持认为，只要苏联首都还是苏方战争的鼓舞中心和组织中心，那么就休想取得对苏战争的最终胜利。所以，他们一定不会放过在这里通过殊死决战来决定战争命运的机会。

事实证明，苏军总参谋部的这种判断是正确的。

9 月底，希特勒德国军队基本上完成了夺取苏联首都莫斯科的战略部署。希特勒在“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的会议上说，在这次战役中必须对莫斯科实行合围。进攻方法仍像战争初期那样，同时从 3 个方向给拼死防御的苏军以决定性打击。他甚至发出了灭绝人性的指示：“在完成合围以后，任何一个俄国士兵，任何一个居民——不管是男人、妇女还是儿童——都不许逃出城外。任何突围的企图，须以武力镇压之。”他把该战役命名为“台风行动”，规定的突击日期为 10 月 2 日。

当时，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已集中了 77 个师的部队，总人数在 100 万以上，拥有 1700 辆坦克和强击炮，1400 门火炮和迫击炮，950 架作战飞机。而与之对抗的苏军西方方面军、大本营预备队方面军和勃良斯克方面军，仅拥有约 80 万兵力，6808 门火炮和迫击炮，782 辆坦克和 545 架飞机。更为严峻的是，当时大本营已经不再掌握有已经编成的任何战略预备队了。

9月30日，德军“中央”集团军群装甲部队首先派出的一支先遣部队出发了。10月2日，霍特的装甲兵团和古德里安的装甲兵团同时在两个方向发起突击，从而揭开了维亚兹马和勃良斯克双重战役的序幕。先是奥廖尔被攻占，接着维亚兹马和勃良斯克也相继陷落。在西南方向，距莫斯科不到100俄里的卡卢加被攻占，在西北，距莫斯科93俄里的加里宁城也被攻占。

莫斯科处于危急中。

10月5日，国防委员会作出保卫莫斯科的决定。决定号召全体莫斯科市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协助苏军保卫自己可爱的城市和祖国的首都。当天，华西列夫斯基作为大本营代表与国防委员会委员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及马林科夫到了西部前线。

他的具体任务是把冲出敌人重围和从西部撤下来的部队火速派往扎伊斯克防线并在那里组织防御。下午3时，华西列夫斯基到达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在那里，经过与该方面军首长一道努力，用了5天时间，终于从尔热夫、谢切夫卡及维亚兹马撤下来的部队中抽调了5个步兵师的兵力，并派他们开赴到扎伊斯克一线。

10月9日，当华西列夫斯基在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向斯大林做例行工作汇报时，斯大林决定把朱可夫从列宁格勒方面军调来，继续担任西方方面军总司令，并准备把大本营预备队方面军合并到该方面军以加强力量。华西列夫斯基表示完全同意这种安排。次日上午回到莫斯科后，大本营就作出了这项正式决定，最后的命令文稿即是华西列夫斯基亲自起草的。

10月12日，国防委员会召开会议，再次研究有关莫斯科的防御问题。会上，斯大林态度严肃，讲话时声音都有些颤抖了，但神情仍显得那么刚毅和不屈。华西列夫斯基已经两昼夜没有睡觉。自从10日上午回到莫斯科以来，他不是在大本营与最高统帅一起研究前线战事，就是在总参谋部作战部同大家一起分析情报，判断敌情，起草各种训令和命令。会间，他不由自主地坐在高背沙发上睡着了。斯大林发现后，示意大家把讲话的声音放低些，不要吵醒这位工作起来不要命的副总参谋长。他对与会同志们解释说，沙波什尼科夫毕竟年纪大了，而且又多病，总参谋部的许多工作实际上都让他一人任劳任怨地揽过去了。尤其是每次到前线去直接布置，更是非他莫属。这些，是华西列夫斯基事后听伏罗希洛夫说的。

10月14日，法西斯德国军队又开始进攻。莫斯科的各个主要方向都在进行激战。

各方向的战线都越来越逼近莫斯科市区，首都的危险大大地增加了。为此，国防委员会决定，一些政府机关、外交使团、大型国防工厂以及苏联首都的科学文化机构都必须撤出莫斯科市，只允许国防委员会、最高统帅大本营及对国家和武装部队实施有效领导所必不可少的党政军机关留在这里。

16日，最高统帅部决定，为了做到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可靠地指挥部队，必须把总参谋部分成两个梯队：其第一梯队总计10人，由副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领导，留下负责前线军队的指挥；第二梯队是大部分，则由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带领迁往新地点，并在次日早晨乘坐两个列车向莫斯科郊外转移。但有一条，这撤出去的总参谋部第二梯队，仍必须与大本营继续保持牢固可靠的经常联系。

由华西列夫斯基领导的总参谋部第一梯队，当时人们都习惯地把它称为作战参谋小组。它的任务就是直接为本营服务。它的具体职责大致有如

下数条：

1. 全面了解和正确估计前线的形势；
2. 经常地、准确地、但又不过于烦琐地向大本营提供前方形势的情报；
3. 如前方形势发生变化，要及时而正确地拟定出自己的建议向最高统帅部报告；
4. 根据大本营作出的战役战略决定，迅速准确地拟定具体方案和训令；
5. 对大本营一切决定的贯彻情况进行严格的、经常不断的监督，对部队的战备情况和战斗力、预备队的编组和训练情况、部队作战物质的保障情况实行监督。

当时，作战参谋小组的生活异常紧张。开始，大家的脑子里干脆没有了日夜的概念，一天 24 小时都不能离开自己的岗位，因为毕竟人员太少了，每个部门只有一名首长和一名工作人员。但是，人总不能不睡觉。于是，就在地铁的车站上给他们准备了一节车厢供睡觉用。最初从华西列夫斯基到一般工作人员都是坐着睡，后来才又给弄来了几节铁路上用的一等车厢（卧铺包厢式），这样大家才能躺着睡觉了。

当时，总参小组的工作办公室与斯大林的办公室离得很近，但斯大林很少在地下办公，只有躲空袭的时候才来这里。

德国飞机越来越加紧对莫斯科的轰炸，空袭警报不断地响。有些单架敌机黑夜里来偷袭，甚至白天也不客气地来光顾。一次，大概是 10 月 28 日傍晚，一枚炸弹落在了基洛夫大街总参谋部的大院里，好几辆汽车被炸毁，3 名司机被炸死，另有 15 名军官受伤，正在总参谋部值班的伊利琴科中校被炸弹的气浪抛到房子外边，跌破了半张脸。其他人多是碎玻璃片、破窗户架子等碰伤的，华西列夫斯基也受了点伤。

同志们劝他走，他不肯，只是临时做了些包扎，便继续工作起来。

这件事发生后，作战参谋小组便全部搬到下面的地铁站内了。此后，大家连续 5 天吃不到热食，因为食堂和厨房都在这次空袭中遭到了破坏。在修复以前，只好天天吃夹心面包。可以说，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最艰苦的时期。不但如此，他们的心情也特别不好——有的情报说，法西斯德国的坦克和自动枪手已经到达战前莫斯科人星期天常去游玩的那些可爱的地方了。

形势越来越严峻。10 月 19 日，国防委员会不得不决定，自 20 日起，在莫斯科市区及其附近地区实行戒严。这主要是担心德国鬼子或许会伪装成市民混进来。

然而，雨季到了。作战双方都知道，秋雨是严寒和冰雪的前奏。一夜之前，田野泥泞不堪，德军的坦克再也无法行动。这时，只有公路还可以使用，但许多公路都是布满了车辙的泥土路。冰冷的秋雨仍在不紧不慢地下。身穿夏装的德军士兵一边哆嗦，一边捉着身上的虱子，心里却也不甘心：莫斯科已近在咫尺，只要把这个最终目标拿下来，该死的东线战事就肯定会结束了。那样，他们便可以在苏俄的首都过一个舒眼的寒冬了。这些都是前线指挥官对他们亲口说的，而眼前的战局也确实如此，由不得他们不相信。

德军仍在继续猛攻，但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好不容易前锋的装甲坦克才冲上了通往莫斯科的大型公路，但等一上路后，他们才知道，这大路的情形也十分糟糕——由于长时间的炮击和轰炸机俯冲扫射，路面上

已全是星罗棋布的弹坑。

坑内灌满冰水和泥浆，德制坦克走不多远就要陷入泥潭之内，简直无法前进。后面的炮车和运输车辆也全都陷在田野里更深的泥潭中，丝毫动弹不得，连弹药和粮秣都送不上来。德国指挥官无可奈何，只得下令全线停止前进以待大地封冻。

这时，苏军那体积庞大的远远出乎德国士兵意料的宽履带坦克群，像一群发了疯的巨型怪兽，猛烈地向德军停止进击的前线紧逼过来。它们终于找到了复仇的机会，一边狂吼般地轰鸣，一边从塔台上的旋转炮口里喷着火舌。德军士兵赶紧向这些怪兽发射步兵反坦克炮弹，有些则是特制的反坦克穿甲弹。但这些炮弹根本不管用，落到对方的甲板上只不过撞出一道火花，随后便被弹出很远。原来，这种苏制的 KV - I 型、KV - II 型坦克，分别重达 43 吨和 52 吨，其甲板厚度全在 80—120 毫米之间，难怪连反坦克穿甲弹击中它也毫无作用。它的特点是能在多种气候条件下作战，即使在严冬的季节，借助高级防冻润滑油发动引擎也丝毫不成问题，虽然庞大的体积和宽型履带使它显得笨重，但却正是因为这样的设计，才增强了它比一般轻型坦克的超越障碍能力。

德军的猛烈进攻被雨季的泥泞和苏军的重型坦克暂时止住了，其突击集团先锋部队的前出部分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即使某些地段的德军仍在顽强地、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但进攻的速度显然大大减弱。在南面主攻的古德里安部队，也在距图拉还有 3 俄里的地方停顿下来。原来，他们企图一举攻下图拉，然后从背后或侧翼包围莫斯科，以便由此率先攻入俄国首都。但是，他过去在各个战场曾经一往无前的巨大坦克群也陷入了进退不得的泥潭之中。

华西列夫斯基从作战参谋小组获悉这一情报后，当即打电话向斯大林报告喜讯。

可是，专线电话怎么也挂不通，显然是那边也正在使用这部电话。待他刚刚放下听筒，电话铃声立即响了起来。“喂！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吗？我刚才怎么打不通您的电话？”华西列夫斯基立即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还未来得及汇报前线战事，斯大林的话音又传了过来，听得出，最高统帅的情绪非常好。

“喂！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您听着，我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您是否可以帮我起草一份关于向一位将军授衔的命令呢？”

华西列夫斯基表示完全同意，说：“那么，请您现在告诉我，是授予何种军衔，又是授予何人的，我好立即起草。”

“请听好，他就是著名的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随后，听筒里传来了斯大林那特有的笑声。

华西列夫斯基很感惊讶和意外，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情况会是这样子：他将要在这个时候被最高统帅提名授予更高一级的军衔——当然是中將了，因为他现在已是少将军衔。于是，他请求斯大林不要让他自己来承当这种工作，他会觉得不自在。

“哈哈，那好，还是干您自己的事去吧。在这件事上，无论怎么说没有您我们也能对付得过去。”斯大林这样说道。忽然，他又接着问道：“您刚才要找我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请讲吧。”

“我是想向您报告一个好消息：敌人中央方向和南部古德里安集团的猛

烈攻势已经变得很弱了，可能是这场秋雨帮助了我们的部队和士兵。现在，我们的几个方面军又重新建立起了防御正面，最起码可以在一段时间内阻止敌人向前推进的企图。”斯大林听了没做什么表示，只说他也从西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那里得到了相应的报告。稍后，华西列夫斯基灵机一动，试探着对话筒又说道；

“斯大林同志，我还有个要求或者建议。我知道您对我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是，这些都是我在作战参谋小组的全体同志们的协助下才得以完成的。因此我想问一下，是否也可以同时表彰一下跟我一样在如此艰巨的时刻工作的我的几位直接助手

斯大林表示同意华西列夫斯基的提议，并要他直接通知波斯克列贝舍夫（斯大林办公室的秘书），应当向哪些人授予何种军衔。10月28日，根据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华西列夫斯基等4人分别被授予下列军衔：华西列夫斯基——中将；卡尔波诺索夫——少将；库拉索夫——少将；谢夫钦科——少将。

自战争以来，由于与斯大林接触频繁，华西列夫斯基等常在他身边工作的人都知道，斯大林的性格十分不好，动辄暴怒，有时常常失去控制。他有一个习惯，如果战事不是像所需要的那样发展，或者某些军事首长未按他的指示打法去做（显然他提出的方案并不都是正确或可行的），那么便是厉声斥责，一点也不给对方留面子。有时则干脆无缘无故地撤换前线军事首长，根本不管不顾国防委员会或总参谋部的意见。但同时，他性格也有矛盾的一面，这就是十分体恤下属，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给他们格外的关心和照顾。例如，就在莫斯科会战这几个月的艰难日子里，他规定总参作战小组的每个成员每天必须保证有五个小时的休息和睡眠。具体到华西列夫斯基，最高统帅给他规定的休息时间是每天凌晨4时到上午10时，有时他还亲自检查他的这个指示是否得到了执行。如果华西列夫斯基未照办，他则严加批评，毫不迁就。因为他坚信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有效地工作。所以，每当深夜在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讨论问题，3点40分他总是要华西列夫斯基回去。而有时回来后华西列夫斯基还要对工作进行部署，或立即起草所讨论的命令训令等，他便不得不耍个小滑头：让副官专门守在他办公室内那架直通克里姆林宫的电话机旁，一旦斯大林来电话，副官就报告说总参谋长10点以前在休息。斯大林的答话总是“那好”，“那就好”。

到11月7日，一年一度的十月革命节又到了。这天，尽管在德军围困万千重的情况下，斯大林和苏联政府仍然在首都的红场上举行了传统的阅兵式和庆祝大会。惟其情况如此，这次活动才显得意义特别重大和巨大，它更能在这极端的日子激发苏联全国军民，尤其是前线广大指战员“保卫祖国、保卫首都”的极大爱国主义热情，让全体人民和全世界都感到苏联的伟大首都仍然在发挥它的巨大政治作用，从而增强人们相信战争必将会发生转折、苏联一定能战胜法西斯的信心。这次阅兵式是在极秘密的情况下准备的，甚至对参加阅兵式的将士们也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而练习。

以致当时有许多各种各样的猜测，但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不过是为开赴前线而做准备，个别人也想到了可能是十月革命节阅兵式，但很快就否定了这种可能的猜测。因为，当时的莫斯科毕竟处在最残酷的非常时期，怎么还可再搞这一类活动呢。

这次空前绝后的阅兵式结束后，斯大林照例发表了重要讲话，当然也

是送别阅兵部队奔赴前线的贺辞。他讲道：

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你们，把你们看成是能够消灭德国侵略匪军的力量！处在德国侵略者压迫之下的被奴役的欧洲各国人民都在注视着你们，把你们看作是他们的解放者！全苏联的人民也在注视着你们，他们把你们看作是祖国和可爱首都的英勇保卫者！

伟大的使命已经落在你们肩上，你们不要辜负这个使命！

让我们伟大的先辈——亚历山大·涅米斯基、季米特

里·顿斯伊科、库兹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的英雄形象，在这次战争中鼓舞你们！

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引导着你们前进！

同时，联共（布）中央还通过斯大林向全体共产党员发出了庄严的号召：拿出全部力量来保卫祖国，战胜敌人！

在这期间，根据 12 月 5 日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开始重新组建的 10 个预备队集团军已经大体完成。这些新的预备队，有些是由莫斯科市民自愿报名参加的，他们中多是曾经在军队服过役的人员；有些是由莫斯科地区党的组织就地征募的；有一些则是从俄国东部各军区调动的现役兵团，其中最具有战斗力的一部分则是从东西伯利亚远东前线秘密运送过来的。他们原来驻扎在“满洲国”附近的中苏边境地域，以便随时对付在那一地区准备北上进攻苏联的日本关东军。苏德战争爆发后，前线苏军兵力明显不足。但就是这样，斯大林也没有把驻在远东国境上的军队抽过来——他一直担心日本人会在某一天发动对苏战争，这当然是有根据的。但这次所以敢于采取这一举措，是由于得到了较为准确的情报消息。据说，当时苏联驻在日本的一位从来也没有出现过任何差错的谍报人员曾向斯大林报告说，据他侦知的可靠消息表明，日本人在最近的一个时期里已把英、美列入首要敌人的位置，他们正在准备在南太平洋地区发动对英美殖民地的进攻，并无北上侵苏的任何计划。

这些大量新的预备队集团军的组建和训练工作，当时也是总参谋部主抓的最重要工作之一，但这主要由撤出莫斯科的总参谋部第二梯队来实施。尽管有了这些新的预备队，总参谋部也不敢对敌人有任何懈怠的心理。相反，他们认为，德军肯定还会孤注一掷地向莫斯科发起新的大规模攻势。因为，敌人“台风行动”的主要战略目的还未实现，他们还在仆从国继续征召前线进攻的预备队部队。目前敌人所以未出现大的举动，一则可能是在等待冰封，那样他们的坦克集群的优势便会死灰复燃；二则就是在筹组新的突击集团，选择更好的突破方向，以及等待其预备队的到来和配备。

没错。这些都让总参谋部猜着了。

11 月 6 日，初期的冰冻开始出现，德军在西北方向开始了对莫斯科—加里宁公路上的克林城的进攻。一周后，即 11 月 15 日到 16 日，德军在中央地区的西部、西南地区，还有上面提到的西北地区，几乎同时再度发起异常迅猛的突击行动。

看来，法西斯希特勒真的发疯了。

在西北方向，德军北部集群的先锋部队见克林城久攻不下，便狡猾地绕过该城，直取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尽管苏军的两个师在这一带拼死抵抗，但靠着强大坦克兵团向前推进的德军还是在 11 月 23 日占据了该城。在这次

战斗中，守城的苏军和市民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其中的一个团竟战斗到只剩下 3 名重伤员，但仍宁死不屈，最后饮弹自戕。两天后，疯狂的德军又攻克了该城东南的佩什基城，以致敌军的前锋第 2 装甲师推进到了距莫斯科只有 37 俄里的地方。而且，他们冲上了一条路面良好的公路，正在向莫斯科—伏尔加运河包抄，后面跟着他们的是 3 个精锐步兵师。

此间，由德军装甲部队工程兵组成的摩托化尖兵部队，曾驰入了莫斯科郊外伏尔加河的小港口希姆基，它离首都郊区仅有 5 俄里。在这里，德军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显然，这是一个小豁口。但他们没有在这里停留，在突击奔进到这一地区后随即又退了回去。尽管如此，仍给这一地区的居民带来了极大恐慌，以至敌军走后仍惊恐不已。

不久，消息更坏了，德军一个步兵师所属的一支部队，在炮兵的支援下于第 2 装甲师的右侧发起了猛烈进攻，并突到了卢涅沃。种种迹象表明，德军将从北面对首都实行大规模的进攻以求突破。在那里，德军已经在莫斯科—伏尔加运河东岸建起了一座巩固的桥头堡。越过运河的德军装甲部队，击毁了一列企图阻止德军前进的装甲列车后，几乎完整无损地占领了一座为莫斯科提供大部分电力供应的大型发电厂。

看来，莫斯科已是指日可下。然而就在 11 月 27 日，气温在两小时内骤然下降 20 度，一下子跌到了零下 40 摄氏度。数以千计的德军士兵身无御寒之衣，情况最好的是在原来的夏装外面加一件呢制大衣，但是大衣并不是人人都有。于是成千上万的士兵染上了使人颤抖不止、全身无力的疟疾，冻伤成群，有些都冻成了残废。自 11 月 19 日以来，部队运送到前线的寒衣数量简直少得可怜，后来则干脆没有了。希特勒和他的帝国将军们后来抱怨说，对俄国首都莫斯科的进攻所以遭到失败，完全是俄国冬季异乎寻常地提早来临造成的。但事实上，并不是那一年冬季到来得早，而是德国统帅部对此干脆一无准备。因为，他们满以为早在冬季来临前就可以攻克莫斯科，当时很多指挥官对士兵们提出的一个颇有诱惑力的号召便是：“到俄国首都去过一个舒适温暖的冬季吧！”

可怕的严寒不仅摧残士兵的身体，而且还使机器停转、武器失灵。担负中央集群进攻的德军部队，在一开始受到了强大苏军的正面抵抗。由于苏军总参谋部把精锐部队都用在这个方向上，因此这里的德军从突击开始就进展不快，每推进一节纵深都要损失大量的兵员和武器。而当严寒骤然来临时，他们的坦克集群的发动机已经无法起动，机枪和自动武器不听使唤，士兵们的步枪枪栓也被冻油卡死了。与之相反，来自东西伯利亚前线的苏军精锐防御部队却完全是另一副样子：他们的机枪都披有枪套，以防止寒流的侵袭；他们的武器全有冬季特制润滑油，使用照样灵活；每个战士都头戴软质皮帽，足登高统军靴，身着棉装又配有呢制大衣，冰雪无碍。

同样，苏军的坦克集群也没有出现因严寒而不能发动的情况，尤其是他们最新装备部队的重 26 吨的 T - 34、T - 35 新型坦克，性能之良好、威力之巨大，在当时的战场上确实无与伦比。它有 5 个旋转式炮台、四挺重型机枪，可载乘员 10 人，速度快，装甲倾斜度很大，一般的反坦克炮弹和反坦克穿甲弹都对它奈何不得。后来德军没有办法，只好调来 88 毫米速射高射炮来对它进行平射。然而，太多的德国士兵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可怕的无休止的寒冷已经超过了人体所能支持的限度。在他们以为俄军预备队兵力不是全部被歼也已用光的时候，越来越多的苏军精锐师却源源不断地出现

在他们面前，这种人为的战场变化也大大地超出了他们理智所能接受的程度。

德军在各个方向的进攻都被可怕的严寒和强大的苏军死死卡紧了。虽然莫斯科已经就在眼前，也已处于他们的炮火射程之内。但毕竟已经是锐气丧尽，乏力回天。

德军士兵就在莫斯科的大门口的冰天雪地里流血，很多人歇斯底里地喊着：“我们再也捱不下去了！”“我们既进不了莫斯科，也回不去德国了！”及至气温下降到零下 52 摄氏度时，他们再也不能作战了。于是，不但进攻陷于停顿，而且简直是眼看着苏军在前面向他们发起冲击。

在西南方向，疯狂的古德里安坦克集群仍在负隅顽抗，他们仍在徐徐地向前推进，并企图绕过布防森严的图拉而迂回莫斯科。就在这时，德军司令部停止进攻的命令下来了。司令官们明白，他们的部队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这一天，是 12 月 8 日。

这是古德里安那支所向无敌的装甲兵团自从踏平波兰以来的第一次撤退。他不得不命令他的士兵们在坚硬如铁的冰封地面上构筑防御工事。然而就在这时，还不时地遭到苏军小股部队的骚扰性突击。这些部队惯于夜战，身穿白衣，手拿涂上白漆的自动步枪，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冷不防地一阵袭击后，马上又不见踪影了。

原来，这是莫斯科近郊的游击队。后来，古德里安在他的自传体著作中写道：“对莫斯科的进攻已告失败，我们伤亡惨重……我们已经遭到了败北。”

妄自尊大的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既低估了苏联军队可投入作战的兵员人数，也低估了它的无畏士气和战斗力。虽然这时他还不认输，并且在以后确实也苟延残喘了相当一个时期，但在这里所遭受的这场失败，却犹如当头一棒，击掉了他和他的法西斯部队的士气。像当年的拿破仑一世一样，这里也历史注定般地成为了他命运中的滑铁卢。

莫斯科的危险解除了。

这个英雄的城市犹如大病初愈的顽强患者，强烈地要求站起腰身并下地行走。

还在 11 月初，苏军最高统帅部内就有人提出进行反攻的建议。斯大林将信将疑，当他询及华西列夫斯基的意见时，这位沉着稳健的将军表示不好。因为，根据当时他领导的作战参谋小组的判断，德军近期还要展开新的攻势，这说明他们还有力量。

到 11 月底，德军的进攻力已渐告竭，这正是由于气候条件、敌人战线的拉长及苏军的顽强抵抗等多种因素造成的。总参谋部这时便提示大本营说，现在我军转入反攻的时机似乎差不多了。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和国防委员会也坚信此点无疑。经研究，最后把发起对德军反攻的日期定在 12 月 5—6 日。这时，希特勒的司令部还没有正式下令停止进攻，但实际上各个方向上的德军进攻已经基本停止。

恰在此际，沙波什尼科夫总参谋长病倒了。于是，斯大林要求华西列夫斯基立即出任代理总参谋长一职。此后，华西列夫斯基与斯大林等大本营成员一起，具体制定、筹划并直接领导了这场莫斯科城下的反攻。这是苏德战争爆发以来，苏军所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击德军的行动。

对于这次反攻行动，苏军最高指挥中枢自信可以成功。这可以从下面

一点得到证实和证明：12月15日，即在反攻开始后的第10天，苏共中央就作出了把原来迁出莫斯科的党、政、军机关迁回的决定。而原来迁出的总参谋部第二梯队，早在11月下旬就已迁回莫斯科，以便立即投入反攻的准备工作。

反攻计划编制完成后，身为代理总参谋长的华西列夫斯基在12月4日便亲自前往加里宁方面军司令部。在那里，他当面向该方面军总司令科涅夫传达大本营关于转入反攻的最后指示，并在那里作为大本营代表协调该方面军不折不扣地执行反攻命令。

何以需要如此这般呢？原来，在12月1日凌晨3时30分，他和斯大林两人曾亲自签署了一道命令，要求科涅夫的加里宁方面军不要在自己所辖的地域内另外组织任何局部反攻，而应把主力用在配合朱可夫的西方方面军的反突击进攻上面。但随后科涅夫即打电话给华西列夫斯基，借口缺乏坦克和兵力不足，不想采取支援西方方面军的行动，仍想单独进行一次进攻加里宁的局部战役。最后，在华西列夫斯基答应他增加兵力支援的情况下，科涅夫才勉强放弃了自己原来的主张。尽管如此，斯大林仍不放心，于是便派华西列夫斯基亲自来到这里。

12月5日，加里宁方面军在航空兵突击和炮火准备之后，先行按大本营方针转入对敌人的反攻。次日，西南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也按期发动了强大的反击攻势。

结果是完全可以想见的，自然是苏军节节胜利。当各方向上的德军还在冰雪覆盖的土地上一点一点地挖掘防御工事的时候，强大的苏军便纷纷冲到了他们面前。于是，敌军便丢盔弃甲，作鸟兽散，留在阵地上只是大批大批被冻伤的士兵，还有大片大片的废旧钢铁——那些根本无法发动的坦克和车辆、火炮、机枪……

原来一路冲杀、骄横无忌的法西斯德国军队，现在开始了他们自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次退却和逃跑，而当初从国境线上一路被迫退却、以致被迫退到自己首都大门口的苏军部队，现在终于获得了复仇的机会，他们开始由败退转入了进攻。这也是苏德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次。

这表明：苏军已经开始掌握战争的战略主动权，虽然这时还不是它的全部。

经过莫斯科保卫战这场空前的激烈角逐，苏军很多高级指挥人员经受了锻炼，他们更多地掌握了现代化战争条件下一系列军事战略技巧与军事指挥艺术。华西列夫斯基在协助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筹划、指挥这次会战中，学到了许多实战军事技能，并在这次著名战役中成长为苏军高级将领。对于他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和献身祖国的精神，苏联国防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给予了高度的赞誉，同时也给了他以应有的实际地位和善遇。

关于整个莫斯科保卫战带给苏联和世界的影响、以及它对以后苏德战场复杂局势的导引作用，华西列夫斯基有自己的独立认识和分析，他曾经这样写道：

苏联首都附近大会战的结局在精神方面和政治方面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在此以前，希特勒的侵略政策还没有遇到过挫折。他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国家，控制了几乎整个西欧。在大部分人的眼里，德国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可是现在“不可战胜的德国军队”居然被打败了，而且败得很惨。在莫斯科附近，法西斯军队损失人员50多万，坦克1300辆，火炮2500门，汽车15000

多辆，还有其他许多技术装备。法西斯军队从来还没有遭受过这么惨重的损失。

希特勒占领军全部从莫斯科州、图拉州和梁赞州被赶了出去，部分地从列宁格勒州、加里宁州、斯摩棱斯克州、奥廖尔州、库尔斯克州、哈尔科夫州、斯大林格勒州和刻赤半岛被赶了出去。这些胜利的意义在于，苏军已经将战略主动权从敌人手中夺了过来，使敌人“巴巴罗萨”计划所规定的战略目标一个也未能实现，在这些毁灭性的打击下，“巴巴罗萨”计划破产了，作为它的基础的“闪电战”理论完全破产了，从而迫使法西斯的头子们不得不转而采取持久战的战略。

第八章 绝不准后退一步

战局恶化全线急，临危受命总军机；
但凭机敏赴维艰，纵横捭阖赖勉力。

1941 年冬季莫斯科城下惊心动魄的厮杀，给法西斯希特勒的打击不可不谓沉重。

但是，他会就此屈服吗？不会，当然不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被德军所大吹大擂的“节节胜利”，把希特勒那原本骄横狂妄的战争赌徒式的心理推向了极端，他已经变成了一架不折不扣的战争机器。作为这样一个自负而变态的战争狂人，他怎么会承认自己的失败呢？尤其是，他又怎么能甘心屈服于他根本不屑一顾的那些“红色俄国佬”呢？！

在艰难地捱过残酷的冬季之后，为了在 1942 年春季进攻中雪莫斯科城下之耻，希特勒不断地通过德国宣传机器给自己将军和士兵们打气。他们吹嘘说，德军已经征服了连拿破仑一世也没有征服过的可怕的俄国冬季，春天的到来一定会给德军带来新的生机。3 月，希特勒和德军统帅部提出的 1942 年攻势的战略计划是：在整个战线的中段保持现态势；在北方夺取列宁格勒，从而沟通与芬兰的陆上联系；在战线的南翼突击到高加索地区。可见，这仍然是一个追求进攻型的作战计划，它反映了法西斯希特勒仍未消减的嚣张骄横心态。在 4 月 5 日由希特勒亲自签署的第 41 号训令中，德军统帅部把上述任务更加具体化，而且着重强调南线战役的极端重要性：

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所有兵力首先应集中用在南线地段来
实施主要战役，以便消灭顿河以西的敌人，然后夺取高加索
的石油产地，并越过高加索山脉……如果我们拿不到迈科普
和格罗兹尼的石油，那么就必须结束这场战争。

显然，希特勒是要集中优势兵力于南线，企图在这里通过几次大的战役来夺取高加索油田、顿涅茨盆地上的哈尔科夫工业区及库班的小麦产地，进而威胁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古德里安曾说，希特勒的作战特点历来是特别重视对石油、粮食等工农业基地及具有政治意义的城市的占领和夺取，而很少顾及军事上的可能与必要。看来，这个训令同样地反映了这一点。

为实施上述侵略意图，德军统帅部把南部集团军群分别布置成“A”、“B”两个集群。其中“A”集群由克莱斯特元帅指挥，所辖部队计有野战第 11、

第 17 集团军、坦克第 1 集团军和意大利第 8 集团军；“B”集群由冯·波克元帅指挥，所辖部队计有坦克第 4 集团军、野战第 2、第 6 集团军和匈牙利第 2 集团军。具体作战方案是“ A”集群由奥廖尔南部发动进攻，夺取沃罗涅日；“ B”集群由哈尔科夫发动攻势并向东突破，然后与前出到塔甘罗格一带的德军会师于斯大林格勒地区。此后，或者一举占领该城，或者对其狂轰滥炸，使其不能再成为俄国南部的工业中心和交通枢纽。如果形势发展顺利，则直接由伏尔加河而上，再度逼取俄国首都莫斯科。

遗憾的是，斯大林和苏军最高统帅部未能正确地判断出德军的上述进攻方向。

从斯大林到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或总参谋部，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战争总体形势及其发展趋向作出了错误估计，而这直接影响了对整个 1942 年春夏季作战计划的拟定和编制。当然，在最终结果上，也就自然地导致了苏军在整个春夏季作战中一系列严重失利。在客观上，这又为德军夏季以后的大举进犯斯大林格勒和在高加索地域提供了求之不得的便当。

早在 1942 年年初，由于莫斯科会战的巨大胜利的刺激，斯大林便开始对战争形势的估计采取了不适当的过分乐观。他认为，经此沉重一击，德军必定在春季到来前一直保持守势，即所谓转入防御时期，以便为其新的进攻争取更多的喘息时间。

一般说，这种分析也还是不错误的。但问题在于，他由这个不错误的前提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在 1942 年 1 月 10 日写给各方面军首长的指示信中，他写道：

红军在充分疲惫法西斯德国军队以后，已转入进攻并把德寇向西赶去。德寇为阻止我军前进，已转入防御，开始构筑设有掩体、障碍物和野战工事的防御地区。德寇这样阻挡我军在春季之前的进攻，以便明春再集结兵力重新转入对红军的进攻。由此可见，德寇是想赢得时间和获得喘息机会。我们的任务就在于，不给德寇以喘息时间，不停顿地把他们往西赶去，迫使他们在春季之前就把预备队消耗光（届时我们将有大批新的预备队，而德寇已经没有任何预备队了），从而保证在 1942 年彻底粉碎希特勒军队。但是，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军就必须学会突破敌人的防线，学会组织对敌人防御全纵深的突破，从而给我们的步兵、我们的坦克兵和我们的骑兵开辟前进的道路……

在这里，斯大林至少犯了两个判断上的错误。兵家常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而他这里却是既不知己——他只是正确地估计到了 1942 年初苏德前线的形势有利于苏军继续进攻的趋势，但却没有能充分考虑到当时苏军的实际能力；也不知彼——他过低地估计了德军的实际战斗力，竟要求在 1942 年内就消灭当时还十分强大的德军。结果，在后来的冬季继续反攻中，苏军把 9 个预备队集团军几乎全部平均地用在各个方向上，不但没有像他提出的那样耗光敌人的预备队，反倒耗掉了自己的这么多的预备队。

按说，到此他应该比较清醒地认识春季形势了吧？但他没有，他还在想如何尽快地在 1942 年内彻底粉碎德军。这样，当西南方面军总司令铁木辛哥向他和大本营提出要在春夏季战斗中在该地区组织进攻的时候，他同意了；当西方方面军总司令朱可夫向他提出在中央方向继续反击敌人的时候，

他也同意了。同样，当一向以慎重老练著称的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向他提出必须只进行积极的防御战略，等到真正地疲惫和消耗了敌人，而我军又有了新的预备队积蓄之后，再于夏季后转入反攻和进攻的时候，他也表示同意了。

当然，当时参加国防委员会的主要苏军高级首长也都对上述作战意图表示同意，如果说是有异议，也是大同小异。如，朱可夫不同意在数个方向上同时转入进攻，但主张在自己的方向上进攻；铁木辛哥既同意朱可夫的中央方向进攻，也坚持自己的西南方向进攻；沙波什尼科夫也只是反对铁木辛哥的进攻，但斯大林却坚决支持；伏罗希洛夫支持铁木辛哥，而华西列夫斯基赞同朱可夫……总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良好愿望，这就是不要轻易丢掉从莫斯科城下之战中夺来的战略主动权，往大了说，则是希望早一天打败希特勒侵略者。

这有错吗？显然没有。但是，要知道，当良好的主观动机和愿望脱离现实基础与可能条件时，并不是都能得到同样的客观效果和结果的。

从根本上说，这个春季和夏季作战初步计划的总的错误根源，还是出于当时苏军高层领导人都认为敌人还会大举进犯莫斯科上，这是总的判断方向的错误。因此，其进攻也好，防御也好，都是单纯地围绕在莫斯科一个方向上。其次，它的要害盲点还在于既同意了进攻，又同意了防御，而事实上这在同一时间内同时进行是极不明智的。

当然，这也是我们今天在事后才能做到的分析和评论。而在当时，由于情报的缺乏，战争形势的瞬息万变，以及对敌我双方都不能真正完全地做到知己知彼等因素，对任何筹划和指挥战争的人来说，都只能是靠大致的分析和预测来行事。然而，惟其如此，也才能真正地令人感到指挥战争是一种高智商的创造性活动，也越发能显示出所谓的军事天才的天才之处来。

当时，斯大林及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总参谋部都以为，德军虽然在莫斯科被击退，但它仍然对首都有相当的威胁。斯大林还从国外渠道得到情报说，希特勒并未放弃攻取苏联首都的想法。而且，在莫斯科中央方向，即朱可夫元帅的西方方面军前面，仍然部署着德军最强大的中央集团军群，仅这一集群就拥有 70 多个师的雄厚兵力。这很使人们不由得不相信，德军会在春季大地复苏后，利用其强大的坦克集群来在此一方向上继续实施新的突击性进攻。因此，大本营和总参谋部都主张把主要的战略预备队放在这里，而这也导致对敌人主要突击方向判断上的错误。

当时，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也曾认为，奥廖尔—图拉方向和库尔斯克—沃罗涅日方向是两个特别危险的方向。分析认为，德军也很可能从这两个方向突击莫斯科，即从西南方向对首都实行迂回包抄之术，像 1941 年 11 月间敌古德里安坦克集群所做的那样。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才决定把最高统帅部直接掌握的大部分预备队集团军，于春末集中在勃良斯克方面军所辖地域，以便从西南方面保卫莫斯科。比如，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坦克第 5 集团军，当时就是在勃良斯克方面军的后方展开的。其用意即是，一旦敌人在这一带发起进攻，则用它来实施强有力的反突击。

因此，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在提出 1942 年春季和夏初作战计划时，认为必须首先在近期内以积极防御为主，但同时也必须在克里米亚地区、哈尔科夫地区，以及科戈夫—库尔斯克方向、斯摩棱斯克方向、列宁格勒和杰米扬斯克等地域实施一系列的局部战役进攻。此后，总参谋部在编制 1942 年春

季和夏季作战计划时，就是完全按上述战略意图进行的。

说到具体的实施方面，似乎当时斯大林最感兴趣也全力支持的，仍是铁木辛哥元帅提出的在哈尔科夫方向上的所谓局部进攻。还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就表示反对，并说大本营不能，也没有足够进行这次进攻所必备的预备队向他们提供。但斯大林立即打断了他的话，说：“我们岂能坐等德寇的首先突击！”

必须在宽大正面上先敌实施一系列突击，这样才可能做好摸清敌人情况的准备，我看，朱可夫元帅提出的西方中央方向的进攻，而在其他地方全部防御，倒是个不彻底的治标的办法。”接着，这一进攻战役的首倡者铁木辛哥元帅便说道：“这个方向上的部队现在能够，而且毫无疑问也必须在西南方向实施先敌突破，这样才能打乱敌人对我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的进攻计划，否则就会重演战争初期的危险情况。至于在西方方向的进攻，我也支持朱可夫元帅的意见，因为这会在那里牵制住敌人可能调动的兵力。”伏罗希洛夫元帅也表示支持这一意见。

随后，大本营和总参谋部研究了铁木辛哥元帅提出的这项进攻战役的具体计划。

按报告所说，该战役的规模相当庞大，其目的是彻底粉碎敌“南部”集团军群，并使苏军由此而前出到戈麦尔—切尔卡塞—彼尔沃迈斯克—尼古拉耶夫一线。参加战役的不仅有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还有勃良斯克方面军，而且，还要求大本营给他们以大量的兵力和兵器支援。总参谋部当即表示不同意该计划，并把意见报告给最高统帅本人。斯大林也表示同意总参谋部的否定意见，但他同时又同意让铁木辛哥元帅去拟定一个比该计划规模小些的局部战役计划，其目的是以西南方面现有兵力和兵器粉碎敌人的哈尔科夫集团。

4月10日，铁木辛哥元帅把按照斯大林意见修改过的计划送交了大本营。这一新计划规定，通过从沃尔昌斯克地域和巴尔文科沃屯兵场两个方向做向心突击，粉碎在这里的敌哈尔科夫集团，一举夺取哈尔科夫并为解放顿巴斯创造条件。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仍认为这是一个相当冒险的计划，因此建议放弃为好。但铁木辛哥元帅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向斯大林保证战役必获全胜。最后，斯大林批准了实施这一局部进攻战役的计划，并专门下令给总参谋部说，应把它看成是该方向内部的事务，总参不要干预这一战役的任何问题。

至此，这一冒险的、并在后来给苏军带来极大损失和许多麻烦的战役计划就算通过了。按该方向总司令铁木辛哥的规定，它将在4月20日开始实行。

在忙过这一系列的紧张的筹划和具体的战役计划编制工作后，4月中旬，华西列夫斯基便作为大本营代表，被最高统帅部派往西北方面军工作去了。按当时1942年春季和夏初苏军作战计划的规定，在西北方向上还有一个所谓的局部战役。它要求西北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协同动作，将已经陷入苏军合围的法西斯杰姆斯克集团就地聚歼。华西列夫斯基此行的任务，就是协助该方面军首长做好这次战役的具体筹划和指挥。他在这里一直工作到5月8日。

正当他们准备实际实施这一聚歼行动时，忽然接到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一道命令，要求华西列夫斯基尽快赶回莫斯科。原来，是总参谋长沙波什

尼科夫心脏病突发不能照常工作，总参谋部的工作又须臾不可离人主持。于是，从5月11日起，华西列夫斯基便第二次受命代理总参谋长一职。

稍后，病愈并逐渐恢复健康的沙波什尼科夫向最高统帅部提出，由于自己年龄和健康的原因，最好辞去总参谋长之职，而去某所军事院校担任一些身体能够承受的较轻松的职务。而且，他还正式提议总参谋长一职的继任人选，他认为华西列夫斯基是最合适的了。因为，这位被推荐者不仅素质和能力方面无可挑剔，其忠诚、干练、机敏及沉着多思，都可以说是一流的人才。此外，在资历上也说得过去，毕竟是上将嘛（按：华氏系于1942年4月26日始获上将军衔的）。斯大林当即表示可以考虑他的建议和要求，惟关于华西列夫斯基继任问题，须得到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国防委员会的批准方可。

6月24日，经研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国防委员会决定：任命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上将为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总参谋长。

在一定的意义上，对华西列夫斯基来说，此番出任苏军总参谋长很有点儿临危受命的味道。当然，这是从此间苏军战场所面临的诸种严重局势这个角度来说的。

因为，在他上任还不到一周，苏军战场的各个方向就开始出现一系列重大失利，随之而来就是整个春季和夏季的形势逆转……

第一桩就是克里米亚战场上形势日益复杂和日趋恶化。

早在是年2月到4月间，克里米亚方面军曾在黑海舰队的支援下3次试图突破德军防御，均未能成功，到春季则不得不被迫转入防御。然而，该方面军的作战部署并不适合于防御，相反却是军事首长擅自按进攻态势布置的。加之，在具体部署方面，其临近黑海可以得到舰队支援的左翼又极为薄弱。他们的理由是，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是苏军占有明显的优势，只要出发阵地稍加改善便可随时发动攻势。但结果是，进攻却一拖再拖没有能够实施，而防御也未按总参谋部的指示予以加强。派到那里去的大本营代表麦赫利斯和方面军首长意见不合，总是争吵不断，以致最后竟把“官司”打到了最高统帅部和斯大林那里。

当时敌人正在准备进攻，以便把苏军从刻赤半岛逐出，从而全力攻取克里米亚方面军英勇防守的塞瓦斯托波尔。这是个著名的军事要塞，是苏联黑海舰队的基地。

克里米亚方面军也驻在以此为全岛中心。当时，敌人准确地查清了苏军临近黑海方向的左翼第44集团军是个弱点，便计划在此准备使用大量坦克、飞机，并派海军陆战队登陆，以通过此举前出到克里米亚方面军的后方。该方面军已经得知了这一切，甚至连敌人转入进攻的日期也被侦察部门获知，但无论是大本营代表或方面军首长，都未采取任何抗击敌人突击的措施。

5月8日，德军按预定时间开始进攻，很快便突破第44集团军的防御阵地，并随即发展了胜利。克里米亚方面军由于纵深没有预备队部署，结果防御一被打乱，立即就失去了对部队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苏军将士经过12天激战，尽管英勇而顽强，但毕竟不是拥有强大坦克集群和俯冲式轰炸机的德军的对手。结果，大量将士无谓战死，仅被俘之苏军官兵，先后就高达10万之众。塞瓦斯托波尔要塞被围困长达9个月之久，最后终于7月4日陷入敌手。至此，整个克里米亚全部陷落，并为德军所盘踞。不仅如此，

敌军还得以因此腾出一个有作战能力的集团军和相当数量的加强兵器，并由此转到了斯大林格勒与北高加索方向。

对此，虽然华西列夫斯基不负任何责任，但这对困难重重中的苏军毕竟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也直接影响了整个南线战场及后来斯大林格勒战场的形势。斯大林极为震怒，不仅在答复麦赫科斯的电报（即为打“官司”而递上去的那份）中严加斥责，并在随后立即撤了他副国防人民委员、大本营代表之职，军衔也被降了下来。

其他包括克里米亚方面军司令员等所有责任者，也都同时被撤职降衔，以示惩戒。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踵而来的就是西南方向铁木辛哥元帅领导的所谓哈尔科夫附近进攻的惨重失败。由此，还严重地累及勃良斯克方面军左翼的安全，以致整个西南战场的局势迅速恶化起来。

5月12日，当刻赤半岛正在激战之际，西南方向两个方面军对德军的进攻开始了。

按原定战役计划，它有两个进攻的突击方向：一个由沃尔昌斯克地域发起，另一个则由巴尔文科沃突出部实施。进攻开始时发展得很顺利。苏军迅速地突破了敌人的防御战线，并于3昼夜内向前推进了25—50公里。斯大林对此很感满意，这也使 he 有了责备总参谋部的理由。一次，他当面对华西列夫斯基半真半假地说：“您看哪，总参谋长同志，铁木辛哥他们干得不错嘛！我差一点由于你们总参的坚持而取消了这样一次进展如此顺利的战役呢。”

但是，不到一周，确切地说是5天之后，战局便发生了急剧变化。完全出乎人们预料的是，当苏军继续向前推进时，德军统帅部给它的“南部”集团军群制定的由奥廖尔向沃罗涅日方向突击进攻的既定计划也开始实施了。说来真是无巧不成书。

与苏军欲消灭德军这“南部”集群的作战目的正好相对应，这里的德军也是以消灭苏军西南和南方两个方面军为直接战略目的。那么，两军相遇究竟何者胜？自然是强者胜。或者也可以说是智者胜或勇者胜。但最权威的说法应是三者兼备为上，即所谓的既“强”又“勇”且“智”。

原来，在这里发起进攻的正是敌克莱斯特上将指挥的“A”战役集群，仅在5月17日投入攻击的兵力就有11个师之多。只是一昼夜，德军便突破了苏军第9和第57集团军的防御阵地，并向前推进了20多公里。而且，种种迹象表明，德军的突击力量仍在不断地增加，各种坦克集群和摩托化步兵师越来越多地蜂拥到苏军侧翼。估计，很快将严重威胁到第9和第57集团军的后方。

尤其糟糕的是，当时铁木辛哥不仅未认识到这种危险，反而仍然顾前不顾后地坚持他的向前进攻方针。当晚，华西列夫斯基打电话给他的老同事、第57集团军参谋长阿尼索夫，后者向他如实地报告了前线的真实危局。由此，华西列夫斯基断定，德军业已展开的这个进攻很可能就是其大规模春季进攻的前奏。显然，敌人是想先清除巴尔文科沃突出部，然后全歼苏军西南和南方两个方面军。这种分析如果成立，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他认为，只有立即停止铁木辛哥集团向哈尔科夫的进攻，并将原用来突击的部分兵力调转头，以解除对第9和第57两集团军的危险。因为在该地区根本没有任何预备队部署，也没有其他可供调用的苏军部队。

打定主意后，华西列夫斯基立即向最高统帅做了汇报，并如实谈出自己的这番打算。记料，斯大林最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主意。当他与铁木辛哥通话后，后者也没有表现出多么的不安，并且提出，只要再给他增派 1 个师的预备队，仍然坚持既定方向进攻便绝无问题。所以，他放下电话对华西列夫斯基说：“铁木辛哥元帅正在采取的措施完全能够击退敌人对南方方面军的突进，所以西南方面军仍将继续进攻。”

5 月 18 日，形势继续恶化，华西列夫斯基非常着急。他再次找到斯大林，建议必须立即停止哈尔科夫方向的进攻，将西南方面军的突击集团转向南面抗击敌人。这次是，斯大林走到电台旁，要求西南方向军事委员会对现时情况作出判断。铁木辛哥元帅再次作出了令人放心的保证。晚上，斯大林又就这个问题与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赫鲁晓夫通话，后者也报告说，尽管克莱斯特集团的威胁在增大，但没有理由终止正在进行的进攻。这样，进攻便仍然继续。华西列夫斯基心急如焚，却一筹莫展：眼看一昼夜的时间又失掉了，怎么才能说服最高统帅呢？

情况一个小时比一个小时严重。到 5 月 19 日下午，敌军在巴尔文科沃突出部合围苏军的威胁已相当明显了。只是在这时，铁木辛哥才下令停止哈尔科夫战役，调转突击部队对付正在形成合围之势的克莱斯特集团。但是，为时已晚。由于各部队在夜间才开始执行命令，极为宝贵的时间再次损失了。及至翌日拂晓及以后的几天中，德军的强大坦克突击集群已经重创苏军第 9 集团军，并将其赶过了顿涅茨河。随后，敌人迅猛突入第 6 和第 57 集团军及博布金将军集群的后方，很快就合围了这些部队。

到 5 月 23 日，第 6、第 57、第 9 集团军的部分部队、博布金所部完全陷入敌军重兵合围之中。经过一个半月的苦斗，只有很少一部分突围出去了，绝大多数都无法冲出重围。在给德军以大量杀伤后，苏军大部战死，余者全都被俘。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的有方面军副司令员科斯坚科中将、第 57 集团军司令员波德拉斯中将、参谋长阿尼索夫少将、军事委员（旅级政委）波品科大校、第 5 集团军司令员戈罗德扬尼斯基中将、军事委员弗拉索夫大校、集团军群司令博布金少将等一大批高级军官和士兵。

据有关史料提供的说法，此一役，苏军死伤及被俘者，总计达 25 万人之众，损失坦克 600 余辆，还有大量其他兵器。

总参谋部闻得这个消息，华西列夫斯基总参谋长不禁为之失声……

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也懊悔莫及。

然而，苏军西南战线的危急并未到此结束。铁木辛哥元帅调转回师的突击集团也遭到德军的顽强阻击，在经受巨大损失后，不得不被迫退到奥斯科尔河地带固守。

6 月 28 日，得势猖狂的德军的巨大进攻真正开始，这就是他们的夏季攻势。敌军从库斯克到罗斯托夫的广阔战场上，分两路猛烈突击，其中一路就是保卢斯指挥的最强大的第 6 集团军，其直指方向正是原西南方面军与勃良斯克方面军之间的薄弱结合部。该部德军依靠其强大的坦克集群，横冲直撞，直取前方。这里，是数百里一望平川的草原，没有那些曾把它阻挡于莫斯科城前的大片森林，没有高山，没有丘陵，没有沟壑。坦克集群旋风般地向前驱驰，扬起了 40 里之内都清晰可见的蔽天尘埃。它们疯狂地驶过无数的城镇和乡村，所留下的仅是死神光临的痕迹。

到 7 月 2 日，勃良斯克方面军所在的沃罗涅日地域局势也日益严重恶

化。敌军两天内即疾进 80 公里，而且推进的势头仍未见减。苏军这一方向上的所有预备队都使用上了，但仍止不住德军的强大攻势。为了阻止敌军占领沃罗涅日这一重要城市（它是由西北通向斯大林格勒的门户），最高统帅部决定，再增加两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交给勃良斯克方面军指挥，同时又把强大的坦克第 5 集团军也拨给该方面军，并派华西列夫斯基亲临前线，负责这里剧烈战斗的协调和指挥。不久，由于南方方向也出现了麻烦，华西列夫斯基又被紧急召回大本营。

就这样，在这段极为紧张艰难的日子里，华西列夫斯基作为新上任的总参谋长和本营代表，总是在最高统帅部和前方战场之间被扯来扯去，疲于奔命。

在整个南线克里米亚陷落、西南方向濒危、沃罗涅日失利的同时，苏军西北方向也由原来的看好形势转向恶化。在那里，原来对德军杰缅斯克集团形成合围的列宁格勒方面军的两个集群，在企图内外夹攻该部敌军时，外线较为有力，而内线则相当薄弱。所以经过激烈奋战后，内线苏军仍有被德军合围的危险。在这危急时刻，苏军第 2 集团军司令弗拉索夫竟率部投敌，致使局势大为逆转。最后，在内线与敌奋战的第 33 集团军没能突出重围，司令员叶弗列莫夫中将身负重伤，饮弹自尽，为国捐躯。其所部将士也战死沙场，无一生还。诚可谓壮而且烈，感泣鬼神。

叶弗列莫夫将军及其所部将士的高尚精神与节操，适与可耻复可恨的叛将弗拉索夫等辈对比鲜明，形同霄壤。如此正气与卑邪，卒令后世思之不尽。

1942 年春季和夏初全线各方向战场上的一系列失利与挫折，致使最终出现法西斯德军威逼斯大林格勒和北高加索地区的严峻局面。这不仅使苏军经于 1941 年冬莫斯科城下苦战获得的战略主动权得而复失，而且更造成了苏联南部广大地区直接暴露于敌军威逼之下。

面对此种严峻又严重的新的战场格局与敌我态势，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和总参谋部颇感压力巨大，斯大林经与国防委员会、大本营及总参谋部合议，遂向全军发出了“绝不准后退一步”的权威性第 227 号命令。

这道命令是斯大林以苏联国防委员会主席和苏军最高统帅的名义于 7 月 28 日发布的。它严肃地分析了当前苏德南部战场的危险形势，批驳了此间甚为流行的一系列关于对敌战争的错误观念，阐明了保卫苏联南部地区，尤其是斯大林格勒这座作为苏南交通枢纽、工业基地和政治中心的著名城市的重大意义。最后，该命令也极为严肃地提出了建立铁的秩序和纪律的要求。它写道：

我们的祖国正在经历艰难的日子。

目前，敌人不顾遭受到的惨重损失，已经把越来越多的新兵力投入战场，他们正在向苏联的腹地一步步地进逼。他们不断地占领新的地区，蹂躏、毁坏我们的城市和村庄。他们奸淫妇女，抢掠财物，残杀人民……

现在，我们已失去了人力资源的优势，也丧失了粮食储备的优势。继续后退就意味着自杀，就意味着断送我们可爱的祖国。

从现在起，我们每放弃一寸土地，都将极大地加强敌人的优势，极大地削弱我们的防御，削弱我们自己的祖国。因

此，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杜绝诸如‘我们还可以无休止地退下去’，‘我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粮食取之不尽’之类的论调。这种论调是自欺欺人的，是有害的，错误的，它会削弱我们自己的斗志而助长敌人的势力。因为，如果我们不制止继续地退却，我们就会没有粮食，没有燃料，没有金属，没有原料，没有工厂，没有铁路……因此，我们得出结论说：该是停止退却的时候了。

是的，绝不准后退一步！

这应该是我们当前的主要口号。我们必须坚守每一块阵地，坚守每一寸苏联领土，尽最大的力量去保卫它，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我们的祖国正处在困难之中。我们应该停止退却，然后打退并粉碎敌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将在所不惜……

那么，我们现在到底缺少什么呢？我们的连、营、团、师、坦克部队和飞行大队缺少制度和纪律。这是我们目前的主要缺点。如果我们要想扭转局势，保卫我们的祖国，我们就应该在我们的军队里建立起最严格的制度和铁的纪律……

今后，没有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没有上级的指示，绝对不许后退一步。这一要求，应成为每一个指挥员、红军战士和政治工作人员的一条铁的纪律和法规……

斯大林的这道命令，曾在随后印发给所有的作战部队，从高级指挥首长到中下级指挥人员和每一名士兵，几乎人手一册。

第二天，即7月29日，苏联红军总政治部颁发了向全军将士宣传该项命令的指示。

尤其要求每一名共产党员必须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坚决做到在作战中“绝不准后退一步”的要求。同时，总参谋部也发出训令，要求各驻部队的参谋人员在战斗中如实地检查对这一命令的执行情况，遇有不遵纪守法者，一律严加惩处。

此间，联共（布）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还大力组织了对这一命令的学习和宣传活动，很多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著名作家和其他知名人士，甚至一些联共（布）中央委员，都直接奔赴前线各部队，深入到各个作战单位进行广泛宣传和教育。自然，这种学习和教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此后，“绝不准后退一步！”这一命令，竟成为每个指挥人员和战士的口号和座右铭，更是战斗行动守则。他们知道，今后必须在战斗中死守阵地，为胜利做到自己所能做到的一切。这首先是在未来最艰难的地方——斯大林格勒方向上。

第九章 鏖兵斯大林格勒

斯城空前大鏖兵，运筹决胜贯始终；
战争转折端在此，当之无愧元帅名。

斯大林格勒位于宽阔美丽的伏尔加河西岸，是苏联南方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和工业中心，也是苏联内河航运干线即伏尔加河上的重要港口。在它以西和以南，是辽阔富饶的顿河与伏尔加河冲击平原，这里是苏联的粮食、石油和煤炭等多种工农业原料的主要产地。1941 年德军侵占乌克兰后，斯大林格勒还成了由苏联中央地区通往南方重要经济区域的唯一交通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此外，在苏联人民的心目中，斯大林格勒还有其独特的伟大历史意义。它的原名叫察里津，由于国内战争时期斯大林曾英勇地领导了这里的人民和红军战士进行过著名的“察里津保卫战”，苏联政府为了纪念和表彰斯大林的英雄行为和伟大功绩，才把它更名为“斯大林格勒”。当年，英勇顽强的“察里津保卫战”曾轰动全俄，它对打破俄罗斯南部反革命企图与东部白匪军会合的计划，挫败敌人试图切断俄罗斯中部与南部粮食、燃料及其他工业品产地的联系的阴谋，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后来，这座城市曾一度为白匪军所占领，但从它陷落的那一天起，该城军民就与残暴的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伟大斗争，并在斯大林亲自指挥下于 1920 年初夺回了它。自此，察里津又回到人民的手中，并在国内建设时期成为苏联南部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因此，可以说，察里津是苏联人民英勇不屈的象征，是苏联领袖斯大林高大形象的象征。

现在，法西斯希特勒又要把它作为新的侵略和进攻的目标。这样做，除了夺取该地区丰富的粮食、燃料及其他工业资源，从苏联南部扩大其侵略战争等直接的经济、军事目的外，希特勒还有他不可告人的阴险政治目的。这就是，一旦德军攻下了这座以苏联最高统帅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他便可以利用法西斯纳粹宣传工具来大肆渲染苏联的失败形象，宣传所谓“苏联不堪一击、指日可下”、“德军不可战胜”之类的纳粹神话，直接给那些长期以来为他充当战争炮灰、如今已逐渐产生厌战心理的德国士兵壮胆打气，同时也用来加强其继续侵苏的勃勃野心。

由于法西斯德军的力量暂时强大与攻势猛烈，苏军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决定，所有南方战线的各个方面军与战役集群一律采取防御性守势战略。在斯大林“绝不准后退一步”的命令下，各部队调整部署，坚守防线，准备以英勇顽强的抵抗把敌人挡在斯大林格勒之外。从而保卫住这座英雄的城市不为敌军所占领和蹂躏，并最终粉碎希特勒的进攻，消灭德军有生力量于斯大林格勒城下。

于是，一场为“保卫祖国而战”、“为保卫斯大林格勒而战”的全苏性质的伟大战斗开始了。

7 月 14 日：联共（布）中央宣布斯大林格勒州处于战时状态。

8 月 25 日，斯大林格勒市全部戒严。

德军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是在 7 月中旬开始的。按照法西斯德国统帅部 4 月间制定的进攻计划，敌“ A”集团军群主力将负责突击苏军没有更多防御力量的北高加索方向。目的是以强大的坦克群将苏军南方方面军分割包围于顿河下游的罗斯托夫以南和东南地域，进而越过高加索山口，占领整个苏联南部地区。然后再向东进军，与隆美尔所部会师，从而彻底切断苏联通过伊朗与盟国联系的陆上通道。而敌“ B”集团军群，其中包括保卢斯麾下的第 6 集团军则实施对斯大林格勒方向的突击，最终夺取这一西南战略要冲，从而控制整个伏尔加河下游的广大地域。此外，该集群在突击斯大林格勒这

项主要任务之外，还同时担当了构筑能保障北高加索方向“A”集团军群侧翼和后方防御体系的任务。

开始，敌“B”集团军群以坦克第4集团军作前锋向前做猛烈突进。强大的坦克集群带着雷鸣般的呼吼，浩浩荡荡地穿过了顿河平原，没有任何苏军能止住它迅猛的势头。随后，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与苏第62集团军先头部队遭遇。虽经顽强抵抗，毕竟寡不敌众，苏军被迫退到该集团军的主要防御地段。紧跟着，德军便乘势突破了苏军防御阵地，以快速部队迅速前出到了顿河卡缅斯基附近，并从北面方向深远包围该集团左翼部队。这样，在斯大林格勒方向上的苏军防线就出现了一个大缺口。

在这危急时刻，华西列夫斯基作为大本营代表于7月23日到达前线。他是受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前去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首长共同应付这一难题的。前此不久，最高统帅部已经把大本营预备队方面军中几乎所有部队都编入了该方面军。除了尚未准备就绪的坦克第1集团军和第4集团军外，大本营在这一地区已没有任何可供使用的预备队了。经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戈尔多夫中将商量，华西列夫斯基认为，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使用这两支正在组建中的坦克集团军。但是，经过联系才得知，坦克第4集团军至少需要两昼夜的时间才能赶到。当时，前线形势根本不允许坐等这么久。在这种情况下，华西列夫斯基当机立断，决定只派坦克第1集团军单独对敌人实施反突击。

华西列夫斯基想，对现在来说，时间是最宝贵的。如果延误或错过这段时间，敌军就可能渡过顿河，并在河的右岸建立起可以固守的阵地。到那时，再想把敌人赶回来，恐怕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了。结果证明，华西列夫斯基的决断是正确的。当7月25日苏坦克第1集团军发起反突击后，敌军的阵地果然被冲乱了。他们万万也没有想到，在这时苏军还有预备队可以使用，而且又是如此迅速地突到了自己的后方。于是，敌军被迫转入防御态势。不久，奉命开到这儿的苏坦克第4集团军也从另一个方向加入了对德军的突击，这更使保卢斯大惑不解：怎么又出现了新的苏军坦克集群；元首和统帅部提供的情报不是说这个方向上敌人再也没有预备队可以使用了吗？无奈之下，德军只好暂时退却，退出了他们要锐意进取的斯大林格勒方向。

华西列夫斯基急中生智安排的这次反突击行动，虽然未能一举消灭（歼灭）入的敌军，但它却打破了保卢斯集团企图围歼第62集团军的计划。更重要的是，它打乱了敌军的行动计划，使其失去了迅速进攻的能力和机会。其一鼓作气夺取顿河渡口、并前出到斯大林格勒附近地区的既定计划落空了。这样，希特勒原以为完全可能的令该集团军在急速奔进中一举攻下斯大林格勒的最终战略追求，也随之化作了永远不能实现的泡影。

希特勒和他的纳粹战略家们失算了。原来，法西斯德国统帅部曾决定，由第6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共同担任进攻斯大林格勒的任务，但是，后来纳粹的战略家们提出，在以往的战斗中已经被削弱了的苏军，将不会在通往斯大林格勒的道路上进行强有力的抵抗。鉴此，希特勒就把坦克第4军调到南方参加北高加索战役的作战去了，而且还把第6集团军的两个军也编入了它的建制。到这时，希特勒才明白过来：只用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的现有兵力进攻，是根本无法突进到伏尔加河的。他忍不住地自问道：如果苏军再把该集团军击退，情况将会怎样呢？由此，他感到必须重新考虑对斯大林格勒进攻的计划。

此间，按照希特勒的安排，霍特的坦克第 4 集团军从科捷尔尼科夫沿铁路方向，曾在南部试探性地对斯大林格勒发动过一次攻势，但仍无法实现其既定的战略意图。

无奈之下，他只好命令该部队转入防御。因为，在这次试探行动中，坦克第 4 集团军遭到苏军的顽强抵抗和反击，兵员和兵器损失都不算少数。

到 8 月上旬，希特勒终于下定决心，要利用现在仍处于优势地位的兵办，尽可能快地解决攻下斯大林格勒的问题。不然，随着秋季的到来，不仅苏军又要集结好大量的预备队送至前方，而且德军自己方面也会出现新的不测：一是作战部队在不断进攻中只能加剧损耗，而又没有新的预备队可以补充；二是德国士兵很容易由于秋季的到来想到可怕的 1941 年莫斯科城下的冬季。希特勒虽然不是雪莱，但还是能从诗人那不朽的诗句里悟出这个道理的。既然“冬天到了，难道春天还会远吗”？那么秋天到了，难道冬天还会远吗？是的，俗是俗些，毕竟道理是一样的。

因此，希特勒决定同时从南北两个方向发起新一轮攻势。其计划为：由第 6 集团军从西北面自上布齐诺夫卡发动进攻；由坦克第 4 集团军从南面自阿勃加涅罗沃地区发动进攻。双方进攻务求向心态势，以便一举攻占斯大林格勒。

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和总参谋部是从一位前线侦察员的报告中获知敌军新的大规模进攻端倪的。据该侦察员提供的情报，原先在巴甫洛夫斯克至韦申斯卡亚地段担任防御任务的敌第 6 集团军，已被意大利第 8 集团军替换下来，集中到斯大林格勒方向去了。经过分析，总参谋部认为，德军的这种调防肯定不是正常的举动，这说明第 6 集团军另有新的更重要的任务。什么任务呢？再明显不过了，它只能是被用来对斯大林格勒进行突击进攻。因为，该集团军是这个方向上德军最强大的部队。

8 月 5 日，为了对付敌军随时都可能发动的新的的大规模进攻，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决定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一分为二，即改组为两个方面军——东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东南方面军的编成即原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左翼部队。它包括第 151、第 57、第 51 集团军以及坦克第 13 军和空军第 18 集团军。后来，又加入了由大本营预备队派至前线的近卫第 1 集团军。该方面军的司令员是叶廖缅科上将，军事委员是赫鲁晓夫，参谋长是扎哈罗夫。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编成即原来剩下的第 63、第 62、第 21 集团军及坦克第 4 集团军、坦克第 28 军及空军第 8 集团军的部分部队（这部分空军后又与大本营派来的预备队编成了空军第 16 集团军）。该方面军的司令员仍是戈尔多夫中将。

所以作出这样的安排，在当时也还有另外的实际考虑。这就是，随着 8 月上半月连续不断的激战，原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战线已经延伸至 800 公里之长，这使该方面军首长越来越不适应指挥和组织这么多军队的战斗行动。因为，当时这些军队不得不在两个互相分离的方向上作战。当然，也有原方面军首长不称职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以后也是存在的。基于此，在未做人事调整前，8 月 13 日，大本营又决定：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拨归东南方面军节制；两方面军的最终指挥权，由派往这里的大本营代表华西列夫斯基负责协调和领导。

8 月 19 日，德军第 6 集团军和坦克第 4 集团军按预定计划开始了对斯大林格勒的第一次直接进攻。保卢斯和霍特这两个法西斯恶魔，简直是倾其所

有地把强大的快速集群从南北两个方向推向斯大林格勒城郊。先是保卢斯集团从卡拉奇方向突破了苏军的防御，并在 23 日把部队前出到了斯大林格勒以北的伏尔加河一线。随后霍特集团也从城南（扎契）入苏军防线，并使其所部前锋前出到了京古塔车站。至此，斯大林格勒的形势开始呈现危局。

此间，作为大本营代表的华西列夫斯基一直在东南方面军司令部。当随后德军飞机对斯大林格勒肆无忌惮地实施空中轰炸时，他曾目睹了这座英雄的城市变成废墟的全过程。许许多多的建筑群转瞬间就消失了，城中美丽的绿荫街区全然不见了。

白昼，整个市区浓烟滚滚，被重型炸弹所掀起的巨大尘埃，像褐色的云雾一样长时间地在空中翻卷，几乎笼罩了这座城市的全部。到了夜晚，城区仿佛一片火海，苏军高炮部队的探照灯射出的道道光柱，敌机被击中后下坠过程划破天空的浓烟和爆炸的烈焰，任何一个非职业军人看了都会胆战心惊。尽管如此，德军的飞机仍不断地出动，巨大的爆炸声浪在夜晚传得更远，尤其疾人。无休止的空中轰炸带来了空前大破坏：自来水、电报局、电车、铁路枢纽及供电设备全部瘫痪，有些工厂把重要物资搬运走了，只有军需工厂仍在战火中维持生产，居民们有些被疏散走了，而有些人则干脆拿起武器直接冲向前线……

一度，华西列夫斯基与总参谋部、最高统帅部的电报电话联系全部中断，他不得不在指挥观察所内用无线电拼命地喊话。电话联系接通后，斯大林给他和前线的两个方面军首长发来了指示：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敌人，誓死保住城市。斯大林说：“请把两个方面军的航空兵合在一起猛烈地攻出突破我军的敌人。把装甲车动员起来沿斯大林格勒的环城铁路巡逻。施放浓烟来吓唬敌人。要充分利用炮兵和火箭炮部队……最主要的是不要惊慌失措，不要害怕无耻的敌人，要有我们必胜的信心！”尽管两个方面军及前些时候补充上来的 15 个步兵师和 3 个坦克军都尽可能地使用上了，仍不能击退突击中猛烈前进的敌人。为什么呢？斯大林不是说“你们有足够的兵力来歼灭敌人”吗？他不知道，对付德军强大而快速的坦克集群，步兵当然是不够的。

前线的兵虽是不少，但主要是步兵师。他们所缺乏的是坦克和飞机，以致许多坦克部队不得不把受伤的坦克送进附近的各种工厂去修理，然后便直接开着修好的坦克去前沿战斗。

8 月 25 日，华西列夫斯基再次接到斯大林的命令。当时，他刚从斯大林格勒北郊的一家大型拖拉机厂回来，那里正在按战时需要生产坦克，而敌军前锋部队离它还不到两公里了。命令要求他立即赶到北郊附近的一个屯兵场去，并领导那里刚刚开来的部队进行突击敌人的准备工作。稍后，刚刚被任命为最高副统帅的朱可夫元帅也赶到了那里，他是斯大林派来接替华西列夫斯基并领导整个斯大林格勒地区苏军作战的。因为，总参谋部和最高统帅部大本营非常需要华西列夫斯基这颗“智多星”；而在具体指挥作战方面，斯大林似乎又认为朱可夫要比参谋出身的华西列夫斯基强些。

9 月 1 日，华西列夫斯基奉命离开前线，他下飞机后便直接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向最高统帅作战场局势汇报。可是，在他离开后这段时间里，前线的战斗更加残酷，更加激烈。有着优势兵器和兵力的德军已经攻破了斯大林格勒城垣，其中一部分坦克部队已与守城的苏联军民拉开了巷战的序幕。随后，第 62 集团军崔可夫将军渡过伏尔加河，直接把自己的司令部设在城南废墟的一座地堡中。真正的巷战开始了。

很快，崔可夫的部队便投入了战斗。当时，他能够用来御敌的坦克还不超过 40 辆，而且有些还是因受伤而不能开动的，他真正有战斗力的就那 19 辆留作反攻时用的 KV 型坦克。9 月 13 日，德军向他的部队发起了全力以赴的进攻，并于次日下午拿下了马马耶夫岗这一高地。这时，敌军就已经能用密集的炮火控制伏尔加河上的重要渡口了。英雄的崔可夫临危不惧，当他的指挥地堡上面还燃着熊熊大火时，他便命令那 19 辆威力巨大的 KV 型坦克从城南向北发起了突击反攻。战斗一直持续到当天夜里，最危险时战斗离他的地堡还不到 200 米。巨兽般的 KV 型坦克在德军阵地前往返穿梭，如入无人之境，有时竟巡回行驶在各个街区的街垒中。德军的坦克不是被它所击毁、撞翻，就是陷入苏军深藏在废墟掩体内的反坦克炮的火力网中。

对德军来说，闪电战的日子真正地成为过去，他们不得不投入面前这场短兵相接的近战和巷战。苏军的近战战术相当出色，他们的进攻全是配备齐全的独立战斗分队，每队有三四辆坦克和一连士兵。他们在弹痕遍地、充满瓦砾的街区里横冲直进。或者，步枪手和机枪手隐蔽在被炸毁的建筑物内，埋伏在瓦砾堆中，藏身在弹坑里，等到德军坦克驶过之后，把省下来的弹药用来对付它后面的步兵，而前面的坦克则由隐伏在建筑物上层的反坦克狙击手来对付。到最后，每场交锋都发展成了逐屋逐楼的拼死激战，甚至成为一场用手榴弹、自动步枪抵近齐射或是用枪刺刀劈的肉搏战。有时，德军占据破损建筑物的下层，而他们不知道，苏军就在他们的头顶上层，并从那里给他们以致命的打击。有时，敌军在建筑物的这一半，苏军则在另一半，待到夜间，墙壁被凿穿，炸弹就从这里慢慢地送了进来，等到“轰”的一声巨响发出时，苏军又移到另一处废墟之中了。

苏德两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废墟和瓦砾中几乎混战了将近两个月，但就是靠了这些办法，最终迫使在数量和兵器上均占优势的德军进攻部队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尽管德军还有专门的巷战部队，苏军还是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肉搏战中掌握主动权，德军的死亡数字大大地超过了苏军。保卢斯麾下的一名军官曾这样描述：“我军的各个部队在 9 月份的战斗中，都遭到了惨重的损失，各师变得疲惫不堪，一个连一般只剩下 30—40 个人。”另一名参加巷战的士兵则写道：“想想斯大林格勒大战 80 个昼夜肉搏拼杀的情景吧，街道不再是用米来计算，而是用尸体作单位来丈量的。斯大林格勒不再像座城市，它淹没在一片无边际的浓烟烈火之中，就像一座炉火映红的大熔炉……”

如果把整个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所有战斗都算起来，从这一年 7 月到 11 月中，德军只在这一地区内就丧失了大约 70 万官兵，1000 多辆坦克，2000 多门火炮和迫击炮，1400 多架飞机。这个代价所换来的，还只是对斯大林格勒城垣和部分市区的突破。到 10 月份，敌军便丧失了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战略主动权。稍后，则开始转入守势性防御；再往后，则干脆变成思谋如何突出苏联百万大军的包围圈和是否投降等问题了。

那么，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军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究竟是怎样设计反击计划，包围德军以致最后决胜的呢？

还在战斗处于胶着状态的 9 月上旬，苏军最高统帅斯大林就在考虑究竟用什么办法才能解决斯大林格勒战场上的德军的问题了。一天，斯大林把副最高统帅朱可夫和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找他们来，主要是想听听两位对当前斯大林格勒前线战局的分析和预测，商量如何

摆脱各部队当前的困境，以及怎样才能解决掉德军保卢斯第 6 集团军与霍特坦克第 4 集团军，并最后夺取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最终胜利问题。应该说，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是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时期的左膀右臂，是斯大林最为信任和赏识的两员猛将。在斯大林看来，朱可夫有足够的军事指挥天才，而华西列夫斯基则是无与伦比的军事智囊。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沉着机敏，有决断能力，尤其富有军事创造才能。

华西列夫斯基先就整个苏德战场各战线的敌我态势做了全面汇报。接着，朱可夫又把他出发前了解到的斯大林格勒战场的最新变化情况做了较详细的汇报。斯大林手里拿着烟斗，两眼凝视办公室墙上悬挂的著名俄国统帅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巨幅肖像。有时轻轻地吸一口烟，有时则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其实，他的大脑里想的全是斯大林格勒战场，他一边听着，不时地点一下头，一边按自己的思路想着前方战事。

突然，斯大林收回了视线，对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说道：“要消除德军控制的走廊并与东南方面军会师，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应该需要些什么？”

朱可夫略加思索便说：“至少还需要 1 个新锐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1 个坦克军、3 个坦克旅和 400 门以上的榴弹炮。此外，在作战过程中必须集中补充至少一个空军集团军。”说完，他看了一眼身旁的总参谋长。

“朱可夫元帅的计算是正确的，我也这么以为。”

斯大林立即拿出他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预备队配置图。伏下身子，长时间聚精会神地看着，仿佛屋里并没有他特地请来的这两位智囊的存在。见状，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悄悄地走到离斯大林办公桌稍远的地方，然后非常低声地谈论起来。不知是谁说了一句：“我们也许需要找个别的什么解决办法……”话音刚停，斯大林突然抬起头来问道：

“有什么别的解决办法吗？”

两人很觉吃惊，他们没想到斯大林有如此敏锐的听力。这实在是以前从未听说过的。

“现在还谈不到，但我俩刚才都在这么想。我们认为，对付保卢斯和霍特这两个可恶家伙，必须得有更厉害的办法。至少，得有比他们更厉害的办法才行。”华西列夫斯基一边向桌边走过来一边解释说。

“好哇，是应该这样。”斯大林接着说道，“这样吧，你们现在就回总参谋部去，好好想想在斯大林格勒地域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可以由哪里调什么部队去加强那里的部署，同时也想想高加索方面军的问题。明晚 21 时到我这里汇总集合。”

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一整天，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一步也没有离开总参谋部。

按总参谋长的命令，作战部、情报部及其他部门给他们送去了一摞又一摞的各种资料。有苏军各方面军的，有德军的，还有许多德国仆从国如罗马尼亚、匈牙利各部队的。他们整晚都是在斯大林格勒地域的地图旁度过的。深夜，副官给他们安排了夜宵，他们根本给忘了，或者干脆顾不上吃，后来还是厨师亲自给他们送到办公室里来的。总参谋部的各位首长都预感到，总参谋长和副最高统帅肯定有什么特别重大的问题在研究呢，按照纪律规定，他们当然是不便东问西问的。直到第二天黎明时分，俩人才稍事休息，但不到 9 时，又都起来投入工作了。到 17 时，俩人出来了，并在各个部门转了一圈儿，与各部首长及工作人员随便地聊着什么。大家都知道，两位高级首

长的任务肯定完成了。要不，他们怎么有时间来聊天谈话呢。

傍晚，华西列夫斯基给最高统帅打电话说，他们准备如约到达汇报工作。但斯大林说那时他有事，请在 22 时到达。

22 时整，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到了斯大林的办公室。他们刚一进屋，斯大林便气愤地说：“千百万苏联人在与法西斯的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丘吉尔却为 20 架‘飓风式’战斗机与我们讨价还价，真是不像话！更何况，他们的那些‘飓风式’飞机还是无用的东西，我们的飞行员都不喜欢这种飞机……”见二人莫明其妙，斯大林就把刚才他与英国大使会见的情形给他们略说了一番。最后，他摆摆手，道：“好了，不管他了，且听听你们的消息吧。怎么样了？谁先来汇报？”

华西列夫斯基回答说：“您下命令吧，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斯大林走到华西列夫斯基铺在桌上的地图跟前，说：“你们带来的这是什么？”

“这是斯大林格勒地域我军反攻计划的初步草案。”华西列夫斯基解释说。

斯大林没再说什么，只见他快速地伏下腰身，几乎是趴在地图上看起来。这时，朱可夫从办公桌上给他拿来了放大镜。斯大林伸手接过来，又继续看了起来。

忽然，他直起身子问道：

“谢拉菲莫维奇地域的这个集群是怎么回事儿？”

“这是一个新的方面军。我们需要建立这个方面军。它的主要任务就是突击，即在敌军战役集团的后方实施猛烈的突击。”朱可夫一边在图上指画着，一边说道。

斯大林看完后，抬起头：“现在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实施这样大规模的战役吗？”他把目光轮流地扫向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意思是请他们做进一步的说明。

朱可夫报告说：“根据我们昨天晚上的计算和今天上午的核算，大约一个半月后，这个战役完全可以得到必要的兵力和兵器保障。而且在时间上也能够充分准备完毕。”

斯大林又问：“如果只限于在顿河由北向南和由南向北实施突击，是不是更好些？”

朱可夫随即解释说：“那样的情况我们也考虑过，但它将使德寇能够迅速地将其装甲坦克师由斯大林格勒附近抽转回来，以抗击我军的突击行动。若像现在这样，我军在顿河以西实施突击，就会使敌人由于可流障碍而不能快速机动。这样，他们至多只能以软弱而少量的预备队来抗击我军了。”一口气说完后，朱可夫不得不喘了口气。

斯大林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但随即又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么，我军突击集团调动的距离不显得过远了吗？”

俩人都觉得，最高统帅确实是个军事天才，只是看了一遍战役计划图，便提出了这么多的关键问题。不过，这些问题好在他们都曾经考虑过。这回，华西列夫斯基解释道：

“您提的这个问题，正是我们要重点向您汇报和请示的。我俩初步认为，这次战役应分两个阶段来进行。在它的第一阶段，我军的目的是，突破德寇的防御，进而合围敌斯大林格勒集团军并建立牢固的对外正面，以隔绝该集

团军与外部敌人的联系；在它的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歼灭被合围起来的敌人，并制止住敌人解围或突围的任何企图。”

最后，斯大林表示基本同意，并说：“你们把计划再考虑一下，而且要好好计算一下我方的资源。现在，”他指了一下朱可夫，“你立即飞回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去，并要着手研究克列茨卡亚和谢拉菲莫维奇地域的情况。几天以后，”他又面向华西列夫斯基，“你也应迅速飞往东南方面军叶廖缅科那里，同他好好研究一下左翼的情况。”临别时，斯大林又说道：“关于这一计划，我们以后再继续研究。但有一点务必记住；在这里讨论过的这些问题，除了我们三人外，目前还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包括国防委员会的委员们在内。如果有人需要知道有关战役准备工作，将由我本人亲自传达。另外，你们俩人可以告知各方面军司令的仅仅是直接和他们每个人有关的那部分任务的内容，除此之外不能事先透露任何东西。”

这样，俩人便分头做自己的准备去了。

到9月底，这项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斯大林亲自给这次空前的大战役取定了一个名字：“乌兰”进攻计划。后经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和国防委员会的批准审核，决定参加这次战役的共有下列部队：

1．西南方面军，即打算新建立的那个部队。它的指挥机关为：司令员瓦图京，军事委员热尔托夫，参谋长斯捷利马赫；

2．顿河方面军，即原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它的指挥机关为：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军事委员捷列金，参谋长马利宁；

3．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即原东南方面军。它的指挥机关为：司令员叶廖缅科，军事委员赫鲁晓夫，参谋长瓦连尼科夫。

此后，制定详细计划的工作便交给了总参谋部。总参在具体编制工作中，还吸收了各兵种司令、后勤部长、总军械部长及各方面军的司令和参谋长。他们的任务是，就共同实施“乌兰”进攻战役提出自己的详细意见。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决定，关于这次进攻的准备工作，在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由最高副统帅朱可夫领导；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由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领导。随后，他们两位便各自赶到自己所在部队去。

10月间，根据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的建议，又经与斯大林格勒地域各方面军首长们商量，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和总参谋部联合提出要求：各部队的反攻准备工作，应在11月初结束，最后一批兵团和发起战役所必需的一切物质，至迟应于11月15日前集中完毕。为稳妥起见，斯大林再次派出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下到各部队，限期检查各部队和部门的准备工作，并要求这种检查工作必须以举行每个方面军总结会议的形式来完成。他要亲自看各部队总结会议的纪要报告。

11月13日，华西列夫斯基代表总参谋部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本营报告了经过核实的“乌兰”进攻计划。在政治局和本营会议上，他着重谈到了下述诸点：

1．德军兵力基本没有变化，第6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的主力仍被牵制在市区的持久战斗中。在该两集团军侧翼（即我军进行突击方向）的仍是罗马尼亚军队。

近期末发现有敌预备队由内地开往斯大林格勒方向，该方向敌军亦未表现出任何重要的部署变更。

2．据已掌握的材料看，在进攻开始前，敌我双方在斯大林格勒地域的

兵力大体相等。在我军即将突击的各方向上，由于增加大本营预备队和次要方向的部队，在兵力上对敌已有绝对优势。现各突击集群已经建立完毕，完全有把握使突击成功，并相信定能取得胜利。

3．在战役初期，按预定计划由西南方面军担任主攻。它已拥有完成这个任务所必须的一切。

4．在战役的第三天日终或第四天凌晨，西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所属的坦克部队与机械化部队将在卡拉奇地域会师。这次会师应当完成对斯大林格勒地域的敌军主力集团的合围。

5．按要求，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必须在 11 月 19—20 日开始进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必须在 11 月 20 日开始进攻。

为了使这次精心策划的伟大战役不致因任何小小的疏忽而遭受损害，前此，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华西列夫斯基还要求总参谋部发布了专门训令，制定隐秘工作措施，以防止泄漏关于反攻规模、实施时间、主要突击方向及行动方式等消息。比如，来往函件和电报通话绝对禁止谈及有关反攻的事情；命令都必须采用口头传达方法，而且只传达给直接执行者；最高统帅部大本营预备队的集中和方面军的部署变更，只准在夜间进行，等等。

战役进攻发起前，华西列夫斯基与朱可夫又向斯大林提出了一项新建议：为了不使希特勒和德国统帅部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危急时刻从维亚兹马以北地区抽调部队来增援敌“南部”集团军群，苏军必须在维亚兹马以北的莫斯科中央方向发起一次迅猛的诱攻性战役，顺便也好一举吃掉一直威胁首都的尔热夫突出部地域的德军。

斯大林对此也十分感兴趣，他很快就同意了这个建议，并要求他俩中派出一人来负责这个诱攻任务。最后，朱可夫被派到了那里，因为他此前曾担任过西方方面军司令。这样，华西列夫斯基便成了南部战线斯大林格勒地域战斗的总负责人。随后，朱可夫便奉命去了西线，而华西列夫斯基则直接到了斯大林格勒前线。

由于担任此次战役突击任务的西南方面军把司令部设在了绥拉菲莫维奇市。为了方便协调指挥，总参谋部便在这里也给华西列夫斯基准备了一个协调三军（西南方面军、顿河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指挥所。

11 月 17 日，华西列夫斯基经过战前巡回检查，正准备于当天搬到自己的前线指挥所去。恰在这时，他突然又接到斯大林的电话指示，要他必须在 18 日到莫斯科讨论问题，具体什么问题没做任何透露。

第二天，华西列夫斯基如约来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和全体国防委员正在那里开会。斯大林立即接待了他，并把一封信交给他，请他仔细加以研读。说完，斯大林便回自己的办公室继续开会去了。

在一间被指定只有他一人才能进出的房间里，华西列夫斯基急忙地展开了这封信。及读毕，确实令他大吃一惊，并且很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原来，写这封信的人，正是在即将开始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担负重要突击进攻任务的机械化第 4 军军长沃利斯基。这封信是他不久前写给国防委员会的，内容是请求推迟或干脆取消马上就要进行的这次战役。这位军长在信中写道：鉴于进攻开始前敌我兵力和兵器的对比情况，拟议中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进攻不仅不会成功，而且，他认为，必定遭到带来一切严重后果的惨败。因此，作为一名忠实的共产党员，并代表参加这次进攻的其他负责干部，他请求国防委员会立即详细地检查就实施这次战役所作出的决定是否

现实，请求推迟这次战役，或者完全取消这次战役。

华西列夫斯基把这封信一连看了两遍，越看越觉得不可思议。他大大地感到惊讶，也极困惑。他对写信人虽不很熟悉，但还是了解的。最近几周，这位军长一直在参加战役的准备工作。不论对整个战役，还是交给他负责的该军任务，他一次都未表示过异议。更何况，在前不久的那次总结会议上，他还当面向大本营代表（即华西列夫斯基）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保证，他的军将坚决完成任务，并讲了自己军的充分战斗力及全体官兵的高昂士气。

斯大林要他急匆匆地赶回来，就是因为国防委员会要在这个问题上听听他的看法。一则，他认识并了解这位写信人；再者，这位军长就在他负责协调指挥的部队中，而且战役马上就要开始。当然，华西列夫斯基是不同意这封信的分析的，他当时就把这一看法告诉了斯大林和国防委员会委员们。

当时，斯大林当着华西列夫斯基的面就给沃利斯基军长挂了一个电话，在简短的谈话中，最高统帅并没有严厉地批评这位军长。然后，他对华西列夫斯基说，他的意见是还把写信人留在军里，因为后者刚刚还表示过一定完成上级交给他们军的任务。关于他是否还担任该军军长的问题，要按该军的行动结果再做最后决定。但是，关于该军及写信者本人在战役头几天的作战表现，他命令华西列夫斯基必须向他提出专门报告。

11月19日清晨，华西列夫斯基就回到谢拉菲莫维奇的指挥所里。这时，进攻已经开始了。

虽然早晨的浓雾和飞雪使突击发起时根本不能使用强击航空兵实施先期轰炸，但各方向的突击集群仍然进展较快。西南方面军的主攻突击很快就粉碎了罗马尼亚军队的防线，一天之内就向前推进了20多公里。有些集团军则挺进到了30—35公里的纵深。同样，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突击行动，也没有更多地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他们照样取得了辉煌的战果。特别是沃利斯基指挥的机械化第4军，表现得更加卓越而勇敢，他在第一天之内也率部前进了20多公里，成绩非凡。在当天晚上向最高统帅的汇报中，华西列夫斯基特别遵嘱谈到了该军的无畏行动。至此，斯大林心里才像一块石头落了地，自然，华西列夫斯基也为之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23日，按“乌兰”计划的预定时间，西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突击集群，在顿河方面军右翼的积极支援下，像两把游刃有余的利剑，巧妙而适时地实施了对卡拉奇方向的向心突击，从而完成了对斯大林格勒地域德军第6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的合围。

这是自苏德战争爆发以来德国法西斯军队所遭到的第一次大合围。

当晚，华西列夫斯基在自己的指挥所内分别给他调度下的三个方面军首长通话，讨论战役形势并拟定了下一步最适当的行动计划。随即，他又把他们的想法和建议直接报告了斯大林。其具体内容如下：

希特勒匪徒无疑会立即采取种种措施，企图在最大的外来援助下救出在斯大林格勒被合围的部队。因此，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尽速消灭被合围的敌军集团，使投入这次战役的我们自己的部队脱身出来；在解决这一主要任务之前，必须牢牢地使被合围的敌各集团军完全孤立，不得使敌军其他集团军向它靠近；为此目的，必须迅速牢固地建立对外正面，并且要有足够的快速预备队。鉴此，我三个方面军从11月24日即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来消灭被合围的敌军。

很快，最高统帅部就复电华西列夫斯基，表示同意他们的建议和下一步部署。

11月24日晨，各方面军所属部队开始按照既定部署向合围圈内的敌军发起攻势。

然而，这次攻势未达成预期目的，相反在各个方向都遭到了强大敌军集群的反冲击。

原来，根据最新的敌情分析，苏军前线总指挥机关才知道，他们从行进间消灭被合围敌军的计划所依据的对敌兵力的估计出现了严重差错：当初，他们认为敌保卢斯指挥的集群只有8.5—9万人，可是实际这时却有30万人。所差之多，实在令人为之咋舌。所以造成如此严重的误差，是因为他们没有把敌第6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在进攻和防御中补充得到的兵力算进去，也未估计到合围圈内大量的特种部队和其他辅助部队，这些部队的官兵则多数补进了作战部队。12月初，经过准备和调整，苏军又对该部敌军组织了一次分割性突击消灭的作战，但仍无显著战果，德军对合围他们的苏军对内正面仍然不断进行远不是没有活力的反冲击。

了解到这种局面后，斯大林非常着急。在12月4日的电报命令中，他批评了华西列夫斯基在最近的第二次突击进攻中的错误。命令如下：

米哈伊洛夫同志：

您的任务是要把伊凡诺夫和顿佐夫的行动联合起来。但是，在您那儿至今却仍是分散力量，而不是联合行动。伊凡诺夫不顾您的命令在2日和3日发起了进攻，而顿佐夫却没有能力发起进攻。因而敌人就获得了机动的可能。4日，顿佐夫将发起进攻，这时伊凡诺夫却又没有能力发动进攻了。于是敌人又获得了机动的可能。请你们以后不要再犯这类错误。在发布伊凡诺夫和顿佐夫联合进攻的命令之前，务必检查一下，看他们是否有能力实施这样的进攻。

瓦西里耶夫

1942年12月4日7时零6分 为保密起见，还在战役前，总参谋部便为斯大林和全部参战的苏军高级首长拟定了化名，这里的米哈伊洛夫即华西列夫斯基，伊凡诺夫即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叶廖缅科，顿佐夫即顿河方面军司令罗科索夫斯基，瓦西里耶夫即斯大林。

华西列夫斯基接到最高统帅的电令后，感到很懊悔。他知道，最高统帅所批评的这些全是确实存在的，谁让他没有去亲自检查呢？！当然，话说回来，最主要的问题还不在这里，而是我们自己的力量不够。这也说明，敌军虽已被围，但力量还是相当强大的。更何况，困兽之斗，是会更加凶猛和不遗余力的。

稍后，更严重的情况发生了。据侦察部门侦知，希特勒和德国统帅部为了给遭到合围的敌保卢斯集团和霍特集团解围，恢复他们在斯大林格勒地域的原态势，已在这个战线的东南地段建立了以德军前副总参谋长曼斯坦元帅为首的顿河集团军群，所有南线的德军，包括被合围的上述两德军集团，统一由他负责指挥。华西列夫斯基还获悉，为了实施解围战役，曼斯坦因建立起两个新的突击集团：一个在科捷利尼科沃地域，另一个在托尔莫辛地域。

华西列夫斯基立即将这一最新战局变化报告给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并提出从大本营预备队中抽调实力雄厚的马利诺夫斯基中将指挥的近卫第2集

团军和其他部队前来支援，拨归顿河方面军指挥。随后，大本营又决定成立由波波夫中将指挥的突击第5集团军，使之以最快速度在西南方面军的坦克第5集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第51集团军之间展开。按命令，该集团军归由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指挥。

到12月10日左右，曼斯坦因麾下的德军顿河集团军群已经占领了从维申斯卡亚到马内奇河的正面。在它现编成的大约30个师（不包括在合围圈内敌第6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中，有17个师横在了苏西南方面军正面；另外13个师则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突击第5集团军和第51集团军相对峙。其中仅在苏军第51集团军对面就有10个师之众的强大德军部队。这样，两军门前的敌我力量对比是相当悬殊的：德军7.6万人，坦克500辆，火炮和迫击炮340门；苏军只有3.4万人，坦克77辆，火炮和迫击炮147门。由此可见苏军第51集团军处境之艰难。

12月13日，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终于批准了华西列夫斯基的请求，决定把马利诺夫斯基的近卫第2集团军由顿河方面军划归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指挥，并决定暂时放弃原来拟议中的“土星”战役。原先，经华西列夫斯基等建议，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一部的突击进攻方向是径直向南，直取罗斯托夫地域，目的是廓清合围圈外的德军。后因德军曼斯坦因顿河集团军群建立，华西列夫斯基又建议改变该战役，而用这两部强大苏军来抗击曼斯坦因集群；待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消灭顿河中游的意大利集团军后，挥师东南，向莫罗佐夫斯克和托尔莫辛方向突击，即前出到敌曼斯坦因集团军群的后方。同时，斯大林还命令说，此后华西列夫斯基的任务便是负责解决敌曼斯坦因的解围部队，而消灭合围圈内德军保卢斯和霍特集团的任务则由新派来的大本营代表、苏军炮兵主帅沃罗诺夫负责。在工作中，沃罗诺夫应以华西列夫斯基的副手出现。

12月19日，德军曼斯坦因集团军猛攻苏军第51集团军和突击第5集团军防线，防御正面被同时撕开了几道口子。战斗是胶着状态，梅什科瓦河附近的许多居民点曾多次易手，原先白雪覆盖下的草原大地，两天后便全部化成焦土一片。

次日，苏军驰援的近卫第2集团军赶到，部队还没容全部展开，前锋就投入了钢铁大战与血肉厮杀。敌人的进攻终于被击退了，草原上布满了血肉模糊的敌人尸体。

近卫第3师在瓦西里耶夫卡与敌军的激烈交战中，虽然伤亡逾半，但终于守住了阵地。

华西列夫斯基事后回忆说：“正是这些日子里在布满峡谷的叶尔根地带的战斗，决定了斯大林格勒会战的命运。”

到12月23日，虽然曼斯坦因集群的另一路前锋部已经冲到了距被合围的保卢斯集团只有35—40公里的地域，但它却再也不能前进一步。他们确实时运不济，或者说是命运乖蹇，苏第51集团军和突击第5集团军的迅猛反突击，苏空军第8集团军令人胆寒的空中轰炸，终于给近卫第2集团军的展开赢得了不可缺少的宝贵时间。待到该集团军全部展开之后，希特勒援救保卢斯集团的计划便破产了。因为，此后不久，该集团军和其他苏军部队便在这里展开了对曼斯坦因集群的大规模反击。结果，曼斯坦因连同他的企图全都失败了。

让我们在这里摘引一段曼斯坦因元帅的自述，他在《失去的胜利》一

书中写道：

因而，现在主动权一转入敌人手中，顿河以东的正面也就快完了。12月25日，力量不断增加的敌人，攻击了梅什科瓦河地域的坦克第57军，并迫使它退到了阿尔赛河。近几天来，已经看得很清楚，敌人冀图从东西两面包围该军的翼侧……

现在，敌人由于拥有超过我们几倍的兵力，在最近几天内正在迫使坦克第4集团军再向后撤，一直退回到它在12月12日由那里发起进攻的科捷利尼科沃……12月12日开始的救援第6集团军的作战遭到了失败，起码是暂时遭到了失败。那么，在当时复杂的情况下，是否还有任何希望再做一次尝试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如今可以彻底研究“B”集团军群正面整个事态进程的条件下，看来只能是否定的。但当时谁能预料到呢？

斯大林格勒会战史诗的最后一幕，以及它那胜利的尾声，是顿河方面军在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发起的那次英勇进攻的战役。它是在整个1943年1月间准备和实施的。

负责指挥这次最后胜利作战行动的，是顿河方面军司令罗科索夫斯基和大本营代表、华西列夫斯基的副手、苏军炮兵主帅沃罗诺夫。

1月8日，苏军向保卢斯集团发出了劝降书，答应给战败者以体面的待遇，包括供给足够的口粮，治疗伤员，允许军官保留自己的武器，并保证战后使人人被遣送回国。但是，正所谓困兽犹斗，保卢斯不肯放下武器。也许，他这时还在想着战役胜利后希特勒许诺给他的高级参谋或德国统帅部长官的军职呢。

德军的所有抵抗和挣扎都变成了徒劳，特别在当前这种被困破城而又待援无望的情况下。当苏军发起进攻并逐步缩小了合围圈时，也就是战斗到第14天之后的时候，保卢斯向希特勒和德军统帅部发出了一纸报告，其中说：“溃败已经不可避免。

我请求立即允许投降，以挽救残部生命。”但是，他的请求没被批准。而没有希特勒的批准，他保卢斯也好，别的其他军官也好，谁敢投降呢？

这样，保卢斯和他麾下的将士们（这时已经不到10万人，苏军有25万之众）便不得不躲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废墟和瓦砾之中。冬日漫天的风雪也与他们作对，士兵们有的干脆放下了武器，他们用冻结的雪块艰难地积起道道雪墙。尽管如此，他们也被冻得一个个神志麻木地蜷缩在地上。至于吃的，开始还有面包，但定量是每天每人一片；15个士兵能分到1公斤土豆。而饮水的唯一来源是融化积雪。罗马尼亚骑兵师所存不多的马匹，到头来竟被他们宰食一空。再到后来，他们不得不在废墟中捕捉狗猫和乌鸦来填充肚子。

保卢斯的日子也没好到什么地步，他的唯一优越条件便是有一所潮湿不堪的地下掩蔽部。而不出10米远，就遍地都是冻硬了的德军士兵的僵尸。1月30日，他的这座值得纪念的居所外边，突然来了许多荷枪实弹的苏军士兵。于是，他成了苏军的俘虏。

两天后，整个斯大林格勒的废墟上再也听不到一息枪声了。

英勇的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了。它以苏联军队和人民的胜利而告终。去年是在莫斯科城下，而今是在斯大林格勒城内，尽管地域不同，但对希特

勒和法西斯德国军队来说，失败却是一样的。如果说还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今年比去年败得更惨，损失的人员和兵器更多。

对于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评价，从它结束的那天起，就有一些西方人——有军人、政治家、也有某些学者——表示不感兴趣，甚至有人公开说这是共产党人为了宣传而制造出来的，还有人不承认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转折点；也有些人只是把它与后来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相提并论……

到底应该怎么看呢？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在斯大林格勒会战胜利后给斯大林格勒发去过一封贺电。后来，苏联人曾把它放大复制后放在了斯大林格勒市的“伏尔加河会战纪念馆”里供人们阅览和参观。它分明地写道：

我谨以美利坚合众国人民的名义向斯大林格勒发去此
函，以表达我对它的英勇保卫者的钦佩。他们在 1942 年 9 月
13 日至 1943 年 1 月 31 日被围攻期间的勇敢精神力量和我
我牺牲精神，将永远鼓舞一切自由人民的心。他们的光荣胜
利制止了侵略的浪潮，成为盟国反侵略战争的一个转折点。
也许，他说的才较为公允。

第十章 库尔斯克大会战

将计就计设奇局，后发制人策大力；
会战全胜绝前后，库尔斯克飞旌旗。

也许是由于 1942 年夏季过于酷热和干燥，到了 1942 年冬，天气则骤然变冷，而且冷得出奇。即使在苏联南部地区，也一样被肆虐般的无情严寒笼罩。大地封冻，河流成冰。纷飞飘漫的大雪，一经怒风狂吹，不仅叫人觉得没有半点诗意，而且惟恐避之不及。

这是苏德战争以来的第二个冬天。

1942 年的除夕夜，华西列夫斯基是在斯大林格勒前线日夜不断的隆隆枪炮声中度过的。由于他成功地领导和指挥了对企图前来救援的敌曼斯坦因顿河集团军群的顽强阻击及随之而来的乘胜追击，斯大林特地在克里姆林宫乘着除夕之夜给他打来电话，向他祝贺 1943 年新年，并直接表彰了他的英勇无畏精神与卓著的功勋。同时，最高统帅还委托华西列夫斯基向在托尔莫辛方向取得反击最大纵深成功的坦克第 7 军传达他的嘉奖。自然，他是非常乐于接受和完成这类委托任务的。按性格来说，他原本是非常愿意和部队在一起的。他更热衷于指挥工作，尤其喜欢官兵间那种建立在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前提下的生活氛围。

胜利使人心情格外欢悦，最高统帅的表彰也使他感到荣耀。这天晚上，华西列夫斯基情致极佳。他信步走出了指挥所，望着满天的繁星，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这是一个美妙的夜晚，星斗盈天，皎洁的月光倾泻在冰封的草原上。身旁黝黑的房间里，总参军官和警卫战士们在吸自卷纸烟，烟头和打火机的光点时闪时现，仿佛在与这月色和星光争辉。只有远处不时传来的瑟缩稀疏

的冲锋枪声，在提醒人们，这是前线的战地，这里前不久还进行了一场残酷的战斗。

深夜，华西列夫斯基躺在简易的行军床上，仍控制不住兴奋大脑的运转。他想明天的工作、以后的战事和新的运筹，也想到了昨天、去年。是啊，去年的今夕，不正是莫斯科会战的激烈和紧张的日子吗……

元旦刚过，斯大林的新命令到了。华西列夫斯基被告知：大本营重新考虑了他的工作，认为歼灭合围圈内德军保卢斯第6集团军和霍特坦克第4集团军的任务已经指日可待，因此不准备让他继续留在斯大林格勒前线，而要他近日动身去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部。在那里，他仍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的身份，负责准备与实施计划在顿河上游地区展开的一次新的进攻战役。参加这次战役的，主要是沃罗涅日方面军、勃良斯克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组织协调这三个方面军的协同行动，保障新的进攻战役的胜利完成，则是他最近一段时间内的主要工作。

1943年2月16日，当华西列夫斯基正在顿河中游组织沃罗涅日与勃良斯克两个方面军实施哈尔科夫战役的时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授予他“苏联元帅”这一最高军阶的决定。对一个军人来说，这当然是最大最高的荣誉。华西列夫斯基当然为此感到高兴，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使他感到出乎意料。

原来，当斯大林格勒会战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最高统帅部和苏联国防委员会便已作出决定，要授予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沃罗诺夫、瓦图京、叶廖缅科、罗科索夫斯基等人以“苏沃洛夫一级勋章”。这是在苏军内部第一次为高级军事首长颁发象征统帅级别的奖章。该勋章的制作与颁发范围，实际上也是苏联国防委员会和苏军最高统帅部刚刚才决定的。由于朱可夫当时是苏军副最高统帅，所以这第001号“苏沃洛夫一级勋章”，自然就非他莫属。华西列夫斯基得到的是第002号，沃罗诺夫作为当时的第3位大本营派赴斯大林格勒地域的代表，得到了003号，余下的几枚则是参加此次胜利战役的方面军司令员们。

不久，当朱可夫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的时候，华西列夫斯基被提升为大将。

当时，斯大林便曾想过，华西列夫斯基与朱可夫一样，都是他的最得力而又最信任的助手，如果说一个是左膀或左手，那么另一个便是右臂或右手。既然如此，在晋升和荣誉方面也应该是完全一样的才好。可是，那时国防委员会中有人提出，朱可夫毕竟是副最高统帅，而且在资历方面也确实比华西列夫斯基要老些。如果不加区别，那么对朱可夫也不太公平。这样，斯大林等人也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提议。但是，他并没有忘了这件事，他的意思是错过一段时间后再为华西列夫斯基授衔。也只有这样，才算是名副其实的两相保全之策。

所有这些，华西列夫斯基并不知道，而且他确实也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朱可夫是1月18日被授“苏联元帅”衔的），为组织和实施奥斯特罗戈日斯克—罗索什战役，华西列夫斯基仍一如既往地朱可夫进行密切协调的合作，俩人仍然是最好的同事和朋友。因此，当得知这么快又授予他以“苏联元帅”军衔时，他才感到有些出乎预料。

对此，华西列夫斯基在回忆录中是这么写的：

1943年2月1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也授

予我以“苏联元帅”军衔的命令，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获得大将军衔才个把月，仅就这一点来说，这个命令也使我感到突然。老实说，我认为国防委员会、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最高统帅部对我的工作做这种评价，未免过高了一些，

从这段回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华西列夫斯基身上的那种“从不炫耀自己，从不夸耀自己的功绩”的谦逊态度与求实风格。

3天后，即2月19日，华西列夫斯基突然接到斯大林的命令，要他立即赶回莫斯科。当天，华西列夫斯基便风尘仆仆地赶回。见到斯大林后，他被告知说，大本营决定立即在莫斯科中央方向发起一次旨在消灭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主力，并把战线向西大大推进的重大战役。他的任务是，在这次战役中负责领导和协调西方方面军左翼部队以及勃良斯克方面军、中央方面军（即由原顿河方面军改称而来）沃罗涅日方面军的作战行动。

华西列夫斯基还清楚地记得，在1月底2月初，斯大林曾为此征求过他的意见，同时也与很多方面军首长商量过。但那时还只是初步酝酿，想不到这么快就要实施了。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表示服从最高统帅部的安排和调遣。他何尝不想速速进军，尽早地把自战争爆发以来就陷于敌手的大片西部领土从法西斯的蹂躏之下解放出来呢。

领受这项新使命后，华西列夫斯基又回到了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部的所在地。

2月23日，苏联红军建军25周年的节日到了。但是，由于是在前线，各部队都未搞什么大规模的庆祝活动。苏军的广大官兵只有一个心愿，这就是：以多多消灭敌人的实际行动来庆祝自己的伟大节日。

就在建军节刚刚过后，苏德战场南部战线的情况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希特勒法西斯军队正以一个新组建的集团军群向苏军发起迅猛的进攻。最先遭到德军攻击的部队正是瓦图京所部西南方面军，他们这时刚好因发动经最高统帅批准的“跃进”战役而推进到了第聂伯河附近地域。随后，由于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西南方面军开始了不得已的快速后撤。

然而，就像连锁反应一样，西南方面军右翼部队的迅速后撤给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左翼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这样，先此返回大本营参加西线进攻战役计划编制工作的华西列夫斯基又被派回了沃罗涅日方面军，以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进一步危局。

这时，时间恰在3月初。

果然，3月7日，德军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进攻。沃罗涅日方面军左翼部队经过顽强英勇的抵抗，防线还是被敌军突破了，最后也不得不向哈尔科夫退却。至3月15日，由于德军不断投入新的兵力和兵器，复由于该部沃罗涅日方面军得不到有力的援军支持，它只好放弃了哈尔科夫。到3月18日，他们又丢掉了别尔哥罗德，一直退到了库尔斯克南面的奥博扬地域。

华西列夫斯基与沃罗涅日方面军首长感到十分痛心。这刚刚被解放的大片土地再次沦入敌手，至少说明了不论是西南方面军首长还是大本营本身，都犯了低估敌人进攻能力的严重错误。好在撤退过程中，部队的领导机关未遭到敌人破坏，部队本身也没有表现出缺乏秩序的惊慌失措现象。华西列夫斯基事后说，这是他第一次在战争前线冒着敌人的炮火和追击撤退这么远的路程。“在向后退却的时候，我们边撤边这样地鼓励自己。相信不久之后，我们一定会重新解放这些地方。我们很快就会再杀回来的。”

3月19日，副最高统帅朱可夫也被派到了这里，他与华西列夫斯基及各方面军首长经过研究部署，终于在沿北顿涅茨河，而后经戈斯季谢沃—贝科夫卡—德米特里耶夫卡—红亚鲁加—克拉斯诺波里耶一线建立起了牢固的防御正面。

至此，苏军在中部库尔斯克地域附近暂时转入了战略防御，整个苏德战场在总趋势上也出现了平静的春季。在库尔斯克周围，敌我态势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向敌军突出的独特弧形地带。悬在其北面的，是处于敌人手中的奥廖尔突出部。在南面，战线大致沿着别尔哥罗德纬线延伸开，在它的西端则稍稍伸至谢夫斯克、雷尔斯科和苏密城之东。在这个巨大的弧形地带的内部及其附近，是严阵布防的苏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它共有10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2个坦克集团军和2个空军集团军的兵力和兵器。

显然，由于冬末德军的这次进攻行动，原大本营安排并准备实施的在莫斯科中央方向向西推进的进攻战役不得不被迫取消。正如俗话说，计划赶不上变化。

此后，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和总参谋部开始了新的策划运筹。其结果，就是苏联卫国战争史上那场著名的库尔斯克会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之首。后来发生的全部事件表明，这次重大战役的规模之大，双方投入兵力之多，战线之绵长，战斗之激烈及战果之巨硕，不仅有资格列入整个苏德战争之最，而且也完全可以称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各重大战役之最。在斯大林所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一书中曾有两句概括得最为精辟、也最具经典性意义的话：“如果说斯大林格勒会战预示着法西斯德国军队的没落的话，那么，库尔斯克会战则使它遭到了灭顶之灾。”当然，这些都是华西列夫斯基在当时还无法想象得到的。

3月22日，华西列夫斯基奉命回到了大本营。他的任务就是与斯大林、朱可夫具体策划这次新的战役举措。就是在这时，华西列夫斯基把自己最欣赏的得力助手、副总参谋长兼总参作战部长安东诺夫中将介绍给了斯大林，就像当年他对之特别敬重的前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第一次带他去克里姆林宫见斯大林那样。此间，安东诺夫也积极地参与了对库尔斯克会战的筹划工作。

当时，大本营和总参谋部先对库尔斯克弧形地带的各方面指挥机关做了调整。

根据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的建议，瓦图京被任命为至关重要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取代瓦图京成为西南方面军司令，原第57集团军司令托尔布欣被提升为南方方面军司令，以接替马利诺夫斯基。随后，所有大本营预备队现有的阵容强大的9个集团军（后增至10个），被改编成了草原方面军（起初曾叫草原军区），战功显赫的波波夫中将被任命为该方面军司令，总参谋长是资深的扎哈罗夫中将。

上述所有苏军部队全被部署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的防御前沿和纵深地区。它们的任务便是严阵以待大本营和总参谋部的决策及最高统帅部最终交付执行的命令。

战役的运筹策划正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总参谋部当然十分清楚：目前所以出现春季的特殊平静，显然德国统帅部也在做着迎接下一步战事的准备和策划工作。

这样，对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及其办事机构总参谋部来说，最主要的当

前任务就是，必须决定好苏军所采取的战略是进攻还是防御。根据华西列夫斯基和安东诺夫掌握的情报，以及他们与前线各方面军首长沟通联络，总参谋部向斯大林和大本营提出了倾向于组织按计划防御的主张。显见，这是个“后发制人”的战略主张。它的目的是先让敌人发起进攻，然后在有计划的积极防御中尽可能地疲惫敌军，待这一目的达到后再一举反攻，最终彻底消灭敌人于防线以外的广大地域。

从3月底到4月初，华西列夫斯基带着这个初步方案在国防委员会和大本营讨论了多次。他整天奔波于国防委员会一大本营一总参谋部之间，详细地审听每个参与讨论和决策的人的各种意见。在这些意见中，有的同意总参谋部关于组织有计划防御的主张，有的则认为应该先敌发起进攻，通过强大的突击进攻来直接消灭敌人。

对所有这些意见，斯大林当时只是听，并未作出明确支持哪一方的表态。

与此同时，华西列夫斯基还用电话与正在沃罗涅日方面军前线的副最高统帅朱可夫就这一问题做了广泛的讨论。4月8日，朱可夫向最高统帅斯大林提交了一份详细的分析报告。该报告对敌军近期活动做了有根据的判断，其中也叙述了他对库尔斯克弧形地带行动计划的一些设想。

朱可夫在报告中写道：

敌人由于预备队数量有限，1943年春季和夏初将不得不在较狭窄的正面上展开进攻，并严格分段完成任务，会战的基本目标是夺占莫斯科。

根据当前敌在我中央、沃罗涅日和西南方面军当面的部署情况，我认为，敌人将对这3个方面军实施主要进攻战役，以便粉碎该方向上的我军，获得沿最近道路迂回莫斯科的机动自由……

我认为，我军为了先敌行动而于最近即转入进攻是不妥当的。最好等到我在防御中消耗疲惫了敌人并打掉敌人的坦克后，再投入新锐预备队，转入全面进攻，以彻底粉碎敌人的主要集团。

当斯大林收到朱可夫的这份报告时，华西列夫斯基也正好在他那里。斯大林把报告读了一遍，然后把它递给了华西列夫斯基，说：“你看，朱可夫同志的意见也是这样。看来，你们总参的主张又多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呀！”华西列夫斯基接过报告，也仔细地看起来。看完后，他又递给斯大林，什么也没说。还需说什么呢？

“尽管如此，”斯大林说话了。他一边瞅着华西列夫斯基，一边继续遭，“我认为还应该与各方面军司令再商量一下为好，然后我们再召开一次特别会议，根据各方面所有的意见，进一步讨论一下1943年夏季战局计划。”他又嘱咐说，“先不要急于编制它，谨慎为妙。”

华西列夫斯基感到，经过斯大林格勒会战后德军早春的那次突然进攻后，最高统帅开始变得比较谨慎了。也许，这就是教训直接带给他的益处。

稍后，华西列夫斯基逐个打电话给各方面军司令部，要求各位高级首长再重新考虑一下敌情和我军的计划，并务必在4月12日前将明确意见报告给总参谋部。对于瓦图京和罗科索夫斯基，他还亲自打电话对他们做了侧重交代。未久，各方面军司令们的报告都送上来了，其中多数都同意总参谋

部或朱可夫的意见。4月10日，华西列夫斯基飞到了朱可夫所在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部。在这里，他俩再次详细地讨论了这次行动方案及关于战役战略预备队部署的意见。他们还就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配置问题拟定了一道训令草案，以便届时一并呈送最高统帅过目。关于对即将展开的这次大规模作战行动，他们一致认为必须坚持原先那种“后发制人”的战略。

4月12日，华西列夫斯基与前一天晚上回到莫斯科的朱可夫及他的助手安东诺夫在一起工作了整整一天。从大清早开始，他们便分头准备各种必要的资料，以便当晚到斯大林那里去汇报。当华西列夫斯基与朱可夫还在拟制向最高统帅汇报的计划时，干练的安东诺夫便已经准备好了情况图及各方面军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作战的行动计划图。俩人对安东诺夫的工作极为满意，尤其对他在编写和绘制材料方面的惊人能力大为钦服。

当天傍晚，3人如约来到最高统帅部斯大林的办公室。原来，这次大本营特别会议的出席者只有他们4人，即正副最高统帅和正副总参谋长。起初，听了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的汇报后，斯大林虽然表示同意在库尔斯克突出的那块弧形地带组织苏军主力展开防御作战态势，但仍对莫斯科方向放心不下，他担心前线部队和后边的梯次纵深预备队能否真正经得住德军强大坦克集群的攻击。后经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俩人解释说明，他才终于下了决心。他们一致认为，现下的苏军各部队已经不是1941年战争爆发之初那样不堪一击了；相反，它已有了精锐的装备和出色的技术兵器，尤其两年来的不断作战也使它的指挥者获得了极其丰富的战斗经验。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法西斯希特勒已经开始惧怕强大的苏联了。

会议最后决定；苏军主要力量应该集中在库尔斯克以北和以南，并在这里用积极的防御战拖垮敌人，而后转入反攻并予以歼灭。更下一步的计划是苏军发起总攻击，同时在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和基辅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将敌军彻底逐出西南广大地域。此外，会上还同时决定了另一个行动方案：如果德国统帅部近期不在库尔斯克附近发动进攻或长时期地拖延进攻时间，那么苏军就转而采取积极行动。

为了使这次作战行动更加稳妥可靠，在华西列夫斯基和安东诺夫主持总参谋部具体制定行动计划的同时，斯大林还指示国防委员会发动各方力量，在依梯次纵深配置的草原方面军（即总预备队）的后面，部署了一条名叫“国家防御地区”的牢固的筑垒线。这里，除了置放大量的反坦克障碍物和雷场外，还部署了许多正规野战部队和地方兵团。这样，原来斯大林曾经一度为之担心的莫斯科方向，就可以说是万无一失了。此外，国防委员会还会同大本营、总参谋部等有关部门向库尔斯克地域进行了整个战争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物资器材和部队的集中，组织了专门的空中战役以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和制空权，加强了游击队的活动以组织大规模的敌后破坏及收集重要情报，等等。

为了保密起见，从1943年5月15日到1944年6月1日，苏军高级领导人和方面军司令级的高级指挥人员的化名又做了新的变更。

在整个战役的准备过程中，华西列夫斯基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前线各部队中度过的。5月中旬，由于斯大林的指示，总参谋部又制定了一个名为“库图佐夫”的进攻性战役计划。它是为整个库尔斯克会战服务的，其任务是在会战进入反攻阶段前先行出击，以消灭战线西端的德军奥廖尔集团军，并相机夺取该城。参加这个战役的部队是勃良斯克方面军和中央、西方

两方面军各一部。随后，华西列夫斯基就为布置这次战役去了勃良斯克方面军驻地。在这里，他视察了各参战部队，并与该方面军司令波波夫一道逐个检查了各集团军的前沿防御情况。

6月10日，华西列夫斯基被召回莫斯科。根据大本营的指示，他最后被派到了沃罗涅日方面军。其任务是负责协调沃罗涅日和西南两个方面军的战役作战行动。与此相适应，朱可夫则被委派为负责中央、西方和勃良斯克3个方面军的作战协调工作。

整个战役的协调者是最高统帅斯大林。

至此，苏军的一切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但是，德军究竟何时进攻呢？这个问题在当时还险些引出其他不必要的麻烦，甚至斯大林本人和有些方面军司令竟要求改变原来总的战役行动计划！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苏方情报部门和苏军侦察机关的有力工作，当敌人第一次想在5月10—12日发起进攻时，苏方就获得了可靠的情报。于是，总参谋部把作战警报和命令传了下去，要求各部队严阵以待，随时做好规定时间内的御敌准备。结果时间过去了，德军并没有发动进攻。是不是情报错了？不是。后来经过查实，原来是敌军因尚未准备就绪而变更了进攻日期。这样，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瓦图京便提出要先敌进攻，其军事委员赫鲁晓夫也把这看成是敌人犹豫不定，因此支持司令员的想法。只是由于当时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及安东诺夫的坚决反对，他们才放弃了自己的打算。

过了10天，即5月19日，总参谋部收到了新的情报说，敌人定于5月19日至26日发起进攻。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长安东诺夫认为这个情报确实可靠，便电请斯大林并拟定了新的警报和命令，斯大林批准后于5月20日凌晨又发至各作战部队。结果同第一次一样，敌人又未在这个时间发动进攻。接着，便是漫长的等待。此间，华西列夫斯基正好在前线，如前所述，先是西方方向的勃良斯克方面军，后来又到了沃罗涅日方面军，经过视察部队和到前沿观察，他得出结论认为，最近数日内敌不能发动进攻。与此同时，在中央方面军的朱可夫和该方面军司令罗科索夫斯基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夏季的6月来临后，考虑到以往德国统帅部常常是将其进攻行动安排在夜短日长开始的这个时间内，那么今年还会不会这样呢？到了6月中旬，苏军通过不间断的军事观察，再加上各种侦察方式得到的情报，已经确切地获悉德军已经作好了充分的进攻准备，但不知何故进攻并未开始。就是这个“不知何故”，使苏方非常不安，甚至一些人早就失去了镇定。华西列夫斯基通过每日与斯大林的汇报和联络，也明显地感到了最高统帅的烦躁心态，至于瓦图京和赫鲁晓夫等方面军首长，更是要求他改变既定的战役计划。也许，他们也有自己的理由，计划中不是也有第二套方案吗？

但是，华西列夫斯基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先敌进攻则只是对敌人有利，要改变“先防御，后进攻”的方案实在不足为取。其实，他也在心里打鼓。可见，在那时，谁能依然坐而不乱呢？一次，瓦图京竟激动地当着他大叫起来：“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咱们会睡过头的，会错过机会的！敌人明摆着是不想进攻。秋天转眼就到，咱们的一切计划和准备就都落空了。别再坐等了，还是主动进攻吧！”

我们的力量是足够的，真不知道你为什么还要等！”再后来，瓦图京直接给斯大林打电话，申述自己的理由。斯大林也动摇了，他通过电话告诉华

西列夫斯基说，他认为瓦图京的这个建议应该得到最认真的关注，并说他已命令瓦图京按自己的设想提出报告给大本营。他还指示华西列夫斯基必须帮助瓦图京，而且让他找马利诺夫斯基，请后者也研究一下自己的下一步行动。

当时，斯大林还说，他想请朱可夫及中央方面军的首长也来谈谈看法，以便研究该方面军的行动问题，并要求华西列夫斯基必须在6月22日以前赶回莫斯科。华西列夫斯基说：“您的指示将会被执行，这一点绝对不会有问题。但我仍认为敌人先进攻对我们有利得多，而且，根据一切情报判断，敌人的进攻即将开始。”后来，在莫斯科他见到了朱可夫，后者说最高统帅尚未与他谈过这个问题。这样，他放了点心。到这时，他俩仍坚持不必先敌进攻，而且深信“敌人将在最近一周内首先实施突击”。

7月2日凌晨，总参谋部终于接到关于敌人转入进攻的最新情报。情报说，在最近几天，至迟不超过7月6日，敌人将在库尔斯克方向开始进攻。那么，这次准不准呢？不过，说来也属奇巧，正好近几天苏军歼击机击落了敌军的一架侦察机，飞行员受伤未死。经立即审讯，被俘之敌飞行员供称：德军转入反攻的日期原定在6月，后又延及7月初。这样，总参谋部得到的情报刚好得到了印证。

听过汇报后，华西列夫斯基即向斯大林做了报告，并请准立即通知各前线方面军首长。随后，安东诺夫帮他拟好了给各部队的训令草稿，他紧接着又用电话向斯大林读了这份警告电报。斯大林听后，未做任何改动便命令他抄送有关人员后立即发出。电文如下：

据现有情报，德军可能在7月3—6日在我战线转入进攻。

最高统帅部命令：

1. 加强对敌侦察和观察，以及时查明其意图。
2. 各部队和航空兵应做好准备抗击敌可能的突击。
3. 已下达之各项命令请即上报。

发出了这项命令之后，华西列夫斯基当天就赶回他应该驻在的工作地——沃罗涅日方面军。晚上，他到了瓦图京的指挥所。

7月3日，战线仍极为平静。第二天的中午过后，还是没有任何情况。华西列夫斯基和沃罗涅日方面军首长处在焦急的等待之中。大家彼此也不多说话，只是都不期然地盯着指挥所里的几部电话机：万一又有什么新消息呢？突然，16时，前沿防御阵地传来报告，大约有4个营的德军在20辆坦克和10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冲向我防御线，估计是前沿火力侦察，但很快就被击退。据战斗中被俘的步兵第168师的一名士兵供认，他们每人分到了一份干粮和伏特加酒，为的是明日拂晓转入突击。

不久，这名俘虏被送到了司令部，华西列夫斯基与瓦图京又审了一遍，说法依旧。于是，华西列夫斯基立即把这一最新事态报告了斯大林和在中央方面军的朱可夫。当即，总参谋部又把这一情况转告所有的前线各参战部队及梯次配置在纵深的预备队。

7月5日凌晨2时30分，沃罗涅日方面军实施了炮火和航空兵的反准备。霎时，周围的大地在颤抖，隆隆的炮声，飞机马达的轰鸣声，各种炸弹的爆炸声，全都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可怕疾人的黑色“交响曲”。深夜的宁静完全消失了。

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大会战就这样展开了。

本来，苏军是防御性作战战略，但这提前的反准备的炮火和航空轰炸机的俯冲轰炸，却使很多德国前沿阵地上的指挥官以为是苏军要向他们进攻了。苏军的炮火反准备先行摧毁了敌人准备好用来进攻的炮兵火力配备，打乱了德军前沿部队的指挥系统。一时间，通讯联系中断，有些德军中下级军官干脆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

与此同时，一些隐蔽待动的坦克集群和预先停留在机场上的轰炸机编队，也遭到了相当的破坏和损失。

后来，华西列夫斯基从交战观察及俘虏口供中得知，不论在中央方面军还是沃罗涅日方面军，苏军的炮兵火力反准备和航空兵轰炸行动都略嫌早了一些。倘若再晚 30—40 分钟，那么效果可能会更好。因为，当时的德军士兵还大多躺在掩体、隐蔽部和深度堑壕工事里，也就是说，大多数团队还都未开始进攻前的集结。苏军的反准备是在夜间，即拂晓前苍茫漆黑的夜晚开始的，事先对前沿敌军集结地域及火力配置点等没有较准确的情报，这也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它的直接命中和效果。

清晨 6 时许，德军的坦克集群在震耳欲聋的发动机轰鸣声中疯狂地冲了过来，后边紧跟着的是重新编组的大量步兵师。德军的航空兵也出动了，没有被破坏的近程炮火也在稍早的时候向苏军防御阵地开始猛烈轰击。整个双方前沿地区成了火海一片，漆黑的夜晚顿时化作了白昼。

显然，敌军推迟进攻是由于苏军强大的火力反准备而造成的。但是，混乱一时的部队立即得到了重新组织。当他们从指挥机关得知苏军并不是突击进攻时，他们便按既定计划开始了进攻。

德军的进攻突击方向也未改变，一个是在苏军中央方面军防御阵地正面的奥廖尔以南地域，另一个在苏军沃罗涅日方面军防御正面的别尔哥罗德地域。按照 4 月 15 日希特勒下达的“堡垒”战役计划命令，德军将从该两地域发起强大集团突击，以集中进攻的方法合围处于库尔斯克地域的苏军并将其消灭在这一广大作战空间之内。

当时，德国统帅部也深知，在双方兵力对比上他们并不占有优势，因此必须在有限地域内实施密集的集中突击。此外，他们自恃优越于苏军的一点，便是大量投入了古德里安总监指导下生产的新式“虎”、“豹”两型坦克，以及经过改装变得威力巨大的“斐迪南”式强击火炮。在他们看来，苏军的任何坦克和火炮都不能与之匹敌。

希特勒在命令中曾说：“这次进攻具有决定性意义，它应迅速完成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次进攻应使我们得以掌握今年春夏两季的主动权……在主要突击方向上，应当使用精锐的兵团、最好的武器、有才干的指挥员和大量的弹药。每个指挥员、每个列兵，都必须深刻理解这次进攻的决定性意义。库尔斯克地区的胜利应当成为照耀全世界的火炮。”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希特勒法西斯这次是要孤注一掷。

他显然并不甘心前两个冬天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的惨败。

然而，在突击的第一天，德国军队便在两个既定的进攻方向上遭到了苏军英勇顽强的抵抗。在奥廖尔方向上，虽然已经投入 3 个坦克师和 5 个步兵师，但整个白天的 5 次突击进攻全被打退。只是到了傍晚，德军通过再次投入兵力和兵器，才勉强（才契）入中央方面军防御阵地。即使这样，最大的纵深也只有 6 公里，更多的是 2—3 公里，而有些地方则根本无法突入，激烈的交战始终在双方的前沿附近展开。到 7 月 12 日，这里的敌人再也无

力进攻了。于是，中央方面军、西方方面军和勃良斯克方面军先后转入反攻，特别是预定参加“库图佐夫”战役的苏军，很快便一举攻下了既定战略目标奥廖尔城，剩下的任务则是大规模全线出击，全力掩杀和追击敌人，并在行进中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在华西列夫斯基所在的沃罗涅日方面军防御正面，德军的突击坦克集群威力巨大，几乎每个小的突击地域上都有 150 辆以上。两军一接火，便见两股钢铁洪流绞在一起，浓烟滚滚，火光盈天，爆炸声在数十公里以外的地方仍然令人心惊胆战。在这里，德军先后投入了强大的坦克第 3 军、第 48 军、党卫军坦克第 2 军、第 52 军及“劳斯”军一部等近 5 个军的兵力，而沃罗涅日方面军则只有近卫第 6、第 7 两个集团军部队。尽管如此，第一天的战斗表明，德军的模人企图并未得逞。

次日，敌军又投入了新的预备兵力和兵器，双方在奥博扬方向上展开了空前的坦克战。华西列夫斯基与方面军首长决定，必须使坦克军、集团军加入该地区作战，并使前沿部队后撤至敌军火力较弱的第二防线前端，然后由后撤部队和第二防御阵地上的各集团军同时阻击敌人的疯狂进攻。仅 7 月 6 日一天，德军就在这里损失了 200 多辆坦克、100 多架作战飞机和数万名士兵。在后来的两天内，虽然德军楔入了前沿防御阵地，但又付出了损失 200 多辆坦克的沉重代价。

7 月 9 日到 13 日，华西列夫斯基一直都在第 18 和坦克第 29 两个集团军的战斗前线。

几天来，敌人加强了对这两个集团军正面的攻势。近卫第 6 集团军的正面也连连遭到敌军的猛烈突击。看来，敌军是要在奥博扬和普罗霍罗夫卡这两个突破口大举（钳）入。12 日，双方的 400 多辆坦克和 380 多架作战飞机及大量的地面作战部队，在这两个地区展开了空前激烈的绞杀，整个天空和地面爆炸声不绝于耳。敌军受到重创，但仍没有放弃进攻的迹象。坦克第 29 集团军和第 18 军的坦克也大半失去了战斗能力，华西列夫斯基不得不先后向这里调入近卫坦克第 5 集团军、诸兵种合成第 5 集团军等预备队，随后又相继补充了摩托化第 32 旅和 4 个反坦克歼击炮团。德军的进攻被暂时打退，但危险依然存在。

此间，奉大本营命令，朱可夫从北部前线赶来这里，他的任务是与华西列夫斯基一道负责协调沃罗涅日、草原、西南 3 个方面军的实施反攻准备工作。13 日晚，朱可夫在西南方面军第 69 集团军指挥所内找到了华西列夫斯基。经请示最高统帅，他们共同决定：增派草原方面军的更多预备队直接到前敌一线，立即发起斯大林早已急不可待的反击行动。一旦反击成功，所有各方面军作战部队必须紧跟退却的敌人，夺取原来他们的突击出发地——别尔哥罗德地域。然后，经过短时间准备，所有方面军的全部兵力则投入对敌人决定性的反攻。

在以后的 3 天里，所有各部队的正面全都是激烈的血战。苏军士兵不顾身旁数以百计的坦克和自行火炮在燃烧，奋不顾身地冲向敌人。这样，坦克大战之后的肉搏冲击开始了。战场上喊杀声响成一片，这巨大的吼声听起来竟毫不亚于钢铁的撞击声和上空炮弹的飞啸声。很快，德军支持不住了，后方逐渐转入防御，只有前线部队还在拼死顽抗。到 7 月 16 日，德军完全丧失了冲击能力，后勤部队已经开始向别尔哥罗德以后的地区撤退。17 日傍晚时分，敌军前线的作战部队也开始后撤。

至此，西南战线上的防御作战阶段也宣告结束。而在 7 月 12 日，西部战线上的中央方面军已先期完成了防御任务。

从 8 月 3 日起，在西南方面军的配合下，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也开始转入经过准备之后的大举进攻。这就是很多史书或回忆性资料中所说的库尔斯克会战的第二阶段——“鲁勉采夫”战役。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据什捷缅科（当时他系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负责协助华西列夫斯基和安东诺夫的工作）在他的权威性著作《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一书中介绍，当时总参谋部也好，最高统帅大本营也好，都没有在先期的作战计划中拟定该次战役。实际上，它是根据各方面军上报各自的进攻计划，最后由最高统帅部核实批准的。参加这项工作的除了各方面军首长外，还应该有斯大林、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

这次战役也分为两个阶段。开始，预定任务是击溃哈尔科夫以北、以东和以南的德军，即刚从别尔哥罗德地域退下来的那部分敌人，此为第一阶段。在而后的第二阶段上，主要任务是攻占并解放哈尔科夫，歼灭或击溃那里的德军精锐部队，从而在事实上结束整个库尔斯克会战。当时，该战役已变为主要作战行动，因此要求苏军在其他方向上的行动都须与之配合，适应它的需要。

按后来晚些时候才发布的（8 月 6 日）大本营训令，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负责领导和协调参战的各方面军部队共同实施这一战役。初步分工的结果是，朱可夫负责北面地段的沃罗涅日和草原两个方面军的行动，华西列夫斯基则负责南面地段的西南和南方两个方面军的行动。此外，华西列夫斯基还须负责协调西南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攻打哈尔科夫的行动。

到 8 月 7 日，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坦克第 1 集团军和近卫第 6 集团军的先锋部队就已攻占了博戈杜霍夫。11 日，坦克第 1 集团军的强大钢铁洪流已经滚过了哈尔科夫—波尔塔瓦铁路。此后，该方面军在追击溃退的德军第 4 集团军时，遇到了前来救援的德军“南部”集团军群由全部预备队拼成的一支强大部队的反突击性拦截。由于苏坦克第 1 集团军和近卫第 6 集团军已经长途奔袭，并在力量上也受到相当削弱，被迫撤出追击方向。到 16 日，苏近卫第 5 坦克集团军立即前来填补这一真空，一方面使上述两集团军撤到有利地区，另一方面止住德军预备队部队继续向北突击。

与此同时，科涅夫领导的草原方面军则开始逐步逼近哈尔科夫，大规模的激战在近郊展开。在争夺波列沃耶地域“二一〇·七高地”的战斗中，双方曾经使之数度易手。最后，苏第 53 集团军第 299 师某连占领了这一高地。在最后一次与德军争夺中，战斗已经发展到空前白热化的程度。当时，德军的炮火几乎轰平了这一高地。

守卫在这里的彼得里谢夫上尉在全连只剩下 7 个人的情况下，仍然保住了这块阵地。

战后，彼得里谢夫和另外两名战士分别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其他 4 人也全部得到嘉奖和勋章。到 8 月 22 日，草原方面军各部队在哈尔科夫近郊的进攻连连得手，该城眼看指日可下。德军守城部队见势不妙，赶忙慌乱中逃离而去。这样，23 日，草原方面军第 53 集团军便兵不血刃地开进了哈尔科夫。

哈尔科夫是乌克兰地区的第二大城市。它是苏军在战争中第一次从敌

人手中夺回的第一个大城市。为此，当天 21 时，首都莫斯科以 224 门礼炮齐鸣 20 响为之庆祝。

至此，库尔斯克会战全部结束。

通过这次大会战，苏军使法西斯德国军队遭受到了永远不能恢复元气的惨败。

希特勒的所谓“堡垒”进攻战役计划规定的目标不但一个也没实现，反而被歼灭了 30 个精锐师（其中有 7 个坦克师），总计兵力 50 多万人，坦克 1500 多辆，作战飞机 3500 多架，火炮 3000 余门。这些惨重损失，使德军在整个苏德战场上完全转入了战略防御。对此，前西德历史学家 B·格利茨曾经评论说：“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大会战对于德军是致命危机的开端。”

经过从 1943 年初到 8 月底的战争考验，特别是 7—8 月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与敌军的斗智斗勇，华西列夫斯基的自信心大增。他一开始提出并一再坚持的对 1943 年夏战计划的设想，被战争的结果证明是正确的。因此，他自豪地写道：“我们学会了猜测敌人的意图。我们有钢铁的意志和坚毅的性格、自制力和沉着精神。这就使我们足以避免犯错误，避免过早地开始战斗行动，避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总之，我们的统帅艺术显示出了创造性。”

第十一章 第聂伯河侧耳听

乘胜反击气势雄，德寇闻风心胆惊；

大军越过顿巴斯，第聂伯河侧耳听。

正当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方向的“鲁缅采夫”战役激烈进行之时，华西列夫斯基在前线接到了 1943 年 8 月 6 日最高统帅部下达的大本营训令。训令要求西南方面军立即向南实施主要突击，与南方方面军采取协同动作，争取一举消灭敌军顿巴斯集团，并攻占戈尔洛夫卡和斯大林诺（顿涅茨克）。南方方面军的主要任务是对斯大林诺实施突击，并在那里同西南方面军突击集团会师。进攻的准备应在 8 月 13—14 日完成。华西列夫斯基的任务是负责领导和协调该两方面军之间的行动，并将它们的行动计划上报大本营审批。

华西列夫斯基清楚，最高统帅部的决策是来自于早些时候他与朱可夫的建议。

在库尔斯克会战进入反攻阶段以后，他们根据整个战场态势呈现出来的日益明显的趋势，以及他们对各自负责的沃罗涅日、草原方面军和西南、南方方面军的调查研究，曾向最高统帅部提出了在整个南部战线向西推进、解放祖国南方工业重镇顿巴斯、进而把敌人赶过第聂伯河的战略主张。当然，实施这一战略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必须消灭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一线的德国侵略者。

现在，最高统帅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华西列夫斯基感到充满信心。他一方面协调西南方面军，使之尽快完成前一段大本营指示的帮助草原方面军攻克哈尔科夫的任务；另一方面，则不间断地奔波于马利诺夫斯基和托尔布欣两个方面军司令部，以便共同研究制定出大本营训令要求的下一步作战计

划。

8月8日，华西列夫斯基经与两位方面军司令反复讨论并最后决定：西南方面军将利用以前夺取的北顿涅茨河西岸的登陆场作为出发地，在伊久姆市以南经巴尔文科沃对洛佐瓦亚、巴夫洛格勒和锡涅尔尼科沃实施主要突击。在与南方方面军主力共同实施向心突击的同时，应迅速切断敌顿巴斯集团军向西及向第聂伯河下游撤退的道路。参加作战的部队将有什列明中将的第6集团军、达尼洛夫少将的第12集团军、崔可夫中将的近卫第8集团军、坦克第23军、近卫机械化第1军和近卫骑兵第1军，以及空军第17集团军。南方方面军的任务是突破德军经过长时间建立起来的所谓“米乌斯防线”。具体部署计划是：由茨维塔耶夫中将的突击第5集团军和扎哈罗夫的近卫第2集团军担任主攻，他们将在一个极狭窄的地段实施大密度火力突破，而后继续对沃尔诺瓦哈和波洛基发展进攻，穿过当年马赫诺匪帮猖獗活动的草原地区。与此同时，克列伊泽尔中将的第51集团军应突破涅日诺耶、伊洛瓦伊斯克和斯大林诺北面的毗连地段，最后与西南方面军在那里胜利会合。

经最高统帅部批准后，8月10日，他们根据大本营的指示作出了决定：西南方面军应在16日晨发起突击，南方方面军因兵力较弱则于18日行动。

8月12日凌晨，华西列夫斯基收到大本营发给他和朱可夫的训令，内容是他们已经知道的南线各方面军的作战任务。训令要求：沃罗涅日方面军在截断敌哈尔科夫集团的退路后，立即在克列缅楚格附近强渡第聂伯河。草原方面军在攻克哈尔科夫后还应攻占克拉斯诺格勒，继而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北地域强渡第聂伯河。

西南方面军应迅速向第聂伯河推进，进抵扎波罗热地区，从而切断敌顿巴斯集团的退路。南方方面军的主要任务是突破德军“米乌斯防线”，进而占领第聂伯河下游广大地域。

为了组织西南方面军对草原方面军攻取哈尔科夫的协同作战，还在进攻未发起前，华西列夫斯基就来到西南方面军的右翼集团。在此，他先后视察了已经拨给草原方面军的第57集团军和其他前线部队。在一个坦克师，华西列夫斯基还亲自钻进了一辆T-34型坦克。他坐在乘员的位置上，请指挥员给他讲解如何发射炮弹和使用连射机枪等操作规程。全战车的12名指战员看到总参谋长坐在他们的坦克上，纷纷要求与他照张合影作为纪念，可遗憾的是当时没有找到照像机。最后，华西列夫斯基说：“这样吧，等到我们把法西斯彻底打败后，我一定请你们到我家去做客。如果你们谁立下了战功，我还可以负责给他提供一个与最高统帅斯大林同志会面的机会。”

8月16日，西南方面军右翼突击集团如期展开了进攻。从一开始，战斗就十分激烈。华西列夫斯基在作战观察所里目睹成批的炮弹落在了敌人的堑壕上，烟尘滚滚，炸得连地上的泥土都直竖起来了，这边一片一片的泥土还没有落下，那边的又一片一片地被掀起来。到中午，强大的敌人抵抗出现了。有些地段上敌人还发起了反冲击，德军航空强击机也成批地向突击集团猛轰猛射。到傍晚，西南方面军虽然有些部队渗透入了敌军防御，但是最终没能突破成功。双方的伤亡都很大，整个战场上尸体成片。在一些胶着地带，干脆已经很难辨认出究竟是敌人还是自己人了。

原来，8月12日，德国统帅部发布了希特勒的第10号命令。命令要求他们那些经过库尔斯克附近苏军打击、业已精疲力竭而又无心恋战的部队，立即在第聂伯河以西地域筑起“东方壁垒”线，用以阻挡苏军乘势的追击作

战。该防线有一部分与“米乌斯防线”并行，整个前沿和纵深都筑有土木或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工事。它从纳瓦尔、普斯科夫、维捷布斯克、澳尔河以东沿索日河到戈梅利、第聂伯河中游直到梅利波托和亚速海岸，其中第聂伯河一段是最主要部分。在这里担任阻击任务的是马肯森上将的坦克第1集团军和霍利特上将的野战第6集团军，总兵力约有22个师。

马肯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名将奥古斯特·马肯森元帅之后，他不仅在作战中表现得“积极突出”，而且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盗贼：1943年冬他曾疯狂地掠夺了撤退到皮亚季戈斯克的罗斯托夫造型艺术博物馆，许多伟大艺术家的作品都被他攫为己有。至于霍利特，他的集团军曾在1942年冬斯大林格勒会战中参加解救保卢斯集团的外围作战，并成为华西列夫斯基手下败将。

现在，由于希特勒对他们下了死命令，这两个集团军便在第聂伯河左岸一字布开阵势，先是在北部的阿赫特尔卡地域猛烈地抵御沃罗涅日方面军的追击进攻，在哈尔科夫外围阻击草原方面军的突击，现在又在这里对西南方面军的进攻展开了顽强的抵抗。德军“南方”集团军群不断地给他们补充新的预备队和大量的技术兵器。

苏军在上述各个地域的受阻遭挫，使斯大林极为恼火。在他发给朱可夫、瓦图京和华西列夫斯基的一系列电报命令中，不断地对这些前线高级指挥首长和责任人发脾气，或指责他们的战术有问题，或规定他们的破敌期限，有时连工作程序方面的问题也不放过。这次，又轮到华西列夫斯基“倒霉”，这还是很厉害的一次。

按最高统帅部的规定，每位被派赴前线的大本营代表必须每天定时向最高统帅部或斯大林本人递交当天的战场情况报告，或者直接打电话汇报。8月16日，由于战事不顺利，前线事务繁杂无序，华西列夫斯基的当日报告耽搁了几个小时，以至斯大林没有在这天夜里24时前收到这份报告。这下，斯大林把所有不快都发到他身上。8月17日清晨，正在第46集团军指挥所里工作的华西列夫斯基突然收到了斯大林发给他个人专收的文件。文件上写道：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

现在已是8月17日3点30分，而您却还没有给大本营
送来8月16日战役总结及您对情况判断的报告。我早已要求
您作为大本营的全权代表，必须在战役每日终时给大本营送
来专门报告。您几乎每次都忘了自己的这一职责，没有给大
本营送来报告。

8月及6日是西南方面军（您就是大本营派到那里去的全
权代表）实施重大战役的第一天。这次您又忘记了自己对大
本营所负的责任，没有给大本营送来报告。

我最后一次警告您，如果您再次忘记对大本营的责任，您
将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并被从前线召回。

斯大林

读过电报之后，华西列夫斯基大感震动，以致一时惊骇不已。他不由暗暗地自忖起来：自从成为职业军人那天起，特别是加入工农红军这支党所领导的伟大军队以来，自己还从未受过一次哪怕是轻微的批评或指责。没有，的确没有过。他又联想到供职总参谋部以来，特别是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至

今的无数个日日夜夜。自己几乎每天都要与最高统帅联系，有时一天中竟三四次之多。他所感受到的一直都是最高统帅对自己的关怀，甚至有时还是超过自己所应得的过分关怀。为此，他始终心存感激，虽然很多人都说作为领袖和最高统帅的斯大林性格乖戾，但他并不相信这是自己所敬爱和钦仰的这个人的本性。那么，现在是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想着想着，华西列夫斯基开始从自己这里找原因。是的，他的过错在于在格拉戈列夫的第46集团军的时间太长了，以至确实把例行报告耽搁了几个小时。但是，华西列夫斯基还是不放心，他要问个究竟。

回到南方方面军指挥所后，华西列夫斯基立即给他在总参谋部的副手安东诺夫打了电话。在电话中，他感到安东诺夫也正为这件不愉快的事情不安呢。后者只能不断安慰他，并说事情已经过去。他并说，他刚才又收到斯大林的指示，要他不要向任何人说起那封电报的事情，电报副本也由他一个人来保存，等等。

关于事情的始末，安东诺夫介绍说，由于沃罗涅日、草原和西南各方面军的进攻与展开局势都相当不好，很使最高统帅焦虑不安。当未按时收到华西列夫斯基的战地报告时，斯大林曾用电话与他联系，但未能接通。这也使他很生气，于是便向安东诺夫口授了那份电报，并指示他必须立即给华西列夫斯基本人发去。就在电报刚发出不久，华西列夫斯基迟到的报告到了总参谋部。于是，他立即把它送到了斯大林处。不过，这一切都已经晚了。最后，安东诺夫说，最高统帅也许也感到有些过分，所以才又给我发来不要外传那份电报的指示。

既然如此，华西列夫斯基也就放心了。当时，他也不禁劝慰自己，要多体谅最高统帅的苦衷。他知道，作为领导战争全局的最高统帅，斯大林身上的担子确实不轻。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他几乎每天都在超负荷地工作，睡眠时间只有四五个小时。

他严格要求自己，因此对别人也格外要求，不允许出现任何差错和懈怠行为。是的，最高统帅从来不愿意宽容别人的失误，也许这在残酷的战争时期是应该的。算了，就这样过去吧。

风波过后，经与马利诺夫斯基重新商量，华西列夫斯基决定，必须尽一切可能，甚至抽调次要地段上的兵力，以充分加强方面军突击集团的阵容和打击力度；尽可能缩小突破口的宽度，以求最大突击战果。新的突击时间定在8月19日。

然而，就在他们着手新的突击进攻的准备工作时，忽然从情报部门接到了新的报告。报告说，西南方面军正面上的德军正在向被冲击的地段补充兵力，敌军邻近南段战线上的兵力几乎都被抽光了。鉴此，华西列夫斯基感到转机来了，必须立即放弃刚刚准备的该地段上的突击行动。不然，结果只能是两强相遇硬碰硬，进攻肯定仍是毫无结果，且带来很大伤亡。经过再次分析和研究，华西列夫斯基和马利诺夫斯基一致认为，必须敌变我变，以变制变。他们决定，就利用敌人的这一点，把自己的部队隐蔽地运动到敌已空虚了的稍南一点的战线上，以争取在敌之薄弱部位一举突破，最终达到最高统帅部要求的战役目的。同时，他们决定由崔可夫指挥的近卫第8集团军担任此次突击的主攻任务。

18日晚，华西列夫斯基向斯大林做例行前线报告时，以自己的名义并代表方面军首长提出了上述新建议。

考虑到部队的隐蔽调动及部署、弹药准备等至少需要五六天，他请求允许在 8 月 25 日左右开始在新地段发起突击。在谈话中，斯大林仍然很不客气地对他和马利诺夫斯基提出一系列指责和批评，其中有些是正确的，而有些则毫无根据。但最后还是批准了他们的新建议，进攻时间获准于 8 月 27 日开始。

华西列夫斯基还向斯大林详细地报告了托尔布欣的南方方面军在这段时间内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战果。到这时，该方面军各部已经完成分割正面敌军集团的任务，并前出到了克兰卡河地域，阿姆罗西耶夫卡—斯大林诺铁路也即将被切断。这样，敌军的侧翼便在被突破的地方完全暴露出来。对此，斯大林表示很高兴，并同意了华西列夫斯基提出的到南方方面军去研究进一步发展的请求。但是，他还是再三嘱咐华西列夫斯基，这必须是在协助草原和西南两方面军攻克哈尔科夫之后。华西列夫斯基知道，最高统帅太重视哈尔科夫战役了。

22 日，在布置好马利诺夫斯基西南方面军的突击准备工作后，华西列夫斯基便马不停蹄地飞到了科涅夫的草原方面军司令部。待到这里之后，他才获知草原方面军已经从两个方向包围了哈尔科夫。经与科涅夫研究，他们决定，立即派出快速部队加速对敌军的合围，并最好堵住敌人企图撤退的铁路线。但是，由于敌军已经事先接到了上峰指示，因此在当晚就弃城向西南方向逃跑了。这样，第二天，草原方面军东部和北部的部队胜利地挺进到哈尔科夫。担负掩护撤退任务的敌军一部，像“舍己救人”一样，全部成了苏军的俘虏。

解放哈尔科夫后，华西列夫斯基与随后赶来的朱可夫就前线战局交换了意见，并着重对草原和西南两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做了指示。是晚，华西列夫斯基又飞回了马利诺夫斯基的指挥部。

此后，沃罗涅日和草原两方面军未经任何休整就向南线德军压去，其势如排山倒海之巨澜，滚滚向前。德军虽然未放弃拼死抵抗，但毕竟力单势孤，于事无补。

与此同时，根据重新部署的行动计划，马利诺夫斯基的西南方面军主力也开始了攻势。在德军南线的地段上，崔可夫的近卫第 8 集团军一路领先，摧枯拉朽。德军的防线终于被彻底冲垮，战场态势立即为之一变。此间，南方方面军和亚速海区舰队也展开了新一轮的协同攻势。各路大军同时西向，越战越勇，其态势不可当。

到 8 月 30 日，德军的“米乌斯防线”已经荡然无存，全线败退的敌军简直向飞蝗一样，回扑到了第聂伯河一线。当天，乌克兰南部重镇塔甘罗格获得解放。到 9 月上旬，华西列夫斯基所统帅的西南和南方两方面军，已经解放了顿巴斯广大地区。铁路枢纽巴尔文科沃、钢铁工业中心马里乌波利以及斯大林诺、沃尔诺瓦哈等一批城市，相继获得解放。

至此，苏军在整个战场的南翼已经牢牢地掌握了战略主动权。通往胜利的征途，正在他们脚下向前伸延……

由于德军“南部”集团军群已经面临灾难性的战局变化，急得希特勒特地从东普鲁士来到他在文尼察的战地大本营。但他的到来也没能制止住形势的日益恶化。

最后，溃败的德军主力不得不撤向第聂伯河右岸。德军“南部”集团军群司令官曼斯坦因在回忆夏秋战局时曾经写道：“到 8 月底，仅我们集团

军群就损失了 7 名师长、38 名团长和 252 名营长……我们的兵员和物质已经衰竭……我们没有预料到苏军在军事上，以及在本国发展军事工业方面会表现出如此巨大的组织才能。我们遇到了一条一个脑袋被砍掉又在原来的地方长出两个脑袋来的真正的多头蛇。”

虽然德军大部分已经退到了第聂伯河对岸，但希特勒和他的帝国将领们并不甘心最近一个时期所遭到的连连失败。他们企图通过第聂伯河这道天然屏障来阻止苏军向西挺进，并在大河右岸附近迅速地建立起新的防线。同时，德军在第聂伯河左岸地域也留下了一定的兵力，以对苏军实行梯次抵抗。特别是在第聂伯河中下游地区，他们还利用暂时盘踞的某些战略重地和屯兵场，准备阻止苏军攻取行动的进一步扩展。更主要的是，通过克里米亚地峡地域的顽强抵抗，保住其南部乌克兰与克里米亚半岛之间的作战机动自由。

鉴此，苏军的下一步任务，就是通过连续作战不让敌军在第聂伯河两岸的接近地上组织有效防御，在行进中强渡第聂伯河，并夺取该河中下游附近的战略要地和登陆场。9 月 9 日，为保证强渡第聂伯河成功，为进一步激发全体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最高统帅部向所有南线作战的部队发出训令。训令规定，对胜利地强渡大河并固守登陆场的有功人员，将授予苏联政府最高勋章；对强渡像第聂伯河斯摩棱斯克以下一段这类大河或强渡其他难度相同的大河的有功人员，将授予“苏联英雄”荣誉称号。

9 月 18 日，自春季以来始终置身前线的华西列夫斯基通过电话与最高统帅斯大林就下一步战役发展问题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讨论。在电话中，斯大林关切地询问了他的身体状况，嘱咐他一定要保证足够的休息时间。这使华西列夫斯基颇受感动。

他觉得，最高统帅仍是一如既往地在关怀他，而这并不是每个在前线军旅生活中的人都能得到的。经过反复讨论，他们决定：西南方面军各部迅速突击并攻取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扎波罗热，以便在最近强渡第聂伯河，夺取并固守住对岸的登陆场。南方方面军各部突破莫洛奇纳亚河并摧毁敌军的防御，然后把敌人牢牢封锁在克里米亚半岛，并向第聂伯河下游挺进，在该地段实施强渡计划。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任务是向基辅方向集中，进而解放这座被敌军占领长达两年之久的乌克兰首都。草原方面军则应向波尔塔瓦—克列缅楚格方向集中，夺取该两据点后直接进抵第聂伯河。

华西列夫斯基很高兴。显然，这一段时间苏军的攻取与展开行动都相当不错，实际战果也是相当巨大的。现在，整个左岸乌克兰地区基本上可以说已经全部被苏军解放。如果强渡第聂伯河的行动很快完成，对面的右岸乌克兰也就指日可待了。

想到这里，他特别兴奋。他叫来副官，让他通知马利诺夫斯基立即到他这里来。待到副官刚一转身，华西列夫斯基又叫住他，说：“不要了，还是我自己到他那里去吧。”

在西南方面军司令部，华西列夫斯基把他刚和最高统帅决定的战事安排告诉了马利诺夫斯基。随后，他们来到作战地图前，就西南方面军的下一步行动计划做了具体的安排。经研究，他们决定，在第 12 集团军和近卫第 3 集团军的结合部，调来实力更强而又骁勇善战的崔可夫近卫第 8 集团军，它将担任主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扎波罗热的艰巨任务。第二天，华西列夫斯基与马利诺夫斯基请来了崔可夫将军，当面给他下达了上述命令，同他共同研究了集团军的部署等一系列有关问题。崔可夫表示，他需要航空兵

火力支持及部分弹药补充，只要这些问题按时解决，完成任务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剩下的其他部署，华西列夫斯基交给了马利诺夫斯基去安排，他将立即动身去托尔布欣那里。

9月22日，华西列夫斯基飞到了南方方面军司令部。在这里，托尔布欣向他介绍了方面军的部署情况。第二天，他们便直接来到前沿位置上的茨维塔耶夫的突击第5集团军和扎哈罗夫的近卫第2集团军。前一天，他们曾企图在一昼夜中从行进间突破德军沿莫洛奇纳亚河西岸的防御地域，但未能获得成功。华西列夫斯基知道，不能把受挫归咎于这两位骁勇善战的司令员。因为，敌人的基本防御地带是设置在高耸在莫洛奇纳亚河谷上的山峦上，而这些山峦又处在亚速海沿岸山地西部支脉上的一片高原上。德军凭险在此构筑有完备的反坦克壕沟网，堑壕纵深达3—6公里，并有防御极好的掩蔽部。守卫这道防线的德军，除了从东线溃退下来的部队外，还有山地步兵第4师。据截获的德军无线电情报说，希特勒已下令必须死守这道防御线，直至战斗到最后的一兵一卒。

鉴于如此，经过共同讨论研究，他们一致认为，必须加强该地区的苏军突击力量，把原来分散的突击集中起来，解决该两集团军人员和弹药的不足。为此，华西列夫斯基决定，除了上述两集团军的9个师外，再增派第44集团军的6个师、炮兵第2、第26两个师及近卫M-31火箭炮第13旅和8个火箭炮团。突击时间定于9月26日开始。

当晚深夜，华西列夫斯基把他对西南和南方两个方面的作战部署向斯大林做了汇报，同时还对南方方面军拟议中的克里米亚战役提出一系列建议。斯大林批准了他提出的作战行动计划。

9月26日，经过近1个小时的炮火准备后，南方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在航空兵的支援下发起了对莫洛奇纳亚河沿线敌军防线的猛烈突击。战斗十分激烈，德军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拼死抵抗，并数次在航空兵支持下用步兵和坦克发起反冲击。3天后，敌人的反冲击终于被压下去。近卫第2集团军和第44集团军的部队立即全力向前挺进，突破口被大大地拓宽了。到10月2日，德军开始全线溃退，坚固的莫洛奇纳亚河防线已经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左翼西南方面军所属的近卫第1集团军也已经前出到第聂伯河左岸，第6集团军的4个师已经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南地段强行渡过了第聂伯河，随后，第12集团军也有两个师沿这里渡过了大河。

10月9日，经过战斗间歇补充后，南方方面军主力开始了旨在夺取美利托波尔城的攻坚战斗。该城是通往克里米亚半岛和第聂伯河下游地区的咽喉要地，因此德军准备誓死固守。据说，希特勒在电报指示中曾以3倍军饷来悬赏死守该城的德军各部队。战斗一直在绵绵的秋雨中进行，一方强攻，一方死守，其激烈程度甚至不亚于去冬在斯大林格勒城廓的厮杀。德军照旧是不断地反冲击，致使许多居民点数度易手。到13日，从预备队中调来的克列伊泽尔的第51集团军硬是从城南（扎契）入了城垣。随后，逐街逐楼展开的艰苦巷战开始了。克列伊泽尔把部队化整为零，成立了许多突击分队，逐一地围攻德军据守的每个据点。德军知道，元首悬赏给他们的那3倍军饷是无论如何也拿不到了，于是，一部分人干脆躲在残垣废墟中待死受俘。

待到最后一段残垣中抵抗的敌军被消灭后，美利托波尔获得了解放。

事后，华西列夫斯基曾在第28集团军的指挥所里审问了一批德军俘虏。其中一名营长供称，当战斗刚开始时，他所部的340人中就已有280多人被

炮火杀伤，到最后，他的营连他在内只剩下 18 个人。德军步兵第 111 师师长说，仅在 10 月 20 日一天内，他的师的伤亡就高达 4/5。

与南方方面军攻打美利托波尔的同时，西南方面军主力对第聂伯河下游突出部上的扎波罗热地域的进攻也开始了。除了担任主攻的崔可夫的近卫第 8 集团军外，左右两翼配合作战的分别是第 3 和第 12 两个集团军。

10 月 1 日拂晓，突击正式开始。头两天，近卫第 8 集团军的进展还较顺利，但随后的几天中，德军凭借其“虎”式坦克及威力巨大的“斐迪南”式火炮，向苏军发起了猛烈的反冲击，致使先此占领的第一、二道堑壕又被敌人夺回。到 9 日，崔可夫的部队经过战术研究和经验总结后，再次对敌军发起了进攻。在战斗中，苏军士兵终于找到了对付敌人“虎”式坦克的办法。这就是，在战术上要避实就虚，先让德军坦克通过苏军的战斗队形，随后分工明确，自动枪手集中火力攻击坦克掩护下的德军步兵；反坦克手则用反坦克弹或燃烧弹等对坦克的薄弱部位——侧面和尾部——实施攻击。这种新战术，终于有效地控制住了敌人颇有威胁力的反冲击。随着后来此种战术在全军的推广，所谓“虎”、“豹”新式坦克不可攻破的神话终于被打破。

但是，到 11 日，近卫第 8 集团军及其侧翼部队仍然未完成攻克扎波罗热的既定任务。这里的敌军凭险固守，兵力也相当多，他们也摸准了苏军一般都是白天进攻的特点，所以把部队分成不同梯队，白天严密布防，晚上则以追待劳加以修整补充。

为此，华西列夫斯基指示马利诺夫斯基亲自到崔可夫的指挥所坐镇，研究是否可以利用夜战来达成进攻的突然性和有效性。后来，经多方研究论证，夜间突击的方案形成了。

13 日 21 时 50 分，整个苏德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夜战行动——参加的有 3 个集团军、1 个坦克军又 1 个机械化军——开始了。

当时，天空中悬着一轮明月，大地经过一整天的炮火轰鸣终于沉静下来。突然，整个西南方面的炮火，包括“喀秋莎”和火箭炮一齐向敌军阵地猛轰了过去。暴风雨般的炮弹划破了沉寂的夜空，呼啸着倾泻到酣睡中的敌军阵中，很多德军还没来得及弄清是怎么回事儿便已做了死鬼。22 时整，担任突击任务的各坦克集群同时打开了前灯，黑夜顿时化作白昼。坦克冲入敌群，搭载的步兵分队立即跳下战车，向睁不开眼睛的德军猛烈射击。随后，各主力部队全部掩杀上来，声势之浩大壮观，直使天地震颤。苏军这突如其来的迅猛攻击打得德军方阵大乱，待他们明白过来这是强大的夜间攻击时，多数官兵都已成了苏军的俘虏。

全部战斗只用了 10 个小时，到第二天上午 8 时，扎波罗热终于被攻克。除战死者外，守敌全部被俘。缴获的敌军辎重装备和各种武器弹药，几乎堆满了第聂伯河左岸的突出部地域。

至此，从扎波罗热上至洛耶夫的 700 公里长的地段上，苏军西南、草原和沃罗涅日三方面军一线排开。不仅第聂伯河左岸德军用以阻击的各大屯兵场和战略要地全被攻克，许多集团军还乘胜利的余勇强渡了这条大河，并在大河右岸占领了若干个登陆场。此外，南方方面军则占领了广大的克里米亚地峡地区，从而彻底切断了克里米亚半岛上敌军与第聂伯河下游的联系。

至此，整个第聂伯河会战胜利结束。

需要说明的是，苏军此间前后的强渡第聂伯河行动，并不是像我们中

国人民解放军 1949 年春“百万雄师过大江”那样的情况，这是我们中国读者应该明确的。实际上，包括强渡大河在内的整个第聂伯河会战，是指从这年 9 月至 11 月初的一系列以夺取第聂伯河一线广大地域为目的的作战，各地段上的战斗和渡河行动都是在行进间展开并完成的。而且，它是按各方面军，甚至是各集团军的具体推进情况而独立进行的。除了朱可夫负责协调上游两方面军、华西列夫斯基负责协调下游两方面军外，总体的推进并不强求一律和一致。苏军最高统帅部所以如此，主要是基于下述几方面的实际考虑。

首先，参加这次会战和渡河的作战部队计有 4 个方面军的强大集群，在北部是沃罗涅日方面军，接着依次是草原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从渡河宽度上看，上起洛耶夫，下至扎波罗热地域，总长度达 700 多公里。而且，这还不包括后期挺进的上游中央方面军部队和下游南方方面军部队。他们所面对的德军包括其“中央”集团军群、“南部”集团军群及“A”集团军群。这是当时德国法西斯在苏德战场上全部兵力的 80% 左右。

其次，由于各个方面军的展开情况和作战位置不同，只能是哪些部队条件成熟便先行强渡，因为这次渡河之前和之后的作战主要是先清除大河左岸的敌军防御据点，然后再夺取右岸的登陆场。这样做，则既可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使其在各个地域分兵把守，又可以利用敌军的顾此失彼而同时掩护两邻友军的推进和渡河。

最后，这种安排也是从尔后进行的解放基辅和收复克里米亚半岛作战的实际出发的。因为，实施突击进攻基辅方向的作战必须提前进行，它的攻击出发地域，也必须直接建立在刚刚占领的第聂伯河右岸的登陆战之上。而收复克里米亚半岛的行动展开，则必须先行切断第聂伯河下游和岛上敌军的通道和联系，即由南方方面军先行占领克里米亚地峡的广大地域，从而造成完全孤立岛上敌军之势。因此，该方面军部队的任务并不是急于渡河，事实上，他们的渡河也是在很晚以后才进行的。

由此可见，就整个第聂伯河会战的情况来说，它是由联系在一起的 3 个步骤来完成的，即先行清除河岸左侧的德军防御体系，消灭或击溃在这一地区负隅顽抗的敌军有生力量；然后在行进中利用一切机会和可能实施强渡；最后则是渡河完成后夺取敌军重兵把守的登陆场，并使之尽可能地扩大纵深，以便抵挡住敌军的任何反突击性战略争夺。

在长达 700 多公里宽的广阔地域上强渡像第聂伯河这样又深又宽的大河，而且要求在行进中消灭强大敌军的梯次抵抗，勇敢地夺取并牢牢稳固住对岸的各个登陆场，这其间所要克服的人为和自然等方面的困难和障碍，应该是不难想见的。但是，英勇的苏军将士靠英勇无畏的精神、高昂豪壮的士气和军事指挥的高超艺术，还是克服了这一切困难和险阻，光荣地完成了最高统帅部交付给他们的任务。当第聂伯河的艰苦作战完成后，整个左岸乌克兰地区便全部获得解放，这块苏联南部最大的工业基地和粮食产区再度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苏联元帅朱可夫在回忆这次作战的结果时写道：“由于胜利地强渡了第聂伯河并在强渡中表现了英勇果敢精神和高超的技能，由于粉碎了敌人在第聂伯河上的防御，大约有 2500 名士兵、军士、军官和将军被授予了‘苏联英雄’的称号。”

本书传主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也曾不无自豪地在《毕生的事业》一书中写道：“夺取第聂伯河的会战……战果辉煌。在很宽的地带上强渡第聂伯河

这样又宽又深的大河，实际上是从行进间实施的，而在对岸夺取登陆场时又遇到法西斯军队的猛烈抵抗。强渡该河并夺取登陆场之所以能够成功，完全应归功于红军的高昂的士气、战士的集体主义和军事首长杰出的指挥艺术……苏军在5个月中通过几乎不间断的进攻，粉碎了敌军118个师，从而牢牢地掌握了战略主动权。而对于德国，战局却是在越来越快地继续恶化，这预示着法西斯集团已经开始瓦解。”

10月20日，苏联最高国防委员会已经决定，对各主要作战方向的苏军部队作了统一的番号变更。实际上，从苏军不断更改的番号和称号上，也可以直接地反映出他们在苏德战场上节节进击、不断胜利的行动轨迹。其主要如下：

- 中央方面军——改为白俄罗斯方面军；
- 加里宁方面军——改为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
- 波罗的海沿岸方面军——改为波罗的海沿岸第2方面军；
- 沃罗涅日方面军——改为乌克兰第1方面军；
- 草原方面军——改为乌克兰第2方面军；
- 西南方面军——改为乌克兰第3方面军；
- 南方方面军——改为乌克兰第4方面军。

第十二章 纵横驰骋乌克兰

挥师西指河两岸，纵横驰骋乌克兰；
解放古城敖德萨，最高勋奖电话传。

为了总结1943年全国战场，特别是南方战线夏秋战局的变化及苏军作战经验，为了进一步研究1943—1944年冬季战役计划要点并为之下定最后的决心，身为苏军总参谋长的华西列夫斯基被最高统帅部召回了莫斯科。

1943年12月中旬，华西列夫斯基自前方回到了首都。他已经连续6个多月没有回莫斯科了。从今年4月份开始，他就不得不不停顿地反复奔波于前方各个战场，忽而天上，忽而地下，工作之紧张，任务之繁重，有时简直都超过了他脑力和体能所能承受的最大极限。在前线，他既要经常与最高统帅商讨全国战局的任何新变化及其特点，为之提供战略总体设想甚至包括具体战役的构思，还要随时解答最高统帅或总参谋部提出的各种棘手问题；又要直接负责自己所在的南方战线各方面军的战役策划和军事行动的协调，甚至深入到各集团军参与实际部署或战前战后检查，解决每一个具体战役中不时冒出来的新问题。所有这一切，加之长时间睡眠不足，脑力体力消耗过多，使他变瘦了，也变黑了。在他自己看来，似乎也老了不少。

副最高统帅朱可夫也回来了。虽然他们在前线也经常用电话沟通情况，但这次见面，仍然觉得十分亲切。当朱可夫元帅到总参谋部来看他并互相征询意见时，他们仿佛久别多年，情不自禁地长时间握手、拥抱。看到对方那副疲乏、劳累的倦容和尚未完全退去的征尘，他们不住地互道珍重。但每当话题转到全国战场的有利形势，或谈及苏军的一系列重大胜利时，他们又是那样痛快和由衷地高兴，似乎所有的辛苦和疲劳都飞走了。当时，他们都有

一种共同的感受：现在，当他们突然回到这既听不见飞机轰炸、炮兵射击，又听不到各方面危急地段上频频传来的告急电话或电报的宁静的莫斯科办公室时，倒又觉得很很不习惯和不适应了。

像往常的这类会议一样，这次会议开得时间也相当长。参加会议的人员中，既有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防委员会委员，也有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和总参谋部的主要部门首长。会上，华西列夫斯基总结了前线各战场的作战情况和作战经验，分析了整个战局态势及其未来发展前景。他的助手安东诺夫则负责对今后准备实施的各个战役的讨论工作。沃兹涅先斯基代表国防委员会就经济和军事工业发展问题做了报告。最后，斯大林向大家介绍了 11 月在德黑兰举行的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的情况，并特别就国际形势和敏感的第二战场开辟问题做了说明。

在报告中，华西列夫斯基着重对 1943 年夏秋进攻战役做了总结。他指出：根据目前的统计资料看，到 1943 年年底，我军已经解放了 1941—1942 年法西斯德军所占领的一半以上的国土。从斯大林格勒会战以来的反攻开始算起，苏军已经全歼或俘虏敌军 56 个师，重创敌军 162 个师。当然，敌军也又对这些师进行了新的补充和改组。

这期间，共击毁敌军坦克 7000 余辆，作战飞机 14000 余架及各种火炮和迫击炮 50000 余门。而且，德军还无可挽回地损失了大量最有经验的将军、军官、军士和士兵。

具体到各主要方向的战场推进情况，他指出：在西方和西北方向上，苏军已经肃清了加里宁州部分地区的敌人，解放了斯摩棱斯克州及白俄罗斯东部的许多地区。在西南和南方方向上，苏军防线已经推进到了波列西耶、日米托夫、基洛夫格勒、扎波罗热、赫尔松一线。南北两端，只有列宁格勒和克里米亚尚未解放。

在谈到当前敌我力量对比的情况时，华西列夫斯基根据总参谋部掌握的最近情报指出：到 1943 年底，法西斯德国连同其仆从国的军队在内，共有 236 个师又 24 个旅，其中德军有 198 个师、6 个旅及 3 个航空队，总计约为 490 万人。其装备有 5400 多辆坦克和强击炮，54000 多门火炮和迫击炮，3000 多架作战飞机。而苏军则有作战部队 610 万人，在装备上有 4900 辆坦克和自行火炮、89000 门火炮和迫击炮、2000 多门火箭炮、8500 多架作战飞机。他解释说，在目前，苏军只有坦克的数量还暂时少于德国，这首先是因为在 1943 年的几次大型进攻战役中遭到了不少的损失。在每次大规模进攻作战中，都是坦克用炮火和履带压制了敌军，突破敌军坚固的防御，从而为步兵部队开辟出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由于坦克是部队的先锋冲击力，所以才蒙受了较大的损失。

谈到这里，斯大林问道：“那么现在我们究竟有多少坦克部队呢？”华西列夫斯基接着说：“原来，我们总计共有 5 个强大的坦克集团军。到现在，我们又增加了一个全新的坦克集团军，所以总共是 6 个坦克集团军。”斯大林再次插话说：“坦克部队还要继续增加一些。总的看，我们的力量已经比法西斯德国强大了许多，我们是有战场优势的。更何况战争的战略主动权已经完全在我们手中了，我们的士兵和将军们也具有比法西斯军队更加高昂的士气和英勇精神。而且，”他停了一下，看了看坐在座的与会人员，继续道，“在德黑兰，”罗斯福已经答应于 1944 年在法国展开广泛的活动，即开辟他们迟迟未能兑现的欧洲第二战场。我想，这次他会遵守诺言的。因为他们，尤其

是狡猾的大不列颠首相丘吉尔先生，也担心我们独自地解放欧洲领土、话说回来，如果他们还不遵守诺言，我们自己的力量也足以彻底打垮希特勒德国的。”

会后，斯大林特意提出宴请与会人员。当斯大林来到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的身边祝酒时，俩人立即站起来。斯大林幽默而风趣地说：“两位劳苦功高，何必大驾起立呢？而不像我，整天在办公室里清闲打坐，所以才特别需要站起来走动走动呢。”一席话，大家都笑起来。其实，人们都知道，最高统帅的工作量之大、工作时间之长及他那种特有的拼命精神，恐怕更是一般人所不能比的。

经过讨论与研究，这次会议确定了1943—1944年冬季作战的主要任务。这就是：苏军必须在列宁格勒到黑海之间展开更加广泛的进攻战，其中最主要的注意力应集中在苏德战场的两翼。在南方，苏军应解放整个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域和克里米亚半岛，并在春季由此前出到国境线附近，争取把战争引向法西斯德国的仆从国境内。在北方，苏军应彻底粉碎德军“北部”集团军群，完全解除他们对列宁格勒的封锁，并由此前出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边界。总的看来，这就要求在不同的时间里在彼此相距很远的地段上先后进行一系列进攻型战役。

随后，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又在大本营和总参谋部连续工作了好几天，以便帮助总参谋部拟定编制出整个冬季作战的各战役具体计划。他们几乎每天都要去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详细地讨论每个战役的细节，并接着为各参加实施作战的方面军起草训令和各种指示。

待到最高统帅批准了训令后，像往常一样，斯大林便最后一次把他们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问他们现在打算去前线的哪些部队，什么时候可以动身等。对此，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已经习惯了，他们倒也更愿意尽快地回到前线去，回到他们与之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战友们中间去，回到那炮声隆隆、弹雨枪林的紧张的军旅生活中去。

12月21日，华西列夫斯基离开莫斯科，又回到了乌克兰第3方面军和乌克兰第4方面军，即原来的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以便根据大本营训令协调它们即将展开的新的进攻行动。同他一样，朱可夫也又回到了原来的沃罗涅日和草原方面军，即乌克兰第1和第2两个方面军。

当时，在这4个乌克兰方面军当面的敌军也颇为强大。它们是德国曼斯坦因元帅指挥的“南部”集团军群（包括坦克第4集团军和第1集团军、野战第8和第6集团军）和克利斯特元帅指挥的“A”集团军群（包括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德国第17集团军、德国第44独立军；2月间，“南部”集团军群的第6集团军被抽出转隶于该集团军群），还有负责支援它们的德国第4航空队。这些敌军总计约有176万人、16800门火炮和迫击炮、2200辆坦克和强击炮、1640架作战飞机。

希特勒严格命令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守住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域和西部各苏联州的粮食产区，以及向有“锰都”之称的尼科波尔、富有铁矿的沃伊罗格盆地和富饶的克里米亚半岛，并要求他们牢固地掩护住苏德战场南翼的唯一交通线。希特勒和德国统帅部还指望这两个强大的集团军群恢复他们已经丢失了的第聂伯河防线。

因此，曼斯坦因和克利斯特命令他们的部队必须坚决地控制住科尔松—谢甫琴科夫斯基登陆场和尼科波尔以南的登陆场。这两个登陆场正好形成

了对苏军乌克兰 4 个方面军构成很大威胁的突出部。前者威胁乌克兰第 1 方面军和第 2 方面军的结合部，它可以任意向这两个方面军的侧翼实施突击；后者则直接伸向乌克兰第 4 方面军的后方，并前出到乌克兰第 3 方面军的左翼侧面。

因此，苏 1943 年冬季作战计划的第一个阶段的任务，即是切断或消灭德军伸向第聂伯河方向的这两个主要突出部，至少也要通过顽强的攻势迫使其后撤。然后在第二个阶段全线打破德军的防御，将其赶出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域，并在行进中把敌“南部”和“A”两个集团军群分割开来予以各个歼灭。

12 月 24 日，瓦图京大将指挥的乌克兰第 1 方面军以基辅为出发地率先转入进攻。

5 个强大的集团军组成的突击集团一路长驱直入，锐不可当，3 天之内就攻克了敌军防御正面的最大支撑点拉多梅什尔。到 1944 年 1 月初，该方面军就把诺沃格勒—沃伦斯基、别尔季切夫和别拉亚采尔科夫从德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在这次战役中，乌克兰第 1 方面军在 3 周内便向西推进了 80—200 公里，并给曼斯坦因集群的坦克第 1 和第 4 集团军以重创。德军企图从诺沃格勒方向夺回第聂伯河防线的想法遂被扼死腹中。

与此同时，科涅夫上将指挥的乌克兰第 2 方面军则用两个突击集团向敌军基洛沃格勒展开了向心突破。到 1944 年 1 月 8 日，该城敌军被歼灭大部，余者则亡命般地而后溃逃。这样，基洛沃格勒被解放了。

嗣后，经最高统帅部批准，乌克兰第 1 和第 2 两个方面军开始了合围敌军科尔松—谢甫琴科夫斯基集团的行动。战斗由 1 月 12 日首先在乌克兰第 1 方面军所在的北面开始。15 日，乌克兰第 2 方面军也转入新的进攻。此间，敌军曾数次发起强大的反突击，并企图在 2 月初沿罗西河方向突出合围，但均未能得逞、消灭敌科尔松—谢甫琴科夫斯基集团的战斗一直激烈地持续到 2 月 18 日才告结束。在双方反复拼杀争夺的大搏击中，德军伤亡 5.5 万人，被俘者达 1.8 万人，战事危急阶段从后方增派而来的全部一新的大量“虎”式坦克和其他技术兵器等辎重装备，也全都被苏军所缴获。科尔松—谢甫琴科夫斯克围歼战彻底消灭了德军在南部战线北端上的突出部，希特勒夺回第聂伯河防线的企图随之化作了泡影。不仅如此，苏军乌克兰第 1 和第 2 两个方面军原来薄弱的结合部被缝合了，从而为下一步向南布格河和德涅斯特河的进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正当朱可夫协调瓦图京和科涅夫两路大军勇猛进击、节节胜利的时候，华西列夫斯基在南端协调马利诺夫斯基和托尔布欣的乌克兰第 3、第 4 两方面军进攻尼科波尔地域突出部的行动却连连受阻，进展缓慢。

原来，当科涅夫的乌克兰第 2 方面军向正面突击敌军时，马利诺夫斯基突然收到大本营训令，要求他派出两个集团军的兵力向北发展以协助科涅夫的进攻。这样，该方面军原定的向南突击包抄敌尼科波尔集团的任务便不得不暂时取消。而且，在 12 月 29 日，经华西列夫斯基与马利诺夫斯基和托尔布欣两位司令员磋商，认为在当前情况下敌人已经不大可能在第聂伯河河曲地带和尼科波尔登陆场继续顽抗；相反，敌军可能放弃尼科波尔和克里沃罗伊罗格之间的地域，进而将自己的主力部队，特别是坦克师撤向因古列茨河附近，或干脆撤至南布格河附近，以腾出这些新锐部队北上去对付瓦图京和科涅夫大军的威胁。

这样，经请示大本营同意，华西列夫斯基和马利诺夫斯基、托尔布欣共同决定，不管天气条件如何恶劣，务使乌克兰第3方面军在肖洛霍沃—阿波斯波洛沃方向上展开积极行动，而乌克兰第4方面军派出3个集团军先在大列佩季哈方向，然后在阿波斯波洛沃方向开始积极行动。一则阻击敌人可能组织的按计划撤退，二则共同粉碎敌尼科波尔集团。结果，经1944年1月头两周的数次进攻，均未得手，反受到了强大敌军的猛烈反突击。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马利诺夫斯基的乌克兰第3方面军和托尔布欣的乌克兰第4方面军在力量上远远不能与该地域敌军相比。而且，技术兵器不足，弹药亦严重缺乏，大本营答应的装备和预备队迟迟不能到达前线；二是与他们估计的正好相反，德军不仅不想放弃这一地域，反而竭尽全力地想把它变成筑有坚固防御工事及保有密集火力联系的战略支撑点，即德军仍在企图从这里恢复其原第聂伯河防线，并重新建立与克里米亚敌军的有效联系。

到1月中旬，经最高统帅部允许，这两个方面军暂时停止了无效的进攻。

华西列夫斯基认为，如果仅仅依靠这两个方面军的力量，是断乎不能夺取拥有强大敌军固守的尼科波尔登陆场的；如硬要这么继续打下去，必将遭到更多的不必要损失，还完成不了任务。下一步的行动必须得到科涅夫乌克兰第2方面军的并力作战，并重新部署部队，托尔布欣的乌克兰第4方面军也必须得到大本营在兵器和预备队方面的补充。经与托尔布欣磋商，后者也表示完全支持华西列夫斯基的这种分析。

这样，1月16日，华西列夫斯基便在托尔布欣的方面军指挥所给最高统帅部打电话汇报了上述意见。

哪知道，听了华西列夫斯基的汇报后，斯大林竟大发雷霆，他在电话里大声地说道：

“元帅同志，我根本不同意您的分析，也不能接受您提出的那些建议。在我看来，问题完全在于你们不善于组织部队的行动，也不善于组织作战！作为大本营全权代表，您必须负起全部责任，而不是一有困难就向我伸手，要装备，要兵器，要预备队！”

华西列夫斯基不知道斯大林为什么这么快就发火，他只能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努力地去说服最高统帅。他说道：“斯大林同志，我认为我们的分析是从前线战场实际出发的。也许我们在组织部队和指挥作战中存在一些问题，但关键的是，现在我们力量有限。如果没有科涅夫的协同，如果不增派必要的兵器和弹药及新的预备队，夺取尼科波尔是断断不能的。我现在仍然坚持……”

华西列夫斯基的话还没讲完，斯大林在电话那端竟吼了起来：“我不想再听你们的诉苦了！您应该知道您自己怎么做！”说完，电话听筒被重重地扔下了。

没办法，华西列夫斯基也狠狠地把已经毫无声息的话筒扔到了桌上。站在他身旁的方面军司令托尔布欣慢慢地拾起话筒，把它放到了原处。显然，他也完全听到了斯大林在电话里传来的吼声。少顷，他微笑着对华西列夫斯基说：

“嘿！您知道吗？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刚才我差点吓得钻到桌子底下去了！”

一句话，说得华西列夫斯基破面而笑。一会儿，他回过头来问托尔布

欣道：“最高统帅为什么要这样呢？是不是克里姆林宫又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了，还是完全就是由我们而引起的呢？真搞不懂！”

托尔布欣耸了耸肩，然后摊开两手，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华西列夫斯基也不知道刚才为什么自己也那么激动，也许是太委屈了？好了，且不要管它了。目前的关键还是得解决武器弹药和预备队的问题。随后，他分别给安东诺夫和在瓦图京那里的朱可夫打了电话，简明地陈述了这里的现状和他们的意见。安东诺夫表示由他去大本营再找最高统帅，以便尽快给乌克兰第4方面军增派预备队。朱可夫也说，他将与科涅夫联系乌克兰第2方面军的协同作战问题，一切清静候便是。结果，到1月20日前，乌克兰第2方面军所属的沙罗钦中将指挥的第37集团军被拨给了马利诺夫斯基的乌克兰第3方面军。此后，该方面军又从大本营预备队中得到了近卫步兵第31军，乌克兰第4方面军也把近卫机械化第4军拨给它了。

1月下旬，乌克兰第3和第4两个方面军恢复了对尼科波尔—克里沃伊罗格方向上的进攻。根据以前的计划，马利诺夫斯基指挥的乌克兰第3方面军从克里沃伊罗格东北地域向阿波斯托洛沃实施主要突击，托尔布欣指挥的乌克兰第4方面军的右翼部队也向这里进攻，目的是以相向突击合围防守在尼科波尔地域的德国第6集团军，从而彻底切断它向西的逃路。

从战斗一开始，天空中便风雪交加，有时还变成雨夹雪，整个战场一片泥泞。

有的地方甚至连拖拉机和牵引车也只能在原地打滑，这样，炮手们不得不扛着迫击炮走，当地的居民则自动承担起了为战士运送弹药的工作。经过两昼夜的激战，德军的防御阵地终于被突破了。紧接着，快速机械化部队艰难地进入了突破口，为了克服泥泞带来的困难，有些士兵干脆把大衣脱下来垫在车轮底下。至2月5日，第37集团军解放了阿波斯托洛沃，企图沿铁路溃逃的德军3个坦克师和4个步兵师最后在这里遭到了全歼。与此同时，乌克兰第4方面军右翼部队也突破了尼科波尔以南的防线，前出到第聂伯河。由于道路泥泞不堪，未能截住全部敌人的退路，但敌逃跑时丢下的重型装备和大量技术兵器则全变成了战利品。

2月8日，“锰都”尼科波尔获得解放，德军的尖嘴形突出部被吃掉。托尔布欣指挥所部拔除了德军在第聂伯河左岸上这唯一的一个登陆场后，便在第聂伯河对岸建立起一个新的登陆场。至16日，作战地区的天气有所好转后，强击火炮和大量的弹药终于送了上来。于是，从次日起，所有乌克兰第3和第4两个方面军的部队开始转入进攻。苏军大踏步地向西推进，德军的纵深防御一个个被突破，整师整师的敌军被歼灭。有些则在溃逃中被快速部队拦腰斩断，后方部队收容敌军俘虏的工作增大了许多。实在没办法时，干脆命令解除了武装的俘虏们大队大队地随同进攻的苏军一块儿往前跑。至22日，乌克兰第3方面军所属由格拉戈列夫中将指挥的第46集团军和沙罗欣中将指挥的第37集团军，已经攻克了克里沃伊罗格和附近的矿坑，并前出到了萨克萨加甘河和因古列茨河一线。

从18日开始，整个作战地区又遭受到暴风雪的袭击，由于地面冰层和雪堆的影响，汽车运输几乎陷于瘫痪。但苏军将士超越了这种自然的障碍，也打破了德军的层层防御。当华西列夫斯基乘越野车也不能前进时，他便和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一起踏冰破雪，用两只脚奋力地前行。当许多在风雪中为部队输送弹药的居民们得知苏军总参谋长也在他们的队伍中一样地前进时，

一些人便主动提出为他找一匹好马骑。

待马找来后，华西列夫斯基说什么也不肯骑，他只是推说自己的骑术不行，后来则让给了跟随他的一名生病的总参谋部工作人员。

到 2 月底，进军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域战役的第一阶段宣告胜利完成。按照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指示，乌克兰第 1、第 2 和第 3 方面军继续向西挺进，在行进中分割德军“南部”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然后将其各个歼灭，并把战线推到苏联国境线附近。乌克兰第 4 方面军则留驻克里米亚地峡地域，以彻底孤立和封锁克里米亚敌军，并准备实施进攻克里米亚半岛战役。

此间，乌克兰第 1 方面军司令瓦图京大将在赴第 60 集团军部署工作的途中，遭到了地方民族主义土匪武装的埋伏，当场腿部重伤，虽然转送后方医院抢救，但终因流血过多，于 4 月中旬逝世。瓦图京曾是华西列夫斯基在总参军事学院期间的同学，后来又在总参谋部出任过作战部长兼第一副参谋长，与华西列夫斯基向为挚友良朋。

在 3 月 19 日住院期间，他还曾专门打电报给华西列夫斯基，祝贺他及乌克兰第 3 方面军在向西挺进的战斗中取得重大胜利。华西列夫斯基当即复电说：“感谢你的祝愿。

亲爱的尼古拉·费奥多罗维奇（按：即瓦图京），衷心祝你早日康复，以便矫健地重新统帅你在这个具有决定意义方向上的军队，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以实现你的愿望。”

华西列夫斯基历来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即使在晚年回忆起这件事时，仍然为国家失一良将，为自己少一挚友而叹惜不已。他对瓦图京的评价相当高，他曾写道：

才具卓越的苏军统帅尼古拉·费奥多罗维奇·瓦图京大将的名字是同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的活动紧密相联的。

1940 年 8 月，他被任命为作战部长，尔后升任第一副总参谋长。尼古拉·费奥多罗维奇在这个岗位上表现了宏图大略，他以不倦的工作为训练我军作出了值得称道的贡献。瓦图京的统帅才干特别表现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同尼古拉·费奥多罗维奇在前线的几次会晤。他担任过西南方面军参谋长，以后又担任沃罗涅日方面军、西南方面军、乌克兰第 1 方面军司令，对事业作出了大量的、十分有益的贡献。我特别想指出的是，国防委员会和本大本营在准备和实施大型战役时，委托给瓦图京将军极为重要的任务，他每次都完成得很出色。他善于坚决地把兵力和兵器集中到主要方向上，善于聚积力量，出其不意地对敌军集团的侧翼和后方实施有力的突击，巧妙地使用大量坦克向战役纵深发展进攻，组织各兵种和军种的紧密协同动作，稳妥地对军队进行不间断而且果断的指挥。瓦图京将军当之无愧地享有大家的崇敬和全民的爱戴。苏联人民至今仍在虔诚地怀念他……

当瓦图京负伤离开部队时，朱可夫就担负起了乌克兰第 1 方面军的指挥工作，瓦图京逝世后，斯大林则命令由朱可夫直接兼任这支重要方面军的司令员。因此，在此后解放全部乌克兰的战斗中，华西列夫斯基与朱可夫的关系更加密切。有时，他则要主动地为朱可夫多做许多工作。他觉得，朱可夫

元帅的担子太重了。

3月初，在华西列夫斯基的直接参与下，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和总参谋部制定了进攻乌克兰战役的第二阶段实施方案。根据以此为依据的大本营营令，乌克兰第1、第2和第3方面军的下一步进攻方向分别是：第1方面军应通过乔尔特科夫向切尔诺夫策，即从波多利耶向布利维纳实施主要突击；第2方面军通过乌曼和鲁德尼查向贝尔齐和雅西实施主要突击；第3方面军通过尼古拉耶夫向敖德萨实施主要突击。为此，大本营还向这些部队增派了新的预备队和大量兵器，如坦克第4集团军分给了第1方面军、第4方面军的一些部队补充到第3方面军，新增坦克750多辆。这样，就从根本上形成了对德军的兵力和兵器的全部优势。

3月4日，由朱可夫直接指挥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按既定方向发起了进攻。进攻的第一天德军的防御就被突破。到第二天，该方面军已向前推进30公里，解放了伊兹亚夫拉夫利和亚姆波利。8日，利沃夫至敖德萨的铁路大动脉被切断。10日，该方面军主力已前出到了普罗斯库罗夫的接近地。到11日，该方面军的先锋部队、由莫斯卡连科上将指挥的第38集团军已前出到了赫麦利尼基的接近地。

3月5日，科涅夫的乌克兰第2方面军以两个突击集团向正面敌军发起了进攻。其右翼集团由7个强大的集团军组成。发起进攻的当天，他们就突破了德军20个师组成的乌曼防线。10日，先锋坦克部队便解放了乌曼和大铁路枢纽赫里斯季诺夫卡。其左翼集团力量较弱，但进展也十分迅猛。到3月11日，整个方面军主力部队已经前出到了南布格河附近。据情报说，德军本想在那里停住，但未能止住败退的军队溃逃。

3月6日，马利诺夫斯基的乌克兰第3方面军向正面的德军第6集团军和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发起了迅猛攻势。具有34个师的德国法西斯军队也没能阻止该方面军的前进，防线在第一天就被冲垮了。到第三天，即3月8日，担任主攻的第46集团军、近卫第8集团军和普科耶夫骑兵摩托化集群就已攻占了既定目标新布格，并截断了多林斯卡亚至尼古拉耶夫的铁路大动脉。为此，华西列夫斯基特别在给最高统帅部的报告中表扬了这个集群和两个集团军，并为他们请功授奖。

由于前线局势异常有利的发展，华西列夫斯基经与朱可夫沟通，立即向斯大林提出修改原作战计划。3月10日，斯大林同意了这一要求。当时决定：朱可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把进攻方向改为利沃夫和普热米什尔，其右翼须前出到西布格河附近的苏联国境线。这样，他们由原来的西南方向改成了正西方向，其目标是直接解放乌克兰西部各州，而后则越过国境线把战场转到波兰南部地区。科涅夫的乌克兰第2方面军仍然向大西南挺进，其右翼前出到德涅斯特河，而左翼则沿基洛沃格勒—雷勃尼查铁路向南急转，直奔基什尼奥夫，然后向普鲁特河国境线前进，准备进入罗马尼亚作战。马利诺夫斯基的乌克兰第3方面军负责立即解放尼古拉耶夫和赫尔松，然后沿黑海沿岸挺进敖德萨，解放该城后再直奔多瑙河下游的苏联国境，最终进入罗马尼亚东北部地区。

这次战略方向和进攻计划的修正调整，大大提前了苏德战场的战争进程，为早日解放苏联全境，使苏军跨越国境线向法西斯敌国挺进创造了条件。

3月20日，乌克兰第1方面军按预定时间恢复了攻势。第二天，巴巴扎尼扬上校指挥的近卫摩托化第20旅就已前出到扎列锡基附近的德涅斯特

河。为此，该旅长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接着，该方面军便开始了强渡德涅斯特河的英勇作战。29日，解放了苏波边界城市切尔诺夫策。随后，该方面军中央和左翼部队沿国境线南下，支援乌克兰第2方面军的作战，直到与后者一直推进至普鲁特河国境线。该方面军在此间作战中，先是击溃了德国坦克第4集团军，后又与科涅夫的方面军击溃了德国坦克第1集团军。总计约毙伤敌军20余万人，击毁坦克和强击炮2000多辆、火炮4500多门、汽车和牵引车53000多辆、装甲车和装甲运输车1000多辆。

与此同时，科涅夫的乌克兰第2方面军迅速向雅西出动，它的前进速度空前快，犹如雪崩一样，从南布格河向德涅斯特和普鲁特两支河流排山倒海地推进。在这迅雷不及掩耳的一路行进中，轻易地粉碎了德国第8集团军的主力部队。至3月26日，该方面军即消灭德军6万多人，俘敌2万余人。缴获的各种作战物资和技术兵器则无以计其数。到3月底，该方面军便越过了苏联国境线，直接挺进至罗马尼亚的博托沙尼、勒德乌茨和帕希卡尼一线。

相比之下，倒是华西列夫斯基所在的马利诺夫斯基麾下的乌克兰第3方面军进展较慢。这首先是因为，连绵的雨水早已把本来就不太好的土路冲毁，部队的一切必需品供给都只能靠拖拉机和越野车，大本营答应的牵引车却迟迟不到，以致进攻一直推迟到3月26日才得以展开。两昼夜激战后，该方面军攻克了尼古拉耶夫市区和港口。到30日，又遇大雨倾盆。道路之泥泞，行军之艰难，完全超乎人们的一般想象，有些地方都是没膝深的烂泥和污水。尽管如此，该方面军的进攻也未停止，反倒在倾盆大雨之中攻占了奥恰科夫和第聂伯—布格河河口的红色灯塔炮垒。

从4月2日起，乌克兰第3方面军从北到东，用了格拉戈列夫、崔可夫、什列明、茨维塔耶夫所指挥的4个强大集团军同时向敖德萨守敌实施突击进攻。到9日，格拉戈列夫的突击第5集团军终于率先攻入城区，10日，全城解放，敖德萨饱经德国法西斯占领军摧残和蹂躏的人民终于获得了自由。人们也许要问，这么多苏军强大的集团军同时突击攻城，何以又经历如此漫长的时日？原来，为了保护这座具有光荣历史的滨海城市，华西列夫斯基和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曾特别要求，所有攻城部队只能在炮兵不得炮击、航空兵不准轰炸的情况下与守敌作战，包括黑海舰队的各种舰只，也不准向该城做任何可能带有危害性的轰射。

乌克兰第3方面军历尽艰辛的作战，以4月13日解放了从德涅斯特河左岸到黑海沿岸的广大地区而告终。总计歼敌10个师，重创敌军20个师。据德军档案记载，仅黑海沿岸至敖德萨城一战，即有5.1万敌人被毙俘，缴获敌人的各种装备和武器弹药，从市区各主要通道到维戈达车站的路途全部被塞满，据说可以装备5—7个德军整编制师。

就在敖德萨获得解放的这一天，华西列夫斯基荣获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奖给他的一枚最高军事勋章——“胜利勋章”。当时，获得此项殊荣的只有他和朱可夫。奖词是：“由于出色地完成最高统帅部赋予的领导大规模战役的任务，从而在粉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事业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是的，华西列夫斯基取得了胜利。

但是，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胜利首先是苏联军队和人民在苏德战争中第一次把侵略者赶出了自己的国土的辉煌胜利。

还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尚未发布这项荣誉命令之前，斯大林就首先在电话中向华西列夫斯基表示了祝贺，但最高统帅的贺辞叫人听来总是那么沉

甸甸的。斯大林在电话里对华西列夫斯基说：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让我祝贺您荣获苏联最高级别的军事勋章，我为您的成就感到高兴和自豪！但是，也须请您知道，您受到奖励并不仅是由于顿巴斯和乌克兰的解放中有您的智慧和汗水，照我看，它还预示着克里米亚的解放也必须由您来负责。现在我就建议您把注意力转到这件事上来。同时，也不要忘记与您颇有感情的乌克兰第3方面军。”

这正是：英雄受奖荣耀日，战斗正未有穷期。

第十三章 克里米亚收复日

分割穷敌在孤岛，急要当在勿使逃；
克里米亚收复日，举国上下传捷报。

克里米亚半岛位于苏联欧洲部分的南端，它就像一只伸展开全部触角的巨型章鱼，长年不动地悬浮在黑海北部面上。这里是连接欧洲和中近东的重要海上通道，在它的南部海岸，与土耳其遥遥相对，西部则是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半岛上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各种物产极为丰饶。自1941年苏军被迫撤离后，它已经在德国和罗马尼亚法西斯军队铁蹄下度过了两年多的痛苦岁月。

早在1943年10月，苏军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就把解放克里米亚半岛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那时，彼得罗夫上将指挥的北高加索方面军在黑海舰队和亚速海区舰队的配合下已经攻克在东部与之相对的塔曼半岛，而北部的乌克兰第4方面军也已突破在莫洛奇纳亚河上的德军壁垒，从而在克里米亚地峡地域切断了陆上与半岛上敌军的联系。即使在环绕整个半岛的广大海域上，也有黑海舰队和亚速海区舰队在活动，实际上，它们已经控制了附近地区的海域通道。

最初，当总参谋部酝酿攻占克里米亚半岛问题时，有一部分人建议说，最好暂时不要攻打克里米亚，只要把大量的德国军队封锁并孤立在那里就可以了。这样苏军大部分部队就可以腾出手来，更加努力地投入其他更主要方向上的作战。但是，这种意见被总参谋部和大本营否定了。因为，如果采取这种作战方法，敌军就可以从克里米亚直接威胁正在进攻第聂伯河一线的各苏军部队的后方，并保留住他们对北塔夫里亚的交通线，甚至成为德军向黑海及亚速海海岸沿线的进攻基地。而且，他们还可能由此再度向东进攻北高加索地区，以夺取北高加索油田来苟延残喘其业已失败的侵苏战争。

那么，究竟采取什么办法，或者说如何制定行之有效的克里米亚战役作战计划呢？

9月中旬，斯大林为此曾专门征询尚在乌克兰第3和第4方面军作战前线的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的意见。经过初步分析敌我各方情况，并充分考虑到苏军所惯常使用的战术原则，9月22日，华西列夫斯基通过电话汇报了自己对这一战役的初步设想。

他的想法是，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在一个主要突击方向上对半岛上守敌发起迅猛进攻，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攻克并占领整个半岛，将敌军全歼。

具体说来，华西列夫斯基的方案是：首先使南方方面军（即后来的乌克兰第4方面军）在从南面迂回美利托波尔的同时，迅速夺取西瓦什湖岸的彼列科普地峡，然后攻打赞科伊城，并随着退却的敌军乘胜直入半岛。为此，必须把北高加索方面军部队秘密地沿亚速海岸运送到这同一方向，以加强对敌军的打击力度和造成大部队攻击的突然性。此外，在赞科伊附近应空投伞兵部队，并使亚速海区舰队在此实行登陆作战。为防止敌军从半岛各港口逃跑，黑海舰队应全面负责封锁海域的任务。

这个计划的优点在于，它规定要在选定的突击方向上大量集中兵力。但是，如果按计划要求的那样大规模调动北高加索方面军，敌军是不可能察觉不到的。而且，它也忽视了便于采取积极行动的刻赤方向。如放弃刻赤方向的突击，敌军则会从该处抽调大量部队，用以加强其赞科伊方向的防御。自然，如果不调动北高加索方面军到同一突击方向，而是在刻赤半岛直接实施登陆作战，则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强渡海峡的困难，另一个是夺取敌军重兵把守的登陆场的困难。而且，刻赤登陆战役也必须先期独立加以实施，这也便无形中暴露了苏军的战略意图。

但是，总参谋部在最后研究克里米亚战役作战计划的时候，多数人的意见认为华西列夫斯基的方案得大于失。上报后，大本营和斯大林本人也表示同意总参谋部的意见。这样，华西列夫斯基的方案就被否决了。当然，斯大林也未对更多人说起过华西列夫斯基的这一设想方案。

10月底，总参谋部编制出了全套的克里米亚战役计划，即先期由北高加索方面军实施刻赤登陆战役，待获得成功，南方方面军开始由克里米亚地峡向南，北高加索方面军则由东向前同时实施两路向心突击作战。当安东诺夫请示华西列夫斯基时，后者也表示同意。

这样，当华西列夫斯基尚在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前线的时候，北高加索方面军就开始了刻赤战役的登陆作战。此前，奉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命令，伏罗希洛夫元帅作为大本营代表，作战部长什捷缅科上将作为总参谋部代表，就已到达北高加索方面军所在的塔曼半岛。

11月初，刻赤战役打响了。两天内，黑海舰队的舰只就把该方面军麦利尼克中将军的第56集团军的第一梯队送上了刻赤半岛。登陆部队击溃了敌军的顽抗，连续攻下若干个构筑在悬崖上的支撑点。勇敢的哥萨克军人在这种无火力掩护的夜袭作战中大显神威，他们常常出敌不意地出现在德国人的筑垒阵地上。待敌人明白过来以后，这块坚固完好的筑垒工事便已经换上了新主人。经过两周左右的战斗，登陆部队终于在刻赤东北方向建立起一块正面为10公里、纵深为6公里的登陆场。

在此后的两周中，刻赤的敌人守军曾多次向这块登陆场发起强烈的反冲击，他们企图把苏军赶下海，或干脆消灭掉。但是，敌人的目的没能达到。在亚速海区舰队和黑海舰队的强大火力支援下，登陆部队英勇顽强地一次次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整个苏军阵地前面的山崖被轰平了，土地被烧焦了，但他们不但没有退却，反而逐步地扩大了登陆场的正面宽度和纵深长度。最后，在完成了牵制敌人预备队并防止其向赞科伊方向调动的任务后，登陆部队便退到刻赤地域苏军主阵地。这里特别挖好了地窖，以便战士们在半岛上过冬，等待春天西南方面军从克里米亚地峡向赞科伊方向的大规模进攻。

按照最高统帅大本营的命令，北高加索方面军改编成独立滨海集团军。

初时，仍由彼得罗夫中将担任集团军司令；后来，彼得罗夫被调回大本营工作，他的位置由叶廖缅科上将接替；待到1944年4月间克里米亚战役发起后，整个独立滨海集团军又都划入乌克兰第4方面军的建制，此后的集团军司令则换成第56集团军的麦利尼克中将。

其实，早在刻赤登陆战役开始的1943年11月间，乌克兰第4方面军的部分部队已经从行进间突入了彼列科普地峡。随后，又强渡西瓦什湖，占领了该湖南岸的一个不大的登陆场。此后，瓦西里耶夫中将指挥的坦克第19军经过连续作战，曾经突破了所谓“土耳其壁垒”上的德军工事，并前出到了阿尔缅斯克地域。此间，德军利用苏军坦克部队与步兵和骑兵部队相脱节的机会，曾一度堵住了防御缺口，并把坦克第19军堵在了里面。后来，托尔布欣立即命令克列伊泽尔中将的第51集团军绕过彼列科普，不惜一切代价地突入敌军防御，最后与坦克第19军胜利会师。至此，此一方面的战事乃告结束。

到1944年1月初，如前所述，当所有苏军乌克兰4个方面军准备进攻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即开始实施1943—1944年冬季进攻计划的时候，华西列夫斯基经与马利诺夫斯基和托尔布欣两位司令员商量，曾想利用进攻尼科波尔德军突出部时同时揭开解放克里米亚进攻战役的序幕，但由于德军并未像他们当初判断的那样向后退却，相反还加强了该地区的防御等因素，这一设想便随之作罢。由于华西列夫斯基已把这一计划作为建议提交给了大本营，所以大本营在后来的训令中指示他说，考虑到夺取克里米亚的战斗将是极其艰巨的，所以决定把它完全交给托尔布欣的乌克兰第4方面军。这样，在随后华西列夫斯基跟随乌克兰第3方面军进军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广大地区时，就未给托尔布欣这支部队分配任何任务，即让它专心地做进攻克里米亚半岛的准备工作。

后来，托尔布欣请示华西列夫斯基，说他的部队经过充分准备后，完全可以在3月间发起进攻克里米亚的战斗。华西列夫斯基表示同意，并把这一情况汇报给最高统帅大本营。结果，克里米亚地区极其恶劣的早春气候和亚速海上的强烈风暴阻止了这一战役的开始。于是，大本营最后决定，待苏军前出到敖德萨地区后再开始进行这次战役。因为那样将更有助于这一战役的顺利进行和尽快取胜。

当时，大本营关于克里米亚战役的整个战略意图是：乌克兰第4方面军从彼列科普和西瓦什湖，独立滨海集团军从刻赤地域同时向辛菲罗波尔—塞瓦斯托波尔这一共同方向实施突击，在半岛上造成分割德军成数片的形势，以防止其在运动中集中或见势不妙而撤退。黑海舰队和亚速海区舰队一则配合独立滨海集团军的行动，另则负责封锁环半岛海域，不使敌军有从海上撤退的可能。

战役开始前，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德军第17集团军由恩内克上将指挥，其全部兵力计有20万人左右，共由5个德国步兵师、7个罗马尼亚师、两个强击炮旅及大量炮兵、工程兵、建筑兵、警备部队和宪兵部队组成。敌军拥有坦克和强击炮215辆、作战飞机148架。此外，他们还可以使用配置在罗马尼亚和摩尔达维亚机场上的空军部队。在黑海水域和罗马尼亚港口克里米亚附近水域，还有7艘驱逐舰和雷击舰、14艘潜水艇、3艘护卫舰、3艘炮舰、28艘鱼雷快艇和大量的扫雷舰只。敌人的兵力主要布置在克里米亚北部。在彼列科普地峡和西瓦什湖，筑有纵深达35公里的3道防御线，在

刻赤半岛地域的纵深则有4道防御线。

参加这一战役的苏军，如果不算黑海舰队和亚速海区舰队，总兵力也超过了30万人，并配有56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6575门火炮和迫击炮以及将近1000架作战飞机。

提前运送到作战地域的各种口径的弹药多达4个基数，润滑油和燃料油则近乎5个基数，以及可供18昼夜使用的粮食及食品。由此可见，苏军显然具有相当大的兵力和兵器优势。此外，在战役开始时，苏军还在西瓦什湖上建有两处渡口，其中一处是长达1865米的架桥；一处是长1350米的舟桥以及同桥两端连接的长达600—700米的两道土堤。由于工程兵部队的特别设计，这些渡桥的载重量都在30吨以上。这就保证了T-34型坦克和重型火炮的渡湖。为了伪装和迷惑敌人，在距这些渡口约1公里的地方还建造了一座假桥。

3月2日，华西列夫斯基暂时放下与马利诺夫斯基的乌克兰第3方面军向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挺进的工作，专程飞往克里米亚北部的托尔布欣的司令部。第二天，他和托尔布欣召集了有第4方面军领导人、近卫第2集团军和第51集团军首长参加的战前会议，共同研究了克里米亚战役第一阶段的有关问题。随后，他们又亲自来到西瓦什湖地区进行实地勘察。这天，正赶上有强烈的风暴袭来，他们顶风冒雪在作战前沿走了约5公里，待要返回时，又遇到德军空袭，其中一串炸弹把随行的一辆军车炸坏了。幸好，车上没有许多人乘坐，只是司机和一位方面军司令部的参谋被炸伤了右手和面部。

当天夜里，华西列夫斯基向斯大林写了一份关于克里米亚战役准备工作实地考察的报告。该报告写道：

伊凡诺夫同志：

我今天和奥布霍夫同志（按：即乌克兰第4方面军司令托尔布欣）来到西瓦什湖畔的克列伊泽尔（第51集团军司令）处，并且从被列科普叫来了扎哈罗夫（近卫第2集团军司令），在现场了解了克里米亚战役的准备情况。昨天和今天下的大雨，把道路完全冲毁了，所有的汽车都停在泥泞的路上，只有拖拉机还可以勉强开动。本打算乘汽车去克列伊泽尔处，后不得不放弃这个主意而改乘乌—2式飞机。道路处于这种情况，战役是不能开始的，我们不仅不能为前进部队提供火炮和弹药，而且也不能供应食品和炊具。此外，在2月末被风暴毁坏的西瓦什湖上的渡桥，由于木料供应不上而耽搁了恢复工作。

据我亲眼看到的情况，以及直接参加战役准备工作的人员的报告，我认为，克里米亚战役只能在3月15日至20日之间开始。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在西瓦什湖上拥有两处顶用的渡口，才能把一切必需品运送到彼列科普和西瓦什湖地域。

请您批准上述日期。我已下达有关战役准备工作的各种指示，各集团军将马上着手结合我的指示研究各种问题。我将在3月4日再飞往罗吉昂诺夫（按：即乌克兰第3方面军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处，以便在战役开始前5天左右能回到

亚历山德罗夫

第二天，华西列夫斯基便回到了马利诺夫斯基的乌克兰第 3 方面军前线指挥部。

我代表大本营和方面军司令部感谢您出色的工作。您实现了自己的诺言，真是好样的！祝您取得进一步的成就。我将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一起为您申请政府最高级别的奖赏……

所以，华西列夫斯基才在祝捷电报中特别写上了“您实现了自己的诺言那句话。

3月28日，当华西列夫斯基正与马利诺夫斯基研究如何有效进攻敖德萨市的时候，忽然接到斯大林从莫斯科打给他的电话。最高统帅在电话中命令他立即去见伏罗希洛夫元帅，以便共同商讨有关乌克兰第4方面军和独立滨海集团军在克里米亚战役中的协同动作问题。斯大林还告诉他说，伏罗希洛夫元帅将于29日上午10点以前抵达克里沃伊罗格，并在那里等候他的到达。

第二天，华西列夫斯基从乌克兰第 3 方面军司令部直接飞到了克里沃伊罗格。伏罗希洛夫元帅在他的专列车厢里接待了华西列夫斯基。两人一见面，觉得特别亲切。

华西列夫斯基为人忠诚，又特别谦逊，这次他仍是以下级和学生的身份来与这位可敬的老首长谈话。伏罗希洛夫元帅也乐得如此，他从很早起便对华西列夫斯基有一种好感，并对他的迅速成长感到由衷地高兴。讨论正题之余，他们经常把话题引回到 10 年前。那时，华西列夫斯基还只是伏罗希洛夫领导的莫斯科军区下面的一个团长……

30 日，他们把谈话的地点移到了美利托波尔，为的是也让乌克兰第 4 方面军司令托尔布欣参加进一步的讨论。参加这次研究工作的，还有第 4 方面军军事委员和参谋长以及空军第 8 集团军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先向伏罗希洛夫详细介绍了乌克兰第 4 方面军实施北部进攻的全部计划，然后伏罗希洛夫也向他们介绍了独立滨海集团军的现在部署及具体作战计划。最后，华西列夫斯基和伏罗希洛夫根据研究结果共同向斯大林提出了一份实施克里米亚战役的综合报告。报告提出：如果天气情况许可，乌克兰第 4 方面军将不迟于 1944 年 4 月 5 日开始发起突击进攻，而独立滨海集团军则应在此后两三天内转入进攻。至此，克里米亚战役的一切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4 月 8 日，乌克兰第 4 方面军打响了进攻克里米亚半岛的第一炮。在各集团军开始进攻前，方面军军事委员向所属部队宣读了转入进攻的命令。命令说：“我们将要在我们的父兄 1920 年洒满鲜血的土地上战斗……让我们的英雄主义把伏龙芝军人的世界荣誉、俄罗斯武器的荣誉发扬光大吧！”

战斗开始后，乌克兰第 4 方面军所属的两支突击部队——克列伊泽尔指挥的向西瓦什湖南岸赞科伊方向进攻的第 51 集团军和扎哈罗夫指挥的向彼列科普方向进攻的近卫第 2 集团军——进展相当顺利。特别是赞科伊方向上，克列伊泽尔大军的凌厉攻势，使得德军只剩下招架之功，而毫无还手之力。最后，守军不得不要求刻赤半岛上的敌军增援。可是，就在这时，伏罗希洛夫和叶廖缅科指挥的独立滨海集团军也于 4 月 10 日 22 时对敌发起了猛烈进攻，经过 8 个小时激战，到第二天清晨便全部解放了刻赤，并开始向阿拉巴特湾和费奥多西亚湾之间的德军防御正面展开了有力的推进。这样，准备增援赞科伊去的德军立即陷于进退两难之境：去吧，这里后院火起；不去吧，那边城门吃紧。正在该部德军未决之际，前方已经传来消息：赞科伊陷落了。

为了克列伊泽尔的第 51 集团军迅速攻占赞科伊的伟大胜利，也为了扎哈罗夫的近卫第 2 集团军攻破彼列科普防线，首都莫斯科为英勇的乌克兰第 4 方面军鸣放礼炮以示庆贺。

此际，4 月初因急驰敖德萨城下协助乌克兰第 3 方面军攻城的华西列夫斯基，奉斯大林电令于 4 月 11 日赶回了克里米亚前线。斯大林在命令中说，敖德萨已经解放，那里的善后工作可由马利诺夫斯基负责。这边的克里米亚前线战事正酣，请务必前来协助托尔布欣进一步展开这里的工作。华西列夫斯基心想，自己没有分身术，否则最高统帅肯定会让他一边一半地工作的。

来到托尔布欣的前线指挥所后，华西列夫斯基先听了托尔布欣关于部队进展的详细报告。因扎哈罗夫指挥的近卫第 2 集团军正在遭受敌军的顽强抵抗，于是，他与托尔布欣商定：立即由坦克第 19 军和步兵第 279 师、反坦克歼击炮第 21 旅组成一个快速集群，由坦克战车搭载步兵同时前进，迅速插入敌军防御后方，以尽快攻占辛菲罗波尔。战斗至第 3 天，即 4 月 13 日，该快速集群就攻克了德军重兵把守的辛菲罗波尔城。随后，乌克兰第 4 方面军的其他部队也大踏步跟进，很多城镇和居民点先后获得解放。当苏军胜利的旗帜在辛菲罗波尔、叶夫帕托里亚和费奥多西亚等地的上空飘扬起来时，许多当地居民激动得热泪盈眶，奔走相告。他们纷纷拿出自己的食品和热茶在街道两侧招待他们的解放者们。

13 日当天，华西列夫斯基向最高统帅报告了克里米亚战场上取得的一系列重大的胜利。斯大林特别高兴，当即宣布对辛菲罗波尔的解放者给予嘉

奖。第二天，莫斯科又为他们鸣放了庆贺礼炮。

14 日之后，乌克兰第 4 方面军各部队开始从各个方向上向南部半岛猛烈进攻。炮声隆隆，旗旗猎猎，所到之处，敌军望风而逃，狼狈鼠窜。战场上到处都是敌人丢弃的辎重装备和枪支弹药。到 14 日黄昏，巴赫奇萨拉伊、苏达克、阿卢什塔等地均告解放。到 15 日，第 51 集团军的快速部队已前出到敌军最后要塞——塞瓦斯托波尔的防御外廓。与此同时，独立滨海集团军各部队也在行进间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并逐步向克列伊泽尔的第 51 集团军靠拢。它的近卫第 11 军正从辛菲罗波尔向巴赫奇萨拉伊开进；步兵第 16 军已经到达阿卢什塔地域；山地步兵第 3 军也到达卡拉苏巴扎尔和旧克里米亚之间的山地地带。正值此际，华西列夫斯基提出的使独立滨海集团军划归乌克兰第 4 方面军建制的请求，得到了最高统帅部的批准。这样，指挥系统终于理顺了关系。这对后来总攻塞瓦斯托波尔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这时，半岛上的大部分德军和罗马尼亚军队纷纷向塞瓦斯托波尔撤退，并在这里重新集结和组织兵力，企图依托坚固的城防工事负隅顽抗。这样做，显然有两种打算：一是据险固守；二是赢得撤退部队和技术兵器的时间。从 4 月下旬到 5 月初，德军统帅部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第一，把防御前线的不可靠的罗马尼亚军队撤下来换上了德国军队，同时空投和海运来了大量补充营以加强第 17 集团军的防御力量。

规定给坚守克里米亚的军队发双倍军饷，许诺凡是积极防御的有功人员可以分到这里的一份土地。第二，撤换了一路败退的第 17 集团军司令恩内克上将，代之以步兵上将阿尔门丁格。这是希特勒的惯常作法，每战一败，必先找出替罪羊予以撤职甚至军法行事，相反却从不承认自己有任何过错。

阿尔门丁格到任后，首先向塞瓦斯托波尔守军宣布元首命令。命令中说，克里米亚应该成为真正的堡垒城市，每个士兵都应该为保卫名而战斗到底。希特勒甚至公开向历史求援了，他说：“我要求每个日耳曼民族的人——不论是将军还是士兵——都必须用生命来守卫这个哥特人的最后堡垒。”（按：哥特人属于古日耳曼民族）。随后，在他的就职演说中，他竟咬牙切齿地发出了如下呼号：“元首委任我担任第 17 集团军的司令官……我接到了要保卫塞瓦斯托波尔登陆场的每一寸土地的命令。我要求所有人都必须名副其实地进行防御作战；要求每一个人都不许后退并守住每一道堑壕，每一个弹坑和每一个掩体。万一被敌人的坦克突破，步兵应该留在自己的阵地上使用大威力的反坦克兵器把它消灭于阵地前沿或防御纵深……军队的荣誉就在于保卫委托给我们的每一寸土地！德意志在等待我们履行自己的职责！

元首万岁！”

的确，塞瓦斯托波尔不愧为一座“堡垒城市”。如果你能找到 1855 年、1920 年、1941 年和 1944 年的作战地图看一看，你就会发现在所有这 4 个时期里，塞瓦斯托波尔的防御部署几乎完全一样，这是由于山、海和地形特点这些自然因素在这里起了极重要的作用。这里有 1855 年克里米亚战争时期留下的最早的筑垒；也有 1920 年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弗兰格尔匪帮修建的工事；1941 年德军进攻此地时苏军在这里重新加强了筑垒防御体系；而这几年来，德国法西斯又不断将其加固和扩充。到现在为止，德国军队在这里已经有了 6 道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堑壕，此外还有密如蛛网的铁丝网，遍布四周的地雷区及许多令人摸不清具体位置的永备性暗堡发射点。这一切，无疑都给苏军的进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障碍。

此间，华西列夫斯基和托尔布欣等指挥者曾多次对塞瓦斯托波尔组织过进攻，但都未能成功。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是在4月23日发起的，几乎所有的前线部队，如第51集团军、近卫第2集团军、濒海集团军，以及黑海舰队和亚速海区舰队等，都从各个方向转入了进攻，苏军强大的航空兵和炮兵部队也给予了相当猛烈的炮火支援。

但向前推进的距离仍十分有限，最有效的攻击地段也只是刚刚突破德军的第2道或第3道堑壕。这种情况表明，要迅速攻克克里米亚半岛上的这座要塞，远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和轻易。

为此，华西列夫斯基几乎绞尽了脑汁。而更加糟糕和令他心乱的还在于，斯大林对他们的屡攻不利还大加责难，甚至每天都在催问下一次进攻的时间及准备情况……

4月26日，华西列夫斯基与托尔布欣决定，将在30日使用近卫第2集团军在辅助方向实施突击，同时让近卫步兵第13军越过麦肯齐耶维山进入战斗，前出到北海湾，把在南区作战的敌人兵力的一部分吸引过来。而用于集团军主要突击方向上的所有步兵团队，都是训练好的强攻封锁队队员，在其编成内分别有步兵、工程兵以及使用喷火坦克和伴随坦克的坦克兵。预计在29日至30日凌晨，苏军所有的大口径火炮和152毫米加农榴弹炮、带有大型炸弹的远程航空兵、所有的加强武器和作战飞机都将一古脑儿地投向德军防御阵地。不管是暴露工事、潜藏永备发射点、雷区还是敌军战斗队形，全都施以不间断的轰击。这样，也好掩护坦克部队和伴随其前进的步兵强攻封锁队的强攻。到5月1日，再由第51集团军和濒海集团军从南面实施迂回，以便夹击城内敌军。同时，也须调动半岛上大量的游击队兵团参加辅助作战。

28日夜，华西列夫斯基将这一计划详细地报告给斯大林，后者认为这一计划和兵力部署、兵器配置都是可行的。可是，当华西列夫斯基说这次进攻还要做新的拖延时，斯大林立即火了，话语十分激烈。然而，华西列夫斯基明白，无论怎么好的进攻计划，如果当它还没做好充分准备便去实施，其结果也只能是徒劳充益。因此，他只能耐心地向最高统帅做不放弃自己立场的说服和劝导工作。最后，斯大林终于同意在5月5—7日实施进攻。

攻击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5月5日，近卫第2集团军在强大的炮火和航空兵准备之后开始侧攻了。随着该集团军坦克和强攻封锁队的前进，方面军的所有空军又轰炸和扫射了敌军的战斗队形和炮火配系。尽管如此，敌军的抵抗仍十分顽强。但是，无畏的强攻封锁队在坦克过后，不惜与敌军展开肉搏大战。激战3小时后，肉搏战日趋白热化。勇敢顽强的近卫第2集团军不畏强敌，只进不退，到第一天结束时，他们已突破了敌军的第4道堑壕。附近1000米之内的土木发射点和永备发射点，全部被他们占领。次日清晨，该集团军再度发起攻击，敌人虽然还在拼死抵抗，但已明显地力量不支了。原来，据俘虏供称，这里的敌军已被抽调至塞瓦斯托波尔筑垒地域的内廓，加强其北部防御去了。

敌军果然中计。5月7日，整个方面军开始了总攻击，而这攻击方向恰好不在城北，而是在萨彭山方向上。这是敌人认为最万无一失的地带。当天下午，敌军这一方向上的防御线被炮火和坦克撕开了一条9公里长的缺口。苏军快速部队在前，步兵团队在后，缺口越来越大。到第二天下午，拥有36个永备发射点和27个土木发射点的萨彭山被攻占。萨彭山的陷落，就使整

个塞瓦斯托波尔城全部暴露在苏军的强大火力网之内。这几乎已经等于苏军拿到塞瓦斯托波尔这个炙手的大面包。

整整一夜过去了，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第三天上午 8 时，苏军再度发起总攻。

当然，这次是直接攻城。所有的城垣都被苏军的炮火和航空兵炸开。第 4 方面军的所有步兵师从数个方向压向城内，新的肉搏又开始了。由于敌军已经再无后退之路，便也个个拼死顽抗。然而，毕竟“败军之心分外怯”，几个回合的冲杀格斗，德军便支撑不住了。最后，他们纷纷退向了城外的一条狭长地段，即从奥麦加到赫尔松内斯角地段。这样，到 5 月 10 日，被希特勒法西斯宣传工具吹嘘为固若金汤的“堡垒城市”塞瓦斯托波尔终于被苏军占领。这座 100 多年来历经战争争夺之苦的英雄城市又回到了人民手中。

这几天，华西列夫斯基和托尔布欣一步也未离开过巴拉克拉瓦以北的濒海集团军指挥所。他们一方面时刻注视着前线各部队的进攻行动，随时为他们做战争导引和战略指挥；另一方面则不断把报告上来的战况向最高统帅部汇报，并随时等待最高统帅可能给他们发来的新指示。

5 月 10 日清晨，最高统帅的命令传来了。原来，这是一道嘉奖令。其中写道：

致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托尔布欣大将：

乌克兰第 4 方面军在航空兵和炮兵密集突击的支援下，经过 3 天进攻战斗，突破了敌人用 3 层钢筋混凝土防御工事构成的永备坚固的筑垒防御，并在几小时之前占领了黑海的要塞和重要的海军基地——塞瓦斯托波尔城，从而清除了德国人在克里米亚的最后抵抗基地。

克里米亚的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已彻底肃清了……

电报命令的后一半详细列举了所有在这次战役中表现突出的、报请授予塞瓦斯托波尔部队称号和勋章奖励的部队名单。

当天，莫斯科的礼炮声又响起来。当然，几乎所有的苏联人都知道它是献给谁或献给哪支英雄部队的。

从 5 月 11 到 12 日，濒海集团军和第 51 集团军突破敌人仅存的那条狭长地段——从奥麦加到赫尔松内斯角地段。仅此一地，就俘虏德军和罗马尼亚军队 2.5 万人，至于各种装备、兵器和弹药已经无法详细计算了。随后，苏军各部队和地方游击兵团四处出击，将敌塞瓦斯托波尔集团残部全部肃清，并在 12 日当晚前出到黑海沿岸之全线。

至此，攻坚夺险的克里米亚战役全部结束。

华西列夫斯基心情格外高兴。嘴上虽然没说，但心里也在为自己、为英雄的乌克兰第 4 方面军感到无上的骄傲和自豪。这难道不应该吗？当然应该。作为一名精于算计的军事统帅，此刻他也在心里默默地统计着这次战役的另一种数字：1941—1942 年冬，德军和罗马尼亚军用了长达 250 余天才从苏军手里夺去塞瓦斯托波尔，而我们今天夺回它则前后只用了 35 天，而且，今日德军所构筑的防御工事远要比当年苏军所拥有的那些完备得多，坚固的多呢。

他不禁又想到，拥有 20 万人和无数精锐技术兵器的德军第 17 集团军全部报销了。

20 万哪，这是个小数目字吗？……

他当时太激动，也太兴奋。在塞瓦斯托波尔被攻克的当天，他就提出要在那里去看看。看什么呢？是看那些遍地的敌军横尸还是看那些狼藉不堪的城区残垣？是看那被毁的家园还是看那仍在冒青烟的永备发射工事的残景？是到那里去看敌军失败的证明还是去看自己胜利的注释？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反正，他决计到那里去看一看。

越野汽车在麦肯齐耶维山地区奔驰，坐在车上的华西列夫斯基看到前面出现了一条又宽又深的地沟形地带。他心想，这一定是敌军堑壕无疑了。但看它现在的样子，满地都是坦克战车履带压过的痕迹，中间和上面又交织覆盖上了许多新的车辙，还有那么多的士兵冬季战靴留下的杂乱无章的脚印。他不由地推断起来：几小时前，这里肯定是双方激战的战场，这些脚印不是苏军冲锋的士兵们的足迹吗……

突然，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奔驰中的越野车停住了。华西列夫斯基的遐思也中断了。他仿佛受到了重重的一击，随即歪倒在车前的挡风玻璃上。

原来，他的越野车轧到了一枚残存的地雷，整个汽车的发动机和前轮被爆炸的气浪甩到离车身四五米远的地方。司机斯米尔诺夫中尉伤了左腿，由于他与司机并排坐在驾驶室里，所以头部受了重伤，脸部也被挡风玻璃的碎片划破了。而护送他的基亚尼茨基将军和他的两名副官倒未受伤——他们3人坐在后排。

大家全都惊呆了。这里怎么还有地雷呢？那么多的车和人走过竟都没碰到它？

大家慌忙把华西列夫斯基和司机包扎了一下，立即送往方面军司令部。再往后，他被飞机送往莫斯科……

第十四章 巴格拉季昂计划

疗伤病榻亦运筹，只因大战费思谋；
扇形阵势百万军，计借古人好名头。

当华西列夫斯基还在克里米亚前线紧张地部署攻打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进攻时，斯大林与朱可夫元帅、安东诺夫副总参谋长等就在莫斯科开始了1944年夏季战役作战计划的运筹帷幄。

1944年夏季战役，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白俄罗斯战役。其实，早在1943—1944年冬季战役正在激烈进行时，苏军最高统帅部就已经决定，应该在夏季实施几次重大战役，以最终解决和歼灭部署在斯摩棱斯克以西广大正面上的法西斯“中央”集团军群，并彻底解放自战争爆发以来一直被法西斯军队所占领的白俄罗斯领土。要知道，这些地区的广袤领土及生息在它上面的无数苏联公民，已经被法西斯摧残蹂躏达3年之久了。

华西列夫斯基当然清楚，最高统帅之所以一再催他加快克里米亚战役的进程，就是因为必须抢时间以及早展开白俄罗斯战役。一方面，需要他这位副国防人民委员和苏军总参谋长回莫斯科投入白俄罗斯战役有关的一切运筹帷幄与精确计算；另一方面，也需要尽早地把那些已经完成了解放祖国南方疆土任务的精锐苏军部队调运到新的作战方向上。 华西列夫

斯基担任此职是在 1943 年 5 月，当时国防人民委员会再度改组，人民委员为斯大林，副人民委员只两人，即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

4 月 23 日，朱可夫从乌克兰第 1 方面军前线被斯大林召回莫斯科。斯大林、朱可夫、安东诺夫 3 人首先在最高统帅部开始了白俄罗斯战役作战计划的最初拟定工作。

就在这次具体研究和议论的过程中，斯大林曾打电话给尚在克里米亚前线的华西列夫斯基，希望他能抽出一两天时间来莫斯科谈谈他对于这次战役的设计和意见。但当时正在研究攻夺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紧要时刻，华西列夫斯基表示不能回去，并说再有 8—10 天就可以了。那时将攻克该要塞，整个克里米亚战役也就要结束了。

可是，斯大林已经急不可耐。他当时一方面要求华西列夫斯基就地写一份关于整个夏季作战设想的报告先交上；另一方面则提出要乌克兰第 1 方面军先行发起这次战役。但后者当即被安东诺夫有根据的分析否决了。朱可夫显然也同意安东诺夫的意见。这样，斯大林便说：看看华西列夫斯基的建议再说。但是，你俩先拟定个初步方案，以便届时我们共同讨论。

结果，就像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斯大林的急切心情没有使华西列夫斯基回到莫斯科，反倒是德军残留的那枚地雷把华西列夫斯基从前线送回了莫斯科。

万幸的是，华西列夫斯基的伤势并不特别严重。斯大林亲自下命令给他调来了最好的医生，要求对华西列夫斯基的头部做认真彻底的检查和治疗。结果表明，伤口并不深，并未危及颅内脑组织，主要是颅外创面较大和颅骨轻微损伤。这样，虽经医生一再劝阻和挽留，华西列夫斯基还是坚持提前出院了。他心里明白，最高统帅和战争形势都急需他立即返回自己那特别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去。当然，他本身也非常愿意并急切地希望回到正在进行的战事运筹和指挥中。

其实，还在住院医疗期间，华西列夫斯基一刻也未停止对白俄罗斯战役计划的思考和运筹。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样一来（指住院），我就有‘机会’再次考察总参谋部正在起草的白俄罗斯战役计划的细节。”

这次战役的代号叫“巴格拉季昂”，同以往的每次战役一样，它的代号也是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而确定的。“巴格拉季昂”是一位俄罗斯著名将军和英雄的姓，他的全名叫彼得·伊方诺维奇·巴格拉季昂。1812 年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远征俄国时，先是大败于莫斯科的熊熊大火，旋即在博罗季诺会战中受到重创，50 万大军只剩了 2 万余人，仓里逃出俄国，以致最后彻底败北于比利时南部的滑铁卢。巴格拉季昂即是这次会战中的著名英雄之一。

住院期间，华西列夫斯基还从向他汇报的第一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及作战部长什捷缅科那里得知，当时还对包括这次战役在内的整个 1944 年夏季战局计划采取了许多隐蔽和保密措施。

为使计划避免外泄，当时知道该计划全貌的，除了斯大林外，只有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安东诺夫、什捷缅科和另外一名作战部副部长 5 人。此外还规定，对该计划严格禁止公文往来，同样也禁止在电话上交谈或利用电报传送。各方面军的战役企图也只有司令员、参谋长和军事委员 3 人参加拟定。文件必须是手写的，要汇报的话也只能司令员亲自来。大功率无线电台禁止使用，训练用无线电通讯网也只能使用距前沿不小于 60 公里的小功率发射台。而且，作业时要在专门的无线电监督下使用低架无线进行。

为了迷惑敌人，总参谋部特别指示在南方的乌克兰第3方面军，要在南部各方向上故意显示出加强兵力的集中。在这些假的集中地域内，每天都安排有大量的坦克、汽车、火炮和人群的运动与配置，在坦克和火炮模型的配置地点故意设置高射炮群防卫，甚至在某些地段还采用出动歼击机巡逻的办法，以显示它的对空防御措施。

与此相反，在大量部队已经秘密调进指定位置的西部中央方向，故意派出小股部队在白天进行热烈甚至是热闹的“防御性”作业，所有前沿地区的工事和筑垒都是完全防御性的。此外，向这里大量调入的各种作战物质和装备，包括各部队在内，都是不经任何中转方式而直接进行的；如必须中转，则事先全部车站内外实行戒严。

其实，连铁路工作人员也不知这是大战前的物资和人员集中。

后来的事实表明，这种保密和隐蔽的方法确实大大奏效，以致德国统帅部一直认为苏军夏季攻势的方向不是在西部中央方向，而是在南部；即使在西部方向有所行动，也是次要的牵制性局部战役。因此，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在它的地段未采取任何积极的防御措施，相反倒在南方方向大筑特建反坦克堑壕，集结兵力并调运预备队。当时担任德军第4集团军司令官的蒂佩尔斯基尔希后来写道：“加里西亚前线德军莫德尔将军认为，除了他所在的地段外，俄国人不可能在其他方向上进攻。

德国最高统帅部也完全同意他的观点。”

为实施这次重大战役行动，苏军最高统帅部还对各主要参战的方面军进行了新的调整和调动，建立了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1、2、3方面军。

此外，当时还规定，在这条突击线的南北两端，分别安排有乌克兰第1方面军和波罗的海沿岸第2方面军做掩护性侧翼进攻。在上述4个方面军的后侧的是大本营预备队，其中两个最有力的集团军——克列伊泽尔的第51集团军和扎哈罗夫的近卫第6集团军，是从克里米亚战场上刚刚调过来的。此外，预备队的编成内还有4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2个坦克集团军，52个步兵和骑兵师，6个独立坦克和机械化军，33个航空兵师。另外，在白俄罗斯地区敌军后方活动的还有37万多人的游击兵团和大型游击队。

稍后，最高统帅部又把担任主要突击的上述4个强大方面军部队分别编成了两个集团。A集团由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组成，共有39个步兵师，2个坦克军，1个骑兵军，6个炮兵师（其中2个是火箭炮兵师）。B集团由白俄罗斯第1和第2方面军组成，共有3个步兵师，1个坦克军，1个机械化军，3个炮兵师（其中有1个火箭炮兵师）。两集团加在一起，计有77个步兵师，3个坦克军，1个机械化军，1个骑兵军，6个炮兵师，3个火箭炮兵师。

与苏军正面而对德军的“中央”集团军群，包括有坦克第3集团军、第4集团军、第9集团军、第2集团军。这些部队加在一起总共有42个师。若把该集团军群侧翼的其他集团的兵力也加上，总共也才只有63个师。

上述说明，不论在作战准备、方向判断还是兵力配置等各方面，苏军都占有绝对的强大优势地位。尤其可笑复可怜的是，这时的希特勒和他的纳粹战略家及将军们对这些还不清楚。

5月20日，伤愈出院的华西列夫斯基第一次应召到斯大林的办公室，同时参加的还有朱可夫、安东诺夫和什捷缅科。他们这次是在最高范围内审

定“巴格拉季昂”战役计划的细节问题。当时，该计划只有1份手写稿，系由作战部副部长格雷兹洛夫将军亲手书写的。据什捷缅科后来回忆，它的全部内容只有一份简短的文稿和一张战役计划图。

第二三天，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几乎全是在斯大林那里度过的。其中第三天，还召集来了所有担任主要进攻方向的那4个方面军司令员，以及苏军各兵种领导人和总参谋部的部分人，以便进行更加广泛深入的研究和讨论。经过这次充分的讨论，总参谋部又负责对战役计划做了进一步的修正和明确，“其目的就是合围并消灭明斯克地域内敌中央集团军群的有生力量”。

5月30日，最高统帅和大本营最后批准了“巴格拉季昂”战役计划，并规定从6月19—20日开始执行。

关于这个计划的特点，华西列夫斯基曾有8个字的精彩概括：“简单明了，大胆宏伟。”他具体写道：

（“巴格拉季昂”）计划简单明了，同时既大胆又宏伟。

它的简单明了表现在，它是以关于利用在白俄罗斯战区形成的对我们有利的苏德战场态势这一决定作为基础的。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知道，这些翼例对敌人是最危险的，也是防御最严的。计划的大胆来源于不惧怕敌人的对策而力图在一个战略方向上实施对整个夏季战局有决定意义的突击。能够证明计划宏伟的是，计划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意义，它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还规定了为实现军事战略的总任务和政治目的而进行的大量方面军战役。这些战役是计划中规定同时实施或相继实施的，它们看起来是孤立的，但是相互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就在“巴格拉季昂”战役计划被批准的当天，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又被召到斯大林的办公室。像往常那样，斯大林对他们说：既然计划已经完成并通过了，那么大本营目前的任务就是帮助各方面军的首长和部队更好地准备战役，然后实施战役。希望他们最好马上就分头到各个方面军去，那里最需要他们。斯大林就问他们愿意到哪个方面军去，两人都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共同表示愿意到被指定的地方去。

这样，斯大林便开始点名指派了：朱可夫去白俄罗斯第1和第2方面军，而华西列夫斯基则到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和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去。

5月30日夜，斯大林、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安东诺夫4人再次聚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这是白俄罗斯战役前苏军正副最高统帅和正副总参谋长的最后一次聚会。在这里，他们结束了运筹帷幄“巴格拉季昂”大战的最后一道工序，这就是研究并起草了给白俄罗斯各方面军的各个训令，关于立即投入准备白俄罗斯战役的指示和战役实施第一阶段的具体任务。第二天，这些由斯大林和朱可夫俩人联合签署的训令便直接发往了各方面军部队。与此同时，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俩人以大本营代表身份分别签署的给巴格拉米扬和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罗科索夫斯基和扎哈罗夫的训令也发了下去。他们要求这4位方面军司令员在他们到达部队之前，先行确定好完成战役准备和开始进攻的日期。

31日，华西列夫斯基还在总参谋部直接召见了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司令员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上将，后者因病未能参加5月23日斯大林主持的那

次讨论战役计划的大本营会议。华西列夫斯基向他详细地介绍了“巴格拉季昂”战役的全部计划和该方面军的具体任务，并亲切地询问他还需什么具体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对这次会见感到由衷的高兴。他知道，华西列夫斯基将同他一起负责实施所在方面军的战役作战任务。而且他还知道，自己这次首次出任方面军司令员一职，也是经由华西列夫斯基向斯大林直接推荐的。

记得还是在南方作战前线时，斯大林在一次电话中请华西列夫斯基推荐一位未来的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司令员。当时华西列夫斯基回答说，有关白俄罗斯战役的一切问题，他与安东诺夫曾谈过多次。因此，他个人和总参谋部的意见是把年轻而勇敢的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上将作为该方面军司令员的唯一候选人。后来，斯大林同意了他的意见，并在4月间发出关于任命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命令。

顺便说一下，当时斯大林还向他提出了关于正在筹建中的白俄罗斯各方面军高级首长的人选问题，并指定要从他所最熟悉的乌克兰第4方面军中抽选这些高级指挥人员，以便在白俄罗斯战役中能够得心应手地加以有效使用。那时，除了上面提到的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以外，华西列夫斯基还从乌克兰第4方面军中推荐了两位集团军司令，即扎哈罗夫和克列伊泽尔，此外还有一些军一级的指挥人员。后来表明，这些建议没有白提，扎哈罗夫接替了彼得罗夫成为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司令，克列伊泽尔和他著名的第51集团军，先被安排到大本营预备队进行短期补充和休整，随后就被派到白俄罗斯战役的主要作战方向担任主攻集群了。另外的那些军长和他们的部队也很快被调去参加白俄罗斯战役。

6月4日，华西列夫斯基由莫斯科出发，他的大本营代表指挥所同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司令部在一起。出发前一天晚上，斯大林又把他和朱可夫召到克里姆林宫。这次，斯大林没有更多地对这两位爱将提出什么要求，只提醒他们要经常让他了解前线战事的发展情况。在特地为他俩准备的宴席间，斯大林频频举杯祝酒，祝他们和他们所在的部队取得胜利，大败法西斯。

当天16时，华西列夫斯基一行来到了设在斯摩棱斯克州红城附近的森林中的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司令部。在他的指挥所里，已经事先准备好了能同大本营、总参谋部及各方面军和各集团军司令保持经常与可靠联系的电报、高频电话及无线电通讯设施。同他一起到达并将展开工作的还有苏军炮兵副司令奇斯佳科夫上将，空军副司令法拉列耶夫空军上将。他们的任务是帮助华西列夫斯基协调这两个方面军的炮兵和空军的行动。此外，还有一个直接受华西列夫斯基领导的以波塔波夫中将为为首的总参谋部军官小组。

晚餐过后，华西列夫斯基听取了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关于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战役计划及其实施准备工作方面的汇报。根据大本营5月31日的训令，这个方面军的战役任务是与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左翼和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协同动作，粉碎位于其正面的敌维捷勃斯克—奥尔沙集团。为达到这一目的，规定将实施两个突击：一个是由第39集团军和第5集团军在方面军的北面实施。其中第39集团军应当从西南面迂回维捷勃斯克，与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左翼协同动作，粉碎敌维捷勃斯克集团并占领该城；而第5集团军则穿过鲍古舍夫斯克、先诺和卢科姆利诸地域，挺进到别列津纳河上游。另一个突击由近卫第11集团军和第31集团军负责实施，该两集团军在粉碎敌奥尔沙集团后，应沿明斯克公路干线向鲍里索夫发起进攻，并利

用坦克和骑兵的快速部队来扩大和展开这一总方向上的胜利。

切尔尼亚霍夫斯基还向华西列夫斯基报告说，他们经过研究已经决定，方面军将迅速建立完成上述任务的第一梯队4大突击集群。这些突击集群将以上述各集团军的精锐部队组成，平均每个集群约有步兵师5—6个，同时配以坦克旅1—2个。作为方面军第二梯队组成的，主要是几个快速兵团，如近卫机械化第3军、近卫骑兵第3军和近卫坦克第2军。后来，大本营又给增派了强大的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切尔尼亚霍夫斯基还介绍说，为保证各突击集群能顺利地冲破敌军防御，方面军还抽调了146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5764门火炮和迫击炮，以加强第一梯队的加强兵器这样，就使平均每公里的突破正面上有44辆坦克和175门大炮。

华西列夫斯基对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这种集中使用加强兵器的作法很表赞赏，但他强调指出，必须严格协调步炮合同以及整个步炮兵与坦克兵和航空兵之间的行动。

第二天，在方面军首长的陪同下，华西列夫斯基还专程到第5集团军视察并了解了前线的部署和伪装等问题。随后，他又专门召集各前线航空兵部队首长会议，与随行的空军副司令法拉列耶夫等一起研究了航空兵部队的协同作战问题。

6月8日拂晓，华西列夫斯基离开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带着随员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巴格拉米扬大将的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司令部。在这里，华西列夫斯基对一切都感到熟悉和亲切，颇有一种如鱼得水之感。因为，该方面军司令员巴格拉米扬和参谋长库拉索夫两个人都是他1936—1937年在总参军事学院学习的老同学，从那时到现在，他们之间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尤其是库拉索夫，他们认识得还更早呢。那是在1935年冬。当时，华西列夫斯基正以伏尔加河流域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长的身份去参加一次由白俄罗斯军区组织的战略野外训练作业。库拉索夫正好在白俄罗斯军区司令部工作。后来，当华西列夫斯基1940年升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之职后，他便把还在总参学院当主任教员的库拉索夫调任他原来的职务。1941年8月，他成为总参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后，库拉索夫再次接替他的工作而成为作战部副部长。那时，他们相处得非常好。

多年好友这次又要新的岗位上共事，这大概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和乐事吧。

当天，他们整天都在巴格拉米扬的指挥所里，华西列夫斯基先后听取了方面军司令、参谋长、各兵种首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关于战役准备过程以及战役的物资保障等方面的报告和说明。

按照大本营5月31日的训令，该方面军在战役第一阶段的任务是，在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配合下粉碎敌维捷勃斯克—列佩尔集团，前出到恰什尼基和列佩尔地域西德维纳河南岸。为此，必须用近卫第6集团军和第43集团军的兵力来突破戈罗多克西南敌人的防御，进而强渡西德维纳河并攻占别申科维奇。在协助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右翼完成合围并消灭敌维捷勃斯克集团后，该方面军主力拟向西继续发展进攻，一举攻占列佩尔市，切断德军第16集团军和坦克第3集团军之间的联系。

为此，该方面军首长决定把部队展开为一个战役梯队，并把坦克等作为快速集群使用。此外，他们还确定了各集团军突击集团的编成。具体说来，在近卫第6集团军中，由步兵第22和第23军组成第一梯队，由第103军和

近卫第2军组成第2梯队进行突破；在第43集团军的突破集团中，由步兵第1和第60军组成第一梯队，步兵第92军作为第2梯队。在方面军预备队中，除了坦克第1军外，还有一个步兵师留在突击集团的右翼。

华西列夫斯基认为该方面军的战役计划是完全可行的。这样，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的战役准备就顺利通过了。当夜，华西列夫斯基又回到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

在此后的几天中，华西列夫斯基一直在为铁路工作的缓慢而发愁。因为，一旦承担进攻任务的部队及其所需要的物资和技术器材不能如期到达指定位置，任何周密的计划也等于白费。而且，由于铁路运输的拖延，必将会使战役发起时间推迟，而这给高度集中起来的部队和大量技术兵器的隐蔽和伪装又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因此，他曾多次向斯大林打电话并递报告，要求最高统帅对此给予高度重视。

他甚至在6月13日夜写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

完成您的指示的准备工作正在全速进行，正在研究各个细节。现有部队在您指定的期限之内无疑将会准备就绪，大家对胜利充满信心。

但是，对于铁路能否把炮兵第4旅和第15旅、奥斯利科夫斯基将军的骑兵军、弹药、燃料以及罗特米斯特罗夫所属各兵团按时运到，我们仍感担心……我再次报告，开始的最后日期将完全取决于铁路工作，我们方面已经作好而且还在继续做着一切努力，以便不耽误您所规定的进攻期限。

朱可夫也就这一问题向斯大林提出报告，抱怨铁路运输极为缓慢。他说：“在我负责的地段上，铁路运输现在已成了最大的问题。据我了解，不仅各种装备和技术兵器，而且连作战部队也未全部到达指定地域。”因此，他建议必须迅速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甚至请斯大林出面加以干预。

由于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的一再催促，终于引起了最高统帅部的重视。后经斯大林亲自过问，交通人民委员会才改变了原运输计划，但是，这种修正已经太晚，以致最后不得不把进攻时间推迟到6月23日。

每当大战之前，都是华西列夫斯基最为繁忙的时候。作为苏军总参谋长，他要对所有的方面军和各集团军负责领导工作。总参谋部和大本营还要为考虑其他方向的作战或下一步的战役规划征求他的意见，或干脆要求他主持这些工作。而作为派赴某一指定位置的大本营代表，他也丝毫不能因上述问题而推卸自己的责任。因此，他常常有一种恨不能分身几处的想法。

6月18日深夜，斯大林突然给他打电话，问他能否在不影响自己负责的当前地段工作的情况下来莫斯科两三天。有什么办法呢？只有应命以赴才好。于是，第二天他就回到了莫斯科。待见到斯大林后，他才知道是北部战线上的列宁格勒方面军出现了新的问题。原来，列3格勒方面军经过激烈拼杀在卡累利阿地峡战线上挫败了芬兰军队。正当他们准备鼓起余勇突破芬军的最后一道防线时，突然得到可靠消息说，德国统帅部已命令防御在南卡累利阿一线的兵力迅速向卡累利阿地峡运动和集结。

这样，列宁格勒方面军的进攻便很可能会因敌军的顽强抵抗而停顿下来，甚至会出现由于敌军的反冲击而使该方面军严重受挫的危险。

当晚，华西列夫斯基就与斯大林和安东诺夫一起从各个方面研究起来。经与列宁格勒方面军首长电话联系，又与卡累利阿方面军首长通话，终于理

出个大致的头绪。他们认为，列宁格勒方面军仍应坚持原来的强攻措施，但必须尽最大可能提前发动；而卡累利阿方面军必须在南卡累利阿地域即时发起斯维里—彼得罗扎沃茨克战役，以牵制住苏军的北上增援行动。战役发起的时间最迟不得晚于 6 月 21 日。同时，大本营还命令奥涅加湖和拉多加湖的区舰队全力以赴地配合卡累利阿方面军的行动。

此后，斯大林指示安东诺夫向华西列夫斯基介绍了盟军正在实施之中的诺曼底登陆行动及其最新进展情况。安东诺夫说，现在是登陆行动的第 13 天，盟军已经把初时的 3 个不大的登陆场连成一片，并正在向科汤坦半岛方向作扩大展开。总之，目前的推进速度应该说是极端缓慢，这显然与其大量兵力和兵器不相匹配。斯大林请华西列夫斯基谈他的分析和看法。华西列夫斯基认为，这。可能是盟军在静中观变的一种战法，即看看德军会不会再从苏德战场继续撤兵西驰，或者干脆是英国人要稳住德军。当话题谈到英美军队此次诺曼底登陆作战对苏德战场的可能影响时，他们一致认为，苏军一旦开始大规模的白俄罗斯战役行动，并继续顺利地往北方进攻芬兰，希特勒和他的统帅部将再会把西线部队部分地移到东线来。

第二天晚上，斯大林又专门请华西列夫斯基把白俄罗斯第 3 方面军和波罗的海沿岸第 1 方面军的详细准备情况向他报告。他们对在白俄罗斯第 3 方面军进攻地段正确地使用坦克第 5 集团军问题，作出了新的安排。华西列夫斯基建议，应把该坦克集团军由原来的奥尔河—鲍里索夫方向转移到鲍古索夫斯克—鲍里索夫方向上来。因为这一突破方向比原来的距离要近，地形也较好。而且，前方正面又没有更强大或密集的敌军。最后，斯大林同意了这一建议，表示暂时可以把坦克第 5 集团军留在大本营预备队，一旦需要，华西列夫斯基就以大本营代表身份对它发出命令。

正当华西列夫斯基要返回即将展开进攻突击的前线时，斯大林又把电话打到了总参谋部，要他先不要走。显然，又有新的问题出现了。

果然，是朱可夫在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前线打来电话。他要求大本营允许把该方面军的进攻日期向后推迟一天，即由原定的 6 月 23 日改为 24 日。斯大林为此征询华西列夫斯基的意见。他回答说，这事他要与巴格拉米扬和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商量一下。

商量的结果是，两位司令员认为可行。特别是切尔尼亚霍夫斯基还保证说，这不会给他的侧翼带来什么不安全。

华西列夫斯基当然也认为是适宜的。随后，他由此又突然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

于是，他向斯大林建议说，这样，“我们便能够在 6 月 22 日夜，即在白俄罗斯第 3 方面军和波罗的海沿岸方面军开始突击进攻之前，利用大本营派给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的远程航空兵了。待我们用过之后，再让它们回到原先的位置上，即在 6 月 23 日夜继续执行它先前的指定任务，岂不两全其美？！”

斯大林听后笑了：“我完全同意，但这必须与朱可夫元帅沟通一下。”接着，他又说，“这对你们还有一个好处，而这是您和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同志没想到的。”

“什么？”华西列夫斯基问道。

“你们还可以多增加一天进攻的时间呢。”

俩人都笑了起来。

6月20日，华西列夫斯基终于被放回了前线。

第十五章 白俄罗斯大逐鹿

钢铁洪流军魂铸，移师西线大逐鹿；
驱逐德寇出国门，遣将驱兵智谋足。

1944年6月22日是个不平常的日子。

3年前，希特勒法西斯德国侵略者正是从这一天开始大举进攻苏联的。而现在，当苏德战争经过整整3年的激烈作战和反复较量之后，苏军不仅早就牢牢地掌握了战争的战略主动权，而且在南部广阔战场上已把侵略者逐出国境，战争很快就转到了敌国战场。

在苏联西部地区，即在有着广袤的森林和大片沼泽地带的白俄罗斯地域，一场千里逐鹿、横扫敌寇的新的大战马上就要展开了。

先一天的夜间，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和它左右两翼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和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的突击部队，已经进入了指定的作战出发地。

当天，各地段上先遣营的侦察作战突击小队已经冲向德军的前沿阵地，火力侦察开始了。远程航空兵的轰炸机群和歼击机群也从隐蔽地域移向了指定机场。由各种口径火炮组成的强大火力配系的炮群也都退去了伪装，黝黑发亮的炮筒直指战场前方。

到了下午，前线各方面军的部队都已经拿到了战斗命令和军事委员会的号召书。

突击集群的将士们正在分别以营为单位召集党员会议、团员会议及各种座谈讨论会。

在隐蔽在一片森林中的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司令部里，参谋人员往来穿梭，电话铃声不断。华西列夫斯基和方面军首长们不时地起来又坐下，坐下又起来，他们在听取来自各个方面的报告和汇报。他们格外关注的是今晚和次日拂晓的气象部门的报告。到21时，气象部门最后一次的消息传来了：和前几次预报结果一样，午夜至明天上午该地区仍是阴转多云。

怎么办呢？切尔尼亚霍夫斯基拿着刚刚送来的气象报告单来到了华西列夫斯基面前。华西列夫斯基接过报告单看了一眼，面部表情并无任何明显变化。他站起身来，轻轻地向旁边踱起了方步。一会儿，只见他转过身子，以征询的口吻平静地说道：“我看，我们只能在没有远程航空兵支援的情况下单独使用炮兵火力配系了。”

无论如何，进攻时间也不能拖后一点儿，这是全局的需要。”切尔尼亚霍夫斯基赞同地点了点头。随后，他们找来了苏军炮兵副司令奇斯佳科夫上将，最后研究了～下如何进一步加大炮群火力的问题。

22时45分，方面军参谋部和作战部的两位首长前来报告说，经过核实和整理，各先遣营的侦察战斗结果表明，正面敌军的防御没有出现新的变化，部队还另外发现了敌人的几个防御炮火配系。此外，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近卫第6集团军所属的第22军，已经随先遣营之后开到了被打开的突破

口附近。他们的先遣营已经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堑壕，突破正面已经被推进了6公里。华西列夫斯基与方面军首长商量决定；一切行动按预定计划进行。

6月23日晨6时，各个预定地段上的轰击炮群发言了。猛烈的炮火像道道闪电，急速地穿过密密而厚实的云层。紧接着，就听到了前方敌军阵地上传来的山崩地裂的爆炸声。清晨的宁静被打破了。

与此同时，在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的作战地段上空，苏军的远程航空兵及方面军所属空军部队的机群也呼啸着冲向敌军防御纵深的上空。原来，这是该方面军首长和空军作战部队专门挑选了90架轰炸机和优秀飞行员，在恶劣气候条件下克服困难去执行任务。

大约40分钟过后，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和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的突击集群在各个地段上同时发起了冲击。仅在这两个方面军的突破正面，就有13个师的强大兵力向前猛烈地推进。其声势之大，犹如铺天盖地的滚滚巨浪。敌军阵地上，翻卷着火焰的浓烟直冲天际，巨大的枪炮声和喊杀声交织在一起，震耳欲聋，慑人魂魄。

昨天，德军防御前沿的部队与苏军先遣营交火后，他们也未感到这是大规模进攻之前的火力侦察和选择突破方向之举。因为德国统帅部和集团军司令官们一直都向他们宣传说，苏军的夏季攻势将是南方方向，根本不可能是他们所在的西部正面。可是，见了今天这阵势，他们明白了。但为时已晚。

到当日日终时，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的两个强大突击集群——近卫第6集团军和第43集团军——已经从预定方向突破了敌军的防御，并从西北部迁回到了维捷勃斯克的后面，推进纵深达15公里。而且，这两个集群在坦克和自行火炮的支援下，还在不停顿地向前推进，马上就要前出到波洛茨克—维捷勃斯克铁路了。显然，他们是要沿这一方向向前面的西德维纳河挺进。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布德利夫中将指挥的坦克第1军，它的任务是等候时机以便投入到日渐扩大的突破口去发展和扩大战果。

与之相对应，在维捷勃斯克以南的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所属的第39和第5两大集团军，也在迅速突破的行进间切断了南北铁路，并胜利地渡过了卢切萨河，大体保持了与北面的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友邻部队相等的推进速度。现在，在维捷勃斯克的西南部，德军只剩下一条宽度约20公里的狭长走廊地带。因此，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尽快地使第39集团军和北邻的第43集团军在奥斯特洛夫诺村地域会师，从而完成对敌维捷勃斯克集团的战役性合围。

鉴此，华西列夫斯基立即通过电话与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和巴格拉米扬商定，必须在最近两三天内完成上述合围任务，并尽可能使这个合围圈增大。时间的紧迫性在于，当时该地域西南方向有德军的预备队。如果稍有迟缓，圈内的敌军可能向预备队部署方向撤退，而敌预备队也可能前来增援接应。为此，他们又决定，只有派第5集团军部队加速进攻，事先抢占前方的先诺村地域，才能有效地阻止敌预备队的增援行动。随后，再把奥斯利科夫斯基中将指挥的骑兵机械化集群，在不迟于第二天晚上以前投入在鲍古舍夫斯克附近的突破口。一俟该集群前出到先诺村地域，就可以根据新情况的进展使之进一步推进，切断维捷勃斯克—列佩尔公路，并从西面回过头来再对奥尔沙方向做深远迂回。

在奥尔沙方向，近卫第11集团军和第31集团军在第一天就遇到了敌军的顽强抵抗。原来，这里有敌军在工事防御和炮火配系方面都十分强大的

一个集群。去年冬天的作战中，西方方面军就曾在这里严重受挫。现在，这两个集团军已经突破了敌军第一道坚固防御，正在艰难地向前推进。他们力图在第二天的再次进攻之前进入敌军的第二道防御。由于他们的进展有限，作为大本营预备队的强大坦克第5集团军仍在原地待命。这时，它距近卫第11集团军和北面的第5集团军均有大约一天行程的距离。究竟把它投入到哪个方向上呢？这就要看哪个方向可能最先出现较大的战役广场了。因为。只有这样，该坦克集团军才能利用广泛的机动发挥出它的最大威力。

第二天清晨，即6月24日，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继续在各自的方向上发展进攻。

在维捷勃斯克北面，近卫第6集团军和第39集团军在一次遭遇战中与敌军展开了一场空前激烈的战斗。经过4小时激战，疯狂反扑的敌人被击退了。阵地上留下了不计其数的德军尸体，某些地段上刚刚萌生出的绿绒绒的小草，也全被染成了黑红色。

稍后，这两个集团军乘胜突进，前出到西德维纳河，并在行进间强渡该河，夺取了该河南岸的一个登陆场。在第43集团军渡河时，先是遇到了德军航空兵的轰击，随后正面又出现了从另一个方向扑来的德军步兵集团。这样，顽强的对垒作战又开始了。苏军战士凭着胜利的余勇，拼力掩杀，只进不退。有些步兵战士则直接抱起机枪向前冲锋，大量的坦克残骸都被当成突击行进的临时工事。终于，敌人被打退了，但该集团军的推进速度则因此而大大地慢了下来。

这时，南面的第39集团军进展异常迅速，正在缩紧合围圈。原来的那条狭长走廊地带已被他们切入近8公里，而且还在继续向前推进。该部侧翼的第5集团军也在迅速向前推进，其先锋部队已经前出到了距先诺村地域只有6公里的地方。

当天中午，华西列夫斯基打电话给巴格拉米扬说：“现在，合围维捷勃斯克敌军的成功与否，就取决于第43集团军的行动了。刚才我了解过，第39集团军的进展很快，我在电话中对柳德尼科夫表示了祝贺。你应该设法使第43集团军至迟在一天后与柳德尼科夫的第39集团军会合，会合地点应在格涅兹季洛维伊切地域通往维捷勃斯克的公路上。”放下电话后，华西列夫斯基来到了担任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第二梯队任务的斯大林格勒近卫机械化第3军。在这里，他和方面军司令亲自找到奥布霍夫军长，命令他的坦克部队必须在15时展开，以扩大并加深第39集团军和第5集团军之间的突破口。是晚，该部就已赶上并超过了上述两支部队，并在第二天由坦克搭载自动枪手率先突入了先诺村。

20时，经斯大林同意，华西列夫斯基按原预定方案把强大的坦克第5集团军划入了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建制，并当即下令给该集团军首长罗特米斯特罗夫，要求他立即突入鲍古舍夫斯克地域，利用第5集团军的突破口从后方迂回奥尔沙，向托洛钦和鲍古索夫方向挺进，以加强方面军左翼部队对奥尔沙敌军集团的攻击。但是，当时罗特米斯特罗夫对把他的坦克部队拨给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很不满意，因此执行命令并不坚决，以致该方向上攻击奥尔沙的近卫第11集团军险些受挫。后来，斯大林对此大发雷霆，责令罗特米斯特罗夫采取迅猛坚决的行动，否则大本营将予以军法追究。

6月25日，罗特米斯特罗夫的坦克第5集团军终于开始了指示方向的坚定突击。

但很快，它便在鲍古舍夫斯克附近遭到了敌军强大集团军的反突击，部队进攻几乎又告停顿。而这时，正在正面方向攻击奥尔沙的近卫第 11 集团军和第 31 集团军也与顽强抵抗的德军杀成了胶着状态。显然，他们一时也很难突破。这样一来，奥尔沙方向的战役展开便很可能大大迟于维捷勃斯克方向。甚至，它也要落后于晚一天发起进攻的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的行动。那么，结果必将要影响到白俄罗斯第 2 和第 1 两个方面军对莫吉廖夫和博布鲁伊斯克的进攻。

华西列夫斯基心里十分着急，怎么办呢？他踱步走出指挥所，看了看云层低低的天空，又看了看湿湿的地面。突然，他想起来了，他记得赫柳金将军指挥的空军第 1 集团军在这样的天气里也曾派出过飞行大队在奥尔沙正面实施空中打击，那么，为什么不能把它调到坦克第 5 集团军这里来用一用呢！想到这里，他急步走向指挥所，把自己刚才的想法与切尔尼亚霍夫斯基说了一遍，后者也表示可以一试。随后，华西列夫斯基以大本营代表的身份直接与赫柳金通了话并征询对方的意见，没想到对方立即回答说：“这完全可以，但现在几个飞行中队刚刚被派向了奥尔沙方向。不过，我可以立即命令他们改变飞行航向，以执行您的新命令。”

华西列夫斯基的眉头舒展开了。他立即打电话给罗特米斯特罗夫，要求他马上组织新的进攻突击队，15 分钟后将有航空兵给他们以火力支援。结果，90 架佩—2 式轰炸机和 180 架伊尔—2 式强击机从奥尔沙方向改变了航向，由它的正面直飞向后方的鲍古舍夫斯克地域。德军被这突如其来的空中打击轰蒙了，他们说什么都想不到苏军空军居然能在离地面不到 150 米的云层下面对他们发动奇袭。由于天气的关系，德军这里的部队根本都没有布置高射炮防御措施。这样，坦克第 5 集团军终于在当天晚上攻占了鲍古舍夫斯克城。

与此同时，在 25 日下午，维捷勃斯克南北方向的第 39 集团军和第 43 集团军也在先诺村以东的预定位置会合了，敌维捷勃斯克集团 5 个师以上的部队陷入了合围圈内。

该部敌军发觉被合围生，立即在刚合拢的两军结合部处发动大规模突围行动。然而，任其怎样动作，强大的合围像一支有力的铁钳，不公不能挣开，反而咬得更紧了。

得到这一消息后，华西列夫斯基经与两位方面军首长商量，一致认为，这部分德军是突围无望了。苏军则必须使主力继续向西挺进，以追求更大的战果并扩大战役的成功。

到 26 日，留下的第 39 集团军和第 43 集团军一部已经把合围圈紧缩到了最小的极限，并向走投无路的敌军提出了投降的最后通牒。德军提出给他们几个小时的考虑时间，苏军答应了。几乎就在苏军的眼皮底下，德军在自己的部队内举行了讨论会。

两个小时的规定时间已经过去，德军仍无正式回答。于是，苏军开始了进攻。不到 1 个小时，德军便开始大片大片地投降，他们根本不再继续执行指挥官的抵抗命令。

在被俘的敌军中，有 4 名将军。于是，华西列夫斯基和白俄罗斯第 3 方面军司令、军事委员以及在此的苏联空军副司令便分别对他们进行了突击审讯。由于被俘后他们是分开关押的，因而谁也不知道别人是否也已被俘。这样，华西列夫斯基在审讯德军步兵第 53 军军长戈尔维策上将时便出现了

这样的笑话：该上将认为他的被俘纯系偶然，是他个人疏忽的结果。而且，他还认为他的部队仍在城郊地区与苏军作战，并提出要求说，如有可能请告诉他郊外战斗的最近进展情况。华西列夫斯基不动声色地对他说：“您的要求完全可以得到满足。但我想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您最好还是亲自向您的部下打听。”

戈尔维策一时怔住了，他觉得这位苏联元帅说得很矛盾：怎么一会儿说可以告诉他，随后又不告诉他了呢？这时，突然听华西列夫斯基对外边喊了一声：“带进来吧。”

片刻，上将的两名部下——第 206 师师长希特尔中将与他的参谋长施米特上校——低着头慢慢地走了进来。

华西列夫斯基平静地说道：“请您直接问他们吧。”戈尔维策一抬头，顿时大惊失色。他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维捷勃斯克大捷的当天，应华西列夫斯基的请求，最高统帅部同意给切尔尼亚霍夫斯基授予大将军衔。稍后，经华西列夫斯基申请，又有 4 位集团军司令级的中将被授予上将军衔。此外，首都莫斯科的 224 门礼炮齐鸣 20 响，为维捷勃斯克的解放者们庆功祝贺。最高统帅斯大林也为前线部队发来了嘉奖令，要求嘉奖所有参加该市解放以前围城的各个部队。同时，斯大林还提出要对表现最为优异的部队授予维捷勃斯克的称号。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希特勒和德国统帅部，失败带来的怒气被发泄到了“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官布什元帅身上。同他的前任一样，这次他也被希特勒撤了职，接替他来的是德国陆军元帅莫德尔。然而，莫德尔元帅的临危授命本身，也在逻辑上包含了这样一个推理：一旦他也战败，那么等待他的命运只能是与其前任一样。说来也是，40 天之后，可怜的莫德尔元帅果然被赖因哈特上将取代。

却说奥尔沙地域的进攻局势，这几天也突然变得格外明朗起来。到 26 日傍晚，近卫坦克第 2 军已经通过迂回前出到了奥尔沙以西 15 公里通向明斯克的公路干线上了。

由此再往西，则是更强大的坦克第 5 集团军突出地。它的任务是继续向西跃进，占领鲍里索夫，并进而直取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同天夜间，担负奥尔沙正面进攻的近卫第 11 集团军和第 31 集团军，终于突破该城郊外的德军防御。第二天，奥尔沙就被攻克了。

向西推进路上的这颗钉子被拔掉后，整个近卫第 11 集团军和第 31 集团军的各部队便马不停蹄地沿着奥尔沙——明斯克公路干线疾驰西指，到 7 月 1 日，这支大军会同坦克第 5 集团军一举攻下了明斯克西北部的屏障鲍里索夫。至此，整个白俄罗斯第 3 方面军各部队便全部前出到了别列津纳河一线。显然，下一步的攻击目标就是白俄罗斯西部的最大城市——明斯克。

还在鲍里索夫未被攻取时，华西列夫斯基就感到应该看得更远些。因为，他相信，用不了几天，最多三五日，巴格拉米扬的波罗的海第 1 方面军部队就将解放其正面的列佩尔和波洛茨克；而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 3 方面军部队在夺取鲍里索夫之后，也将解放明斯克。因此，必须立即着手战役的新阶段，即不使德军有机会在白俄罗斯东北和东面筑起任何一条新的防线，而必须把他们一鼓作气地彻底赶出白俄罗斯，赶出整个西部国境线。鉴此，他在 6 月 29 日同斯大林通话时提出：在全部解决白俄罗斯境内德军的同时，必须着手进行解放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战役。

而这之前的当务之急必须是，使波罗的海沿岸第 1 方面军前出到波兰和东普鲁士边境，从而彻底切断敌军“北部”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的联系。使前者孤立干波罗的海沿岸，对其实施陆上和海上的双重封锁；而对后者则必须加以坚决彻底的歼灭。斯大林对华西列夫斯基的这种分析表示完全赞同，并答应他可以在前线开始具体部署和组织。

随后，应华西列夫斯基的要求，大本营把预备队中精锐的近卫第 2 集团军和第 51 集团军拨给了波罗的海沿岸第 1 方面军。同时总参谋部又把白俄罗斯第 3 方面军强大的第 39 集团军也划归它的建制。这样，该方面军就成为了当时战场上最强大的武装部队。

7 月初，解放明斯克被提上议事日程。

此前，希特勒要求莫德尔死守明斯克，并说要把该城变成在俄国作战的最后一座堡垒城市。这样，莫德尔便在明斯克以东建立起一条由多尔基诺沃到戈洛伊斯克、斯莫列维奇、直至切尔文的强大防线。为此，德国统帅部还从苏德战场的其他地段和欧洲国家调集一些新的预备兵团，连同莫德尔的“中央”集团军群的一些警备部队和特种部队也被调入这条防线。但是，就像早些时候别列津纳河防线一样，这条防线也没有能够“防”住苏军西进的强大铁流。希特勒的愚蠢在于，他应该为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而主动将该集群撤回波兰或本土，而不是硬把他们送到苏军已经张开的口中。当然，不甘心失败并拼力挽回失败，这就是一切失败者所经常陷入的一种逻辑悖论。

7 月 1 日，当鲍里索夫被攻克后，坦克第 5 集团军便插向东北方向。第二天便前出到了斯维斯洛奇河源附近，从而封锁住了德军北去的道路。第 31 集团军和近卫第 11 集团军则坚守东部方向并冲入敌军斯莫列维奇一段的防线。近卫机械化第 3 军渡过维利亚河后，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占领了维列伊卡，从而堵住了德军向西北方向的退路。随后，白俄罗斯第 1 和第 3 两大方面军主力分别由南北两个方向开始向明斯克西部包抄迂回。到 7 月 3 日，这两支大军胜利地在明斯克市中心会合。

至此，莫德尔方发觉，自己苦心经营的这道防线不但丝毫没用，反倒真正地把自己拴到了四面苏军的中间。先前，他想方设法要把部队调到这一地域以加强防守，现在，他则不得不琢磨怎么把这些部队弄出去以脱离苏军的手掌心。然而，一切努力都没用了，苏军白俄罗斯的三大方面军正在呈向心运动向他压来：在西北和北部的是第 3 方面军；正东面的是第 2 方面军；在南部和西南的是第 1 方面军。这就像一只中国人所喜欢吃的巨形饺子，苏军是面皮，德军则成了它里面的饺子馅。

作为“饺子馅”的部队，包括有从莫吉廖夫方向败退下来的第 4 集团军，从维捷勃斯克、奥尔沙以及博布鲁伊斯克各方向逃出来的坦克第 3 和第 9 集团军残部，还有莫德尔刚刚调来的那些预备兵团。以前侥幸溜出的和新近送进来的，这次可真要一锅端了。此间，合围圈内这些德军曾于 7 月 4 日到 8 日做过 3 次企图突围的冒险尝试：一次是向北，一次是向西南，随后又向正南。但是，这些冒险都未能得逞，相反倒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伤亡。据后来被俘的一名德军上将供认，仅在这 3 次突围中，他们就损失了大约 4 个师的兵力。

按大本营原来的计划，最后消灭合围圈内敌军的任务是交给整个白俄罗斯第 2 方面军及白俄罗斯第 3 方面军所属第 31 集团军的，但由于敌人越来越丧失战斗力，合围圈也在越来越缩小，最后便责成白俄罗斯第 33 集团

军和原指定的第 31 集团军来完成，并决定此后第 33 集团军也归入白俄罗斯第 3 方面军建制。7 月 10 日，这两支方面军开始向合围圈内的德军发起紧缩进攻。敌军虽然还在某些地段负隅顽抗，但整体状态已是苟延残喘，甚至气息奄奄了。到 12 日，被合围的敌人开始举白旗投降。有些德军士兵干脆把白衬衣一撕两半，把枪筒穿到一只袖管内高高扬起。经初步清点战场，被俘者约在 3.8 万之多，其中军官达 780 多名，将官 11 名。还缴获了德国第 4 集团军的全部技术兵器、装备和后勤单位。

此间受命接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长的古德里安后来曾经写道：

“中央”集团军群方面的情况，自 7 月 20 日以来就更悲观了，实际上是已经不堪收拾。俄军在贝里西拉与波洛茨克大沼泽地之间的攻击已经获得成功。6 月 22 日到 7 月 3 日之间，它已经在罗格齐夫、乔赛、奥尔沙以北和维捷勃斯克的两侧地区突破了德军的阵线，在整整地歼灭了德军 25 个师后，继续压迫德军逐步后撤。在最后数天内，俄军对于战果的扩张更是获得了惊人的胜利，不仅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已经站不住脚跟，而且“北部”集团军群也被拖住，陷入了全面崩溃的局面。

7 月 5 日，在明斯克获得解放之后，华西列夫斯基来到了该市市区。看到这座昔日秀丽的城市已经变成废墟，他的心情极为沉重。尤其是那些饱受法西斯蹂躏的市民们的饥黄而憔悴的面庞，更令他不忍卒视。整个城市几乎被离去之前的敌人炸掉。

发电厂、火车站、大多数工业企业和文化设施都不见了踪影。在较大的建筑物中，敌人没来得及炸毁的只剩下白俄罗斯政府大厦、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新楼和红军之家等。因为，德国人曾在占领期间用这些地方来办公……

明斯克和波洛茨克的解放以及明斯克东部合围圈内德军的被歼，在事实上结束了白俄罗斯战役第一阶段的战事。

在这个战役的第一阶段，主要是为了突破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战略防线。

因此，当时大本营的战略要求是四大方面军——白俄罗斯第 1、第 2、第 3 方面军和波罗的海沿岸第 1 方面军——沿各个方向实施向心突破，并在维捷勃斯克、奥尔沙、博鲁布伊斯克和明斯克等地域合围、歼灭掉敌军主力集团。现在，当这些任务完成后，就出现了立即追击敌人、进一步扩大突破口、横扫西线全部德军、驱逐其出苏联国境的新任务。

因此，最高统帅部在给上述各方面军的新训令中，就提出了各部队应立即沿所在地域离心方向实施突击和追击的任务。当时，大本营要求，在中部作战的白俄罗斯第 2 和第 3 方面军，必须直接向西挺进，前出到波兰东部地区。而在它们两翼的部队则分别呈扇形向西南和西北做大幅度展开，即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向西南、波罗的海沿岸第 1 方面军向西北然后向北全面展开。这样，整个战略布局像一把展开后的巨大扇面：白俄罗斯第 2 和第 3 方面军是轴线到中部的扇面；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是它的左翼扇面；波罗的海沿岸第 1 方面军是它的右翼扇面。这个巨大无比的扇面覆盖了整个苏联西部的白俄罗斯地区。其前端和左右两侧还分别覆盖了部分乌克兰、波兰、东普鲁士和立陶宛广大地区。

从 7 月中旬到 8 月下旬，在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直接指挥下，这只巨大无比的扇面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扇动。结果是，在扇面中部的白俄罗斯获得了完全解放，两翼和前部的乌克兰、波兰东部、立陶宛也被解放。苏军的整个西部战线一口气向前推进了 600 公里！其中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已经前出到华沙城下。

华西列夫斯基未参与直接向西部方面挺进的工作。此后，他负责的方向转向了西北和北部，即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再往后，则是对东普鲁士的进攻。

7 月 6 日到 9 日，华西列夫斯基还在白俄罗斯前线接待了前来访问他这位苏军总参谋长的英国和美国驻苏联军事代表团。

这次活动当然是根据最高统帅斯大林的指示安排的。原来，英美两国从诺曼底登陆作战以来，就注意到了苏联红军这场大规模的以巴格拉季昂将军的名字命名的白俄罗斯战役。他们隐约地感到，苏联人的这次反击作战很可能像 1812 年击败拿破仑一世那样，彻底地把侵略者全部赶出俄国。那么，此后呢？也就是说，苏军将以怎样的行动出兵波兰和欧洲呢？这才是他们所特别关心和担心的事情。

本来，在苏美英三大国首脑德黑兰会晤及以后的多次信函联络中，他们已经答成了初步协议，这就是法国和德国西部地区由英美军队来负责解放并占领；东欧诸国和德国东部包括柏林由苏军来负责解放和占领。但是，当苏军前出到波兰首都华沙时，所距柏林的距离正好与英美军队距那里的距离相等，这种情况使后者开始另外打起主意。其中主要是英国首相丘吉尔（罗斯福倒还不太强烈）曾经暗暗想使他们的军队首先突入柏林，从而在战后欧洲树立英国的突出地位，这样也可以遏制布尔什维主义的苏联对欧洲的扩张。因此，丘吉尔一再怂恿罗斯福，要求派代表团到苏德西部前线去看看实际正在发生的情形究竟怎样。这样，他们便向斯大林提出了正式请求。

那么，这时的斯大林在想什么呢？

首先，对英美军队 6 月 6 日诺曼底登陆作战及其由此真正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苏联的态度是欢迎的。虽然斯大林早在库尔斯克会战胜利后就说过没有欧洲第 2 战场苏联也能单独地打败希特勒法西斯之类的话，但他还是乐于看到德国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局面。这样，一来可以减轻苏联战场的压力，二来也可以加速希特勒德国的灭亡进程。何乐而不为呢？

其次，苏联这时并不惧怕英国和美国。斯大林一直相信，苏军经过 3 年现代化战争的考验和锻炼，肯定要比美国和英国的军队更有战斗力。因此，迅速解放东欧和占领柏林的计划，完全可以由苏联自己决定时间和方式。此外，斯大林与罗斯福之间已有较充分的谅解，他知道罗斯福不会完全支持丘吉尔的愚蠢而又贪心的想法。

第三，关于德国纳粹可能想与英美单独媾和一事，斯大林更有他有力而正确的判断。一次，他对莫洛托夫和朱可夫等人说：“现在，希特勒就像一个疯狂的赌徒，他一方面要与苏联作战到底，另一方面则把希望寄托在英国人和美国人身上，他在想以坚决地抵抗苏联来换取英美可能的与之单独媾和。但我相信罗斯福与丘吉尔是不会同他做这种交易的。他们为了保障自己在德国的政治利益，将不会同已经完全失去人民信任的希特勒分子相勾结。更何况，他们也不愿意和不敢因此而永远背负起其本国人民和全人类的骂名的。”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斯大林才有充分的把握。事先，他曾在电话里告诉华西列夫斯基，要尽可能好好地款待这两位英美使者，他们要求到前线去实地观察也完全可以允许。华西列夫斯基当时觉得，最高统帅似乎也可以做一个颇为不差的外交家呢。

到华西列夫斯基这里来的是英国驻苏军事代表团团长伯劳兹将军和美国驻苏军事代表团团长迪安将军。可是，他们并不是一起来的，先是伯劳兹将军，而后才是迪安将军。华西列夫斯基只知道斯大林对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态度并不完全一样。一般说来，他对罗斯福和美国的态度要好一些，而对丘吉尔和英国的态度则差一些。

这在 1943 年 11 月的德黑兰会议上人们早就获知了。但这次这样安排是斯大林的意思还是两位客人的主张，他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华西列夫斯基对他们的接待则是一样的。会晤有时安排在森林里，有时则直接安排在白俄罗斯第 3 方面军的司令部里。他们分别向华西列夫斯基通报了诺曼底登陆作战的情况，而华西列夫斯基则向他们介绍了包括白俄罗斯战役在内的苏军 1944 年夏季战局。

随后，请他们观察了白俄罗斯第 3 方面军的一个作战地段的战斗情况。在他们的要求下，还请他们看了一些被俘的德国将军。

华西列夫斯基用以招待他们的是那种极为别致的战地宴会……

第十六章 在波罗的海沿岸

转战波罗的海岸，拦截歼敌立陶宛；
解放西北三小国，驱逐德寇全民欢。

与西部白俄罗斯一样，波罗的海沿岸广大地区也是最先沦入法西斯德国敌手的。

自苏德战争爆发以来，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个加盟共和国就长期地为德军“北部”集团军群所控制。这里成了德军向列宁格勒和加里宁等北方地区实施进一步侵略的主要基地，也是法西斯德国在苏联北部广大地域的最大桥头堡。

从这一地区被法西斯占领的那一天起，英勇不屈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人民就展开了对法西斯德国侵略者的顽强斗争。当地各族人民利用森林、湖泊、海岸线等地形气候优势，开展了广泛的敌后游击战争，给入侵者以不间断的骚扰和打击。到 1942 年冬季列宁格勒的危机被基本解除后，苏军列宁格勒方面军、加里宁方面军以及随后在它们的基础上新组建的波罗的海沿岸方面军、沃尔霍夫方面军、卡累利阿方面军等部队，也在整个北部地区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对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斗争。

特别是自 1943 年秋冬季至 1944 年夏季以前，该地区的苏军还在这里发起过一些相当规模的局部性战役。但是，由于敌“北部”集团军群的暂时强大，苏军在兵力和兵器方面都处于严重劣势等原因，战果极为微小。

但是，到了 1944 年夏季，随着苏军在整个西部战线的迅猛推进，特别是白俄罗斯战役的巨大胜利及其战役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最终消灭敌“北部”集团军群有生力量、解放波罗的海沿岸广大地区的条件成熟了。事实上，白

俄罗斯战役第二阶段所要求形成的巨大苏军扇面攻势，就已经把立陶宛的大部分地区囊括进去。其进一步向西北和北部方向的发展，实际就已经构成了波罗的海沿岸战役的一系列初步展开。

这时，根据最高统帅大本营的命令，华西列夫斯基的工作又增加了协调波罗的海沿岸第2方面军行动的内容。这样，在整个北部地区作战的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和波罗的海沿岸第1、第2方面军就全部由他来负责了。

当时，按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指示，苏军在西北和北部地区对敌人形成的战略态势是：切尔尼亚霍夫斯基指挥的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负责向西稍北的方向进攻，攻击矛头直指立陶宛南部的该共和国首都维尔纽斯及由此到考纳斯、普里涅曼尼耶一线，以断然切断敌“北部”集团军群各部与东普鲁士老巢之间的联系；巴格拉米扬指挥的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的主要注意力，应放在敌德文斯克集团的正面，从德文斯克向里加方向发动进攻，最终前出到波罗的海沿岸并切断敌军由此向东普鲁士的交通线；叶廖缅科指挥的波罗的海沿岸第2方面军则应向列泽克涅方向发动进攻，同时在左翼协助巴格拉米扬部对德文斯克的攻击。这样，波罗的海沿岸的德军第18和16两大集团军便全被牵制在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境内。这对波罗的海沿岸第3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在整个北端夺取爱沙尼亚的作战，也将是极大的帮助和支援。

在7月12日以前，华西列夫斯基不断地在波罗的海沿岸第1和第2方面军之间飞来飞去。作为大本营代表，他更关心的是这两支部队在具体部署和未来作战中的相互协调问题。待巴格拉米扬和叶廖缅科基本完成战役准备后，华前列夫斯基于12日晚回到了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

这里正在进行合围德坦克第3集团军的激烈战斗。当时，该部敌军为保住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这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已经撤退到维尔纽斯—科达铁路线上。早些时候，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已派出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和近卫第11集团军从北南两侧绕到了维尔纽斯的后面。当敌军发觉有被合围的危险后，便发起了强大的反冲击。英勇的近卫第5集团军派出一部从正面牵制敌人，另一部继续向纵深加速合围；而近卫第11集团军从南侧猛冲到特瓦里斯和特拉卡伊，最后于13日在维利亚地域与坦克第5集团军会合。敌人所有的突围尝试都先后失败，合围圈内的大约1.5万德军全部成了苏军的俘虏。该部敌军是早些时候从维捷勃斯克包围圈附近被击溃而败逃到这里的。当时，他们曾想去解救维捷勃斯克包围圈内的自家部队，没想到今天自己也落得了同样的下场。

随着合围圈内敌军被消灭，第31集团军攻克了利达。很快，维尔纽斯也被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解放，这座古老的城市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更重要的是，由此，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与“北部”集团军群的陆上联系终于被切断，德军坦克第3集团军被彻底地挡在立陶宛南部地区。

此后，华西列夫斯基与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决定，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主力部队立即向西挺进，占领整个从考纳斯到波罗的海沿岸的直线走廊，最终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德国与立陶宛之间的边境线，以待下一步从这里直接进军东普鲁士的德军“狼穴”所在地。

与此同时，巴格拉米扬的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也先后攻占了帕涅维日斯、夏乌里亚等地，并在叶廖缅科所部的协同下攻克了德文斯克。至此，

到 7 月 20 日前，由于苏军各个方面军所实施的在时间上协调一致的进攻，已经明显地束缚并大大地削弱了敌第 18 和 16 集团军的力量，它们已经丧失了波罗的海沿岸到普鲁士之间自由机动的能力。鉴此，9 月 20 日晚，华西列夫斯基在波罗的海沿岸第 1 方面军司令部通话给斯大林，报告说，现在彻底封锁波罗的海敌军的时机成熟了。请求大本营把坦克第 5 集团由白俄罗斯第 3 方面军调入波罗的海沿岸第 1 方面军，同时也应把已经拨入该方面军建制的近卫第 2 集团军和第 51 集团军投入新的突击战斗。斯大林同意了他后面的请求，并说，对坦克第 5 集团军，只能以后视情况而定。

7 月 24 日，华西列夫斯基与巴格拉米扬判断认为，由于白俄罗斯第 3 方面军右翼部队的猛烈进攻带来的威胁，德军必须在米塔瓦（叶尔加瓦）一里加一线收缩部队。

因此，他们决定：立即以近卫机械化第 3 军为先锋向希奥利文实施突击，然后以第 51 集团军及方面军主力部队同时向前推进，直至占领连接东普鲁士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主要交通枢纽米塔瓦（叶尔加瓦），以实现大本营训令规定的战略意图。

25 日，突击行动开始。在奥布霍夫上将率领的近卫机械化第 3 军迅猛的攻势直线突击下，希奥利文前面的德军部队根本来不及组织有力的抵抗。这股勇猛无比的钢铁洪流一路过关夺隘，所向披靡。到次日夜晚，就已突入希奥利文城垣，并攻占了该城东北地区的大部分敌军据点。与此同时，克列伊泽尔指挥的第 51 集团军也从另一方向攻入该城。至 26 日晚间，希奥利文守敌大部被歼，一部分向后溃逃。

当晚，华西列夫斯基将这一情况向大本营作了汇报。斯大林指示说，整个波罗的海沿岸第 1 方面军应立即将主力转向里加方向，追击并歼灭向该方向撤退的德军。

次日清晨，大本营又把正式的书面训令发给华西列夫斯基和巴格拉米扬。电称：

大本营代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

波罗的海沿岸第 1 方面军司令巴格拉米扬大将

.....方面军部队的基本任务是，切断波罗的海沿岸地区

敌军集团通往东普鲁士的交通线。为此，最高统帅部命令：

攻占希奥利艾地域以后，向里加总方向发展主要突出，并

以方面军左翼的部分兵力进攻麦麦尔，以切断连接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与东普鲁士的滨海铁路.....

斯大林

安东诺夫

巴格拉米扬立即给近卫机械化第 3 军发报指示：“感谢你们解放了希奥利文。停止在希奥利文地域的战斗，迅速向麦什库柴集中，然后沿公路向北突击，于 1944 年 7 月 27 日日终前以主力攻占约尼什基斯，以强有力的先遣支队攻占包斯卡、叶尔加瓦。”随后，华西列夫斯基与巴格拉米扬商定，克列伊泽尔的第 51 集团军也必须立即投入这一新方向的战斗。

27 日，骁勇善战的奥布霍夫在部队未作任何休整的情况下，毅然转头向北对敌军发起了新的突击。由于德军在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部署都已是穷于应对或苦撑局面，只能是哪里战事吃紧便向哪里移动部队。当希奥利文受到猛攻时，北部的德军便放松了防御，甚至抽调了部分部队向西方向拦

截。现在，苏军的装甲部队突然又调转方向朝他们冲来，确实很出乎他们的意料，因此只能在仓皇间组织有限的抵抗。近卫机械化第3军借着胜利的余威，当天夜幕降临以前在行进间就攻下了约尼什基斯。一部分敌军就地被歼，另一部分则留下大量装备和弹药向北逃去。

28日起，方面军又投入第51集团军参加这一方向的作战。同时，第43集团军也在向这里做强大的推进。以后的两天内，该地区的苏军在米塔瓦（叶尔加瓦）以南和以西与敌人展开了相当激烈的战斗。德军已经意识到，如果苏军攻占了米塔瓦地域，那么赖以维系南北沿岸德军的唯一堡垒里加必将受到严重威胁。到30日，苏军克列麦尔上校指挥的近卫机械化第8旅，作为先遣支队穿插到了图库姆斯和克拉普卡尔恩斯地域的海岸附近。这样，德军由波罗的海沿岸退往东普鲁士的道路便被切断。

31日，连接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与东普鲁士的主要交通枢纽米塔瓦（叶尔加瓦）终于被攻克。按照希特勒的将军们的说法，在库图姆斯地域形成了“德军的缺口”，这真是波罗的海沿岸战场上的“巨大不幸”。

在这个阶段的行进作战和突击行动中，华西列夫斯基最感满意的是近卫机械化第3军的行动。早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他就认识了该军军长奥布霍夫。那时，他还只是少将，但由于在堵截前去救援的敌霍利特集团的战斗中他率部极为勇敢果断，并战功卓著，他的部队同时获得了“近卫军”和“斯大林格勒机械化第3军”的称号，而他本人也被升为中将，这在那时还是不多见的。在此前的白俄罗斯战役第一阶段作战中，这支英雄部队的表现也相当突出，华西列夫斯基曾亲自打电话给斯大林，请求授予奥布霍夫“苏联英雄”的称号。后来，当他被调任要职时，华西列夫斯基还特别准许他照旧领取近卫军部队的薪饷额。按规定，凡是被授予近卫军称号的部队，首长们拿到的薪饷是其他部队的一份半，而士兵则拿两份。当然，与此相适应，凡是近卫军部队，在进攻性战役中都应用于完成最重要的任务，在防御作战中则应用于对敌人的反突击等重要任务。

至1944年7月底8月初，在整个波罗的海沿岸战场上，苏军的前沿战线已经大大地向前延伸了。这时的两军态势是：在拉脱维亚由北向南方向，战线从卢巴纳湖到西德维纳的叶卡皮尔斯；从那里转向麦麦列河以西，接着又迅速转向西北绕过米塔瓦（叶尔加瓦），前出到里麦里附近的里加湾；在那里不到库图姆斯就向南转，经过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北部绕过多贝列、扎加列、夏乌里亚直到舍舒维斯河；从那里向东到达韦涅日河，接着转向西南经过涅曼河到达考纳斯通往维尔巴利斯的铁路；然后向下到苏瓦乌基以东，直到格罗德诺以西的别勃扎河。在这弯曲的漫长战线上，最突出的部分就是近卫机械化第3军所在的里加湾部分。

整个德军“北部”集团军群已经失去了它同德国本土的陆路联系，德军“纳尔瓦”战役集群及第18和第16集团军之一部恰好位于突出部西北，以南则是坦克第3集团军和“中央”集团军群的其他兵团。苏军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正位于这两个集团军群的中间。

按照最高统帅部的训令，华西列夫斯基的任务再次加重了。他不仅要负责协调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和波罗的海沿岸第1、第2方面军的行动，而且还要指挥它们的战役作战。同样，朱可夫元帅在南部战线也得到了同样的指示。华西列夫斯基敏感地认为，这种由大本营直接指挥各方面军的新的指挥形式，可能是最高统帅的某种过渡性举措。因为，随着对德军的迅速胜利，

苏德战场的大部分将要移向东欧地区直至德国本土。那样，所有各方面军的部队统由大本营统一指挥，则可以减少中间环节，直接增加灵活性和各部队的攻击效能。就他个人来说，华西列夫斯基也愿意这样。用他自己的话说，“这种工作丰富了我的经验，而且在我被任命为远东苏军总司令时对我大有裨益”。

新的使命，让华西列夫斯基更加感到了自己的任重道远。他清楚地知道，德国统帅部和前线德军都不会甘心波罗的海沿岸战线上这个“德军的缺口”的存在，他们肯定会不惜代价地派出部队来填充这一缺口，以恢复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与东普鲁士之间的陆上联系。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甚至是性命攸关的。鉴于此点，华西列夫斯基于8月2日晚将自己的分析报告给斯大林，并再次提出把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调入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他还提出，应把波罗的海沿岸第2方面军所属的突击第4集团军也划入该方面军建制。斯大林表示同意他的分析，也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第二天，安东诺夫就告诉他说，大本营和总参谋部已经作出了上述安排。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同样，巧将也难为无兵之战。现在有了必要的这些部队，华西列夫斯基便命令巴格拉米扬立即在米塔瓦（叶尔加瓦）至夏乌里亚一线严加部署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的前沿和纵深，以便随时准备击退德军的反突击。此外，为了积极防御的需要，华西列夫斯基又指示波罗的海沿岸第2和第3两方面军立即对里加实施南北夹击作战。

8月10日，马斯连尼科夫中将的波罗的海沿岸第3方面军右翼部队首先在北部打响了塔尔图战役。其左翼也开始按计划沿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边界地带向西推进，以策应在南部战线上已经开始突击里加方向的波罗的海沿岸第2方面军。13日，叶廖缅科指挥的波罗的海沿岸第2方面军已经攻占了马顿那，若以直线计算，这里距里加已经不到150公里。但随后，该方面军便遇到了强大敌人的顽抗，推进速度明显地减慢了。其实，这恰好等于给华西列夫斯基以提示，说明敌军将要在这一线坚持固守，甚至可能就是预料中的反突击行动。

果然不出所料，在此间获得的大量情报表明，敌军正在沿麦麦列河地域建立强大防御，那里已集中了7个步兵师，而且还有一个军队集团集结在里加以南的森林中，看样子可能是要从北面突击进攻米塔瓦（叶尔加瓦）。同时，侦察部队还发现，在夏乌里亚以西地域还有大批敌军正在集结。据此，华西列夫斯基判断，敌人可能要从上述两个方向拔出苏军打在里加湾方面的楔子。于是，华西列夫斯基与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首长经过商量，并向最高统帅部请准，在这两个重要方向上布置了强大的防御措施，其中还安排了近卫机械化第3军的反突击行动。

8月16日，德军的突击行动果然开始了。敌军同时以6个坦克师和1个摩托化师、两个坦克旅的强大兵力展开反攻，其中反攻的重点在米塔瓦附近。结果，敌人在夏乌里亚附近的突击被击退，而米塔瓦地域的突击却大得其手。虽然遇到英勇顽强的激烈抵抗，德军最后还是堵住了所谓的“缺口”地带，从而获得了一条宽约50公里、长达1000公里的防御地带，在它的南端，则经过日穆季直接可达东普鲁士边界。这是德军在8月下半月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取得的最大战果。

德军这一反攻行动的得逞，虽然不能说使此前波罗的海沿岸各方面军的努力前功尽弃；但它重新夺回的那条走廊，已经足够使其较自如地实行兵

力机动，而且也算是恢复了它通往东普鲁士的陆上交通线。这表明当时波罗的海沿岸的敌军还具有相当的实力，也就是说还没有到强弩之末。相反，从另一方面看，当时苏军在该地区也确实没有实现对敌的强大优势，大本营预备队虽然并未用光，但也还有比这里更重要的作战方向等待接济。再就是，随着战线的拉长，燃料、弹药等后勤供应也不能及时到位。大本营对前线各方向的部队供应都不得不开始执行定量供应办法。

此外，毕竟苏军是不间断连续作战，部队的伤亡减员不必说，即便是其有生力量也已相当疲惫了。

最高统帅部自然也考虑到了上述诸种因素，因此并没有对华西列夫斯基提出任何责备，相反则主动为波罗的海沿岸各方面军补充了必要的兵力、装备及弹药等。

根据斯大林的提议，大本营 8 月 29 日给华西列夫斯基的训令还指示说，为了专心致志地部署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全部兵力及准备下一次更有效的进攻，所有波罗的海沿岸的 3 个方面军均由华西列夫斯基负责协调和指挥，并从他身上卸去了白俄罗斯第 3 方面军的责任。

这样，到 9 月 14 日新的进攻之前，波罗的海沿岸 3 个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的总兵力已达 90 多万人，并有近 17500 门火炮和迫击炮、3000 多辆坦克和自行火炮、2600 多架作战飞机（加上远程航空兵和海空航空兵则已达到 3500 多架）。此外，波罗的海舰队还奉命从海上支援列宁格勒方面军在爱沙尼亚地区的作战。与此相比，他们的当面之敌总数约在 70 余万人，大约 700 多门火炮和迫击炮，不少于 1216 辆坦克和强击炮、近 400 架作战飞机。显而易见，这时敌我战场上的兵力和兵器对比，苏军已经占有了相当的优势，但还不能说是绝对或强大的优势。因为，德军所特别凭借的除了坚固的筑垒工事以外，还有他们对地形地势的特别熟悉。此一点，在沿海作战是十分重要的。

此次作战，应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华西列夫斯基对这一点十分清楚。因此在准备实施战役计划时，他格外细心，也严格要求各方面军部队。9 月 11 日，天公不作美，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忽然下起了暴风雪。虽然气温还没有明显变冷，但雪粒和 8 级以上的大风也给人们的行动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尽管如此，华西列夫斯基还是坚持在进攻前逐个方面军和集团军地检查了一遍各部队。直到 13 日下午，他才风尘仆仆地从波罗的海沿岸第 3 方面军赶回他设在第 1 方面军的指挥所。

14 日晨，整个波罗的海沿岸的 3 个方面军在暴风雪的呼啸里同时对德军发起了进攻。17 日，列宁格勒方面军也转入了进攻。一开始，德军没有想到苏军会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实施突击。当猛烈的炮火倾泻过来以及随后的坦克群冲到防御前沿时，德军次要方向的阵地立时大乱，伤亡损失十分严重。但随后在第二天或第三天，就出现了有组织的抵抗。经过一周多的残酷战斗，苏军才推进了 80 公里，有些地段也就是 60 公里左右。

然而，在里加主要方向上，敌军在当天下午就稳住了战线。从第二天开始，德军曾数次组织反突击行动，战斗极为激烈。17 日上午，敌军以两个坦克师和一个摩托化师的强大兵力，向波罗的海沿岸第 1 方面军所属的近卫第 6 集团军正面实施了猛烈的反突击。近 200 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向该集团军的两个步兵师结合部猛冲。由于反坦克武器的缺少和后援坦克部队没有到达，该部敌军曾一度突破苏军防线达四五公里。只是在晚上，华西列夫斯基

派去的坦克第 1 和第 19 军赶到才制止住了敌人的前进。

第二天，当敌人再度发起进攻时，近卫坦克第 5 集团军也插向了这个方向。这样，敌人的反突击被击败了。然而，此后，德军凭借深沟堑壕和坚固的筑垒配系，仍在拼死抵抗，致使苏军在这一主要方向上只能一口一口地咬着敌人的防御缓慢地向前推进。

显然，这样的战役进展不可能取得迅速胜利。更何况每前进一步还都要付出不小的代价。究竟怎么办呢？

恰在这时，大本营给华西列夫斯基和巴格拉米扬送来了敌军的最新情报。稍后，方面军侦察部队也印证了这一情报的准确性。这些情报说，在克莱彼达州的德国坦克第 3 集团军地段上，敌人的兵力总数不超过 8 个师，其余的都被派往米塔瓦（叶尔加瓦）附近去营救那里的“北部”集团军群去了。而且，种种迹象表明，敌军力图用一切办法保住其“北部”集团军群与东普鲁士的联系通道，以便在必要时将其部队全部撤离波罗的海沿岸地区。

说什么也不能让这部分敌军跑了。否则，这旷日持久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作战岂不要功败垂成？这是当时华西列夫斯基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他与巴格拉米扬反复分析，权衡轻重，最后一致认定：宁可暂时放下里加附近的战役计划，也要先在南部海岸的麦麦尔首先堵住德军“北部”集团军群的退路。这样，还正可以利用该地区敌坦克第 3 集团军的暂时弱势。

9 月 22 日，华西列夫斯基立即把这一想法用电话告诉了斯大林，并要求大本营给他一定的战役准备时间。没想到，斯大林听了立即很高兴地表示赞同：“看来，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你们的分析和我的想法完全一样。我认为，你们应该把主要突击力量转到希奥利艾地域，从那里组织一个强大的突击集团向麦麦尔实施进攻。我看，这只要巴格拉米扬的一个方面军就够了。”

“为什么不组织得更强大些呢？”华西列夫斯基说，“我们认为，如果组织一个更加强大的突击集群，不仅可以堵住德国人的逃路，还可以同时全歼坦克第 3 集团军。”

“不，我目前的想法是，在你们实施这一新的突击行动时，还不能减弱另两个方面军在里加方向上的攻击。同样，也不能减弱列宁格勒方面军在爱沙尼亚的进攻。”斯大林最后说，“你们也可以再商量一下，但现在暂时先按此执行为好。”

“好，我现在就着手部署您建议的行动。”华西列夫斯基答道。

此间，华西列夫斯基几乎每天都与斯大林通话联系，他们商讨了麦麦尔战役所需突击集团的兵力编成、变更部署的方式以及隐蔽机动的办法，等等。最后，他们确定：这一突击集团的位置应在希奥利文及其以北地域，计由突击第 4 集团军、第 43、第 51 和近卫第 6 集团军、近卫坦克第 5 集团军、近卫机械化第 3 军和独立坦克第 1 军等 5 个集团军及 2 个独立军组成。关于部署变更，是要求里加以南波罗的海沿岸第 1 方面军空出的位置由波罗的海沿岸第 2 方面军补上。关于机动隐蔽问题，则主要依靠夺取制空权的战斗来达到，即当所需部队转移及后续部队填补战线时，派出空军部队和远程航空兵猛轰敌军防御，以造成在该地段要有新的进攻的假相。

9 月 24 日，最高统帅部正式训令到达，要求把进行这一战役的任务全部交给波罗的海沿岸第 1 方面军。几天后，斯大林又打电话给华西列夫斯基和巴格拉米扬说，经他再三考虑，这一任务应以波罗的海沿岸第 1 和第 2 两

个方面军来协力完成。此外，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第39集团军也应加入，它的任务是沿涅曼河进攻，以协助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的行动。电话中，斯大林还批准了华西列夫斯基和巴格拉米扬提出的于10月5日发起战役的日期。

10月1日，华西列夫斯基又收到大本营训令说，此后他的任务将变动成只负责和协调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行动。而波罗的海沿岸第2和第3方面军、列宁格勒方面军则由兼任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的戈沃罗夫大将负责领导。

训令解释说，采用这种不同一般的指挥形式，最高统帅部就能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主要的战略方向——麦麦尔方向上，同时又能保障可靠地协调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战斗行动。

10月5日，麦麦尔战役打响了。

先于进攻前的50分钟，340多架重型轰炸机组成的轰炸机群向敌军纵深阵地上投下了数百吨的钢铁，240多架强击机组成的攻击机群向敌人的各种工事和暴露战斗队形进行了扫射。接着是各种口径的火炮猛轰敌军前沿。整个麦麦尔到帕兰加地段上，烟雾升腾，火光冲天。

德军更多的注意力一直投放在尚在激战中的里加方向，万万没想到苏军在这时调转方向朝这里发起攻势。原来，按他们接到的上峰指示，在完成里加方向的反突击之后，也将在这里对苏军发起突击。但是，他们晚了一步。当然，晚了就只能挨打，而且是被动地挨打。然而，德军也并非愚蠢到不知所措的地步，他们清楚苏军在这一地段上发起攻击的目的和意图。因此，在战役的第二天，大量德军部队便开始由里加附近通过库尔兰向东普鲁士本土上撤退。

与此同时，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已经突破了敌军的防御，并立即沿着突破口向纵深迅猛推进。随后，组成强大突击集团的其他各集团军在各自的突击地段上奋勇突进，一往无前。到了第5天，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已经彻底粉碎了绝望反抗的敌军拦截，并最终前出到了波罗的海沿岸。到同一天晚上，近卫第6集团军和突击第4集团军迎锋上前，牢牢地堵住了已经进抵萨尔杜斯、普利耶库采地区敌“北部”集团军群的退路。这样，前有近卫坦克第5集团横布战车于海岸，后有近卫第6和突击第4两集团军铁壁生根一样的堵截，德军向东普鲁士老家撤退的可能一点也没有了。德军近40个师的大军只好一面组织拼死抵抗，一面后退至预先构筑好的库尔兰防御地带。这就是人们所习惯说的那个“库尔兰圈”。

这样，德军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向东普鲁士撤退的计划彻底破产。连接这两地区的陆上通道终于被苏军第二次——当然，也是最后一次——彻底地切断了。

10月15日，里加解放，这座拉脱维亚都城回到了苏军和人民的手中。此后，波罗的海沿岸第2和第3方面军迅速肃清了所有拉脱维亚西部的敌军。在这里，除了成群成群的德军俘虏，再也见不到一个德国人了。此前，列宁格勒方面军已解放了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爱沙尼亚全境获得解放。逃到尤希马岛和萨列马岛上的德军，经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波罗的海舰队的联合作战，也于11月24日以前全部被肃清。

现在，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只剩下了“库尔兰圈”内的敌军。由于敌军逃入“库尔兰圈”之前已经遭受到苏军的追击性质的巨大打击，真正进

入该半岛地区的德军已经不足 33 个师了。

由于该半岛地势极为复杂，内部纵深又相当广大，德军在这里还有相当的机动自由。自 10 月 16 日到 12 月初，波罗的海沿岸第 1 和第 2 方面军曾数度发起攻势。天上有空军两个集团军各种机群的轰炸，波罗的海舰队又实施严格的海上封锁，但均未能够奏效。最后大本营决定，目前暂时对该部敌军实施陆海空立体封锁，在它投降之前，让它在这个寒冷的半岛上尝尝缺衣少穿的严冬生活滋味。

其实，从 10 月 16 日一直到 1944 年 1 月 13 日，华西列夫斯基一直也没有离开过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此间，波罗的海沿岸第 3 方面军撤销了。一部分部队转入大本营预备队，另一部分则归入波罗的海沿岸第 2 方面军的建制。这样，华西列夫斯基手下就剩两个波罗的海沿岸方面军了（其中白俄罗斯第 3 方面军是 11 月直接交回给大本营指挥的）。

就在这段时间里，华西列夫斯基再次在行车途中受到了意外的伤害。当然，这次不是碰到了地雷，而是一个冒失鬼司机迎面撞的。

那天，华西列夫斯基清晨从叶廖缅科的司令部到巴格拉米扬的指挥所去。当他的车子正常地在路面上奔驰时，突然前面飞驰过来一辆越野吉普车。驾车的是一个年轻的军官，不知怎么回事儿，只见这辆车子直直地朝华西列夫斯基的小车迎面冲来，司机根本来不及拐弯或刹车。结果只听一声巨响，华西列夫斯基眼前一黑，就被甩出了车外，车子也歪歪地倒在了路旁。

待被副官吃力地扶起来时，他只感到头部和腰部剧痛难忍。一会儿，那名肇事司机也自己歪歪扭扭地走了过来。当他看到华西列夫斯基的肩章后，立时吓呆了。

“元帅同志，请您枪毙我吧！”说着，他从腰间抽出了手枪，递过来，“我罪该万死，怎么竟撞到了您啊！”

起初，华西列夫斯基以为这名年轻的上尉军官是喝醉了，要么就给震晕了。副官上前正要申斥他，华西列夫斯基将他制止。

“你这个冒失鬼！赶紧收起武器，到你的部队里去如实报告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华西列夫斯基被抬到了附近的一个集团军机关包扎了一下后，回到了巴格拉米扬的机关里，在那里躺了 10 天。当他一个月后到莫斯科作 X 光检查时才发现，原来有两根肋骨被撞成骨折了。

后来，华西列夫斯基还不得不为这名上尉去说情。因为，他所在的部队首长为他撞伤了红军总参谋长而要送他上军事法庭。当然，这种举措被制止了。

原来，这名肇事的年轻上尉是一个前线的侦察连长。那天夜里，他刚刚出色地完成了一次责任重大的任务。他是要急着赶回部队去向上级首长报告。

没有多久，华西列夫斯基又听说，这名上尉光荣地获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

第十七章 进军至东普鲁士

亲统大军人敌境，直捣“狼穴”建奇勋；
“胜利勋章”颁二度，“苏联英雄”传美名。

苏联军人在秋天来临之前已跨越了同东普鲁士接壤的边境。自从俄国士兵在德国人的重炮轰击之下经过这个地方（退回东方），已经整整过去 30 年了。而现在，东普鲁士又可以听到俄语了。但是，现在向西迈进的已经不是过去那种为了与己无关的目的而在战场送死的毫无权利的和识字不多的农民了。现在向西迈进的是伟大苏维埃国家的战士，是担当解放者的军人，是为欧洲国家人民带来自由的反法西斯战士。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晚年的华西列夫斯基所写下的这段话是充满了复杂感情的。凡是稍微有点儿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他说的 30 年前是指 1914 年。那时，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人在东线战场大败俄军，平均三人一条枪、甚至连衣服和鞋袜都供应不上的腐败的沙俄军队一路由加里西亚、波兰、东普鲁士、立陶宛仓皇退回了俄国。其情其状，确乎丢盔弃甲，狼狈之至。当年 19 岁的青年华西列夫斯基，就是从这时中断科斯特罗马神学校的学业而走上职业军人的道路的。自然，那时他也是想“报效祖国”。

东普鲁士确实是令包括华西列夫斯基在内的每个俄国人都感到伤神或沮丧的地方。不仅 1914 年是这样，1918 年德军还曾企图把这里作为出发地而夺取旧俄都城彼得堡，那时俄国上下都在惶惶不安之中。而且，像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这次 1941 年爆发的苏德战争中，德国军队那三路大军中的“北部”集团军群也是从这里突入苏联的，而且很快就通过立陶宛直接威胁到了对苏联人有着特别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精神价值的列宁格勒的安全。现在，当战争进入第四个冬季，即 1945 年 1 月的时候，苏军不但已经把侵略者全部赶出了自己的国土，而且马上就要在这里实施对法西斯德国北部本上的反击了。这怎能不让人感到兴奋并浮想联翩呢？

现在，华西列夫斯基就要亲统大军进击东普鲁士了。他心里非常清楚，攻占这个德国军国主义的堡垒和法西斯希特勒的老巢，将是欧洲东部战场上对德军的致命一击。它将会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东线战争最后阶段中的重要一员。

在整个苏德战争的 1941—1945 年期间，东普鲁士对法西斯德国有着极为重要的经济、政治和战略意义。从战争开始之前直到 1944 年冬季，法西斯分子自称为“狼穴”的希特勒德国统帅部大本营一直就设在这里。它在拉斯登堡附近的一群距地面很深的坚固地堡群中，它的地面上是一片不大的小树林，用来作为防空伪装。其地下核心部分共由 10 个地堡组成，地堡的后部和卧室都在两米厚的钢筋混凝土之下。

希特勒本人所在的地堡内，除了工作室、卧室之外，还有一间可作小范围讨论的会议室，它们都在里边装着单独的木板房。到 1944 年秋季，他的地堡因重新加固而成了水泥巨人，仅木板房外的水泥墙就有 7 米厚，附近的其他作战机构也都重新加深加厚了。

希特勒认为保住东普鲁士具有很重要意义，它是牢靠地掩护从波兰北部和立陶宛进入德国并由此通向德国中心地区的要冲。因此，在普鲁士境内和与它毗邻的波兰北部地区，法西斯在旧有的地堡基础上又构筑了一系列现代化的工事。这些筑垒体系，不论在工程技术方面还是火力配系方面，在当时的欧洲和世界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它有坚固的正面阵地、斜切阵地和

布满数不清的永各地下防御暗堡，而这些，又被几个大的防御枢纽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其防御总深度可达 150—200 公里。该地的地貌特点也极利防守，它有遍地的湖泊、河流、沼泽和水渠，有四通八达的铁路和公路网，有坚固的石料建筑物。像这样的现代化筑垒和天然障碍物相得益彰的防御体系，就其实力来说，远不比德国西部的“齐格菲防线”逊色，在某些地段上甚至还超过了后者。

为了阻止苏军从这里突入，除了这些防御体系外，希特勒和德国统帅部还在这里部署了重兵。稍早些时候，当其“中央”集团军群在白俄罗斯地区被歼后，残部又在这里获得了重建，自 1 月下旬则直接改称为“北方”集团军群。其当时所辖部队，计有坦克第 3 集团军、第 4 和第 2 集团军，总计兵力 41 个师（其中 3 个坦克师和 4 个摩托化师）和 1 个旅，约有 58 万人之多，此外尚有 20 万人组成的所谓“民众冲锋队”。它们拥有 8200 门火炮和迫击炮、700 辆坦克和强击炮及第 6 航空队的 515 架作战飞机。

早在 1944 年 11 月间，苏军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就开始酝酿东普鲁士战役计划，并曾试图以白俄罗斯第 3 方面军先行突入东普鲁士境内。为此，华西列夫斯基被斯大林由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前线召回了莫斯科。但这次行动没有能够成功。后来，大本营只好另行重新策划，华西列夫斯基因战事紧急没有再回莫斯科，只是征求了他的意见。当时，大本营和总参谋部考虑到，只有及早地粉碎这里的敌军集团，才能空出白俄罗斯第 2 方面军去增援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正在准备中的柏林方向作战，而且，这也是事先消除该部敌军集团可能对柏林方向作战的苏军实施侧翼突击威胁的需要。

因此，还在华西列夫斯基没有完全脱离开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前线事务时，东普鲁士战役便于 1945 年 1 月 13 日开始了它第一阶段的作战。揭开战役序幕的是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 3 方面军和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 2 方面军部队。当时，这两个方面军共有 14 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1 个坦克集团军、2 个空军集团军及 8 个坦克机械化军和 1 个骑兵军，总兵力在 160 万左右，它们拥有 21500 门火炮和迫击炮、近 3800 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以及 3000 多架作战飞机。这样，在整个力量对比上，苏军的有生力量超过了敌人 1.7 倍，火炮超过 1.6 倍，坦克超过 3.7 倍，飞机超过 1.9 倍。显然，优势是绝对的。

根据大本营计划，这次战役的总目标是：切断守卫在东普鲁士的“中央”集团军群同其他德军的联系，把该集团军群逼到海边加以分割并各个歼灭，肃清东普鲁士境内的敌人。为此，计划规定将由白俄罗斯第 3 和第 2 两个方面军通过实施协调一致的向心突击来达成战役任务。首先，白俄罗斯第 3 方面军从东北和东部方向突破敌军防御，夺取蒂尔齐特、英斯特堡、贡宾南及拉斯登堡等一系列要塞地域，然后直取敌军重兵把守的哥尼斯堡，将敌人消灭在这座海滨城市。同时，白俄罗斯第 2 方面军从东南方向突入，夺取姆瓦拉、德意志-埃劳等地区，从而切断东普鲁士敌军集团与其“中央”集团军群及其战略后方的联系，一则实施对东普鲁士的深远迂回，再则也掩护了向华沙、波兹南与柏林方向进攻的苏军侧翼。

应该提出的是，整个这次战役的弹药准备及其实际消耗量，恐怕在战争史上一切战役中都是极为空前的。当时，两个方面军一共领取了 1330 万发各种口径的炮弹、62000 万发各种枪弹、220 万枚手榴弹。白俄罗斯第 3 方面军仅在 13—14 日两天内就消耗了 1000 多个车皮的主要弹药，而白俄罗

斯第2方面军仅在进攻的当天，即14日一天之内，也消耗了950多个车皮的主要弹药。为了把这19500多车皮的弹药从火车站运送到部队前线，就调运使用了将近10万辆运输汽车。

进攻前的炮火准备和航空兵准备也是空前的，它大大地帮助了两支方面军部队在各自突击方向上的推进作战。到1月18日，尽管德军还没有放弃拼命的抵抗，但已呈现出节节败退的局面。其有生力量也遭到了相当程度的重创。整个东普鲁士东南、东北及北部的广大地域，全被苏军占领了，战线推进了80—100多公里。到1月底，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部队已前出到哥尼斯堡南北两面的海边，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部队也前出到了被一个沙嘴与但泽湾分开的弗里齐斯—哈弗湾地带。至此，东普鲁士敌军集团已经被挤到了海边，并切断了它与“北方”集团军群的联系。整个敌“北方”集团军群也被分割成了3个互不联系的部分。具体说来，敌军有4个师被逼迫到了泽姆兰德半岛的海边；5个师连同要塞部队被围困在哥尼斯堡；将近20个师被分割合围在哥尼斯堡以南的广大地域。与此同时，从北面负责保障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行动的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于1月28日攻占了被围困长达3个多月之久的敌麦麦尔集团，守敌3个师全被消灭。这样，不仅该敌与北部沿海的“库兰圈”内敌军的联系被撕断，而且，在总的战略方向上，希特勒企图利用“库兰圈”、麦麦尔、哥尼斯堡一线敌军突袭进攻柏林方向苏军侧翼的阴谋也遭到了彻底破灭。

在整个东普鲁士战役分阶段的战役作战中，德军损失极为惨重。仅被俘者就达5.2万人之多，此外还有大量的装备、弹药和技术兵器。东普鲁士的大片领土被苏军占领，他们还从这里的法西斯集中营中救出了约6.8万名欧洲各国公民。当这些饱受希特勒法西斯分子虐待、劳役之苦的人们见到了他们的解放者后，很多人都纷纷要求加入苏联红军，以便为自己、为自己的亲人和同胞们，向万恶的法西斯讨还血债，报仇雪恨。

在这一阶段中，华西列夫斯基的主要精力仍旧放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围歼敌“库兰圈”的作战上，其中主要是1月下旬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攻夺海港城市麦麦尔的战斗。到2月初，由于斯大林和安东诺夫要去克里米亚半岛参加雅尔塔三国首脑会议，根据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他被召回莫斯科以履行总参谋长和副国防人民委员的职责，即代行大本营统筹全局，领导各个方向战场上对德军的进攻。此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苏军行动转入防御，具体协调工作转给了当时的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戈沃洛夫上将负责。

2月6日起，华西列夫斯基开始了东普鲁士战役第二阶段的实际部署工作。当天，根据他经手签发的大本营训令，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的部队全部拨给波罗的海沿岸第2方面军，其指挥机关则从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接收了第43、第39集团军和近卫第11集团军，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则得到原属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的第50、第3、第48集团军和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及近卫坦克第8军。这样一来，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就可以按原计划改变作战目标，直接在波美拉尼亚方向去协助朱可夫领导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进攻柏林方向的战役作战了。这时，在它的建制内还有突击第2集团军、第65、第49、第70集团军、近卫坦克第1军、机械化第8军及近卫骑兵第3军等大量部队。

2月10日，东普鲁士战役第二阶段作战开始。参加这次作战的有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和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其任务是最终消灭被分割合围

的各德军集团。按先一天发出的大本营训令，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已经把司令部移到了英斯特堡。同时，空军第3集团军也把司令部由波罗的海沿岸移到了这里。训令要求，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的任务是消灭哥尼斯堡敌军集团，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则应在20—25日前消灭在哥尼斯堡以南地区进行防御的敌海尔斯贝格集团。此外，波罗的海舰队必须以积极的行动切断在库尔梁季亚和东普鲁士沿线敌军的海上供应。

此间，华西列夫斯基从总参谋部情报部门了解到，东普鲁士的敌军各集团已接到德国统帅部的命令，必须拼全力固守其现有防御地域，似便尽可能长久地把苏军牵制在这一地区，不使其转到柏林方向参加作战。此外，德国统帅还答应给在哥尼斯堡、皮拉乌海军基地及海尔斯贝格地域的敌人以预备队补充。这说明，未来的战斗仍将是残酷而激烈的。

果然，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攻击敌海尔斯贝格集团的战斗，从一开始就打得极为艰难。在这一筑垒地域内，敌军有900多个钢筋混凝土工事和许多土木防御工事，还有数不清的各种永备发射暗堡以及防坦克防步兵的各种障碍物。穷途末路的敌军凭借这些在每个工事、每道防线上拼死顽抗，苏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相当巨大的代价。到2月15日，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各突击集团明显地失去了进攻能力，部队因连续投入激烈的作战而疲惫不堪，伤亡也颇为巨大。这不可能不降低推进速度和突击力度。华西列夫斯基认为，这是由于苏军把主要力量全都放在了柏林方向，此外气候的急剧变坏也使情况大大地复杂化了。

鉴于此种严重情况，27日晚，华西列夫斯基向刚刚从克里米亚返回莫斯科的斯大林做了详细汇报。听了报告之后，斯大林提出：“你应迅速地到前线去帮助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和他的部队，他肯定需要你的支持。这里的大本营还由我和安东诺夫来负责好了。”斯大林还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尽快地消灭东普鲁士之敌，这样，才能及早地腾出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和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的部队，一则可以用来加强柏林方向的进攻，二则也能腾出必要的部队加以训练并使之派赴远东地区参加未来的对日作战。斯大林还透露给他说，准备将来派他到远东地区领导战事。

华西列夫斯基领受了赴东普鲁士前线的任务后，便直接向斯大林提出了解除自己苏军总参谋长职务的请求。

斯大林大感惊奇，便问道：“这样的话，不使您感到难堪吗？”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去年10月间他提出请朱可夫担任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的时候，朱可夫回答说，是的，整个战线缩小了，领导各方面军也容易得多了，因此大本营可以不须前线代表就直接指挥各方面军了。他当时曾问朱可夫：“您不会是因为赌气才这样说的吧？”朱可夫说：“有什么可赌气的呢？我想，我和华西列夫斯基是不会失业的。”他没想到，今天华西列夫斯基竟向他提出了这样的直接要求。问过之后，斯大林陷入了沉思之中。

华西列夫斯基见状，立即解释说：

“斯大林同志，我刚才还没有把话说完，现在请您允许我接着说吧。因为，我考虑，”华西列夫斯基瞟了一眼仍在沉思中的最高统帅，继续平静地说道，“从1943年开始起，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前线充当大本营代表，只是有时奉召才能抽身回到莫斯科来。而去年10月前，您又赋予我和朱可夫元帅不仅协调，而且还要指挥所属各方面军的任务，这样前线的工作就更重更多了。我认为，我也好，朱可夫元帅也好，都是乐于服从最高统帅的一切

安排的。”

华西列夫斯基见斯大林仍不吱声，又继续说道：“您放心，这绝对是我自己的由衷意见。我建议任命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实际履行总参谋长职务的安东诺夫同志来担任这一职务，而只给我保留副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就可以了。”

斯大林听完华西列夫斯基讲的这一切，缓缓地转过头来对在场的安东诺夫问道：“安东诺夫同志，您对您的顶头上司的这个建议有什么意见呢？”

“不，我完全不同意华西列夫斯基总参谋长的这种建议和请求，如果您是真心要征求我的正式意见的话。”安东诺夫说道。

华西列夫斯基站起来对安东诺夫说道：“阿列克谢·莫诺肯季耶维奇！我清楚您的意思，但请不必谦让，这是工作的需要。我相信斯大林同志对此会作出正确决定的。”

斯大林最后说：“让我再考虑一下吧，这也需要征求政治局和其他有关领导的意见。”随后，他指示安东诺夫为华西列夫斯基起草了一份训令，即派他去领导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和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作战行动的命令。见他收好了训令，斯大林又问道：

“您什么时候赴前线呢？”

“明天吧！”

“噢，照我看，您不必这么急。我建议您在家呆两天，也去看看戏，休息休息。”

对了，在您离开前，也就是19日晚上，请再到我这儿来一趟。”

“好，我将按您的建议去做。”说完，华西列夫斯基走了。在他的印象中，这是斯大林第一次没有急急地催他奔赴前线。

然而，到了第二天，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当他真的来到莫斯科大剧院看戏时，正在演出过程中，他的副官说最高统帅要他立即去听电话。在电话中，斯大林告诉了他一个不幸的消息：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司令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大将在梅尔扎克城地区因负重伤而牺牲了。听到这个噩耗，华西列夫斯基特别感到震惊。他太了解这位年轻的优秀统帅了。他知道，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不仅是一位无限忠诚的共产党员，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帅才，而且也是一个心肠特别好的人。他们在一起共事这一年多，彼此已经建立起极为深厚的战斗友谊，俩人从来也没有过任何争吵，甚至都没红过脸。当战争开始的时候，切尔尼亚霍夫斯基还只是一名师长，后来成为第60集团军司令。在库尔斯克会战中，他指挥部队一昼夜就拿下了这座城市，这辉煌的战绩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后来，在白俄罗斯战役开始的时候，经华西列夫斯基的提名推荐，他第一次出任方面军司令员之职。在战斗中，华西列夫斯基又为他晋升为大将专门直接请求斯大林给予批准。在华西列夫斯基看来，切尔尼亚霍夫斯基有深邃的军事理论知识和素养，他善于吸收别人的经验，包括部属们的意见；他总是在战斗中身先士卒，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和勇气十分宝贵；他严格要求部属，但待人却坦率而朴实，对自己的要求也十分严格……

在电话中，斯大林还说，大本营准备派他去担任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司令，问他有什么意见。华西列夫斯基当即表示愿意服从大本营的新的安排。

2月19日晚，华西列夫斯基如约来到了斯大林的办公室，最高统帅给他做了一系列有关新工作的建议和指示。告别时，斯大林祝他和他的部队取得胜利和成就。

出来后，斯大林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在接待室里交给他两个文件夹。其中一个装着任命华西列夫斯基为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司令的新命令，命令要求他必须在2月21日到任视事。当他打开第二份文件时，顿时感到颇出意料：那是一份重新调整后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名单。只见上面赫然写着：

经调整，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当由下列人员组成：最高统帅兼国防人民委员、苏联大元帅斯大林，副国防人民委员、苏联元帅朱可夫，副国防人民委员、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副国防人民委员布尔加宁大将，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海军总司令库兹涅佐夫元帅。

华西列夫斯基感到困惑得很，他不解地问波斯克列贝舍夫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决定。后者只是笑了笑说，他了解这件事的程度同对方完全一样。

华西列夫斯基非常清楚，自1941年7月10日国防委员会决定成立大本营以来，它的成员就从来也没有变更过一次。自从自己出任总参谋长、后来又担任副国防人民委员以来，都没有正式成为过大本营的成员。尽管几乎每次大本营讨论问题都请他去参加，但那是作为总参谋长而必须列席的。而且，在原来的大本营成员中，除了朱可夫之外，方面军一级的首长从来也没有过。是为了照顾他和朱可夫在军队中历来接近于平起平坐的地位呢？还是为了吸收安东诺夫加入？他搞不懂，实在搞不懂，也许根本没必要搞懂这些。不过，有一点他倒是清楚的，那就是：随着卫国战争的发展，斯大林和苏联党政机关，甚至包括一些外国的军事权威人士，早都已经把他看成是苏联红军的第三把手了。

总的看，华西列夫斯基之此次受任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司令与辞去总参谋长一职，既有偶然的因素也有必然的成分，而且，也不无临危受命的意蕴。

20日，华西列夫斯基来到了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司令部。第二天，他便开始着手对该方面军的全部领导工作。好在他与方面军军事委员及集团军一级的首长们早就十分熟悉。很快，他们便建立起良好的新型合作关系。

但是，前线的战事仍是十分地吃紧，更糟糕的情况还在于，在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进攻受挫的稍晚些时候，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在哥尼斯堡地域和泽姆兰德半岛的局势也大大地出现了危机。原来，该方面军按大本营指示先在哥尼斯堡组织防御性作战，而把主力集结到了泽姆兰德半岛附近，以便在20—27日期间粉碎敌人该集团。可是没想到，该两部敌军在得到德国统帅部从海上运来的预备队支援后，竟在19日先于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发动了反攻。敌人的突击是分别从哥尼斯堡和泽姆兰德两地相向发起的，经过3天激战之后，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不但没能阻住敌人的反攻，反倒被敌人把战线逼退了不少，从而使敌人成功地建立起一条连结哥尼斯堡集团和泽姆兰德集团的走廊地带。

最高统帅部了解到这种情况后，考虑到消灭整个东普鲁士敌军集团的战役行动需有一个统一的领导，21日决定把所有在这一地区作战的部队都划归华西列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建制。据此，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从1945年2月24日24时便撤销了，其所属部队改称为泽姆兰德集群，原该方面军司令巴格拉米扬大将遂被任命为该集群司令兼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副司令。这样一来，合编后的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编成就大大地扩

大了。它计包括如下集团军：

- 近卫第 2 集团军，司令为昌奇巴泽上将；
- 第 43 集团军，司令为别洛博罗多夫上将；
- 第 39 集团军，司令为柳德尼科夫中将；
- 第 5 集团军，司令为克雷洛夫上将；
- 第 50 集团军，司令为奥泽罗夫中将；
- 第 31 集团军，司令为沙弗拉诺夫中将；
- 第 28 集团军，司令为卢钦斯基中将；
- 第 3 集团军，司令为戈尔巴托夫上将；
- 近卫第 11 集团军，司令为加利茨基上将；
- 诸兵种合成第 48 集团军，司令为古谢夫上将；
- 空军第 1 集团军，司令为赫柳金上将；
- 空军第 3 集团军，司令为帕皮艾上将；

此外，还有大量的独立坦克军和独立机械军、独立骑兵军部队。

尽管看起来白俄罗斯第 3 方面军现在的兵力十分强大，但它的突击力量仍是有限的。因为，各部队都已大大地减员而又没有得到任何补充——大本营仍把主要力量放在柏林方向上。该方面军尤感困难的是物资供应和燃料，一则供应有限，二则后方遥远。只是有限的军用列车在逐段修复和重建的铁路上缓慢地向他们提供一切必要的物资。

鉴此，华西列夫斯基认为，只有先暂时停止对敌泽姆兰德集团的 11 个师的主动战斗，而把主力用在消灭更大的敌 19 个师组成的海尔斯贝格集团上面。除此，方面军没有任何其他良策可行。经最高统帅部同意，粉碎敌海尔斯贝格集团的战役准备必须在 20 天之内完成。

3 月 15 日，分割聚歼敌海尔斯贝格集团的作战行动开始了。苏军 6 个集团军分别从东面和东南两个方向对海林根拜尔总方向实施了分割突击，空军第 1 集团军在浓雾弥漫的恶劣气候条件下，克服种种困难对地面作战部队给予了有力的支援。战斗一直激烈地进行了两周。各步兵集群硬是踏着没膝深的沼泽地，一公里一公里地向前推进，许多战士为加速完成合围动作连靴子陷在泥里也不要了。后勤部队为及时把有限的弹药送上前线，干脆把军大衣铺在泥泞的路面上让运输车队通过。最后，整个 19 个师的敌军在哥尼斯堡以南的广大地域被合围成了两个包围圈：海林根拜尔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此役歼敌 9.3 万多人，俘敌 4.6 万多人，缴获坦克和强击炮 600 多辆、野战火炮 3560 门、迫击炮 1440 门及作战飞机 128 架。

一直在企图向南运动以突击向柏林方向前进的苏军侧翼的敌海尔斯贝格集团终于被彻底就地解决。这次战役的战果是巨大的，但它打得艰苦和残酷之状，也使华西列夫斯基永远不能忘怀。事后，他曾写道：“春泛使河水溢岸，把整个地域都变成了沼泽。苏联军人跨过没膝的泥泞，冲破炮火和烟雾，直指法西斯集团的中心。

敌人企图摆脱我军，慌忙跳上驳船、舢板、轮船，随后就炸毁了堤坝。由于浪涛向平原倾泻，有上千的希特勒士兵葬身水中。而那些得以逃生的敌人又落入了苏军的火网，我们的飞行员扫射了载着法西斯分子驶向海里的轮船和驳船……”

在消灭敌海尔斯贝格集团的同时，华西列夫斯基便指示巴格拉米扬展开了强攻哥尼斯堡敌军的准备工作。

当时，敌哥尼斯堡集团共有 4 个步兵师及一些独立团的正规部队，此外尚有要塞部队、警备部队和所谓的“民众冲锋队”。总计兵力约有 13 万人、400 余辆坦克和强击炮、4000 门火炮和迫击炮，泽姆兰德半岛各机场还有 170 余架作战飞机可供使用。

在该城城内及近郊地区，除了 1 月间被苏军攻破的外廓之外，敌军还有 3 道设有永备工事和防坦克障碍物的防御阵地。第一道设在距市中心 6—8 公里处，它由数条障碍线和密雷组成，其中还有 15 座坚固的堡垒，每个堡垒内都有一支精干的守备队严守。

沿城区周围的是第二道防御阵地，包括有一些石料建筑物、街垒和钢筋混凝土永备发射点。环绕市中心的第三道防御阵地，主要是由一些棱堡、塔楼和坚固的建筑物组成。该市中心还有一个极为坚固的古堡，它可容纳数千人。这里的内城守备队全由死心塌地的法西斯分子组成。

为了一举攻破这座有着 200 多年历史的坚固要塞城市，华西列夫斯基特别从大本营申请了最强大的压制兵器，并集中了方面军几乎所有的加强火力。到进攻开始时，方面军共有约 5000 多门火炮和迫击炮，其中有近一半都是大口径的重炮，包括大威力和特别大威力的口径为 203 毫米到 305 毫米的火炮数百门。为了炮击重要目标，并不让敌军沿哥尼斯堡海路撤退其军队和装备，还专门部署了 5 个海岸铁道炮兵连把守各个通道，给他们配备的兵器全是射程可达 34 公里的远程重炮。此外，担负攻城任务的地面部队各师也都配备了包括火箭炮兵在内的强大炮群。在航空兵和空军火力方面，参加这次战役行动的不仅有方面军所属的两个空军集团军，还调来了列宁格勒方面军、白俄罗斯第 2 方面军和波罗的海舰队的航空兵部队，空军主帅戈洛瓦诺夫指挥的航空兵第 18 集团军的轰炸机群，也被斯大林直接派到了这里。

具体的地面攻城计划是：从北面和南面沿向心方向同时实施强有力的夹击，迅速分割敌军守备队，并攻占该市。为牵制德军泽姆兰德集团，华西列夫斯基还计划在西部滨海的皮拉乌海军基地方向上实施辅助突击，以使该部敌军不能向哥尼斯堡市区增援。此次担任攻城的部队，全由泽姆兰德集群所属各部组成，它们包括有第 43、第 50 集团军和近卫第 11 集团军、第 39 集团军等。

3 月 17 日夜，华西列夫斯基专门为战役开始时间问题与斯大林通了话。原来大本营给他们规定的攻城时间为不迟于 3 月 28 日，但那时南面的敌海尔斯贝格集团才刚刚被消灭，部队部署根本来不及。因此，他建议改为 4 月初，至迟不超过 4 月 8 日。后来，斯大林同意了，并答应派新任空军主帅诺维科夫空军上将前去充当他的助手。

4 月 2 日，苏军炮兵和航空兵的强大火力准备开始了。华西列夫斯基说，他还很少亲眼看到过这样的猛烈而长时间的立体火力轰击场面。整个 4 天之内，“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它们都没有过瞬息的停止，当时很难想象世界上还有‘安静’二字的存在”。事先，各炮兵部队和航空兵轰炸机群已经搞到了哥尼斯堡城区的一份兵力兵器部署模型，因此轰击和轰炸的效果极佳，城内的许多坚固建筑全被夷为废墟，各主要雷区也被炮击引爆了。整个城区和近郊完全变成了一片火海，从白天到晚上，浓烟蔽日，火光冲天，各种爆炸声此起彼伏，震人魂魄，夺人心胆。

4 月 6 日，经过 4 昼夜的毁灭性炮火轰炸，攻城部队的坦克和步兵向敌人发起了冲击。在冲击推进的过程中，方面军本身的徐进弹幕射击也给了突

击集群以有力的掩护。攻击开始以后，华西列夫斯基再也坐不住了，他离开了自己的指挥所，不间断地到第 39、第 43 和近卫第 11 集团军的指挥所去巡视和实地观察。当他发现第 39 集团军由北向南的突击不够有力时，立即调来了第 5 集团军到西北方向。很快，两支部队便切断了哥尼斯堡和泽姆兰德半岛的敌军的有效联系。随后，第 50 集团军封锁了从东面入城的道路，近卫第 11 集团军从城南方向的突击取得了相当的进展，第 43 集团军也从西北方向突入城郊地区。第一天下来，敌人的指挥系统被打乱，但各堡垒和永备地下发射点内的敌军守备队仍在拼死抵抗。

第二天是攻城战斗的决定性一天。仅在这一天中，方面军就出动了作战飞机 4700 架次，向敌军阵地和堡垒投掷炸弹多达 1500 多吨。晚上又出动轰炸机 1800 架次，敌人的钢筋混凝土工事被炸塌了无数个缺口。但即使这样，奉命不得撤退半步的敌军仍没有放弃垂死前的挣扎，在某些地段，绝望的敌人还组织了拼死的反扑。最先从西面和南面突击要塞内层的苏军第 43 集团军和近卫第 11 集团军部分部队，与敌军展开了空前的肉搏。在炮声隆隆、火光阵阵之中，白刃翻飞，喊杀连天。晚上，城内的合围圈终于在城区的西面合拢了。到第三天上午，要塞内已有 300 多道街区为苏军所占领。

4 月 8 日，为了避免更多的无谓牺牲，华西列夫斯基以方面军司令的身份向哥尼斯堡守敌发出了劝降最后通牒。然而，守敌仍然决心抵抗到底。这样，更加激烈的街区战斗在全城四面八方展开了。苏军英勇的战士们在火焰、烟雾和尘埃中奋不顾身地前进，他们一个街垒一个街垒地肃清敌人。但仍有很多暗堡中敌人不时地向苏军战士发出致命的射击，眼见英雄的战士倒下去，各级指挥员十分痛心。

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华西列夫斯基决定，暂时放弃争夺所有市区的敌人筑垒，各步兵团队撤到指定街垒位置，以便明天实施加强轰击炮火与地毯式飞机轰炸。9 日清晨，5000 门各种口径的大炮，1500 架轰炸机几乎同时对有限的敌军固守区域进行了轰击和轰炸。这确实是名副其实的毁灭性打击！不到一个小时，敌军的堡垒和建筑物内便越来越多地挂出了投降的白旗，待到轰击停止后，德军成队成队地从筑垒工事里走了出来。到当天夜间，城市所有的敌人全部被肃清。被俘敌军总数高达 9.2 万人，其中军官和将军 1800 人。这里面就有哥尼斯堡警备司令拉什中将。

后来，拉什将军在接受审讯时说：

要塞的士兵和军官们在头两天守卫很坚定，但俄国人的力量远远胜过我们，并且占了上风。他们善于隐蔽地集中了如此多的炮兵和飞机，集中运用这些兵器摧毁了要塞的工事，这使我的士兵和军官大丧其胆。我们完全失去了对军队的指挥，我们走出工事到大街上想同司令部取得联系，可是不知往哪里走，完全迷失了方位。破坏得如此厉害的熊熊燃烧的城市已经彻底变了样。我怎么也不曾想到，像哥尼斯堡这样的要塞竟会如此迅速地陷落。

俄国统帅部很好地拟定并且出色地完成了这次战役。在哥尼斯堡城下我们整整丧失了 10 万军队。哥尼斯堡的失守，使我们失掉了最大的一个要塞和德国在东方的支点。

是的，希特勒曾经称哥尼斯堡是德意志国家有史以来最好的德国要塞，并且说它是“绝对攻不破的德意志精神堡垒”。该城失陷后，希特勒在他的

柏林地下办公室里气得暴跳如雷。他先是破口大骂“北方”集团军群的司令官魏斯上将，后来又以无可奈何的狂暴情绪缺席判处了被俘的要塞司令拉什将军的死刑。

当苏军前线部队还在清点战利品的时候，胜利的捷报就传到了莫斯科。4月9日当晚，首都上空响起了324门祝捷礼炮的24响齐鸣。这巨大声响载着胜利的喜庆，震天动地。这次使用的是第一等级的礼炮庆贺方式，它只限于在解放加盟共和国首都、攻克其他国家的首都或庆祝其他特别重大的事件时鸣放。

翌日清晨，华西列夫斯基接到了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打给他的祝捷电话。在电话里，最高统帅高兴地告诉他，他已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苏联英雄”的称号，同时，还准备为他颁发第二枚“胜利”勋章。斯大林说：“我祝贺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希望您取得更大的成就！这就是全歼东普鲁士境内的法西斯匪帮。”

华西列夫斯基十分激动，他对党和国家给予的巨大荣誉表示感谢。最后，他说道：“斯大林同志，请放心。我将迅速执行您的指示，全歼泽姆兰德半岛上的残余敌军！”

确实，华西列夫斯基值得骄傲和自豪。要知道，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荣获过两枚苏军最高军事勋章——“胜利勋章”的只有3个人，即除了他本人外，再就是斯大林和朱可夫，后俩人分别是苏军的正副最高统帅。他的第一枚“胜利勋章”是在乌克兰战役胜利后获得的。当时是1943年4月10日，正好是敖德萨城被攻克的日子。

在这次进攻哥尼斯堡的战役中，仅华西列夫斯基指挥的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中，获得各种奖励和勋章的就高达数万人。

哥尼斯堡被攻克后，在整个东普鲁士就只剩下了敌军泽姆兰德集团。它在这时还有8个师的兵力，其中只有1个坦克师。而且，它已绝对地处在强大苏军的包围之中。海路上有波罗的海舰队的严密封锁；陆路则被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围得铁桶一般；即使在空中也有终日不断的苏军航空。作战飞机在他们头上盘旋巡视。

鉴于敌泽姆兰德集团已经插翅难逃，4月11日，华西列夫斯基向他们发布了劝降通牒。该通牒全文如下：

留在泽姆兰德的德国将军、军官和士兵们：

现在，苏联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司令、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要对你们讲话。

你们清楚地知道，德国全军已经遭到了彻底的粉碎。俄国人已经到达柏林城下和维也纳，盟军也已到达莱茵河以东300公里的地方，他们已经占领不来梅、汉诺威和不伦瑞克，直抵莱比锡和慕尼黑城下了。半个德国已经在俄国人和盟军的手中了。

德国最坚固的要塞之一哥尼斯堡在3天内就被我们攻克了。要塞司令、步兵将军拉什已经接受了我提出的投降条件，带着大部分守备部队投降了。投降就俘的德军总共有92000名，其中军官有1819名，将军有4名。

留在泽姆兰德的德军官兵们！现在，在哥尼斯堡这个德军在东普鲁士的最后堡垒易手之后，你们的处境已经绝望了。

你们距正在战斗的什切青前线有 450 公里之遥，往西的海路也已被我们俄国的潜舰切断。你们现在是处在俄国军队的深远后方，你们已经没有出路了。与你们对峙的，是力量数倍于你们的苏联红军。力量当然在我们方面，你们的任何抵抗都只能是毫无意义的——这只能导致你们的死亡和聚集在皮乌拉地区的大量平民的牺牲。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流血，我要求你们必须在 24 小时内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投降就俘。凡是停止抵抗的将军和官兵，都将得到生命的保障和足够的饮食，并在战后予以遣返。所有的伤病员将立即得到医疗。我允许对一切投降者给予无损士兵尊严的待遇，和平的居民也将可以回城或回乡从事和平的劳动。

这些条件对兵团、团、分队、小组和个人同样适用。如果我的要求在提出后的 24 小时内未被执行的话，那么你们就将会有被歼灭的危险。

德军官兵们！如果你们的指挥官不接受我的最后通牒，你们就单独行动吧。

保全性命，投降就俘吧！

苏联白俄罗斯第 3 方面军司令

苏联元帅

华西列夫斯基

1945 年 4 月 11 日莫斯科

时间 24 时

然而，华西列夫斯基的这个要求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得到回答。

4 月 13 日凌晨，华西列夫斯基命令预定的突击集团以双倍敌人的兵力发起了迅雷不及掩耳的强大攻势。

按预先计划，突击地点选择在泽姆兰德半岛中部的费什豪森方向，目的是分割敌军集团，然后加以各个歼灭。担负主攻任务并从北向南并肩作战的是近卫第 2、第 11 集团军，第 5、第 39，第 43 集团军。

进攻的当天，敌军的防御阵地就被突破了。到第二天，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的德军就开始了总退却。到 17 日，整个白俄罗斯第 3 方面军发起战役总攻的时候到了，强大的苏军犹如势不可当的潮水，翻卷着冲天的巨浪向守敌呼啸扑去，不到 3 个小时，费什豪森就被占领。随后，不到当天傍晚，泽姆兰德半岛上的德军就便彻底肃清了。希特勒的私人代表、泽姆兰德集团的敌军头子科赫乘机乘坐整个冬天都停泊在这里的一艘破冰船逃走。当他临逃之际，还严令士兵必须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4 月 25 日，在波罗的海舰队的积极配合下，华西列夫斯基指挥白俄罗斯第 3 方面军攻克了皮拉岛。这是德军在泽姆兰德半岛上的最大港口，也是它在这里的最后一个要塞和据点。

至此，整个东普鲁士战役以苏军的最后全面胜利而告终。由此，希特勒法西斯德国在东方的最大反动堡垒彻底陷落了。

对华西列夫斯基来说，这次战役的前半段是费尽心思又吃了不少辛苦的，只是在后半段才最终出现了势如破竹、一往无前的甘甜。正是因为有了前半段的辛苦劳作，才积累并赢得了后半段的胜利丰美。这正如中国一句古

话所说的那样，梅花香自苦寒来。就他个人前后领导和指挥来说，又可以说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第十八章 远东苏军总司令

对德胜利凯旋日，对日作战运筹时；
受命独身担大任，远东战事赖以之。

1945年4月27日，也就是当东普鲁士战役胜利结束后的第二天，华西列夫斯基就奉最高统帅部命令离开了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他知道，这次调离后等待他的将是更重大的使命，即由西线转赴东线，奔赴远东领导和指挥最高统帅拟议之中的未来对日作战。

2月17日，早在雅尔塔会议刚刚结束、他到斯大林那里去汇报工作、并被委派到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前线领导进军普鲁士的伟大战斗的时候，斯大林就曾告诉他说，在德国投降2—3个月后，苏联政府为承担反法西斯盟国的义务，将在远东地区展开大规模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作战行动，并建议派他前去领导和指挥这次意义重大的远东战事。当时，斯大林还指示他说，最好由他在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和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中挑选出若干个精锐的集团军，以便届时派赴远东战区，作为对日作战的苏军远东部队的尖刀。

“4月27日，我开始着手制定对日作战计划。”华西列夫斯基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到这时候，他才终于明白了当初他提出辞去总参谋长职务后为什么斯大林把他列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之一。显然，在最高统帅的心目中，他和朱可夫仍是最得信任和赏识的军事统帅，最高统帅仍是把他们俩人视作自己的左膀右臂一样。因为，当时朱可夫元帅已经被派赴到最重要的柏林方向去了，那么这个与之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远东方向便非他莫属了。

其实，早在雅尔塔三国首脑会议之前，斯大林就曾指示华西列夫斯基和他的第一副手安东诺夫，要求他们考虑究竟采用什么办法才能缩短即将进行的对日作战的准备时限问题，只是那时他还没有想到要派他去领导和指挥这次绝对重要的战事罢了。他当时只是认为，这不过是他作为总参谋部的主要领导人的分内之事而已。

现在，对苏联决定参加对日作战问题略微作些追述和说明。

如果把事件的源头追溯到1904年前后在中国东北大地上演出的那场骇人听闻的日俄大战，也许有些读者会觉得离题太远了，或者会认为那些年代的事情对后来的事件并不具有什么重要的背景意义：因为那是帝俄时代的俄日争夺，沙俄也是奉行扩张主义的封建军事帝国；而1945年的事件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支援中国抗日或履行盟国反法西斯义务的举措。因此这些还是不搅在一起的好，等等。

但是，在这里有必要提醒或提示给大家：这是历史，是不但根本扯不断而且还紧密地缠绕、连结在一起的历史！此外，尤其是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每一个民族或国家在处理各种国际事务中，都首先要参照并顾及过往的那些似乎已经沉睡了许久的历史及历史的联系；同样，每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领袖人物都不会轻易地割断他们的历史脐带，或者是自觉的和有意识

的，或者是不自觉的和下意识的。要知道，就像人的感情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要接受理智的驾驭一样，这种民族或国家间的历史情结也会冲破意识形态的束缚或阻滞。更何况，在许多时候还往往有着更为重要的国家或民族的实际利益在背后作着强大的驱动呢！

是的，这种解释确实有点儿抽象而且过于冗长，那么就说些具体而实际的吧。

稍有一定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宽大办公室的墙上，挂的既不是马克思也不是列宁的肖像，而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些著名的统帅和将军们的巨幅肖像，如苏沃洛夫、库图佐夫等，甚至如我们已经介绍过的，许多著名战役和军功章也都是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的。当然，这倒不一定非要给予非议或厚非；但是，当斯大林在 1945 年 2 月雅尔塔密约中把掠取第三国——确切地说是中国——实际权益作为出兵对日作战的先决条件的时候，就不能不让我们和任何有正义感的人感到有些匪夷所思了。而且，这些问题如中东铁路、南库页岛、大连港国际化及租借旅顺作军事基地等，又都是经由 1904 年那场日俄战争的结果而引起来的。

可见，此役确为事之始因。

1904 年春，为互相争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权利，沙俄和日本两伙强盗在关东大地上展开了厮杀。日军先是在旅顺口、盖县、辽阳至奉天一线大败俄军，随后又在对马海峡打得前来增援的俄波罗的海舰队全军覆灭。战后，日本遂夺取原来在沙俄控制之下的旅顺海军基地，中东路沈阳至大连一段（即所谓的南满铁路）、南库页岛及其附近岛屿等势力范围。这样，沙俄苦心经营的中国南满地区特权全部被迫无偿地转让给了日本。老牌沙俄帝国的扩张政策终于败在了新锐强盗的“大陆政策”之下。这使俄国人大为光火，心痛急煞。由此，两国旧怨新仇交织一处，深埋心底。

1917 年 11 月，列宁的新生社会主义苏维埃俄国出现后，日本出于意识形态和远东利益等多种因素，带头参与并策划了 1920 年前后的 14 国联合外部武装干涉。其实，对日本来说，干涉布尔什维主义是借口，真实动机和利害是实施蓄谋积久的侵略。

1918 年，日本即出兵西伯利亚并占领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1920 年又占领了整个库页岛。后因苏俄军民奋力苦斗，才彻底击败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活动，日军也被迫于 1922 年 10 月撤出所占领的大部分地区，其中包括库页岛北部。这样，日苏之间在远东及中国东北地区的实际利益又回到了 1904 年日俄战争之后那样的基本状况。

此后，虽然 1925 年日本被迫承认苏联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但两国，尤其是日本却一直也没有放弃在远东地区与苏联的争夺。苏联政府也深感日本及其背后的美国是其在远东地区的实际威胁，遂于 1929 年 8 月下令成立特别远东军；1931 年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后，苏联政府又决定建立远东海军。这是因为，日本内阁自 1927 年就制定了“北进”的侵苏政策，其军部也狂妄叫嚣从北部击败苏联。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将其关东军司令部移至其傀儡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苏联政府为阻止日本“北进”，争取时间加强经济建设，扩充实力，遂于 1931 年底向日本建议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结果，在时隔一年之后被日本以时机尚未成熟而拒绝。苏联遂感问题严重，乃于第二年 5 月

加强了特别远东军实力及其防务。越二年，又改远东海军为太平洋舰队，增设外贝加尔军区。

1936年11月，日本勾结德国法西斯签订了“德日关于反共产国际协定”，同时还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秘密附属协定”。后者是一个旨在反苏的秘密军事协定，它规定：缔约一方受到苏联进攻或威胁时，另一方不得采取足以减轻苏联负担的一切措施；不经对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同苏联签订与本协定精神相违背的一切政治条约。至此，“东京—柏林”反苏反共轴心形成（次年意大利亦加入）。

1938年7月，日苏哈桑湖冲突爆发（即张鼓峰事件）。日军进攻被打退，苏军进入张鼓峰地区。此间，苏军总参谋部决定将特别远东军改为远东方面军，接着又把该方面军分成独立第1军和独立第2军。哈桑湖军事冲突期间，华西列夫斯基作为总参谋部战役训练处（作战部前身）处长，直接协助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参与了这一战斗的指挥及善后处理，并因此得到了苏共政治局的表彰。

1939年春夏际，蒙满边境诺门坎军事冲突爆发。实际上，这次冲突在背后是日苏间的再次军事冲突，关东军和苏军也都投入作战。结果，苏蒙联军大败日本关东军而宣告停战。

是年8月下旬，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第二年9月，德意日三国订立同盟条约。

鉴于日趋紧张的苏德关系和日美关系，日苏两方都在打自己的算盘，结果于1941年4月，日本与苏联亦订立中立条约。后者规定：“如果缔约国一方成为第三者一国或几国的战争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应保持中立。”换言之，假如发生苏德战争，日本须保持中立；如爆发日美战争，则苏联要保持中立。该条约有效期为5年。

然而，当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特别是德军势如破竹地越过苏联西部广大地区、并于7月间发起对莫斯科的大举进攻时，日本便准备北进攻击苏联了。7月初，日本政府拟定了《适应形势演变帝国国策纲要》。该纲要规定，对北面的苏联“要秘密准备采取武力”。随后，7月7日和16日，军部两次下达了“关东军特别演习”（实际不是演习，而是进攻苏联的作战）动员令。经过这两次动员，苏联边境这侧的关东军总兵力已经达到了70余万人。苏联政府对此极为紧张，驻日大使每隔10天就拜访日本外相松冈一次，质问日方是否准备遵守《日苏中立条约》。在第三次（7月13日）会见时，松冈干脆冷冷地说：“我认为，日苏中立条约不适用于目前进行的战争。”只是由于后来日本第二次近卫内阁解散，第三次近卫内阁新任外相丰田不主张急于攻苏，随后参谋本部也判断德军不能在年内攻下苏联首都并结束战争，最后才决定了“在本年内不对苏联使用武力”的新方针。

后来的事件表明，日本参谋本部的判断是正确的，德军不仅没能在冬季攻下莫斯科城，反而在那里惨遭大败，以至不得不把战线后退80—100公里。但是，当时苏军总参谋部和大本营却为此大大担心了好长时间。此间，在远东前线，远东方面军命令各部队在前沿大修筑垒工事，布置反坦克障碍物，拉铁丝网，敷设雷区；太平洋舰队加强巡逻和空中侦察，并在苏联海域苏维埃湾—符拉迪沃斯托克近海—波谢特湾附近敷设大量水雷；空军部队也进入了三级战备状态。（按常规，在一级战备中，飞行员须全天候地在驾驶舱内待命；在二级战备中，飞行员在机旁待命；在三级战备中，飞行员在指

定地点待命)。在 10 月以前,苏方向远东前线增派了不少的兵力,只是此后得到准确情报后,斯大林才在莫斯科城下吃紧的时候,把善于冬季作战的远东军 11 个精锐师抽调到了西线战场去打击德军。然而即使如此,随后又向远东投放了比这个数目还要多的兵力,只不过这些都是未经更多训练的部队而已。

苏德战争的第二年,即 1942 年,当德军把春季攻势发展为夏季夺取斯大林格勒的大规模进攻时,日本参谋本部又一次制订了进攻苏联并夺取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作战方案。为此,日本军部决定设立关东军第 1 和第 2 方面军司令部、装甲兵司令部和第 2 军司令部。同上一次一样,后来由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遭到更加严重的失败;而苏军随后把战争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并由此开始大规模反击作战等因素,日本方面才不得不放弃了这次与德军夹攻苏联的打算。自此以后,虽然日军仍在远东前线留驻着关东军的主力部队,但再也没有敢提出进攻苏联的新计划。这是因为,一方面,日军在南太平洋战场连连遭到美英军队的打击,如中途岛战役、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等等。另一方面,苏军已在战场上转入了对德军的反攻,如库尔斯克大会战,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战役和右岸乌克兰战役中,德军已经连遭大败,几成节节败退、望风而逃之势。

到 1943 年 11 月,当苏、美、英三国首脑首次德黑兰会晤时,斯大林就已原则上同意了在击败德国后立即着手进行对日作战的准备。因为,一方面,斯大林已经高兴地看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终于答应了将在第二年春天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承诺;另一方面,这是为了承担盟国义务或者回应美英两国的积极行动,也是为了尽快地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和彻底教训一下一直在威胁苏联的这个“小日本”。这时,斯大林认为他已经有这种能力了。当然这这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他一直在等着这个机会。

1944 年 9 月,斯大林第一次向总参谋部下达指示,要求计算出在远东集结兵力所需时间,以及兵力配置、战役保障等各种资料和数据。随后在 10 月间与前会会晤的丘吉尔和艾登谈话时,他明确表示苏联可以在德国投降两三个月后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条件是,请美英两盟国在远东建立起足够 2—3 个月的燃料、粮食和运输工具的储备。丘吉尔和艾登表示愿意承担该项义务。

到 1945 年 2 月雅尔塔会议举行的前夕,斯大林曾在克里姆林宫接待了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后者想急于了解苏联政府在出兵对日作战问题上的立场,斯大林丝毫不加掩饰地对他说,现在日本非常惧怕苏联参战,而苏联再也不用过多地担心日本的挑衅或进攻了。为此,他给美国大使举了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他说,在不久前东京举行的一次官方招待会上,日军总参谋长杉山曾向一位苏联代表建议说,日本方面很想与苏联首脑举行会晤。杉山说,德国人并不在日本人眼里,日本同德国的条约不过是一纸空文。“但我根本不想见杉山,所以没有给他以任何答复。日本这一作法表明了他们对未来的恐惧,其恐惧已深重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日本的一个高级军官竟然在这样微妙的事情上向一名普通的苏联代表进行试探。”

关于第二个例子,斯大林对哈里曼说:“日本立场改变的另一个证明还反映在,日本人现在已经同意了我们提出的把萨哈林岛(即库页岛)北部开采石油和煤炭的租让权卖给苏联。早在 1941 年 4 月我们就谈起过这笔交易,当时还打算在同年 10 月办妥一切手续。但是后来日本人把此事拖延了两年

多，现在他们突然愿意实现那份原有的协议了。这是东京的忐忑不安的另一个迹象。”

在雅尔塔三国首脑会议上，斯大林在礼貌的外表下向罗斯福和丘吉尔强硬地提出苏联出兵对日作战的不可动摇的条件。在 2 月 11 日签订的那份秘密文件(史称“雅尔塔密约”)上明白地写着：

……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 2—3 个月后，苏联将参加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是：

1. 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
2. 恢复 1904 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各项权利，即
 - 甲. 将库页岛南部及其附近毗连岛屿归还苏联；
 - 乙. 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惠权益，恢复租界旅(大)连港为苏联海军基地；
 - 丙. 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进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惠权益，而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3. 千岛群岛交给苏联。

姑且先不去说斯大林和苏联政府所开具的上述条件及其所持立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侵犯了同为反法西斯盟国的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也不用去说斯大林如何地不喜欢蒋介石这个人；人们首先就会问，斯大林为什么能这样强硬地提出问题呢？一向多谋的罗斯福和狡黠的丘吉尔何以能答应苏联的这些要求呢？

原来，在雅尔塔会议召开之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就对日战事提出了一份相当悲观的估计和设想。按照那些富有经验的高级军官们的估计，德国投降后至少还需要有一年半的时间才能最终战胜日本，而为此美军至少要付出 100 万以上官兵死亡的巨大代价。他们认为，最早在 1945—1946 年冬才能攻占日本列岛；如若欧战延长的话，那么这个进攻只得推迟到 1946 年较晚的时候。麦克阿瑟将军曾说：“通过东京平原攻占日本的工业心脏地区，将会是一场极其激烈的战斗。”当时美英两国的许多政治家和军人甚至预测说，恐怕在 1947 年或 1948 年前不能最终彻底地战胜日本。既然如此，则不论是罗斯福还是丘吉尔，他们都希望由苏联人来承担这一牺牲，哪怕这样做确实对他们在远东的未来利益有着不小的妨碍甚至威胁。他们的心理至少有两点：一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二是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

自然，罗斯福和丘吉尔也不是傻瓜。当斯大林提出上述条件时，他们总是态度模棱两可，甚至以中国政府和蒋介石不会同意为理由企图变相拒绝。无奈斯大林心中早已吃了秤砣，他铁了心要取得这些条件，否则便不准出兵参战。当然外交辞令不是这么说的。

关于蒋介石和中国政府的态度问题，斯大林说，他也不反对关于协议内容应该得到中国的确认，但现在不必急于通知中国人。他只是希望把这些作为会议正式文件写下来并得到总统和首相的赞同，至于什么时候通知中国人，他相信罗斯福会有他认为可行又稳妥的办法的。此外，为了平衡蒋介石的心理，在对待中国内部国共两党关系上，斯大林也接受了罗斯福的建议，同意在最近与蒋介石签订一个正式的条约，以示对他的政府的支持，而并不支持与他有着共同信仰的毛泽东和共产党人。

关于美英并不情愿放弃的那份在远东的利益，以及罗斯福提出的把大连等地实行国际共管而不是苏联一家独占等问题，斯大林干脆不加考虑，他只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解释说：如果不接受他提出的那些条件，那么苏联人民将难于理解为什么苏联要对日作战。德国威胁着苏联自身的生存，因而苏联人对于同德国作战的意义有很清楚的认识，但是他们不会懂得为什么要去攻打日本。不过，如果能接受他提出的那些政治条件，这件事就可以较为容易地用涉及国家利益的理由，向苏联人民和最高苏维埃进行解释了。

就这样，斯大林的“理由”充分，罗斯福和丘吉尔也表示“理解”。只有中国不能“理解”，也没有“理由”来做这样的“理解”。可遗憾的是当时中国方面还并不知情，即使后来中国方面知道了此事，也太晚了。就这样，在反法西斯盟国中间，确切地说是在美英苏三国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也演出了这种牺牲弱国利益以维持大国间平衡的悲剧。实际上，这也是一幕丑剧。

当然，中国人民和当时的中国政府，尤其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没有否认过这样的事实，这就是：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及其一举消灭日本关东军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它加速了中国人民打败日寇并驱逐其势力出中国的伟大进程。不仅如此，中国人民对苏军的英勇作战还给予了热烈的欢迎和积极协助。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包括今天也都一直对此给予极高的评价。同样，对美英等盟国在抗日战争中给予中国人民的援助和支持，也非常感谢。但是，这不等于中国方面对美英苏各大国拿中国的主权作交易是认可并同意的。功是功，过是过，功过自当分明。

如果说，美国和英国等对于牺牲小国利益来换取它们的平衡或实际利益已经是轻车熟路、志于此道的话，那么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作为自诩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斯大林来说，则无论如何，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为此，当 1949 年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当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并拜会斯大林的时候，后者也感到相当难堪，并为他过去对中国革命一系列指手划脚的错误作了道歉；而且，抗日战争胜利之际苏联从中国得去的那些特殊权益也通过条约形式归还给了中国。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但是，在当时，斯大林所更多考虑的确实是怎样才能迅速打败与苏联有着无数旧怨新仇的日本，怎样才能在対日出兵作战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和利益。他确实很少或干脆就没有顾及这样做会不会损害同是反法西斯盟国之一的中国利益和主权；或者，在他看来，苏联既然出兵参战了，那么就不能什么报偿也得不到。也许，斯大林和苏联政府是太实际或过于贪心了，也许是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对他和他的政府用他们自诩的标准来要求和衡量？对此，只有天知道。

当时，斯大林是太想狠狠地教训一下日本了。也许，从 1904 年日俄战争以来那一幕幕历史过深地刺激了他的民族根性，他要彻底地来一次总报复。他决心要让日本比当年俄国人败得更惨重，他要夺回当年日本人在他的前辈手里夺去的那些东西，甚至比那些还要多……

日本政府和军界也明显地感到了这一切。1945 年 2 月雅尔塔会议不久，日本参谋本部就获得了苏军将在战胜德国 3 个月后即对日宣战的情报。但是，狂妄好战的日本军部认为，苏联的对日宣战和出兵时间应该大有疑问。他们觉得苏军的进攻不会那么快，准备工作也不会在那么早就完成。他们甚至判断认为，苏军一定要等到日军“瓜熟蒂落、不堪一击”的时候才会真正

出兵作战。可是，他们没想到，形势发展得太快了，那绝好的“瓜熟蒂落”的时机恰好在德国投降3个月后就到来了。此外，日本方面的史料还说，此时日本军部并不知道雅尔塔会议期间还有那样一个关系到中国主权问题的密约，这只是在战后他们才知道的。根据莫斯科1952年出版的《关于结束战争的历史文件》的披露，还在苏联没有作好最后出兵作战的准备时，曾经一度帮助日本与美国进行和平试探的艾伦·杜勒斯就已经在私下里把该项秘密告诉了日本方面。

1945年4月5日，当朱可夫正领导西线苏军展开总攻柏林的激烈战斗时，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把苏联政府不准备延长《日苏中立条约》的决定当面通知了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在阐述这样做的理由时，莫洛托夫毫不客气地说：“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援助自己的法西斯盟友德国的对苏战争，同时也已同苏联的盟国英国和美国处于交战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认为《日苏中立条约》已经失去存在的意义，因此完全没有再让它继续存在的理由了。”按规定，该条约有效期为5年，如果在期满前一年任何缔约国一方不宣告废除的话，它将继续延长5年。

现在，恰好是第4年。日本人气得直咬牙根：怎么赶得这么巧呢？至此，他们应该明白，这是苏联方面准备参加对日作战的一个明显步骤，同时也是向他们发出的一个严重的警告信号。

但是，狂妄的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对此并没有特别在意，它仍然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眼前的时局。于是，日本国内在“无论如何也要胜利”的口号下，仍然煽动战争的歇斯底里。铃木首相甚至以政府的名义宣称：“我们将毫不退让地继续前进，并以胜利最终结束战争。”

自然，日本政府也没有愚蠢到真的相信苏联。它一方面表面上向苏联款送风情，甚至不断派出所谓“亲苏派”官员赴苏；而另一方面，它也深知日苏战争终不可免，因之在不断地做着各种战争准备工作。当然，这时与以前所不同的是，由准备入侵苏联改变成了防范苏联对它的“入侵”。日军军部认为，苏军将首先在中国东北地区和北朝鲜发动进攻。在4月间，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向各战区和非战区军以上司令部下达了一份绝密军事文件，即《苏联东部地区苏军后勤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是截至1944年底以前日方掌握到的苏联远东地区的各种经济和军事情报的总汇，它包括苏联在该地区的人口统计、经济实力（主要是石油、煤和钢材）、军事工业、西伯利亚铁路运输能力（包括平时和战时）等计算和分析，最后还对苏联出兵作战可能使用的最大兵力及其粮食、弹药、燃料等补给量做了估计和判断。报告认为，苏军可能投入的最大作战兵力为55—60个步兵师，这是指在单靠西伯利亚铁路运输情况下的算法；倘按理论上的计算，他认为最多可以达到80个师左右。

此后，日本便逐步加强其关东军的实力，并下令所有在满洲的退役军人重新入伍服役，以扩充其对苏联的防务。同样，从1945年4月份以后，苏联也开始把大量的西线兵力，特别是那些具有在冬季条件下和森林、山地作战经验的部队，逐步地运送到远东前线……

当4月底华西列夫斯基回到莫斯科大本营受命的时候，苏军最高统帅部和苏联政府国防委员会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据他了解和掌握的情况，此间先后调到远东地区的作战部队计有4个集团军：柳德尼科夫上将指挥的第39集团军、克雷洛夫上将指挥的第5集团军、克拉夫钦科坦克兵上将指挥的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和马纳加罗夫上将指挥的第53集团军。其中，第39

和第5集团军是直接从东普鲁士战场上调过来的，这是早在2月间华西列夫斯基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精神而特别挑选出来的两支精锐部队。

此间，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还专门为远东苏军选派了一大批富有指挥经验的军事统帅和高级军事首长。这项工作是在斯大林和华西列夫斯基的亲自把关下完成的。

当时，他们认为，在不打乱远东现存苏军组织的情况下，为加强后贝加尔方面军、远东方面军和滨海集群，必须给他们派去更多的在西线作战中受过锻炼、而最好又在远东服过役的人员。自然，他们还必须具有统帅经验和高超的指挥才能。

远东方面军司令员的人选没有改变，仍是普尔卡耶夫上将。他是华西列夫斯基的挚友，早在苏德战争爆发前，他们两人就熟识了。此人干练果决，富于思考，具有在森林地带指挥作战的丰富经验。战前，该氏曾经出任莫斯科军区代理参谋长、白俄罗斯军区参谋长。卫国战争初期，先是担任西南方面军参谋长，1942年担任西北方面军下属的一个集团军司令，后因战功卓著而晋升上将，并被任命为加里宁方面军司令。1943年4月，接替阿帕那先科大将出任远东方面军司令一职。原来，是准备派他来这里为后者充当副手的，但阿帕那先科在被调到沃罗涅日方面军锻炼期间，在库尔斯克会战中牺牲了。这样，普尔卡耶夫就再也不用等候阿帕那先科回来了。自此，他便扎根在远东地区。

关于滨海集群的司令员人选，斯大林决定干脆把原卡累利阿方面军司令部的全班人马搬到这里来，并任命麦列茨科夫元帅出任该集群司令。斯大林曾对华西列夫斯基说：“我相信，这个机灵的雅罗斯拉夫一定会有办法打败日本人，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在森林地区作战了，他更有对付强大筑垒敌人的经验。”华西列夫斯基对麦列茨科夫印象极好，他知道后者的身世和经历，特别是卫国战争期间，麦列茨科夫一直在西北部战线的各方面军中转战，独挡一面，卓尔不凡。尤其是，他具有森林战、山地战和攻坚战等多方面的实战经验和指挥才能。该氏升任苏联元帅较晚，但战前就获得了“苏联英雄”称号的殊荣。

至于最重要的对日作战方向——后贝加尔方面军的人选，华西列夫斯基提议最好由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来担任。他还向斯大林推荐说，马利诺夫斯基的参谋长，应该非扎哈罗夫大将而莫属。斯大林对这两个人选没有提出任何意见，他知道，华西列夫斯基与他们俩人共事时间颇久，应是最了解他们的人了。而且，他还记得，华西列夫斯基很早的时候就多次报告说，马利诺夫斯基是一个声望极高的军事统帅人物，他最富机动作战的经验，治军有方，更有善于深思、当机立断的美名。一般说来，凡是由马利诺夫斯基向大本营或总参谋部提出的报告或建议，多数都是合理的和正确的。

此后，华西列夫斯基经与总参谋部商量，最后请准斯大林同意，又向后贝加尔方面军和滨海集群派去了一批有卓越战功和丰富指挥经验的集团军首长。如，普利耶夫上将、巴甫洛夫斯基中将和卢钦斯基中将，此3人被派往后贝加尔方面军；又如别洛博罗多夫上将、奇斯佳科夫上将和扎赫瓦塔耶夫中将，此3人被派到了滨海集群。

这样，远东苏军各方面军的主要人选都解决了。当时的部署和编成如下：

满洲西部边境的是后贝加尔方面军，方面军司令为马利诺夫斯基元帅，

军事委员会委员为捷夫钦科夫中将，参谋长为扎哈罗夫大将。下辖各集团军为：

- 近卫坦克第 6 集团军，司令为克拉夫钦科坦克兵上将；
- 第 39 集团军，司令为柳德尼科夫上将；
- 第 17 集团军，司令为达尼洛夫中将；
- 第 53 集团军，司令为马纳加罗夫上将；
- 第 36 集团军，司令为卢钦斯基中将；
- 苏蒙混合骑兵机械化集群，司令为普利耶夫上将；
- 空军第 12 集团军，司令为胡佳科夫空军元帅。

满洲东北部的是远东方面军（后改为远东第 2 方面军），方面军司令为普利卡耶夫大将，军事委员会委员是列昂诺夫中将，参谋长是舍夫钦科中将。下辖各集团军部队为：

- 第 15 集团军，司令为马莫诺夫中将；
- 第 2 集团军，司令为捷列欣坦克兵中将；
- 第 16 集团军，司令为切列米索夫中将；
- 堪察加防区，司令为格涅齐科少将；
- 空军第 10 集团军，司令为日加列夫空军上将。

部署在满洲东部边境的是滨海集群（后改称远东第 1 方面军），司令为麦列茨科夫元帅，军事委员会委员是什蒂科夫上将，参谋长是克鲁季科夫中将。下辖集团军为：

- 第 1 集团军，司令为别洛博罗多夫上将；
- 第 5 集团军，司令为克雷洛夫上将；
- 第 25 集团军，司令为奇斯佳科夫上将；
- 第 35 集团军，司令为扎赫瓦塔耶夫中将；
- 机械化第 10 军，司令为瓦西里耶夫坦克兵中将；
- 空军第 9 集团军，司令为索科洛夫空军上将。

此外，参加远东苏军对日作战的还有尤马舍夫海军上将指挥的太平洋舰队和安东诺夫海军少将指挥的阿穆尔河区舰队（亦称小太平洋舰队）。这两支舰队也受华西列夫斯基的苏联远东军总指挥部节制和指挥。

关于华西列夫斯基担任总司令的远东军司令部的情况，需要说明的是：华西列夫斯基的远东军总司令一职的正式任命命令是 1945 年 7 月 30 日才正式下达的，但这纯粹是出于当时对日作战准备的严格保密的技术需要。按斯大林和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指示，在 1945 年 8 月 3 日之前，华西列夫斯基的总司令部一直被称为“瓦西里耶夫上将作战组”。当时，华西列夫斯基、马利诺夫斯基和麦列茨科夫 3 位元帅都奉命取下了元帅肩章，以普通上将的身份秘密进入远东地区的。而且 3 人也都改用了化名，华西列夫斯基改为瓦西里耶夫上将，马利诺夫斯基改为莫罗佐夫上将，麦列茨科夫改为马克西莫夫上将。所有的作战命令和报告都必须以此统称，而且，军师两级首长及其以下的军官都不知道此事。也就是说，他们并不知道这次对日作战的总指挥官和方面军首长到底是谁。

关于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部的设立，最初只有斯大林、安东诺夫和华西列夫斯基 3 人知道，稍后斯大林只告诉了在西线的朱可夫，因为他是副最高统帅。实际上，从 4 月底到 8 月初，华西列夫斯基一直是以远东军总司令的身份在领导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但多数人并不知道此事，只是知道有

一个“瓦西里耶夫上将作战组”。因为，在此间的一切公开场合，华西列夫斯基都是以副国防人民委员，大本营成员兼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司令的身份出现的。包括6月24日的大型胜利阅兵活动，华西列夫斯基也是以后面的职务领头出现在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千人混成方阵前面的。

在1945年4月底和5月初的几次谈话中，斯大林对华西列夫斯基一直强调，这次对日作战与在西线的对德作战完全不同，因此大本营代表制度不适合远东战场的实际需要，他提出成立一个由华西列夫斯基负总责的远东苏军总指挥部或司令部，后来干脆就说任命华西列夫斯基为苏联远东军总司令。他征求华西列夫斯基本人的意见，华西列夫斯基表示说，他完全同意最高统帅的安排。他和朱可夫经常与斯大林打交道，发觉最高统帅有一个特点，或者说是习惯：每当他已经决定了一件事情后，便喜欢把这种意见说出来并征求当事人或在场的人的意见，而最后由别人说出“是应该这样”，或“我表示同意”之类的话。

当时，在阐述这一任命的职责权限时，斯大林破天荒地给予了华西列夫斯基以远远超出以往大本营代表那样的权限。他说：“在这个岗位上，您拥有完全的决断权和指挥权，您甚至可以把您的司令部当成最高统帅部的一个派出机构。当然，我也希望您经常不断地与我保持联系。”

之所以有这样考虑和做法，主要是因为远东战场将处于与苏联中心地区十分遥远的位置，如果坐飞机从莫斯科到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只空中飞行时间累计起来就须近30个小时。此外，远东地区幅员辽阔，地形极为复杂，参战的兵力和兵器都与以往有很大不同。这就要求对这些问题必须当机立断，全权解决，以免因过多的请示报告而耽搁战机。再有，这次作战将与在西线作战采取完全不同的办法，它要求彼此远相隔离的各方面军和海上舰队，必须同时在3个方向开展向心突击以分头消灭敌军。而在西部战场上，过去多是几个方面军彼此衔接地平行向敌人展开攻势，因此互相呼应和照顾十分方便，指挥起来也相对顺手得多。这就要求要有一个非常强有力而且熟练的指挥机构来组织和保持各方面军紧密的协同动作，否则，远东整个战局就会出现乱子，或者顾此失彼，或者各自为政，等等。

为此，在远东军司令部的组成人选外，斯大林还特别给华西列夫斯基派去了一批各方面的助手。他们分别是：苏军空军总司令诺维科夫空军主帅、通信兵副主帅普采尔采夫通信兵上将、炮兵副司令奇斯佳科夫炮兵元帅、后勤部副部长维诺格拉多夫上将、工程兵副总司令纳扎罗夫上将以及以缅泽林采夫少将率领的一个总参谋部工作小组，其成员全是在远东地区工作过的，或是这方面的专家。

后来，华西列夫斯基曾经就此写道：“在我看来，成立远东军总指挥部作为对军队实行战略领导的机关，是正确的。有了这样一个机关，就能有效地执行最高统帅部的指示，就能估计战役战略形势和军事政治形势的一切变化，并对这些变化作出及时的反应，也能就地给各方面军以必要的帮助……”

第十九章 对日作战费运筹

调兵遣将苦思谋，对日作战费运筹；

秘赴远东设大帐，只待东风吹“满洲”。

一般人们都把 1945 年 8 月开始的苏联对日作战称为远东战役。同以往很不相同的是，斯大林或总参谋部都没有给这次重大的战役行动正式命名，也没有给它确定一个什么代号之类的称呼。

这次战役的直接战略目的是，通过三路大军从满蒙边境、北部中苏边境及北朝鲜方向的相向突击，彻底摧毁驻扎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主力，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中国东北广大地区及北朝鲜，加速东方法西斯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后败亡。

基于此点，当华西列夫斯基与总参谋部在制定此次对日作战计划的时候，特别着重考虑和分析了日本关东军各部队的兵力兵器、作战能力以及具体部署等一系列问题。

需要事先说明的是，当华西列夫斯基全身心投入对日作战计划的制定之前，总参谋部和大本营已经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对整个远东战局的形势作出了初步的估计。

当时曾认为，当日本在确信希特勒德国必然失败之后，很可能仍不放弃其进攻苏联的计划。一方面，日本出于救援它的法西斯德国盟友，可能在东方采取积极行动而推迟前者的迅速败亡。另一方面，日本关东军的力量仍然十分强大。在整个苏联国境线上都一直配置有重兵。日本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基地距苏联国土也很近，这也使得它很容易对苏联的重要目标和远东部队实施突击进攻。这样，最初的远东作战计划仍是以防御为主的。在 4 月底甚至 5 月中旬以前，最高统帅部给远东各部队下达的都是防御命令。后来由于形势的迅速发展及大量部队的东调，总参谋部才向大本营提出了改防御为进攻的新的远东作战方针。

当时，山田乙三大将领导的日本关东军仍是一支实力雄厚、攻击能力强大的作战部队。不论在部队装备还是战斗素养方面，它一直是日军中最强的。截至 1945 年 8 月上旬以前，它总共拥有作战兵力近 100 万人。其编成内计有第 1 和第 3 方面军、独立第 4 集团军、空军第 2 集团军和松花江军区舰队，后来又增加了第 17 方面军和第 5 集团军两支部队。此外，隶属于关东军指挥的还有所谓“满洲国”、内蒙和绥远等省的近 30 万人部队。当然，这部分部队在装备和作战能力上都远远不能与关东军相比。

其时，关东军司令部设在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长春），后来又在通化设立了一个作战司令部。

5 月 8 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军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司令部联合研究了苏军可能对日作战的期限问题。当时认为，苏军很可能在严寒到来之前实施进攻，但其准备完成时间至早应在 8—9 月份。据此，日本陆军部于 5 月 30 日向关东军下达了新的对苏作战要点。该要点规定的作战目的为：“击溃入侵满洲之敌，确保京图线（新京到图们）以南、京连线（新京到大连）以东要地，以利于坚持全面作战。”这说明，日军将要改变原来那种进攻战略为防御作战。这就要求散在中苏国境线上的各兵团及大量作战物资向后撤移。按计划，撤移工作必须在 9 月下旬完成。

此后一直到战争爆发前的关东军防御部署情况大致如下：

喜多诚一大将指挥的第 1 方面军担负“满洲国”东部的防卫任务，其所辖第 3 和第 5 集团军计有 10 个步兵师团和 1 个旅团的兵力。全部展开在苏联滨海地区南部的边境上，主力则部署在通向哈尔滨和吉林的牡丹江方向

上。方面军司令部设在牡丹江市，两个集团军的司令部则分别设在延吉和拉河。

后宫淳指挥的第3方面军负担“满洲国”西部的防卫，其所辖第30和第44集团军计有8个步兵师团、3个步兵旅团和1个坦克旅团的兵力。其中两个师部署在蒙满边境一线，其余主力则集中在奉天（沈阳）附近地区。方面军司令部设在奉天（沈阳）市，第30集团军司令部设在新京（长春），第44集团军司令部设在辽源。

上村干男中将指挥的独立第4集团军分散部署在海拉尔，齐齐哈尔、哈尔滨和黑河一线，担负着“满洲国”北部和西北部的防卫，在它的编成内计有3个步兵师团和4个旅团的兵力。司令部设在齐齐哈尔。

原田宇一郎中将的空军第2集团军司令部设在新京（长春）。拥有作战飞机1500余架，但日方说能够作战的还不到150架。此外，在朝鲜部署的还有空军第5集团军，拥有作战飞机约600架。该两个空军集团军前者是掩护“满洲国”方向，后者系掩护朝鲜方向。

司令部设置在汉城的日军第17方面军，是关东军的预备队。其所辖计有第34和第59集团军9个师团的兵力。其中第34集团军的司令部设置在北朝鲜的成兴，司令官栉渊煊一指挥2个师团担负北朝鲜的防卫；其余大部则由方面军司令上月良夫中将统帅，部署在南朝鲜地域，以防美军乘机实施登陆作战。

此外，关东军司令部尚有1个步兵师团、1个步兵旅团和1个坦克旅团的预备队，负有特殊使命的是专门由侦察员和防坦克狙击手组成的敢死旅团。再就是各防卫战区配合日军作战的“满洲国”军队。

根据日本关东军的上述实际兵力及其部署状况，华西列夫斯基和总参谋部分析了敌人的弱点和优势，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当时远东苏军的实际情况，展开了制定对日作战计划的全面工作。其中主要一点是，经过请准最高统帅斯大林同意，根据远东新的敌我对比变化，他们提出了改防御为进攻的战略。华西列夫斯基认为，现在对日作战已经完全不同于当年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的对德作战。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在德国投降后日军根本不敢再进攻苏联了。所以必须坚决地实施突击进攻才能最后消灭关东军。

华西列夫斯基认为，日本关东军的部署及其战略意图显然是守势，它在兵力配置和部署方面的最大弱点在于缺乏可靠的后方。首先，它与日本本土相距太遥远，交通线太长，北满和西满的铁路网不甚发达，而中满和东满铁路线也都在苏联空军的航程之内。其次，整个关东军的部署全被长达4500公里的苏蒙弧形国境线所包围。

它的中国后方和朝鲜后方也被中朝两国抗日武装的不断袭击和骚扰活动搞得极为不宁。在张家口以南晋绥地区、锦州以西的冀热辽地区，都有中国共产党人的八路军和地方武装，而在广大东北地区当地民众都对日军怀有深仇大恨。再次，关东军需要防卫和掩护的战线太长，它不可能有足够的兵力在整个边界和所有的障碍地区设防。如从蒙古东部通往多伦和张家口的山地和沙漠地带，就是它防御最薄弱的所在地区，这里既没有筑垒工事，也没有部队加以掩护。

关于日军的长处，华西列夫斯基认为，在滨海地区对面苏军可以实施进攻的各个方向上，已经全被关东军的筑垒防御和大量兵力所封锁。仅在这里，就有大片筑垒地域8处，每处纵深达40公里以上，正面宽度则有20—

100 公里，在它的后面，还有第 17 方面军的预备队。此外，这个方向的进攻，不仅要突破这些坚固的筑垒，还必须强行通过绵长的山脉和大片的原始森林地区。这就要求苏军必须有绝对优势兵力和大量大威力杀伤兵器，否则进攻很难奏效。再者，由于有了一线的坚固筑垒、天然屏障和阵地防御，日军便可利用满洲平原在内线自由机动。一旦哪个方向出现问题，它就会把部队运送到哪个危险地段上增援。

经过。才关东军的情况仔细研究之后，华西列夫斯基和总参谋部便初步确定了通过数路突击来分割敌军的总战略意图。这样做的优点在于，一是可以从敌人防御的薄弱地域利用快速兵团突击，从而一举插入敌后；二是在敌防御坚固地区的突击可以牵制住敌军的有效机动，在行进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最后，总参谋部形成的初步作战计划是：由后贝加尔方面军从蒙古境内实施进攻，同时由滨海集群从滨海地区实施相向突击，而从北面越过黑龙江沿松花江的突击由远东方面军来承担。这样，不仅可以彻底孤立关东军的各作战部队，而且可以借助分割来各个消灭敌军。

具体说来，从蒙满边境实施突击，应把进攻方向放在索伦和四平方向。只有在这个方向上，才可能取得最大的战果，甚至搞得好一下子前出到奉天（沈阳）敌后地区；如果继续挺进，则可经南满铁路直取旅顺口。预计，这个方向的突击将一举消灭关东军第 3 方面军。如果只是考虑到敌人防御薄弱这一点，则张家口到北平方向是最佳选择，但那里除了与大自然作无效的斗争外，则什么战果也得不到。同样，从滨海地区的突击，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突破敌人的筑垒地域，都必须穿越高山和森林地带，否则就不可能前出到吉林至新京（长春）一线，也不可能彻底分割并在行进中消灭敌军。预计，这个方向的进攻将可吃掉关东军第 1 方面军部队。自然，消灭关东军独立第 4 集团军的任务是留给北部正面突击方向上的远东方面军的。

随后，他们才论了坦克集团军在什么地方使用和怎样使用的问题。

他们认为，更多的坦克部队应该交给后贝加尔方面军使用。因为在该方面所处的满蒙边境突击方向上，没有既宽又深的黑龙江，没有原始森林，也没有为数众多的筑垒地域。坦克集团军是能使部队具有突击力、高速度和实施大纵深进攻的主要战斗手段。诚然，在这个方向上的纵深有大兴安岭山脉的天然阻隔，坦克兵要越过这样高的大山的确也是个复杂而困难的问题。但他们坚持认为，英勇的苏联坦克兵是能够克服这一切的。而出奇不意地大量使用坦克于敌人认为根本不可能的地带，才是解决突击任务、消灭敌人的关键。因此，他们坚决主张将坦克集团军用在通过大兴安岭的主要方向上，而且还一定要用于方面军战役布势的第一梯队。

后来华西列夫斯基曾说；我们所以坚持这样做，是因为敌人根本想不到会在这里遭到强大的坦克集团的攻击。此外，根据情报，关东军第 3 方面军在大兴安岭地区还未构筑好阵地，只有少数部队占据为数不多的野战工事。我们认为，有经验的坦克兵是完全可以克服山地障碍的。只要我军先占领了山间通道，则敌军根本无力与我坦克部队对抗。

最后，他们还对达成战役突然性与进攻的迅猛性问题作了讨论。

由于日本人早就坚信与苏联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而要使作战行动达成突然性显非易事。但是，华西列夫斯基提醒大家考虑这样的问题：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前，我们不是也预料到会爆发战争并作了准备，可德国人

的突击仍使我们甚感突然。经他这样一说，大家顿时明白了。就是说，即使当前这种情况下，苏军仍不应过早地放弃进攻的突然性。

要达成在远东与日本作战的突然性，首先必须对苏军的准备程度严格保守秘密。

因此，专门制定了变更部队部署和集中作战物资等方面的保密制度。此外，他们明显地感到，有一点是完全可以用来麻痹敌人的。这就是当时日本并不知道盟国方面已经事先向远东地区投放了相当一部分援助苏军的作战物资，它只知道苏军所有的兵力、武器和大量作战物资必须通过运输能力较弱的西伯利亚铁路来进行。如果按这条唯一的铁路运输线来计算，它肯定会把战争开始的时间判断为秋天甚至秋后。

关于此点，他们当时还料定，敌人将认为在天气不良的条件下苏军将不会进攻。

而与盟国商定的对日出兵时间——“对德战争结束两三个月后”——从形式军事逻辑的观点看正是非常不适当的远东雨季。按照这一逻辑，日本军部将会认为苏军只能在晚些时候，即天气变得很好、很干燥时开始进攻。后来的事件表明，华西列夫斯基和总参谋部的这些推测是正确的。日军果然计划在9月下旬完成部署，然后准备迎击苏联的突击进攻。

至于进攻的迅猛性，这似乎是任何进攻型战役行动所具有的一般特点，但总参谋部特别从日军作战史的角度对此给予了格外的考虑。如，他们提出了不用事先炮火和航空兵准备就实施突击，或者把行动安排在夜间，等等。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在进行防御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敌人，一般总是在强大的炮火和航空兵准备与支援下进行非常谨慎的按部就班的进攻。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习惯于敌人的胆怯的按部就班的行动和较缓慢的进攻速度，而根本不习惯快速的坦克集群的大规模冲击。而且，据资料，在整个二次大战中，日本还没遇到过像苏军这次这样大规模的迅猛的坦克冲击战役。

到6月初，总参谋部已经把旨在消灭关东军的这次远东作战的初步计划拟定好了。

随后，斯大林和华西列夫斯基详细地听了总参谋部的汇报和计算结果。斯大林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他完全接受了。他知道，华西列夫斯基对这一计划的每一细节都了如指掌，有些问题的分析和讨论，他还是直接参加者或意见提供者。

由于华西列夫斯基曾多次向斯大林提出，应把后贝加尔方面军的突击方向当成战役的关键和重点，总参谋部当然也支持这一观点，所以还在6月上旬，斯大林就要总参谋部通知马利诺夫斯基和扎哈罗夫，请他们务必先于其他各方面军首长到达莫斯科，（他们是来参加计划中将于6月24日举行的莫斯科胜利大阅兵仪式的）。接到通知后，俩人立即带着方面军作战处处长帕夫洛夫斯基来了。他们当然清楚，所以要他们提前来莫斯科，肯定不全是为了参加阅兵仪式，而是为了讨论他们所辖部队的作战问题。

一见面，华西列夫斯基就对他们说：“你们倒是精明啊！连作战处长也同时带来了。”活泼的扎哈罗夫立即抢过话头说道：“不这样，我们怎么能在您手下工作呢！”

6月18日，按照斯大林的指示，马利诺夫斯基二人如期提出了他们方面军的具体战役计划。计划认为，在他们的进攻方向上，将要遇到至少18—25个日军师团的阻击。但他们自信地认为，要消灭这些敌军还是不成问题的。

向有稳健之名的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还认为，预计在1个半至2个月内即可消灭日本关东军主力。他还另附了一条意见，即认为在顺利的条件下还可能更早地消灭日本关东军。

他们提出的该方面作战计划中，也认为应该在索伦—四平方向上对敌展开进攻。

计划把整个行动分成两个阶段即两个战役来进行：第一个战役是占领中部满洲；第2个战役是前出至中国东北与华北交界处，然后向南满推进，从敌人手中解放包括旅顺口在内的整个辽东半岛。

此后，华西列夫斯基又征求了麦列茨科夫元帅和普尔卡耶夫大将的意见。至6月27日，即苏联莫斯科胜利大阅兵仪式举行的第二天，最高统帅部就已经对整个对日作战的远东战役计划审批完毕。28日，大本营为此签发了给参战各方面军的训令。

训令要求同时在三个作战方向上对日军实施毁灭性的打击，即：以后贝加尔方面军主力从蒙古和满洲交界的塔木斯克突出部实施突击；以远东第2方面军的主力从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西南地域实施突击；以远东第1方面军的主要兵力从滨海地区实施突击。这些突击的目的是为了分割关东军，将其孤立于中满和南满并分别歼灭。

在这三路突击进攻中，后贝加尔方面军的突击应起主要作用，其目标是占领新京（长春）、奉天（沈阳）和旅顺，以决定战争的结局；远东第1方面军应从滨海地区沿捷径向吉林挺进，以与后贝加尔方面军的突击相会合；远东第2方面军向黑龙江沿岸地区的突击是辅助性的，其任务是钳制住敌人并将其消灭在那里。

简单地说，此次对日作战行动主要由三个战役共同组成，即：（1）兴安岭—奉天战役，由后贝加尔方面军和蒙古人民军一部共同实施；（2）哈尔滨—吉林战役，由远东第1方面军负责实施；（3）松花江战役，由远东第2方面军负责实施。

至此，全部远东战役作战计划告竣。

7月初，斯大林最后一次约见华西列夫斯基。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斯大林一点也不轻松不起来，每临大战之前，他几乎都是这个样子。华西列夫斯基把按作战计划标示好的作战地图摆到了桌上，请最高统帅做最后的校阅。看过之后，斯大林对他说道：“真的没有什么问题了吗？”

“斯大林同志，我想是没什么问题了；如果说有的话，那也是到前线后所遇到的新问题。那时，我会遵照您的指示及时请示您的。”

“请您必须经常与我保持联系。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不管我在做什么都要叫到我。”这是斯大林经常对去前线的大本营代表或高级军事统帅说的口头语。意思是说，如果他正在睡觉或看电影，一定要把他叫醒或找来。

“我一定与您保持经常的联系。”这也是华西列夫斯基每次离开斯大林时必说的话。

“祝您成功！我等着您的好消息。”

“谢谢。”

7月5日，华西列夫斯基飞到赤塔。这里是马利诺夫斯基的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他的远东军总指挥部先期驻地就在距此西南方向25公里远的地方。后来，他的指挥部转移到了麦列茨科夫的远东第1方面军司令部那里。

华西列夫斯基将大本营 6 月 28 日的训令当面交给了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并请工作人员把另两份送到麦列茨科夫元帅和普尔卡耶夫大将那里去。到这里的第二天，他就不得不与方面军司令及军事委员会委员一起研究许多刻不容缓的组织和协调工作问题。

铁路运输所必需的煤不够用了，地方储备的份额马上就要用尽，为使极端重要的运输工作不致中断，他不得不向最高统帅请准使用不准动用的国家储备份额。

弹药的积累速度令人感到严重不安。必须命令加快将弹药运出工厂和送往部队的速度。向前线运送作战飞机的速度也不够快。

部队非常缺乏盛水的容器。而无盛水容器，进攻就有停止在满洲的沙漠和山地地域的危险。

通信人员严重短缺。

卫生机构的充实工作进行得迟缓。

装甲及坦克装备的修理工作也远不如意。

除了上述这些，近卫坦克第 6 集团军的状况特别让他担心。负责装载运输这个集团军的部队和装备的铁路列车，一天比一天越来越多地未能遵守规定的运行时间表。

这个集团没有运输工具，原有的汽车都留在了原来的驻地。仅编制部队就缺汽车 2274 辆，加上配属给集团的两个摩托化步兵师，所缺汽车几乎近 3000 辆。

在随后的几天中，华西列夫斯基和马利诺夫斯基在后贝加尔方面军的主要突击地段做了一系列实地勘察。他还视察了作战部队，并与各集团军和军的首长以及师长们做了讨论和座谈。结果，他们一道对原先定下的决心做了不少的重大修改，其中主要是缩短了原训令中规定的各部队完成任务的期限。如，担任先锋突击的近卫坦克第 6 集团军有可能不按原先规定，即不在战役的第 10 天，而在战役第 5 天前就能强行通过大兴安岭地区。这样一来，各诸种合成集团军前出到满洲平原的期限也随之大大地缩短了。具体情形如下：

第 36 集团军攻占海拉尔地域筑垒区的期限由原来的战役第 12 天提前定到了第 10 天。而后，它应改向齐齐哈尔进攻。

第 53 集团军的部署稍稍偏右些，紧跟在近卫坦克第 6 集团军的后方，其任务是不停顿跟随先锋集团扩大突击口。

整个方面军右翼的部队，特别是在越过大兴安岭后必须占领大板山地区的第 17 集团军，也把原定的期限缩短了 5 天时间。

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预计也可以大大缩短前出至张家口和多伦的期限，他们应该在该两地域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部队会合。

所有这些新的变更，当然都须经由最高统帅部的批准。当华西列夫斯基将情况及时地报告给斯大林时，后者立即命令总参作战部首长对这些重新加以计算。计算结果表明，他的建议是基本可行的，总参谋部只是担心近卫坦克第 6 集团军能否在山地行进中保持那样高的速度。但最后斯大林还是按上报要求批复了华西列夫斯基。

后来，近卫坦克第 6 集团军在实际作战中不仅达到，而且还超过了这一规定速度。

进入 7 月中旬前后，华西列夫斯基又先后到远东第 1 和第 2 方面军那

里视察了部队，检查了这两个方面军突击地段上的实际部署情形。经过对地形、敌情及苏军物质保证措施的分析研究，也在原训令规定的战役期限目标方面做了不小的修改，尤其在作战物资保障方面做了很大的改进。每到一处，华西列夫斯基就向各集团军及军师级首长强调，在这场战争中我们面对的是新的、有强大战斗力的危险敌人，我们必须在相当特殊而复杂的远东战场上消灭敌军。因此，必须把一切问题都充分地估计到，考虑好，决不允许出现半点差错。这项任务是光荣的，但也是艰巨的，其间每个指挥人员的责任都是重大的，不能在任何环节上有所疏忽，否则必将影响整个战局。

7 月下半月，华西列夫斯基对各种作战物资，包括装备、燃料、飞机等的运输工作花去了很多精力，许多问题都需要他亲自去过问，去协调和督促。同时，他还向各方面军司令部发出命令，要求它们务必利用这段时间在各自的进攻地段上进行一次接近于所应完成任务的专题性诸兵种合成实战演习。命令还要求，演习必须在各方面军司令员和集团军首长的亲自指挥下进行，目的是使指挥人员和全体战斗人员都尽可能准确地熟悉未来作战中可能出现的一切问题。这是华西列夫斯基自白俄罗斯战役以来惯常使用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战前训练万法，他认为这对即将进行的战斗大有种益。

7 月 16 日，前去柏林参加三国首脑会晤的斯大林突然从波茨坦打来电话，询问华西列夫斯基对远东作战准备得怎么样了。他还问道，这一工作能否提前 10 天完成，如果可以提前，务必抢时间完成。华西列夫斯基报告说，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各作战部队的集结和全部必需的作战物资的调运，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他请求还是维持原战役计划所规定的时限为好。对此，斯大林只说了声：“那好吧！”随即就放下了电话。

事后，华西列夫斯基感到很奇怪。他想，最高统帅一定有了什么新的考虑，不然为什么突然提出期限提前的问题呢？也许，是和波茨坦会议的什么情况有关吧？什么情况呢？他没好问，斯大林也没说……

原来，在波茨坦会议前后，苏、美、英三大国的关系已经大不如前了。随着法西斯德国的战败及无条件投降，在处理未来德国前途问题上，英国首相丘吉尔和新任美国总统杜鲁门企图改变雅尔塔会议的决议。也就是说，他们开始担心由于苏联的强大而影响到自己在欧洲和世界的地位和利益。早先，这个问题也不是不存在，其中主要是丘吉尔。他曾多次向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吹风说，斯大林的苏联将要“赤化”欧洲，这应该是所有西方国家共同感到忧虑并及早加以防止的问题。但罗斯福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在反法西斯作战中团结对敌，而不应该在强敌未败之前盟国内部先起磨擦。他主张对解散了共产国际组织的斯大林和苏联政府表示更多的诚意，因为在对德国和日本的作战中苏军仍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可罗斯福逝世后，由原副总统位置递补上来的杜鲁门的思想与主张正好与丘吉尔非常相近。因此，在波茨坦会议之前，俩人即统一好了口径和对策，这就是共同来对付斯大林并遏止苏联。

在会议期间，关于战后德国的未来前途问题，其中包括对德国的分割占领、索求战争赔款、边界划定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波兰问题上，英美两国都在暗地里与苏联大加勾斗。他们希望苏联在欧洲乃至在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小才好。只是碍于苏联的强硬立场和巨大实力，他们才不得不有所收敛。但是，越是因为如此，他们也才要越发不遗余力地想方设法限制并遏止苏联。

会议于 7 月 26 日公布的著名的《波茨坦公告》，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例。

这份文件是由美国方面负责起草、经英国讨论同意并邀请中国参加最后签字的，其主要意旨是促令日本政府迅速无条件投降。虽然苏联早在德黑兰会议上就表示将参加对日作战，而在雅尔塔会议上更作出了法律性的承诺，但这一文件的起草工作却始终不使苏联方面知晓和参加。他们借口苏联与日本尚未处于战争状态，所以坚持不必与斯大林商量就予以公布，并且根本不想邀请苏联参加签字。只是在公布文件的当天，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奉命将文件副本交给了苏联政府代表团。当苏方提出推迟3天公布的建议时，也被会议所拒绝。这也反映了美英两国企图拒绝苏联参加解决远东及日本问题的意向。

这是因为，在具体对待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上美英两国的政策改变了。原来的他们极力要求苏联及早地参加对日作战，是为了减少英美军队在对日作战中的牺牲和代价。而现在，情况变了。就在杜鲁门到达波茨坦的第二天，即波茨坦会议正式开幕的当天，杜鲁门收到了一份仅有6个字的密码电报：“婴儿顺利降生。”这份密电的含义是：7月16日清晨，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沙漠里，第一枚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了。随后，杜鲁门经过多次与丘吉尔商量，认为有了原子弹这种威力巨大无比的武器，没有苏联的参战也足以战胜日本。而且，他们还认为，原子弹不仅可以制服日本，使之早日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而且还可以因此贬低苏联对日作战的影响，以至用来遏止苏联在欧洲和远东的扩张。在此之前，杜鲁门曾露骨地说过：“如果原子弹能像我预料的那样顺利爆炸成功，我就有了对付俄国壮汉的大棒了。”

说到原子弹，在波茨坦会议间还有一场杜鲁门和丘吉尔共同导演的对斯大林的“原子讹诈”——这是世界上首次原子讹诈事件——的故事。事情是这样的：

在整个会议期间，杜鲁门和丘吉尔一方面为有了原子武器而欣喜若狂，但表面上故意不露声色；另一方面则商量用什么样的办法把它告诉给斯大林：当然不能告诉他这就是原子弹，但又一定要让他感到大受震惊或惊愕不已。这才能达到预期的震慑目的。7月24日的全体会议结束后，杜鲁门带着译员来到斯大林面前，装成漫不经心的样子对斯大林说，美国已经有了一种可怕的武器，它具有特殊的摧毁力量。

因为丘吉尔早就知道杜鲁门要向斯大林谈什么，所以便目不转睛地盯着后者，等着看他作何反应。然而在外表上，斯大林故意把杜鲁门的话当成一条极为正常的消息听了。接着谈话就结束了。待斯大林离去后，先出来的丘吉尔立即走近杜鲁门问道：“后来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杜鲁门回答说：“他连一个问题都没有向我提出。”此后，丘吉尔和很多英美人士都认为，斯大林当时根本没有听懂透露给他的这一具有绝等重要意义的消息。丘吉尔甚至说，斯大林对国际上发生的这个革命性的事件竟一无所知。

实际上，当时斯大林已经听出了这一消息的真正内涵，只不过是故作声色不露之状而已。朱可夫——当时苏军驻德占领军总司令和波茨坦会议的筹备者——后来回忆说：“当斯大林返回住所，就在我在场的情况下，跟莫洛托夫谈了刚才与杜鲁门这次谈话的内容。莫洛托夫听后说：‘他们是想抬高身价。’斯大林发笑说：‘让他们抬高好了。应该告诉库尔恰托夫加快我们工作的进度。’我知道，他指的是原子弹。”当时，苏联的原子弹研制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斯大林说的库尔恰托夫就是具体负责这项秘密工作的领导人

和研制者之一（后来，苏联于 1949 年 7 月制造并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事后，华西列夫斯基说，当时斯大林在 7 月 16 日给他打电话要求把对日进攻时间提前 10 天，并不是由于那时已经知道了美国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因为那是 7 月 24 日杜鲁门才透露给他的——不过，打电话的当天正好是美国爆炸实验的日子，斯大林会不会从其他渠道得到了这一消息呢？他本人没说过，想来可能并不很大，也许这纯是一种巧合吧。华西列夫斯基也说，斯大林在这天“之所以关心战役开始的日期，并非依据这一事实，而是出于总的军事和政治的考虑”。

此间，在波茨坦的斯大林和华西列夫斯基始终保持经常不断的联系。通常，都是斯大林在晚上打电话给华西列夫斯基，内容多是询问战役的准备进展情况。有些时候，最高统帅部的训令或命令也直接由那里发给华西列夫斯基。

7 月 30 日，斯大林和安东诺夫（后者也是波茨坦会议苏联代表团的成员）签署的任命命令发出了。命令说，从即日起，任命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为远东苏军总司令。

从 8 月 1 日起，后贝加尔方面军、远东方面军、滨海军队集群和太平洋舰队及阿穆尔区舰队统归苏联远东军总司令指挥。

8 月 2 日，即在斯大林一行启程离开波茨坦的前一天，华西列夫斯基再次收到最高统帅部发给他的训令。训令的全文是：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命令：

从 1945 年 8 月 5 日起，

（1）滨海军队集群（司令为苏联元帅麦列茨科夫）改称远东第 1 方面军；

（2）远东方面军（司令为普尔卡耶夫大将）改称远东第 2 方面军；

（3）瓦西里耶夫上将作战组改称远东苏军总司令的司令部；

（4）任命伊凡诺夫上将为远东苏军总司令的参谋长。

约·斯大林

阿·安东诺夫

这份训令需要说明的只有一处，即关于远东军总参谋长伊凡诺夫的任命问题。

这个任命所以这么晚才到达，是因为在此之前华西列夫斯基和斯大林之间一直也没找到总参谋长的合适人选。起初，斯大林曾向华西列夫斯基推荐后贝加尔方面军参谋长扎哈罗夫大将来担任。后者一到赤塔就与扎哈罗夫本人谈了这个意见，但扎哈罗夫认为还是他现在的岗位更能发挥自己的主动性，他希望大本营考虑一下他的个人意见。斯大林和华西列夫斯基都很尊重他提出的理由，又考虑到他曾长期与马利诺夫斯基在一起工作的情况，就同意了他的个人意见。此后，华西列夫斯基还就此征询过他的同学和同事库拉索夫大将的意见，但后者也请求最好不要改变他的职务。

这样，到最后，斯大林就给他派了伊凡诺夫上将来担任此职。

8 月 3 日，当斯大林由波茨坦返回莫斯科的当天，华西列夫斯基就向他提交了一份关于整个战役准备进展情况的工作报告。其中也部分谈到了他对

有些部署问题和最后发起战役日期的建议。

他说，截至现在，进攻的全部准备工作已经接近于大体完成。后贝加尔方面军的第 39 集团军和第 53 集团军已经进入距蒙满边界只有 50—60 公里的集中地域，它们与近卫坦克第 6 集团军及该方面军的其他部队，完全可以在 8 月 5 日晨开始进攻行动。

远东第 1 和第 2 方面军的各突击部队也将于 6—7 日前完成进攻的全部准备。太平洋舰队将在 5—7 日间做好充分配合作战的准备。他还提出，请派海军人民委员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前来负责协调海军和陆军之间的行动，并请求以人员和装备，特别是坦克来加强各方面军的突击集团。

他建议说，我军的进攻不得迟于 8 月 9—10 日越过各地段的边境线。他解释说，需要利用后贝加尔地区最近几天的好天气，以便使我空军和坦克部队充分发挥其威力和作用。虽然滨海地区仍在下雨，但道路和构筑良好的空军机场仍可使用。只有海军机场情况较差，它被雨淋坏了，但预计到 8 月 6—10 日滨海地区的天气也将转好。

他还说道，拖延开战时间将对我方不利的另一个原因是，侦察部队发现了驻“满洲国”和朝鲜的日军有变更部署的征候。7 月下半月内，该地区敌军已由原来的 19 个师增加到 23 个师，作战飞机也由原来的 450 架增加到 850 架。此外，敌在索伦和滨海两地区增加步兵部队。他担心是否日军已经侦知了苏军的战役意图。

他还报告说，现在各前线部队的兵力情况和兵器情况是：已准备好的作战部队计有 150 万人左右，拥有 29000 多门火炮和迫击炮、5200 多辆坦克和自行火炮、约 5200 多架作战飞机。

最高统帅部对华西列夫斯基的报告极为重视，斯大林又派总参谋部做了再次计算，结果认为这一切完全可行。最后，采纳了华西列夫斯基关于在 8 月 9—10 日开战的建议。

8 月 7 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给华西列夫斯基发出了战前的最后一道训令。训令说，所有远东苏军必须在 8 月 9 日开始行动；各方面军的航空兵的战斗行动从 8 月 9 日晨开始；太平洋舰队必须在 8 月 9 日前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并完成布雷行动。

然而，就在此间，在华西列夫斯基的总司令部一个工作组里发生了一桩令人十分震惊的事情。它差一点儿没把整个苏军的全部行动泄露给敌人。这是由该工作组里的一名违反保密制度的愚蠢的中校所干的。

原来，8 月 3 日，总参谋部作战部长什捷缅科上将突然收到了一封信，它是由《红星报》编辑部转来的，写信的人是一位名叫彼得罗夫的老记者。信的外表与普通的读者来信绝无任何不同之处，但一打开读起来，确确实实吓坏了作战部长。

信中写道：

是非常情况促使我这个老头子给你们写这封信的。在 7 月的最后几天，在有 20 多名与军队无关的人员在场的的一个公共场所，一名官衔为中校的红军军官十分卖劲地炫耀自己，同时还泄露了军队和国家的机密。他姓波卢比或戈鲁比，名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据他说，目前似乎正在加紧对日作战，并往远东派去了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为首的一群总参谋部的军官来领导这次对日作战行动……

……应该让他懂得，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国家的利益要比这个年轻人的幸福宝贵和重要得多。

此致

敬礼！

记者彼得罗夫

写信人提醒总参谋部应找出这名军官并对其施以惩戒。

什捷缅科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华西列夫斯基，但是他没有去报告斯大林。于是，调查工作在总参谋部和远东军司令部两边同时开始了。很快，这个人被找到了。

原来他是被选派到华西列夫斯基的机构中的一名工作人员。同时还查明，他当时还讲了许多关于与华西列夫斯基有直接工作关系的一位将军的情况，以及大本营对这次对日作战所采取的某些措施。

当然，结果是立即把他从华西列夫斯基的远东军司令部抽调回了莫斯科。随后，他被清除出了军队系统。

要知道，当时日本派到远东地区活动的特务和谍报人员是非常多的，这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啊！幸运的是，后经查实，这个饶舌鬼所讲的那些并没泄露到彼得罗夫所提到的那伙人的范围之外。

第二十章 神威倾覆关东军

三路大军似铁流，势不可当出“满洲”；

神威倾覆关东军，英雄美名贯九州。

1945年8月6日上午8时15分，蒂贝茨上校驾驶的巨大的B-29轰炸机飞临万里无云的日本广岛上空，为它担任护航的只有两架美军作战飞机。安装在炸弹舱门上的自动计时器显示到第15秒的时候，舱门自动打开了。在那蓝色外表上涂着写给日本天皇的粗鲁的词句和当时红极一时的女影星丽塔·海沃思的美人照的“小男孩”立即落下。它下落时发出的超声速呼啸，根本传不到地面上的人的耳朵里。

“突然，一道白色夹杂着粉红色的闪光出现在天空，伴随着一种奇异的震动，几乎立即出现了一股令人窒息的热浪和风，把一切都卷走了。”这是一个观察者所记录下的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刻的情景。除了迅速升腾起的那独特的蘑菇状烟云，那下坠的比太阳表面还要热几千度的大火球溶化了整个城市，它把人和物体的影子强迫地印在了地面上和残留的建筑废墟上。几乎没有几座建筑物在核反应强光和雷鸣组成的冲击波下存留下来，火光和波浪瞬息之间就夷平了广岛的中心。

“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情！”美国总统杜鲁门接到“广岛被炸”的电文时禁不住地喊了起来。当时，他正在大西洋中部的“奥古斯塔”号上同水手们一起共进午餐。

“这是一枚原子弹，”白宫事先准备好的文稿宣称，“它驾驭的是宇宙间的基本力量，即太阳从那里获得能量的那种力量。现在我们把它释放出来以对付那些在远东发动战争的人……类似这样的事情在这个地球上还从来没有

发生过。”

美国的这颗原子弹使 10 平方英里的广岛变成了废墟，13 万以上的日本平民惨遭暴死。同时，被关押在广岛城堡里的美军战俘也全部化成了灰烬。白宫的宣传机器还在威胁日本，似乎同时也在把难看的脸色甩给了苏联。相隔大约 51 个小时后，美国又在长崎上空扔下了一颗这样的炸弹，但它造成的伤害远没有广岛厉害。因为该城周围的群山限制了它的威力和影响。这也是美国当时仅有的一颗“小男孩”了。

就在这两颗原子弹爆炸的中间，确切地说，是在第 2 颗爆炸前的 11 个小时，急不可待的日本驻苏大使佐藤终于等到了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约见他的通知。早在 7 月 26 日中美英三国波茨坦公告公布后，日本政府见苏联并没有在那上面签字，就准备派出前首相近卫作为天皇的特别代表到莫斯科。它企图通过说服苏联领袖斯大林，使后者从中间作和事佬或调停人，要求不是无条件而是有条件地向美英等盟国求和。

以至于在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投到广岛之后这 40 个小时中，仍然抱着侥幸心理让佐藤大使等候莫洛托夫答应给他的所谓最后答复。

起初，苏联外交部通知佐藤大使说，莫洛托夫外长准备在 8 月 8 日 20 时会见他。

后来又说他会见的时间提前了 3 个小时，改在当日 17 时了。佐藤当时还觉得挺高兴：不管结果如何，毕竟是少了令人焦心的 3 个小时啊！

哪知道，会见的结果竟是事与愿违。当他来到克里姆林宫后，莫洛托夫只是冷冷地对他宣布说：“苏联政府决定，为履行反法西斯盟国的应尽义务，将于 1945 年 8 月 9 日与贵国进入战争状态。”说完，外长把他手里拿着的一份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声明递了过去。

该声明写道：

在希特勒德国失败与投降之后，日本依然是坚持战争的
唯一强国，美英中三国今年 7 月 26 日关于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已被日本拒绝，因此日本政府要求苏联帮助调解远东战争的建议已经失去了一切根据。

鉴于日本拒绝盟国关于无条件投降的建议，苏联政府决定参加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这样可使战争结束的时间更加接近，减少牺牲者数目，并加速一般和平的最早恢复。苏联政府忠实于其对盟国的义务，接受了盟国方面的建议，决定同意并加入盟国今年 7 月 26 日公告之行列。苏联认为，苏联政策的这一方针，是能使和平更加接近、解除各国人民的牺牲和苦痛并使日本人民避免德国在其无条件投降后所遭受的那些危险的唯一方法。

由于上述诸点，苏联政府宣布：从明天即 8 月 9 日起，苏联将认为其本身已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至此，佐藤明白：一切都完了。他悻悻地离开了克里姆林宫莫洛托夫的会客室。

回使馆的路上，他突然想起来了：现在不就已经到了 8 月 9 日 0 时了吗？也就是说，苏联人现在已经开始在满洲地区进攻了。原来，按国际时差，莫斯科时间刚好比东京时间晚 7 个小时。换句话说，莫斯科的 8 日下午 17 时正好是东京的 9 日 0 时。

是的，佐藤算得没错。实际上，莫洛托夫所以把会晤时间向前提了 3 个小时，正是受命于斯大林的安排。

8 月 8 日，置身于远东前线的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打电话到克里姆林宫。

他向斯大林建议，应该把原来拟定的 8 月 9 日凌晨 3 时的进攻时间提前到 0 时 10 分，以增强进攻的突然性。斯大林同意了。随后，他找来了莫洛托夫，指示他把原定的同日本大使佐藤会见的时间向前顺推 3 个小时，以便与远东苏军的进攻时间保持一致。

就这样，莫洛托夫把提前会见的事请外交部正式通知了那名虔诚的日本使者。

是晚，华西列夫斯基再次打电话给斯大林，但秘书说最高统帅正在看电影。这样，华西列夫斯基说等一会儿再打。他并没有什么特急的事情要报告，只是想了解一下莫洛托夫与佐藤大使会见的情形而已。他知道，斯大林有爱看电影的习惯。几乎银幕上新上演的影片，更不要说军事题材片了，斯大林差不多都非常注意。遇到好的影片，他还推荐给其他高级军政领导人看，包括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等人。

稍晚些时候，华西列夫斯基打通了给斯大林的电话。斯大林告诉他，莫洛托夫与佐藤大使的谈话大概还没开始呢，不过也快开始了。“那时，”他说，“日本人该是什么样的表情啊！也许，最主要的是佐藤先生将怎样把我们宣战的消息转告给铃木首相。”

华西列夫斯基报告说：“现在，各进攻方向上的我军已经全部进入了攻击出发地。对面敌军的部署尚未发现有任何新的变化。可以说，一切准备就绪了。如您无新的指示，我们将按原定计划开始行动。”

“好！请一切按计划进行。”斯大林最后说，“祝你们一切顺利，彻底打败日本人！”

“是！”华西列夫斯基放下了电话。

进攻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当华西列夫斯基总指挥部墙上的时针指向 0 时 10 分时，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指挥的后贝加尔方面军的进攻方向上，顿时响起了轰炸机和坦克发动机的巨大引擎声响。

在这万籁俱寂的夏日深夜，坦克部队的隆隆轰鸣和轰炸机群的厉声啸叫交织在一起，传得是那么远，听来令人魂胆俱裂。

在该方面军的进攻地段上，除了胡佳科夫空军元帅指挥的空军第 12 集团军的各个轰炸机群外，率先发起强大攻击的是克拉夫钦科坦克兵上将麾下的近卫坦克第 6 集团军，紧随其后的是马纳加罗夫上将的第 53 集团军。他们从马马特地域出发后，一路顺利突进，直指遍布荆棘的各道大兴安岭山口。其最终目标是消灭日军第 3 方面军所属的第 44 军右翼，夺取该方面军驻地奉天（沈阳）。仅这两支部队的作战编成，就有 6 个步兵师、两个摩托化步兵师、1 个伞兵师、5 个坦克旅、6 个机械化旅和 1 个步兵旅。可以说，这是该方面军的精锐和拳头。

在它们北面发起进攻的，分别是柳德尼科夫上将指挥的第 39 集团军和卢钦斯基中将指挥的第 36 集团军。柳德尼科夫所部计有 9 个步兵师、1 个坦克师和 2 个坦克旅。

它由蒙古东部塔木斯克（塔木察格布拉克）突出部出发，将粉碎日本

关东军第 30 军和第 44 军左翼 ,然后沿铁路向关东军司令部的所在地新京(长春) 挺进 , 同来自东部的远东第 1 方面军的第 5 集团军会师于该城。卢钦斯基所部的 7 个步兵师和 1 个坦克旅 , 则从乌里亚出发经海拉尔急取齐齐哈尔 , 那里是日本独立第 4 军的司令部所在地。

在它们南面的分别是达尼洛夫中将的第 17 集团军和普利耶夫上将的苏蒙混合骑兵机械化集群。达尼洛夫所部以 3 个步兵师由尤哥孜尔庙地域向赤峰发起突击 , 其任务是使日本关东军与驻北平的北方方面军失去可能的联系 , 使后者不可能对关东军实行任何增援措施。普利耶夫所部计有 5 个骑兵师、2 个机械化步兵旅、1 个坦克旅和 1 个装甲汽车旅 , 它由北部戈壁地区向多伦方向发起进攻 , 以夺取多伦和张家口一线。

8 月 10 日 , 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日宣战后 , 由霍尔洛·乔巴山元帅率领的蒙古人民革命军也加入了普利耶夫所部向张家口方向的进攻。

麦列茨科夫元帅麾下的远东第 1 方面军在午夜 1 时已经越过了国境线 , 所有各个突击集团地段上的进攻都发展得极为顺利。该方面军进攻造成的战役突然性最为明显 , 因为 , 在它所在的主要攻击地域内一直在下着大雨 , 有些地方甚至是暴雨。尽管如此 , 苏军将士仍然踏着泥泞 , 头顶风雨向敌军阵地大胆突进。对面筑垒中的日军怎么也想不到苏军会在这样的天气下向他们发起进攻。

在该方面军地段上担任主攻的是古雷洛夫上将指挥的第 5 集团军和别洛博罗多夫上将指挥的第 1 集团军。其中第 5 集团军兵力最多 , 它所辖部队共有 12 个步兵师又 5 个坦克旅 , 早在西线对德战场 , 该集团军就以骁勇无敌、战功卓著而闻名。这也是华西列夫斯基挑选它来远东作战的主要原因。而第 1 集团军也丝毫不差 , 它是苏军中为数不多的荣膺 “ 红旗勋章 ” 的战斗集体 , 其所属部队计有 6 个步兵师和 3 个坦克旅。

在这次进攻突击中 , 这两支英雄的部队为达成进攻的突然性和迅猛性 , 根本未经任何炮火准备就突入了日军的第一道筑垒线。第 5 集团军很快就从格罗杰科沃冲向了绥芬河地域的广大正面 , 然后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吉林方向。第 1 集团军由兴凯湖以南地域发起进攻 , 直取穆棱和牡丹江 , 以夺取日军第 1 方面军设在牡丹江的司令部。按进攻计划 , 然后两支部队分兵一部攻取哈尔滨 , 而大部主力则向新京 (长春) 挺进 , 最后与后贝加尔方面军会师长春 , 占领所谓 “ 满洲国 ” 之首都 , 粉碎驻在那里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

与此同时 , 在这个突击集团北面由扎赫瓦塔耶夫中将指挥的第 35 集团军 , 以 2 个坦克旅和 3 个步兵师的兵力分两股由古别洛沃和列索扎沃茨克两地同时发起了进攻。

当天中午 , 该集团军一股即渡过了乌苏里江 , 然后一路领先 , 直逼林西地域。

部署在该方面军地段最南端的是由奇斯佳科夫上将指挥的由 4 个步兵师和 1 个坦克旅组成的第 25 集团军。进攻开始后 , 该部主要协同克雷洛夫上将的第 5 集团军主力部队作战。到第二天后 , 它将攻击矛头指向了延吉 , 随后经延吉直接向北朝鲜发展进攻。

与远东第 1 方面军协同作战的还有龙马舍夫海军上将麾下的庞大太平洋舰队。当陆上各部发起进攻后 , 该舰队先后派出了两个强大的海军航空兵机群对第 25 军前面的日军展开了轰击和扫射。到 12 日傍晚 , 太平洋舰队的主力以海上航空兵和登陆作战部队分两组对北朝鲜的雄基、罗津展开攻势 ,

最终与第 25 集团军之一部攻占了这两座海港城市。15 日，该舰队所属的一支海军步兵旅开始在清津登陆。翌日，该港遂被攻克。

普尔卡耶夫大将麾下的远东第 2 方面军各部队的进攻是午夜 1 时整发起的。它的主要任务是渡过黑龙江后向哈尔滨以及宝清一线挺进，切断日本关东军各部之间的联系，并在整个战役中配合后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 1 方面军作战。计划以夺取哈尔滨为目标，然后沿松花江逆水而上，直接解放北满平原的广大地区。

担负该方面军主攻地段攻击任务的是由马莫诺夫中将指挥的第 15 集团军，该部计有 4 个步兵师又 3 个坦克旅。突击开始后，它首先以一支强悍的先遣部队从松花江与黑龙江的交汇处率先渡过了黑龙江，协助先遣部队行动的是阿穆尔河区舰队和苏军边防部队。到中午以前，所有的江中岛屿及大江对岸的登陆场尽为先遣部队所占领。随后，第 15 集团军的主力部队乃长驱渡江，日加列夫空军上将指挥的空军第 10 集团军的作战机群，有力地掩护了渡江部队的行动。此后，它的轰炸机群在轰炸北安镇、齐齐哈尔和克山等地的同时，还对沿线的日军列车进行了袭击轰炸。结果表明，该部空军的行动极为成功，有些向后方撤退的日军部队还在列车上就成了死人团。

在第 16 集团军西北方向黑龙江上游发起进攻的，是由捷列欣坦克兵上将指挥的第 2 集团军部队，该集团军也是荣膺“红旗勋章”的著名英雄战斗集体。它的进攻稍晚一些，按计划它应在当天下午渡江，但日军舰队在黑龙江上游封锁得很死。最后由于阿穆尔河区舰队及其所属的航空兵的有力出击，才清除了日满联合舰队的封锁线。当天晚上，第 2 集团军大部强渡黑龙江获得成功，随后主力便在次日上午夺取了南岸日军重兵把守的黑河和瑷珲等地。接着，该部即经小兴安岭由北面向齐齐哈尔扑去，以配合后贝加尔方面军所属的第 36 集团军夺取该城。

布置在第 15 集团军南面的由帕什科夫少将指挥的步兵独立第 5 军，在突击进攻发起后两小时，便趁黎明前那段黑暗时光悄悄地渡过了乌苏里江。当他们向勃利挺进的时候，竟然没遇到任何日军部队的阻击，简直如入无人之境。因此，到次日晚上，帕什科夫干脆下令：坦克搭载步兵，运输汽车卸下装备而载运部队前进。直到占领勃利前，全军竟未发生过一人伤亡。原来，这一带日本关东军根本没有部署兵力，早先驻扎在这一线的部队，也都事先向后方撤退了。

此外，远东第 2 方面军的第 16 集团军，主要负责从北库页岛向日军占领的南库页岛发起进攻。堪察加防区的各部队在 8 月 15 日以后根据华西列夫斯基的命令登上了千岛群岛。

当天 20 时 15 分，华西列夫斯基拨通了给斯大林的电话。他向最高统帅报告说，现在各个方面军进攻态势极为良好，除了远东第 1 方面军在筑垒地域遇到了强大敌人的抵抗外，后贝加尔方面军的突击集团已经挺进了 60 公里，最远处已经前进了 100 公里左右；远东第 2 方面军的主攻方向也向前推进了 40—50 公里。即使在远东第 1 方面军那里，克雷洛夫和别洛博罗多夫的部队最少也前进了 10—15 公里，其中第 5 集团军的 1 个坦克旅已经突入了 35 公里，而且缺口正在不断地扩大。

“干得不错！”电话的那端传来了斯大林的声音，“我相信我们的英勇战士是所向无敌的。不过，现在最主要的是继续保持这种进攻势头，不使敌人有喘息的机会。否则，他们可能重新组织顽固的防御。”

“是的，傍晚的时候我已向各作战部队下达了命令，特别要求马利诺夫斯基注意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一定要让克拉夫钦科连夜推进，马纳加罗夫的部队也必须同时跟进……”

斯大林抢过来说：“我插一句，对克雷洛夫和别洛博罗多夫的部队，也请麦列茨科夫命令他们继续推进，夜晚也不要停止进攻。”

最后，华西列夫斯基建议说：“对麦列茨科夫的部队，还应给予更强大的航空兵支援，请大本营将继续调运的远程航空兵直接运送到他那里。此外，我担心克拉夫钦科集团的燃料问题，这也请总参谋部加以关注。”

当华西列夫斯基放下电话时，总参小组的缅泽林采夫少将给他送来了最新的敌军情报分析：日军很可能放弃一线阻击，关东军司令部也可能由新京（长春）转走。

确实如此。在苏军潮水般的攻势袭来时，山田司令部就向日本参谋本部发出了报告，请求使用第2套阻击方案。

原来，不要说日本政府和陆军参谋本部了，就是消息灵通的关东军司令部也没有想到苏军的攻势来得这么早。如前面所介绍过的，关东军认为苏军的战役进攻可能在远东雨季过去后的9月底才能开始，因此，他们把防卫计划所要求的部队部署、筑垒修造及弹药准备等都限制在9月下旬的最后期限。就在苏军全线发起攻击的前几个小时，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刚刚踏上南去的列车——他要到大连履行一趟公务。结果，当他刚过奉天（沈阳）时，参谋长秦彦三郎的特急电报到了。

接到报告，山田不禁大吃一惊，竟很长时间没能说出一句话来。他随即下车，改换第3方面军航空队的一架飞机飞回了新京（长春）本部。

当天，山田就收到了军部的加急电令：“以对苏作战为主，随地击破进犯之敌，确保朝鲜。”他明白，大本营的意思是即使丢了满洲，也要保住朝鲜。同时，根据空中侦察的情报，苏军西线大部队正从白阿线（白城子—阿尔山）以南地区向东南方向直扑而来，先头部队当天的突击进程就多达100余公里。据此，关东军司令部判断，苏军如以这样速度推进，那么到8月14日前后，就将直抵新京（长春）城下。于是，山田与秦彦立即作出决定：关东军司令部应该离开新京（长春），迅速移驻到早已准备停当的作战司令部所在地通化；同时，齐齐哈尔的上村干男将军的第4军司令部立即迁往哈尔滨。

此后，日军第3方面军司令官后宫提出，由于关东军作战准备严重不足，实在难于与苏军作持久之战。这时莫不如以第3方面军的全部主力与急速突进的苏军展开决战为好。为此，他直接命令本乡义夫中将的第44军尽快赶到新京（长春）、奉天（沈阳）一线，用以对苏军布成殊死一战的阵势。

但是，所有这一切安排，到后来都成了徒然之举。公允地说，这有两条原因，一是苏军的强大攻势确实锐不可当，仅4500公里这样宽广的推进线，就已足使关东军成为瓮中之鳖了；二是日本政府吃不住大军之压迫而不得不接受无条件投降之议，这也使关东军首先乱了心志和阵脚，何况它也并不是像日本方面所说的那样并未遭到苏军的严重打击。

8月10日，克拉夫钦科的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已经到达大兴安岭分水岭附近。次日，该部越过了横亘的山岭，开始进入靠近满洲中部平原的醴泉（突泉）、鲁北地区。一路上，日军的阻击倒还在其次，主要是天然的阻碍成为苏军坦克部队的大难题。此外，没有像样的地图和向导，燃料的供应也

相当困难。在险恶的山间道口上，装甲汽车和其他运输工具显然比坦克的穿行要付出更大的艰难和代价。后来，干脆不得不全靠空中运输来解决燃料等急需品。同样，虽然有这支强大的坦克部队在前面突击跃进，后面的主力作战部队的跟进仍然是相当的艰辛。然而，就是这样，到 14 日日终时，整个由近卫坦克第 6 集团军和第 53 集团军组成的突击集团，硬是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向前推进了 250—400 公里。最前头的突击部队已经胜利地前出到满洲中部地区。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分成两股强大集团分别向新京（长春）和奉天（沈阳）进军了。

对此，华西列夫斯基不禁激动地写道：“穿越兴安岭之役，是现代战争中无与伦比的英勇业绩……敌人没有料到，苏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竟能在一星期之内通过几百公里（险峻的山路），出人意料的程度如此之大，而关东军从西北方面遭到的打击又如此之重，以至关东军从此就一蹶不振了。”

当 11 日近卫坦克第 6 集团军与醴泉（突泉）地域内的日本陆军和空战部队展开大战时，它北面的第 39 集团军主力部队正在绕过五叉沟关东军第 107 师团，向索伦方向直驱。再北面的第 36 集团军也向日军第 44 军的所谓“国境阵地”发起了猛攻。13 日，第 39 集团军在行进中大量杀伤日军后，已经进入了索伦和王爷庙地区，越一日，则前出至吉林省洮南一线。沿北满铁路前进的第 36 集团军，先是夺取了战略要地免渡河车站，并在该地域给日军以重创，随后，从 15 日开始，主力部队则开始向大兴安岭山顶的日军第 119 师阵地的强攻。

此间，后贝加尔方面军西南战线上的形势也相当顺利。14 日，以赤峰为夺取目标的第 17 集团军已南下至林西一线，15 日则挺进到大板上地域。普利耶夫率领的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也于 14 日攻克了多伦和张家口的北部屏障张北县城。

远东第 1 方面军的各个方向上的战斗，从第一天起就相当激烈。当风雨止住后的第二天，别洛博罗多夫的红旗第 1 集团军就已经推进到距牡丹江只有 20 公里的穆棱附近。为了彻底摧毁关东军在这一地区的坚固筑垒，航空兵轰炸机群和该集团军的自行火炮部队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原因是，日军的火炮口径远远比不上苏军，仅有的高射炮阵地也事先被苏军打掉了。这样，轰炸机如入无人之境，迅速前进的巨型 T-34 型坦克群更是毫不客气地填补了所有的轰炸空白。守敌 1 个师团又两上旅团，只有不足千人逃溜出去，其余的大部分成了筑垒废墟的一部分，余者俱皆被俘。

这时，日军第 1 方面军司令官下令方面军司令部撤至敦化，该地距原驻地牡丹江多达 170 多公里。同时，第 5 军司令官清水也把第 126 师团由八面通向后撤了 70 多公里至掖河，第 135 师团由七星向后撤了约 40 公里至同一地域，此地距牡丹江只有 5 公里，显然这是要以这两个师团来阻止苏军对牡丹江的进击。

8 月 11 日，红旗第 1 集团军在炮火和航空兵的掩护下，首先向穆棱西方的敌 124 师团阵地发起猛攻。经过两日激战，敌军阵地被苏军占领。随后，自 15 日晨，攻打掖河的战斗拉开战幕，克雷洛夫集团军也以 3 个师的部队加入了友军的这场对敌厮杀。

到当天日终，掖河被苏军攻克，丢盔弃甲的日军只好收拾残部再退。这一退，又是 50 公里，直至牡丹江以西的横道河子才煞住了脚跟。

其间，该方面南翼的第 25 集团军先是于 12 日夜占领了北朝鲜的雄基、

罗津两港，14日又通过迅猛进攻夺取日军第128师团的阵地。至15日，则开始了向琿春西方高地的守敌第112师团发起了进攻。与此同时，最北翼的第35集团军也已先后攻克密山至东山一线。

在远东第2方面军的方向上，到8月15日以前，第15集团军的突击部队已经前出到距佳木斯40公里的苏苏屯地域。红旗第2集团军也在攻克胜武台日军阵地后进入孙吴附近，下一步即将展开对敌123师团的猛攻。

至此，当苏军全线各个作战方向上的进攻进行到第6个昼夜的时候，日本关东军的部队已被强行分割成几个部分。不仅它们彼此之间丧失了应有的防务联系，即使是关东军司令部也对多数部队失去了指挥能力。对此，关东军副参谋长松村少将在后来的供词中曾经坦白地说：“苏联在8月8日这天宣战，对关东军指挥部来说是异常突然的。同样，我们没有想到俄国人会进行这种闪电式的进攻，而且也没有想到俄国军队会这样快地穿越过大兴安岭、戈壁荒漠和原始森林……”

自然，华西列夫斯基也对自己麾下的这170万将士的勇猛行动和巨大效果深感自豪。事后，他曾分析认为：“在彼此分隔开的各作战方向上行动的苏军部队，其进攻速度之所以有可能达到这样高的程度，完全是由于下列原因：

（1）军队的部署经过周密的考虑，熟知每一作战方向上的地形自然特点和敌人防御配系的性质；

（2）坦克兵团、机械化兵团及骑兵兵团的广泛而大胆的使用；

（3）进攻的出敌不意，高速进攻性的突破及坚决果断与特别巧妙的行动；

（4）红军官兵和蒙古官兵以及水兵的无畏精神和群众性的英雄主义行为。”

的确，在这近一周的英勇战斗中，华西列夫斯基在战役总指挥过程中显示出高度的军事指挥艺术。他所历来重视的坦克兵团和其他快速部队的使用，以及诸兵种合成部队的协调动作，无疑证明了他关于现代战争军事思想框架的合理性和正确性。

对此，从斯大林到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到总参谋部，都给了他以高度的评价。以至在苏军内部和盟国军界，人们无不夸赞苏联远东军的快速勇猛精神。有人甚至把它称做一支无坚不摧的坚甲利师，华西列夫斯基在战后也博得了智勇神威的美名。

然而，就在这时，当华西列夫斯基统帅下的三路强劲神旅一路披荆斩棘、攻关夺隘、穿越过深山老林、戈壁荒漠、从而胜利进入中国东北平原广大腹地的时候，日本政府突然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全部条件，愿意在从南太平洋到满洲、朝鲜的各个战场上放下武器，无条件向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各盟国投降。自然，即使是对胜利在望的广大苏联远东作战部队来说，这也是一个绝好的消息。

但是，我们要知道，狂妄的日本帝国主义，尤其是作为日本战争机器主要组成部分的日本军部及其一大批顽固死硬派军阀，对于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条件是有一个过程的。而且，尤其需要在这里指出的是，即使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诏令以后，日本关东军也并没有立即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广大战场上放弃抵抗。相反，有些地段上双方的战斗还是非常激烈的，甚至，某些关东军部队还以没有接到放下武器的命令为借口，大肆向苏军发起所谓的反冲

击。

下面，让我们简略地介绍一下此间事态演进发展的过程。

8月9日凌晨，日本外相东乡从佐藤大使那里得到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后，立即前往首相官邸拜见铃木首相。他们知道，现在企图通过苏联谋求有条件和平的希望彻底灭绝了。俩人一致认为，必须从速结束战争，以争取对日本任何可能的益处。

是日上午10时30分，铃木首相在日本最高指导战争委员会会议上宣布说：“今晨苏联参战，已完全将我们推入绝境，我们已经不可能继续进行战争了。”可是，陆相阿南等一伙人对此坚决反对。他们声称，绝不能接受日本皇军还有投降一说，必须战斗到底，哪怕是全部战死。况且，在他们看来，日本人并不是没有死里求生的希望。会议一直在激烈的争吵中延续到黄昏以后，双方在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提出的条件上无法统一。

当晚午夜，会议又在皇家图书馆下面的深层防空掩蔽部里召开。天皇裕仁也带着苍白无助的面容参加了这次会议。当会议持续到凌晨2时时，铃木首相说道：“这个问题我们讨论的时间已经太长了，可是仍然没有一致的结论。形势确实严重，但是我们也没有徒然消磨时间。因为我们没有先例可循——我也觉得十分为难——但现在我将以崇高的敬意请求天皇陛下发表意旨。”首相这一令人吃惊的请求，顿使在场的人大感震异。阿南立即表示抗议这种违宪的做法。他提醒大家说，天皇的职责历来都是在于批准，而不是对大臣们提出忠告。然而，裕仁天皇却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用那尖细的嗓音毫无表情地说：“目前旷日持久的流血和暴行已经无济于事，朕亦认为波茨坦宣言要求我们解除军队、惩罚战争领导人等，确实令人不能容忍。但是，”天皇看了一眼群臣，继续说道，“时间已到了，我们不得不容忍不可容忍的事情。”

10日晨，根据天皇的意旨，东乡外相约见苏联驻日大使马利克并声明说：“日本政府准备接受得到苏联政府同意的7月26日宣言的条件。日本政府理解，这一宣言不包含损害天皇权益的要求。”同时，日本还通过中立国瑞士向美、英、中等国政府转告了类似的声明。

11日，苏、美、英、中四国政府答复说：“自日本投降之日开始，天皇和日本政府对国家的管理权将隶属于盟军最高总司令……”答复还说，天皇应立即命令日本所有海陆空部队及一切武装力量停止战斗，并缴出它们的武器；在波茨坦宣言规定的目标未实现之前，盟国武装力量将不撤离日本；日本政府的模式将由日本人民来决定。这样，就等于再次要求日本全面接受波茨坦宣言。也就是，日本政府要求保持天皇至高无上权利的请求被驳回了。

于是，主战派中的军部成员坚决反对就投降问题进行任何谈判。在他们操纵下，12日的东京电台曾广播了这样的一个通告：“皇家军队和海军，遵照最高命令……全面转入对盟国的积极战斗行动。”到第2天，日本参谋总长梅津和海军副参谋长兼所谓“神风突击队”队长大西等会见外相东乡，仍然表示要战斗到底。大西甚至提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计划——“神风战役”，即由空军敢死队驾驶满载炸弹的飞机去撞击盟军的海陆目标，企图与之同归于尽——不惜牺牲2000日本人的性命来挽救日本的最终战败之局。

所有的会议仍无任何结果。

到14日晨，最高战争指导委员会和内阁大臣联席会议上，阿南和梅津仍然坚持反对接受波茨坦宣言，继续扬言战争到底。但激烈争论后，他们的

意见被否决了，最后决定以天皇诏令的形式表示全部接受波茨坦宣言。

是晚 23 时，日本通过瑞士向各盟国发出了同意无条件投降的电报。同时，裕仁天皇在秘密录音室里录制了投降诏令的录音磁带，以备明晨向全世界播出。

然而，受到陆相阿南支持的以烟中少校为首的一批最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直到这最后的时刻仍然拒绝无条件投降。是日深夜，他们以 1 个警备师的兵力发动了占领皇宫的叛乱。他们企图搜出天皇的投降诏令录音带和联席会议记录，结果，他们没有找到要找的东西。他们随后又向主和派官员大开杀戒，铃木首相和平沼议长是他们的首选目标。可是，赶到两家后，首相和议长都事先躲出去了。于是，叛乱者愤怒地烧掉了他们的住宅。到 15 日清晨，叛乱被田中中将为首的东部军区部队平息。

叛乱主要首领（火田）中、幸贺、大烟等被命令剖腹自杀。随后，阿南陆相也被迫剖腹自杀谢罪。

15 日正午 12 时许，东京的数百人纷纷来到皇宫城外默然肃立。他们已经事先得到通知，天皇陛下将要发表日本有史以来的第一份投降诏令。当裕仁那乏味单调的细细声音传出来之后，不仅在这里的，包括全日本以及所有在南太平洋、满洲、朝鲜各地的日本平民和军人，都流下了痛苦和怀疑的眼泪。大和民族昔日的骄狂全都没了踪影，代之而来的是忧虑、恐怖、悲伤和精神崩溃……

在新京（长春）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内，与此同一时刻，凡是有收音机的每个房间都挤满了日军将帅官佐和士兵，他们密密麻麻地立正站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据说，在收听广播的过程中，室内异常寂静，连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在地板上的声音都能听到。院子里也是肃穆得一无声息，那些没有资格进入室内的兵士们，全都在盛夏正午的烈日下端端正正地站立，战败的恐惧和绝望攫住了他们。

早在前一天，即 14 日夜里，山田司令官就已经收到阿南和梅津的电报。陆相和总参谋长事先告诉了他关于天皇和政府决定停战和投降的消息。但电文仍然指示他说：在没有接到其他命令之前，还须继续执行以前的任务。也就是说，剖腹自杀前的战争狂夫阿南和主战派魁首梅津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既定主张，他们还在命令日军劲旅关东军继续与苏军顽抗死搏。

山田后来的借口是，他和他的部队并未收到日军大本营的停战命令。他说，关东军司令部是在 8 月 16 日 16 时以后才收到军部的停战命令的。即使如此，他也没有立即向各部队发出相应的命令。直到 17 日 15 时，山田才通过广播向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请求停止战斗，然而也没有提出任何一句缴械投降的建议。

早在 8 月 14 日深夜，在得到了莫洛托夫关于收到日本政府决定全部接受波茨坦公告条件的报告后，斯大林立即打电话通知了总参谋部的安东诺夫和远东前线的华西列夫斯基。他特别提醒华西列夫斯基说：“请注意明日以后日军在战场上的行动。

如果对方放下武器投降，苏军必须以人道主义待之；如果日军仍继续顽抗，则坚决彻底地消灭之。”

得此消息，华西列夫斯基高兴异常。在他看来，狂妄的日本军国主义终于招架不住了，这也许是它比西方战争狂徒希特勒明智的地方所在。但是，

他也同时感到，中国东北战场上实力尚未完全消耗的日本关东军，是不会立即放下武器投降就俘的。

就是说，今后的任务将更加复杂化了。

果然不出所料，所有各个作战方向上的日军在 15 日这一天都没有停止战斗的任何表示，有些地段上的战斗仍旧十分激烈。

当天晚上，华西列夫斯基将这一情况如实地报告了斯大林和大本营。总参谋部也向斯大林报告说，并未发现有日本军部给关东军和其他各作战部队下达停战令。

对此，似乎也在斯大林的预料之中。他显得非常镇静，处理起来也极为轻易。他指示安东诺夫说，应该立即在报纸上对战场的实际情形加以说明，同时命令各作战部队，在敌人尚未在实际上无条件投降以前仍应继续采取积极行动。

第二天，即 8 月 16 日，在苏联最有影响的报纸《真理报》上，刊出了安东诺夫以苏军总参谋长身份签署的公告。

公告写道：

1. 日本天皇 8 月 14 日关于日本投降的公告，只是关于无条件投降的一般性宣言，对武装部队还未发出停止战斗的命令，日本武装部队依然在继续抵抗。因此，日本军队尚未实际投降。
2. 只有当日本天皇命令自己的武装部队停止战斗行动并放下武器、而且这一命令确实付诸实行时，日本武装部队才算投降了。
3. 有鉴于此，苏联远东武装部队将继续进攻日本。

在随后的几天里，华西列夫斯基下达命令给马利诺夫斯基、麦列茨科夫、普尔卡耶夫，要求其所属各前线部队继续按计划发展进攻，坚决消灭一切尚在顽抗中的敌军。

在后贝加尔方面军长达 1000 多公里宽的广阔战线上，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前出到了张家口至承德一线；第 17 集团军已经赤峰冲向了辽东湾沿线；第 53 集团军正在向阜新发起攻击；近卫坦克第 6 集团军在燃料时断时续的情况下，仍在保持高速向奉天（沈阳）的挺进；第 39 集团军一边修复敌军撤退时破坏的桥梁和铁路，一边往洮南向新京（长春）疾进。到 19 日日终时，整个方面军已经前出到了赤峰、奉天、开通、长春和齐齐哈尔一线，其所占领地域已经接近 60 多万平方公里。

在远东第 1 方面军的进攻方向上，第 35 集团军 16 日即前出到勃利地区的佳木斯到图们铁路线上；红旗第 1 集团军和第 5 集团军通过大规模的攻坚战，终于夺取了大铁路枢纽和行政政治中心牡丹江。此一役，计毙俘日军 4 万余人；第 25 集团军占领了朝鲜北部的要冲汪清和大海军基地清津，切断了第 17 方面军同第 1 方面军和日本海沿岸的联系。由于该方面军的努力，日军第 5 军被全歼，第 1 方面军和第 3 军也损失大部。

至此，日军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苏军进入中满平原和北朝鲜的企图破产了。

远东第 2 方面军所属各部，在这几天内占领了北满战略重镇佳木斯，沿松花江边流而上直取哈尔滨的进攻也态势良好。此外，太平洋舰队已牢牢地封锁住了朝鲜北部沿岸。

到8月17日，山田司令官终于意识到继续抵抗已经毫无意义，乃于15时通过关东军司令部的广播电台向华西列夫斯基提出了进行停战谈判的请求。这时，距他接到日本大本营停战令已经过去了近23个小时。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在广播中说：“为了尽快实现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我们关东军首长今晨颁布命令，以便我方代表乘坐的飞机能在8月17日10—14时（东京时间）之间飞往牡丹江、密山、穆棱，同苏联红军当局建立接触。关东军司令部希望这一措施不致引起任何误会。”

两个小时后，华西列夫斯基又收到了山田本人亲自签署的无线电报，说他已命令所属部队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向苏军交出武器。又两个小时，即19时，日军飞机在远东第1方面军驻地地段上投下了2个通信筒。筒内装有日军第1方面军司令部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要求。

然而，在整个远东苏军的其他大多数作战地段上，日军仍在做着顽强的反抗。

鉴于此，华西列夫斯基当即发电报给山田司令官。电报说：此间，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曾发电报给远东苏军司令部提议停止军事行动，但却只字未提满洲的日军武装部队的投降问题。同时，日军在双方战线的一系列地区还转入了反攻……兹向关东军司令提出：必须在8月20日12时起在全线停止对苏军的任何战斗行动，并缴械投降。之所以提出上述期限，是为了使关东军司令部能将停止抵抗和投降就俘的命令下达到自己的一切部队。

一旦日军开始缴械，苏军将停止战斗行动。

同时，华西列夫斯基下达命令给麦列茨科夫，要求他派出代表到牡丹江和穆棱两地的机场，授权他们通知关东军司令部的代表，明确告知对方，只有当日军开始投降就停时，苏军的军事行动才能停止。

应该指出的是，华西列夫斯基所采取的这种拖延受降（用苏联政府和他本人的话说是停止军事行动）期限的做法，在一方面，确实有他向山田等日军方面所名正言顺地解释的成分，即很多地段上的日军并没有停止抵抗，山田也没明说要缴械投降，也担心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不能按时送达各部队，等等。一般地说，这些是基本可以成立的。但是，在另一方面，这里也有苏联政府和华西列夫斯基的另外打算，这就是，趁日军混乱之际更多地占领原日军所盘踞的地区，其中尤其是中国东北各大中心城市与各铁路沿线，包括他们念兹在兹的整个中东铁路全线——长春到旅顺口这一线正是苏联的未来利益所在。这样，即可以对英美等盟国夸口自己全部消灭了关东军部队，又可以向蒋介石国民政府说是它帮助解放了东北全境，以在中苏互助同盟条约的双方谈判时增加自己的砝码。此外，他们还可以更多地从这些地区最大限度地掠取财富——名义上是对日作战的“战利品”。

18日晨3时许，山田再次致电华西列夫斯基，答复苏军说，日本关东军将立即向苏联远东军履行一切投降条件。山田还说，关东军司令部已经在答复总司令阁下的同时向所属各部队下达了相应的命令。

当天上午，华西列夫斯基就开始接到有关前线苏军指挥部的报告。报告说，从上午8时起，很多前一天还在激烈抵抗的日军师团，纷纷派来代表商谈受降事宜。鉴此，华西列夫斯基深感形势逼人，必须采取非常措施来组织和实施这样空前巨大的突击占领和受降活动。为此，他立即向各方面军首

长下达了下述命令：

.....日军的反抗已被摧毁，而道路不通的情况又严重地阻碍了我军的迅速前进完成既定任务。为了立即占领长春、奉天、吉林、哈尔滨等大城市，必须派出专门编组的装备精良的快速支队，还必须用这些支队或类似的支队来解决各项后续任务.....不要怕它们离自己的主力部队太远，行动须大胆、果决.....

后来，他又向各方面军首长提出，对重要的军事目标和工业目标的占领，还必须立即组织精干的伞兵分队，以它们为先导而迅速执行快速支队的先期任务。

很快，各方面军的伞兵分队和快速支队都组建起来了。各快速支队的组成主要包括有坦克部队、乘坐装甲汽车的步兵分队以及由自行火炮和反坦克歼灭炮兵抽出的精锐干练人员。伞兵分队主要是由各空军集团军抽调的精良分子，然后再配若干名中高级指挥官。

当天下午，接到日军成批投降缴械的报告越来越多了。到傍晚时分，几乎所有各作战方向上的每个地段，都有大量的日军部队有组织地放下了武器。

就在这天 17 时，远东第 1 方面军所属的第一支伞兵分队向哈尔滨进发了。该伞兵分队由扎别林中校负责指挥，全队由 120 名空降兵组成，作为方面军全权代表的是该方面军副参谋长舍拉霍夫少将。由于时间仓促，形势紧急，当时对哈尔滨城内的形势及驻地苏联领事馆的情况均无确切情报，只知道在牡丹江附近被击溃的敌第 1 方面军主力正在向该城方向清退。以此区区 120 人的苏军来接管全城并要应付所有可能发生的复杂情况，确实是太困难也太艰巨了。但苏军勇士们根本顾不了这许多，只有大胆前行努力以赴了。

两个小时后，苏军这支空降兵分队在哈尔滨机场着陆并占领了该机场。不久，日本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由几名军官陪同来到了机场，他向苏军特命全权代表报告说，哈尔滨地区的日军已经瓦解，几乎已经不受关东军司令部指挥了。舍拉霍夫少将立即向他宣读了要求所有日军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并命令秦彦及驻哈日本领事宫川等于 8 月 19 日 7 时乘苏军飞机前往远东第 1 方面军司令部。后者要求给他 3 小时的准备时间，以便准备包括满洲全部日军投降命令、关东军将领名单及哈城守备部队实力等在内的一应材料。23 时，秦彦如约呈上了上述资料。第 2 天，他被带到了麦列茨科夫元帅的指挥所。华西列夫斯基也先期到达这里，以便与之进行受降等一系列问题的指示性谈判。

远东时间 19 日 15 时 30 分，在麦列茨科夫元帅的陪同下，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与秦彦三郎和宫川举行了关于日军在整个满洲和朝鲜地区无条件投降事宜的谈判。

华西列夫斯基向秦彦提出了投降程序的要求，指定了受降的集合点、行动路线和具体时间。秦彦立即表示接受苏军的安排。他还向华西列夫斯基解释说，某些日军部队所以未及时执行缴械命令，是由于关东军当局没能把投降令传达下去。因为关东军司令部在苏军发起进攻的第二天，就已经失去了对某些部队的指挥。华西列夫斯基还警告他说，所有日军的投降必须有组织地进行，包括军官在内一并转交苏军，不得有任何差池之处。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秦彦三郎俯首帖耳，唯唯诺诺。对华西列夫斯基

的每项要求，总是连连点头称是，甚至不惜卑躬屈膝。昨天还是骄横的满洲太上皇和狂妄的战争武夫，今天却变得如此卑微和沮丧。真是不可思议之极！华西列夫斯基心想，他们昔日的那种武士道精神怎么就荡然无存了呢？

当哈尔滨全市已经落入 120 名苏军勇士之手的同时，19 日拂晓，由后贝加尔方面军特命全权代表阿尔乔缅科上校指挥的伞兵小队也飞到了关东军司令部驻地的长春。

他们一行只有 11 人，其中有 4 名军官和 6 名士兵，其任务是接受长春守备部队和市郊所有其他日军部队的投降就俘。

他们几乎是突然地出现在停有约 300 架敌机的长春中央机场上空，盘旋几圈后就在机场着陆了。苏军的这架飞机立即占领了起飞滑行道并准备随时向机场开火。当确信并无危险后，阿尔乔缅科才发出了让空降兵分队飞往长春的预定信号。随后，他留下所有的军官和士兵占领机场，只身前往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大将的办公室去了。这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孤胆英雄！

当时，山田的办公室内正在开一个什么会议。当阿尔乔缅科上校只身步入他的办公室时，在场的日军高级军官全都惊呆了。他马上下令中止会议，并当面向山田等宣读了要求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上校读毕，山田曾企图提出些什么条件，但立即被阿尔乔缅科断然拒绝。当城市上空传来苏军轰炸机和运输机的强大轰鸣声后，山田第一个取下佩刀并将它亲手交到上校的手中，承认自己成了苏军的俘虏。随后，其他在场的日军将领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到 11 时，苏军第一批航空兵部队已经占领了长春市的主要桥梁、铁路、电台等重要设施。与此同时，山田和“满洲国”总理在阿尔乔缅科提出的全部投降书上签了字。当晚，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大楼上空的日本国旗被降了下来，代之而升起的是苏联国旗。随后，阿尔乔缅科在原关东军司令部的一间房子里组成了临时苏军司令部，给他通宵值勤并担任门口警卫的，是山田司令官的孙子。按日本古代的风俗，客人的住房必须由房主人最亲近的人们来守护，这表示客人享有最高的礼遇并最有安全感。

20 日晨，近卫坦克第 6 集团军部队组成的快速支队已经进入长春。

在奉天（沈阳）机场上，第一批由 225 名苏军勇士组成的伞兵分队于 19 日 13 时 15 分正式着陆，它的特命全权代表是后贝加尔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普里图拉少将。

这里发生的情况与哈尔滨和长春都不一样。当苏军飞机降落时，他们看到一队由“满洲国”皇帝溥仪的代表和当地日军守备队长官等人组成的欢迎队伍。在检查机场的建筑物时，苏军战士在一间屋子里发现了溥仪和他的一批家眷和亲属。原来，他们是准备由奉天机场逃往日本的，结果，在他们的飞机还没准备好时，苏军先遣伞兵到达了这里。于是，这个日本傀儡皇帝和其他城内的日军官兵一样，也成了苏军的俘虏。有意思的是，当这个仅有 27 岁的年轻皇帝一见到苏军全权代表后，便开始痛哭流涕地检讨自己的罪行。最后，他向普里图拉少将转交了一封信，信尾竟写了很长一段对斯大林祝福的话。他还要求千万不要把他再交给日本人，他宁可去苏联。

225 名苏军控制拥有 170 多万人口的奉天（沈阳），简直是根本无能为力。即使到第二批快速支队的援兵到达时，苏军也仅有 1000 余人的兵力。用这些可怜的兵力去解除 5 万多名日军官兵的武装，虽然并没有发生什么事，但也确实让人捏着一把汗。但是，英勇而无畏的苏军做到了这一点。

20 日，后贝加尔方面军由 200 名坦克兵官兵组成的先遣支队分乘 10 架运输机占领了旅顺口和大连港。

随后，其他的中国东北城市及朝鲜地区也先后被苏军全部占领。

到 8 月底，苏军也完成了对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占领和登陆。

至此，以消灭日本关东军有生力量、解放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为目的的空前战争规模的远东战役，胜利地结束了。此一役，计击毙日军 8.4 万余人，俘敌 59.4 万余人。仅后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 1 方面军的战利品，就有火炮、迫击炮及掷弹筒 3700 门（个）、坦克 600 多辆、飞机 861 架、汽车 2000 多辆、机枪 12000 挺、马匹 13000 匹、各种仓库 679 栋。

不仅日本关东军彻底败亡了，整个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机器也被全部打碎了。

很多年来有很多人都愿意研究询问这个问题：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决定日本迅速败亡的，到底是我们开头描绘的那两颗美国原子弹还是苏军出兵作战的沉重打击呢？一般地说，美国和西方人认为主要是前者的超威力打击和震慑；而苏联人则认为主要是苏军的打击。真是公婆自道争夸功。

华西列夫斯基和所有参加这次远东作战的苏军全体将士一样，每人都获得了一枚“战胜日本”奖章。此外，他再次被授予“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

是年，华西列夫斯基恰好 50 岁。

